



传知行学术通讯

二〇一〇年第七期 总 007 期



黄凯平：税制与国家竞争力

李炜光：减税是中国税改的必要步骤

刘尚希：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应该废弃

【传知行学术通讯】

月刊·创刊于 2010 年

2010 年第七期·总第 7 期

【主编】

金复生

【封面设计】

魏强

【本期撰稿（姓氏拼音序）】

崔卫平、楚望台、丁东、傅国涌
郭玉闪、胡平、何清涟、华新民
黄凯平、李炜光、刘尚希、刘荻
秋风、任星辉、谢韬、肖雪慧
野夫、杨孚瑞、由晨立、张博树
张大军、曾金燕

【说明】

《传知行学术通讯》是传知行研究所的电子刊物，每月中旬发刊。内容包含我们所做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兼有公共话题方面的文字，同时《通讯》也是结交与我们有着共同价值理念朋友的一个公共平台。我们非常欢迎各位读者加入到我们的撰稿行列，如有意向请投稿到：chianjinfusheng@gmail.com，届时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

【出品机构】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网站】

<http://www.zhuanxing.cn/tongxun.aspx>

【博客】

<http://chinatransition.blog.sohu.com/>

【邮箱】

chianjinfusheng@gmail.com

[卷首语]

不许自由

“魔兽世界”第二部“巫妖王之怒”经过行政审批的蹉跎，终于在 8 月底与大陆玩家见面。不过，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巫妖王之怒”，遇有玩家的角色名、对话等中间出现“自由”等词汇时，要么提示修改，要么直接显示乱码。对此，一些玩家在网上发动“非自由不魔兽运动”，而多数玩家则兵来将挡：魔兽没了“自由”，“目田”蹿红网络。

据百度百科：目田，象形词，意指被阉割了的自由，很明显，自由的俩带把的都被和谐了；近义词，自由；反义词，自由。

“魔兽世界”的与“自由”为敌，或者是个偶然的技术失误；而在最近的事件中，不许自由，一如既往，依然是个不折不扣的现实问题：谢超平先生因发表反映三门峡移民问题的报告文学《大迁徙》而被陕西渭南警方于 8 月 19 日进京刑拘，且至今未报检察院批捕，大概受到了“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的“礼遇”。不过谢先生的罪名，既不是“诽谤政府”也不是“敲诈政府”，而是“非法经营”。

《大迁徙》是自费出版不假，但却是经火花杂志社同意而以其增刊名义印行。《大迁徙》的内容，不但火花官方认可——不反人类、不反社会，“反映移民真实疾苦的纪实文学”——气势汹汹的渭南警方也未置一词。《大迁徙》有书号刊号，至于未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备一节，正如《火花》执行社长魏丕植所言，“只是违规行为，最多承担行政责任”。事实上，《火花》的主管单位山西省新闻出版局也已经对他们进行了处罚：贾祸的《火花》下半月刊永久停刊。

“渭南书案”，舆论轰动，惟渭南警方岿然不动，空余“我们要把你请到渭南去见我们的书记！”“我是警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寸土地上的事，我都可以管”的豪迈，绕梁不绝。渭南警方，其实和进京抓记者、网上通缉记者、跨省追捕网友的地方警察一脉，除了更“大胆有为”，无甚特别。真正的问题在于，涉及公共问题的言论受制于事先审查，即使大实话，未经许可也说不得；漏网之语，不过程序瑕疵行政违规，便有巧立名目的刑事追诉伺候——这根本就是一个无地自由的体制设计。

然而，自由岂是锁得住的，惹不起总躲不起：“目田”兴起，《大迁徙》以电子版、复印本的形式四处流传……

任星辉

2010 年 9 月 15 日

[目 录]

传知行动态	4
刊物.....	4
会议.....	4
讲座.....	4
时事评论	5
转型智慧	
重提转轨并论其可能性.....	秋 风 5
米奇尼克余波	
有关米奇尼克中国对话的几点思考.....	何清涟 12
波兰的昨天和我们的今天.....	刘 荻 16
把老虎赶进笼子里.....	崔卫平 18
关于米奇尼克北京之行争论之我见.....	何清涟 30
自由从何而来?	刘 荻 34
研究专栏	36
企业有没有边界?	郭玉闪 36
台湾全民健康保险计划缩影.....	杨孚瑞 38
强制收治应当遵循的三个原则.....	楚望台 43
告诉你：土地不是“国家的”	华新民 46
封面专题·减税，中国税改的方向与契机.....	48
税制与国家竞争力.....	黄凯平 49

减税是中国税改的必要步骤·····	李炜光 53
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应该废弃·····	刘尚希 57

转型译丛 ······62

非武装反抗（四）·····	张大军 62
---------------	--------

大学论坛 ······81

回望历史——百年前的大变革·····	傅国涌 81
--------------------	--------

逝者····· 98

怀念谢韬老·····	张博树 99
好人谢韬·····	肖雪慧 100
缅怀谢韬先生·····	丁 东 102
要民主还是要专制——从谢韬文章谈起·····	胡 平 103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谢 韬 105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忆李慎之·····	谢 韬 114

副刊·····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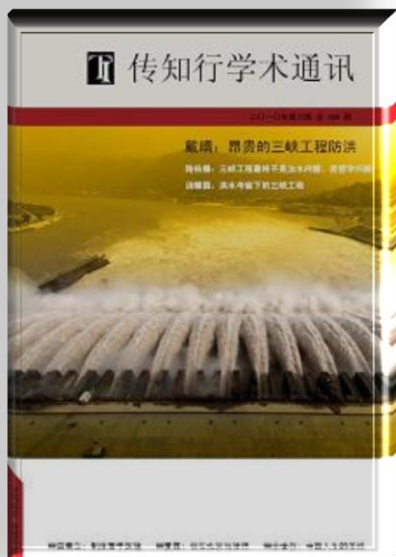
查拉图斯特拉新说·····	曾金燕 133
畸人刘镇西·····	野 夫 134

传知行推荐 ······142

好书：《奥地利学派译丛》推介·····	由晨立 142
新闻·····	145
文章·····	146

传知行动态

刊物



传知行学术通讯 2010 年第六期

上期回顾：很高兴有几位新朋友加入了本刊的撰稿和制作，主要从事与中国政教关系和土地制度相关实证研究的独立学者孔德继先生，通过多年对中国高校制度的观察，中美类似制度的对比，在《呼唤有政府的野鸡生存——由唐骏事件反思中国教育》一文中，从事实分析入手，直问中国高等教育何去何从。

一直以来心存恢复历史正义大目标的余世存先生，最近为尚未付梓的《回到卢作孚》一书作序，他写到：“就在中国人对成功人士献媚或成功人士洋洋得意之时，社会戾气空前地高涨。普天之下，莫非暴民，率土之滨，莫非暴行。这种残暴之横行，成功人士也在所难免，甚至是攻击的重要目标。”当举国将成功模式奉为人生的圭臬并顶礼膜拜之时，世存先生提醒我们，人生还有另一种生存范式，民国的卢作孚等人就是其典范。他们向我们昭示了人生的丰富性，生活的内涵，以及伟大的真正尺度。本期副刊收录这篇序言，感谢世存先生。另外，还收录了慕彦臣先生《“白封出版”的重大意义》和远在澳洲的李程远先生为我们惠寄的一篇人物访谈——《对话黄有光》，在此一并感谢。

传知行学术通讯 2010 年第六期 PDF 下载

会议

- 2010 年 9 月 3 日，传知行召开出租车项目研究小组讨论会，讨论 2010 年度出租车报告写作工作。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传知行研究员由晨立，出租车项目研究员杨帅、金怀宇。
- 阿里巴巴集团成立网规研究中心，本所研究员郭玉闪受聘为特约研究员，本月 9 日获邀赴杭州参加第七届网商大会暨第六届西湖论剑。

讲座

- 传知行主网页“大学论坛”部分近期做了内容更新，请点击以下链接访问阅读：
<http://www.zhuanxing.cn/project-dxlt.aspx>

时事评论

编者按：大多数关心中国前途的有识之士，出于对中国现状的忧虑都担心中国未来会以非常巨大的代价进行转型，但是迄今为止，一直未能出现对可能影响中国走向的各种力量做清楚分析的文章，秋风的《重提转轨并论其可能性》一文是非常重要的开端，在此文里他用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对中国现有格局中各种影响因素作了归纳，未必最准确，但确实奠定了一个扎实讨论中国转型面临之风险、可应对之策的最根本基础。这是民间对温家宝在深圳讲话里所提及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做的最好的回应。只有民间能为中国转型贡献类似知识、智慧与理性，才有可能与体制内改革派形成理性互动，从而廓清疑虑、打消既有利益集团对转型风险（例如仇恨导致的清算）的恐惧。这种良性转型格局的形成，端赖于类似秋风文章这样的努力以及更多有识之士的投入；如此，或许中国转型可以获得一线乐观的机会？从今年开始的五年，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立宪时刻之一。下面将会当下中国的各种政治、思想力量略作分析，初步的结论是，各界精英必须作出重大政治决断：要么透过理性的协商、合作、选择，打败权贵资本主义和极端的政治原教旨主义，平稳地完成转轨；要么得过且过，听任伦理、社会秩序溃散，政治秩序崩溃。

本通讯在第五期曾以很大篇幅报道并评论了米奇尼克先生之访华；米奇尼克北京一行，与知识分子以及网友两次见面，引发了巨大反响与议论，近来又添新论，我们将论者的几篇文章放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小专题，名曰：米奇尼克余波，与大家同思共论，感谢几位作者惠赐文稿。

转型智慧

■ 重提转轨并论其可能性

秋风

如果他们足够明智，转轨的启动就有六成可能性。全社会向上的力量就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两个最危险的敌人：权贵资本主义与毛左派。

➤ 社会结构的极化与紧张

2004 年是当代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构成了 1992 年以来的分水岭。在这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动、由“三个代表”理论予以确认、中国加入 WTO 予以加速的市场化，因为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权贵私有化，及工人权益遭受广泛而系统的侵害，也因为教育、医疗等领域商业化改革的失败，至此破产。这意味着，所谓的改革共识不复存在。社会开始急剧分裂、乃至于断裂。

此一分裂的背后乃是权贵联盟之自觉，从这一年开始，权贵联盟公开化：

1、经济上，官府在经济上的政治倾向性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从这一年开始，国有企业取得眩目成绩，“国进民退”大规模展开，国有企业成为民众的众矢之的。一般领域的私营企业与官府之间的蜜月终结，成为官府的刀



秋风，独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研究。著有《为什么是市场》、《立宪的技艺》，主持翻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译丛》。

下之俎。

2、土地利益集团强势出现，它们的构成分为多个层次：核心层是权贵型房地产开发商，与各级政府中主政官员；其次是商业银行、投资、信托公司；再次是大学、研究机构中的所谓专家和房地产媒体。相当数量的城市中产阶级也被裹挟进这个集团，因为他们的财富集中于房地产，这笔财富的安全仰赖于这个集团对政治的操纵。

这个徒弟利益集团目前是中国最具有政治操纵意识和能力的群体。它们的行为连贯而彻底，因而它们可以几度扼杀《拆迁条例》的修订，也可以操纵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因为它们能够带来经济高增长，因而也在政治上居于主动地位。

这两个权贵联盟肆无忌惮，引发大众愤怒，导致三个重要社会结果：

1、精英全面失信：大众首先失去对官员和富裕阶层的信任，进而失去对专业人士的信任。从诸多流行词汇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黑衣天使、叫售、砖家。在李庄案中大众也表现出了对律师群体的深度怀疑，薄熙来正是利用了这一情绪。总之，原来尚被人们尊重的体制内精英，已经基本上丧失了领导社会的资格。

2、官、民关系紧张和冲突弥漫、加剧。其中大部分是由土地利益集团的非法行径引起，“维权运动”就是在此背景下兴起的。

3、贫、富间的对立日趋严重，贫富分化已被人们视为最为重要的社会问题。这种紧张和对立具有弥漫性，事实上影响到所有人看待所有事情的心态。

总之，不满、愤怒、怨恨已经变成这个社会基本的情绪，社会基本上已经陷入失序状态。

➤ 维稳体制与改革的终结

党政统治体系已经深刻感受到这样的社会紧张所释放出的巨大压力，曾经在九十年代被各方有意淡忘的“专政”，突破粉红色的改革话语体系，而坚定地构造自己，形成了“维稳体制”。中共本为一个革命党，1949年所建立起来的政府乃是一个革命政府——因而这是一个专政政体。在70年代遭遇严重的危机后，八十年代启动“改革”，部分地掩藏了其革命政府性质。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具有强烈的革命政府性质，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就是：党政统治体系用革命的手段实现经济增长，因为这个时候，经济增长已经被当成革命的主要任务，被当成证成革命的主要依据。

但是，这个专政体系可以随时回归。第一次系统回归发生在1989年之后。此后，革命性再度被遮掩，三个代表理论与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官方话语，表明了非常规的革命治理之正当性丧失之后，重建常规统治之正当性的一次努力。随后引入民主、法治政府的政治价值，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不过，这样的努力并不完全成功。因为，革命依然是这个统治体系的基底，增长依然主要是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的。而革命一旦介入日常性商业过程中，就必然变成不公正的制造者。不稳定就是革命推动增长的模式所造

成的。而一旦出现秩序不稳定，根本没有完成转型的统治体系也就必然立刻回归革命。维稳体制是专政体系在八十年代以来的第二次系统回归。

不过，这两者间也存在重大区别：上一次的专政针对明确的一小撮敌人，这一次的敌人却是根本不知其在何处的大众。因此，目前的维稳体制不能享有任何正当性，而不能不遮遮掩掩地运转。但是，可以预料，目前的维稳体制将日常化，。如果社会日趋紧张，专政的力量也将趋向强化。从政体科学的角度看，本轮维稳体制与 1989 年后的维稳体制大不相同。上次的专政是由老革命者进行的，他们充满了控制的自信，因而可以说，他们重建了革命政府。而革命政府的基础永远是被人信仰的意识形态。

但是，本轮维稳体制则缺乏这样的意识形态支持，因此，2004 年以来似乎是被无意识地构建出来的维稳体制不再是革命政府的重建，而是威权主义政体的构建，它将主要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和暴力威胁。这样的维稳体制基本上采取防御态势，它的目标仅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秩序。这意味着，它没有能力消灭它所圈定的敌人。因此，维稳体制注定了将是不稳定的，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性政体。

而在此期间，自上而下的改革很难存在，而且必然出现所谓的“倒退”。维稳体制的出现，就明明白白地意味着改革的终结。因为，改革必然改变秩序，维稳则要维持秩序，两者是直接对立的。这样的体制自身是难有改革动力的。

这个时候，必须重提“转轨”。

“改革”是一个故意含糊其辞的概念，这个概念主要为执政党使用，几乎所有变化都被称为改革，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改革体制”，它是一个软化版的“革命体制”。对于信奉自由（包括自由市场制度）、民主、宪政这样的价值的人士说，八十年代以来，他们期待的一直是“转轨”。“转轨”的意思就是从现有的治理秩序转入另一种治理秩序。九十年代苏联东欧变化引入了这个词。不过，随着东欧转型的形象破灭——这部分是专家的短视和媒体的偏见所致，人们几乎很少谈论转轨了，相反，出现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之说。此说的潜台词是：中国已经找到了恰当的制度框架，因而根本无需转轨了。转轨已经完成了。

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个幻觉。中国仍然处于过渡时期，几乎所有思想流派、几乎所有严肃思考中国问题的人都相信，中国迟早要经过一次大变革，也即“转轨”。因为，维稳体制注定了是一个过渡性政体，它没有前途，必须另找前途，因而必须转向另一个轨道。

➤ 思想界新趋势

对此，思想界已经进行了一些思考。过去十年中，中国思想界经历了相当剧烈的变化：

1、2004 年，伴随“郎顾之争”，经济自由主义声誉扫地，市场化改革被大众抛弃，而鼓吹市场化的体制内外经济学家，也基本上被执政党和政府抛弃，大大丧失话语权，在整个决策过程中边缘化。相反，出现了与他们的信念完全相反的强大趋势：国进民退。

经济自由主义丧失信誉，也连累了自由主义，因为当时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接终于市场化的话语浮现。面对大众声誉危机，自由主义开始分化。

2、维权自由派兴起。这一派掀起了公民维权运动，在征地、拆迁、宗教、上访等领域，相当活跃。在此过程中，涌现了一批维权律师和专业维权活动家，遭到政府镇压。

3、在学术界兴起了宪政主义。推动自由主义理论从空洞的自由概念转向相对具体的制度构造研究。

4、在人文主义学者圈中兴起了和解自由派。它似乎首先形成于海外，近来不少国内自由主义者受到东欧转型成功启发，转而强调建设性，主张妥协与和解。

5、毛左派异军突起，九十年代，国有企业工人大量下岗，这些工人很自然地重回其本就十分熟悉的毛思想。新世纪的贫富差距扩大，扩大了其接受范围，大量大学生、大学新毕业而生活落魄者，信封了毛思想。他们愤怒的第一个对象是资本及他们想象的资本代理人——经济自由主义者，第二个对象则是支持改革的当权者。他们是中国版的极端原教旨主义。

6、学术界还有国家主义之崛起，这属于中国版的极右翼，其代表人物是刘小枫。

7、民主社会主义顽强地生存，他们是“一二九”一代及八十年代改革派的老人。他们主张执政党回向新民主主义，或者直接走向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他们介于体制内外之间。

8、儒家同样兴起，尤其是政治儒学别开洞天，并产生巨大影响。

9、执政党正式机构内部也活跃着一批民主主义者，不少官员是法治主义者。

10、中国的民族主义始终不成器，没有发展出系统的理论言说，因而很难说是一种思想流派，它更多地是一种情绪，但这种情绪具有相当强的弥散性，会贯穿多个思想群体，比如国家主义、毛左派、儒家都不乏民族主义情绪。

上述思想流派，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为温和派，包括经济自由主义，维权派、人文派自由主义，宪政主义者，部分儒家，民主社会主义、党内法治民主派。它们构成了一个松散的自由主义联盟，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要求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尽管对其理解存在严重分歧。通常，他们也反对暴力，恐惧可能出现的暴乱。

第二类是极端派，主要是毛左派，它呼唤暴力与暴乱，试图颠覆整个秩序。它不仅准备颠覆现有政治秩序，重归毛式强人独裁；也试图颠覆现有经济与文化秩序。因此，它是中国式的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与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异曲同工。也因此，它们与这些原教旨主义频繁呼应。

一点也不奇怪，上述两大派都不满意于现状，都要求变化，而且都要求根本性变化。这种根本性变化就是宪制革命，尽管是完全不同的革命。可以说，整个思想界关心的主题已从八十年代的文化、九十年代的经济，转向政治、宪制，转向统治权的重新安排，尽管其价值取向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思想界这一趋势说明：转轨不可避免。

➤ 执政党的精神分裂与政治分化

谈及思想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已经溃散，根本无法提出任何具有吸引力的概念，更不要说体系了。执政党已经没有愿景。它基本上是在没有灵魂的状态下生存着，靠着革命党的遗产生存着——也即靠着人们对它的恐惧生存着。它仅仅为了生存而生存，也即仅仅为了既得利益而生存。这意味着，现在的它基本上丧失了政治性。这也正是维稳体制不是革命政府的根源所在。

不过，如果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目前的党政统治体系并不完全可以用维稳体制来概括。它的身体是复合的，在价值上，它处于精神分裂状态。

一方面，执政党始终坚持其原有的专政性宪制框架，因而“专政”、“敌人”这样的词汇依然具有合法性。这些也是维稳体制的理论依据所在。但另一方面，过去三十年，中国深受全球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响，也坚持“改革”，并且沿着改革逻辑，引入了大量现代文明符号，比如市场、人权、民主、法治。“民主”是以前就存在的，且经过了系统的 1984 年式解释。不过，因为其他概念都是全新的，并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地概念框架，“民主”被置于全新的概念框架中，它的 1984 式解释也就逐渐剥落，而转向了主流的解释。党内民主法治派和财经官员就是这一价值的承载者和守护者。

这两种价值同时存在于统治体制内，执政党试图将其融合为一体，但没有、也不大可能成功。这样，就形成符号与制度的脱节，言辞与行动的分裂，公开言辞与秘密言辞的相互矛盾。执政者陷入精神分裂状态。这种精神分裂的政治后果之一是：它基本上丧失了真正的专政者的自信心。而且，维稳体制必然遭致其身体内部的反弹。

当然，这种精神分裂也敞开了体制内出现政治分化，进而出现了变革的可能性。

➤ 执政党精英的结构与心智变化

革命政府通常是铁板一块的，因为，意识形态可以支持其清理——甚至从肉体上消灭——价值观念上的异己者。维稳体制却没有这种能力，因为所有人本来都没有坚定的意识形态信念。因此，维稳体制尽管试图维持秩序，但它的内部其实就缺乏革命性秩序，相反，它具有常态社会的多样性。

过去两年中，执政党的最高权力层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随着执政党换届将继续进行：

1、精英的权威结构发生变化：过去六十年中，统治的单一中心权威在持续地衰减，到今天，已经接近其极限。这种结构正在向多中心权力结构转变。从而有可能形成精英共治-分治的格局：重大问题上脆弱的共治，日常的分治。

2、执政党精英的心智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也即从工程师、辅导员向红卫兵转换。这一转换可能产生重大政治后果。

工程师只能根据他人的蓝图组织施工或者操纵机器，辅导员的心思是琐碎而乏味的。两者都缺乏政治上的想象力，也缺乏政治责任感。相反，红卫兵具有激情和想象力。红卫兵敢想敢干，不畏任何权威。红卫兵具有政治意识，具有宏大政治抱负：他们曾经准备解放全人类。这样的抱负让他们倾向于思考和解决根本问题，而蔑视细节。最为重要的是，红卫兵具有政治家意识，他们知道大众的重要性。

正是这种心智，推动他们狂热地卷入文化大革命。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挫折，让他们经历了对毛体制的一次彻底幻灭。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他们又是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其中不少人推动了八十年代的改革。因此，红卫兵一代精英具有变革的政治意向，如果有必要，他们也可以作出决断。

➤ 温、薄异曲同工：政治新现象

正是上述变化，催生了一个值得深度关注的政治新现象：大众政治的初步浮现。两个人物是其主角：

1、过去两年中，温家宝频繁地表现其亲民形象，并不断发表关于政改、法治、民主、正义的言辞，赢得舆论

的广泛支持，也在自由主义联盟中引起强烈反响——比如，各地网友目前正在“组织学习”温在深圳关于政改的讲话。

2、主政重庆的薄熙来通过“唱红”进行大众政治动员，通过打黑、通过打击律师，通过民生措施，取悦大众。

两人的政治取向大不相同，操作手法却惊人相似。由他们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具备了“政治”意识。这里的政治就是寻求民众、大众的信从。除了毛之外，共产党没有人玩过这样的政治——毛时代也只有毛一人具有玩政治的特权。到了后毛时代，中共的基本活动形态是宫廷政治，精英依据势力——主要是人事和资源控制力——分配权力，即便是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也是秘密的。

这两人则启动了大众性政治，或者说准大众政治。政治精英把目光从庇护人、从同僚，总之，从宫廷，转向了大众。他们知道取悦大众的重要性。而大众的支持，也确实成为他们政治的政治资源。

这当然是因为，庇护人已经不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了，而“同僚”也都缺乏深厚的人脉网络，整个庇护-被庇护体制不再那么紧密有效。这个时候，寻求扩张权力的精英，就只能向下寻找，通过大众的支持，积聚政治力量。

这是过去三十年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形态变化之一。有人批评温家宝作秀，这是对现代政治无知才会得出的结论。

这样的政治，天然地与维稳体制之间存在冲突。维稳体制倾向于秘密操作，大众政治必须公开。由此可以理解，即便薄在进行黑打，但它仍然允许媒体采访。因为他相信，通过这种公开，可以向大众展示律师的无耻，从而赢得大众支持。

➤ 转轨共识：六成可能性？

上面对当下中国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执政党结构和观念略加考察，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根本性变革，也即“转轨”已构成一个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必然性；第二，“转轨”也具有一定可能性。

体制外精英的转轨意识始终未变，最近一年发生的若干事件证明，体制内精英的转轨意识正在重新苏醒：温家宝的政改讲话，秦晓对中国模式的否定，和对现代国家构想的阐述，刘亚伟关于中国十年必然民主化的讲话，都表明，他们默认转轨的必然性。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政治态度遭到毛左派的激烈反对。这一政治原教旨主义的激烈反对，足以构成任何明智的精英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限制性框架：任何关于中国前途的思考，必须以化解、避免这种原教旨主义运动为前提。这个运动已经积聚了非常强大的力量，随时可能爆发出来，并淹没现有的一切秩序，不管是体制的秩序，还是体制外人士珍视的财产权、个人自由、社会等等。

这一限制性框架让转轨不仅是必然的，也具有可能性。也就是说，为了反对共同的、最危险的敌人，体制内外所有理性的、明智的精英应当联合起来。唯有如此，中国主流社会才有可能对抗政治原教旨主义。这是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所有人需要对此做出决断。

事实上，这种反对政治原教旨主义的联合，也是有可能的：

1、体制外寻求转轨的各种自由主义的力量，一般而言，对大规模暴力和动荡的前景心怀恐惧。他们通常是社会精英，因而期待平稳转轨。人文自由派甚至已经明确释放出了和解的信号。

2、精神分裂的统治体制中，已经有一半是认可转轨的，温家宝就代表了这一力量，它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和党内民主法治派。

这两派目前已经联合起来，默契配合。民主社会主义的老人们中不少本来就横跨体制内外。需要考虑的是体制内的另外两派：

3、体制内存在一个传统派，它对党的事业还保持了一定盲目忠诚，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执政党始终维持其存在，甚至是强势的存在。


4、还有另一派，权贵资本主义派，主要就是自上而下的土地利益集团。它关注于短期的掠夺。

传统派如果具有政治的明智，就不能不承认，七十年大限很可能是一个普遍经验性规律，中国目前的社会状态似乎也指示了这一规律的有效性。既然如此，为了实现它的目标，它需要考虑的问题就不应当是永久甚至长期执政，而是如何实现平稳转轨，最好是掌握着主动权的转轨。简单地说，它其实从现在开始，尽最大努力复制海峡对岸的国民党的转轨路线。这是保持执政权的唯一可行策略。万年执政之类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而有害的幻想。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派应当认可党内民主法治派的努力，而与体制外自由主义联盟形成默契。真正的难题是如何处置权贵资本主义集团。其实，如果党内民主法治派与传统派联合起来，是完全可以遏制这个集团的。

但传统派却经常与这个腐败的集团紧密合作。因为，这两派都属于保守派，他们都倾向于维持现状。只不过其理由并不相同：传统派唯恐任何变革会导致统治权的丧失；权贵派却担心，任何变革都可以让自己丧失进一步掠夺的机会。也正是基于这一共识，权贵资本主义把自己的私人利益装扮成党的利益，游说传统派采取强硬措施。民众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反抗，也确实会被传统派理解为是对党的统治体制的反抗。恐怕正是这两者的合作，构建和维持了维稳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体制内变革能否启动，取决于传统派是否足够明智。如果他们不明智，转轨的可能性就只有四成。中国社会的结局很可能就是玉石俱焚，包括传统派的价值甚至人身。

如果他们足够明智，转轨的启动就有六成可能性。全社会向上的力量就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两个最危险的敌人：权贵资本主义与毛左派。

这两种力量都缺乏理性，而放纵激情：一个是放纵贪婪，一个是放纵仇恨。他们相互敌视、恐惧，因而也都拒绝理性，拒绝妥协。他们之间形成的正反馈，随时可能从内部爆破整体社会政治秩序。中国能否完成转轨，最终取决于他们之外的一切理性而负责任的精英能否联合起来，凝聚成一种压倒性力量，化解、瓦解、以至摧毁这两个极端主义的、反政治的力量。 

2010年9月9日

米奇尼克余波

编者按：从米奇尼克“只有依靠党内改革派才能实现非暴力转型”这个观点开始，何清涟、崔卫平、刘荻三位女士之间进行了一场反复的并且严肃的讨论。且不论对米奇尼克北京之行表达的观点归纳的准不准确，也撇开关于国内国外“资格”这样带点意气的争执，这场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的转型会怎么发生？应该怎么发生？东欧的经验包括米奇尼克的波兰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否？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去讨论，去思考；只要关心中国的未来，期待中国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么这样的争论越多越好，碰撞的越多，就越能出彩。比如，这次争论里，崔卫平老师的《把老虎赶进笼子里》既介绍了米奇尼克最深刻的一些看法，又几乎把国内近年来公民社会展开的思想背景概括完全；而何清涟女士的文章，也基本上把民间反对派对官方的意见分歧分析清楚，即“有歧见的是如何迫使官方作出理性选择”，其实大家都明白应该设法让官方在中国转型上采取理性反应，但问题在于民间如何才能推动形成这样的局面。只要中国转型未成功，这永远是最核心的问题。

■ 他人的经验与我们的现实——有关米奇尼克中国对话的几点思考

何清涟

徐友渔一直崇尚和平转型，主张耐心等待中共变革。在这次座谈会后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却表示：“当他（米奇尼克）谈到和解的时候，我最大的启发是中国现实条件和当时波兰的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方不能绝对压倒一方的时候，才能提和解，但是如果现在统治者自认为可以使用暴力绝对压制对方的话、根本没把对方当一回事的时候，谈和解是不行的。你知道中国近年也有很多人提和解，并成立了一些相关的东西，理念上我当然是赞成的。谈和解要掌权者对你有一定程度的尊重、有能力让他们认真倾听你的声音，如果没有的话，现在谈和解纯粹是一厢情愿的。”

最近，波兰民主转型时期的代表人物、“自我克制的革命”理论的倡导人米奇尼克先生访问中国，与中国部分自由知识分子及维权人士开展了两场对话（一次座谈与一次推特对话）。从两次对话的内容来看，我感觉与其说让中国民主运动的先进（包括本人在内）在这次对话中找到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还不如说让大家看到了波兰与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巨大差距。有时候认识差距也是一种必要，因为只有认识到差距才会知道他人的经验有多少可资借鉴。



何清涟，湖南邵阳市人，女。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198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曾工作于深圳，供职于某报社，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现居海外。专门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代表作《现代化的陷阱》在海内外引起轰动，成为学术著作中罕见的畅销书。

米奇尼克在两场对话中主要是答问，思路随问题而生，比较零散。但其中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只有依靠党内改革派才能实现非暴力转型”，其余“要有力量，有对话的意愿，还要有耐心”；“面对共产党，我们缺乏想象力”等都是围绕这一观点的阐发。

➤ “只有依靠党内改革派才能实现非暴力转型”

米奇尼克首先声明他不了解中国（从后面的谈话看，这并非自谦之辞），因此他的所有判断与建议确实只能依据当年他在波兰民主化进程中积累的经验。因此，参与并读到这些对话的人士只能根据中国现状来判定哪些建议可行。

7月9日北京座谈会的主题是“分享波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联合、非暴力与和解”，其中“只有依靠党内改革派才能实现非暴力转型”应该算是米奇尼克的重要告诫。米奇尼克还谈到：“我认为，波兰的模式对各位来说，应该是一个很有兴趣的模式。圆桌会议就是一个既不毁灭国家又能消灭专制的方式。各位一定要组织一个公众舆论的机构，舆论是力量聚集所在。”米氏所谈到的，中国异议人士与维权人士其实都早就想到了，近年的网络舆论与以南方报系为主的一些媒体都在努力践履。与中国知识界早在80年代初就成形的“必须借助于体制内的改革派，形成从上到下的合力”的策略相比，米氏建议亦无新意。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各界包括政坛精英，一致承认中国社会当时正处在从专制逐渐向民主过渡的社会转型期，除了胡耀邦、赵紫阳被公认为党内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之外，连邓小平都被视为改革派的强大主心骨，陈云、邓力群等人及其周围人物则被视为党内反改革的代表人物。当时中国知识界提出的“借助于体制内改革派”的策略，不仅具有一定现实基础，亦较好地付诸操作，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成为当时改革重点，深圳蛇口甚至一度创造“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

但自1989以后至今，从江朱到胡温，其经济与社会分配政策日益向利益集团倾斜，意识形态上更是明显地一步步向左回归。尽管知识精英中的民主派日渐式微，但异议人士中的温和派倒是从未放弃“借助于党内改革派力量”的想法，问题是他们自己可能也无法确定哪些人才是党内的“改革派”的代表人物。目前要在中共党内高层找出主张政治转型的“改革派”，确实得发挥非凡的想象力，至少应该具备类似清雍正时期湖南儒生曾静策反岳钟麒的那种“想象力”。其实，米奇尼克提到的对共产党的“想象力”，在中国民间从来就不缺少，上世纪80年代民间对邓小平、“六四”期间对万里、90年代中后期对朱镕基都曾寄以厚望。胡锦涛备位期间直至上任两年后，对其能力与志向发挥“想象力”的不仅是中国社会，还有国际社会。许多文章的丰富“想象力”，可能让作者自己都不愿意再回头检视。充满深情的“胡哥”之称从互联网上消失只不过是昨日之事。

➤ 自我克制的革命与中国非暴力革命理同势不同

米氏谈到：“波兰有天主教因素，很有力。自由运动三大因素：知识界、工人和天主教。历史上讲，波兰工人运动都是自发的，比如60年代，没有政治上的结果。”“没有力量的真理是无法说服当权者的，我们首先要有力量，有对话的意愿，还要有耐心。我深信，中国必然会发生民主化的变化，要不，通过协商；要不，通过冲突。

这里应当稍稍介绍一下波兰转型前的社会状况。在共产党国家中，波兰率先出现了具有大规模号召力的民间组织——团结工会，当时米奇尼克提出的“自我克制的革命”理论成为团结工会的行动纲领（也是波兰民主化进程的行动纲领）。但这一切并非从天而降，此前的波兰已经历了长达20余年的一系列变革。在政治上，1956年波兹南事件后，波共开始了政治上的改革，1957年1月进行了新的议会选举，开始实行了差额选举制，意识形态控制明显放宽，民主化思想如春潮涌动，在国际上造成相当影响。其间虽然经历了哥穆尔卡的镇压，但其后继盖莱克执行了一条更大胆的改革路线，政治透明度大大提高。正因为当时的波共领导层保持了这种开放姿态，米奇尼

克才确定了他的行动纲领：不要求建立民主，而是赢得自由；不向共产党夺权或分享权力，而是限制共产党权力的范围，并在共产党政府之外开辟出一片自由的活动空间，建立起真正的民间社会。苏东波到来时，波兰的国家与社会已成二元对立之格局：国家（即政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而社会却已经是民主派的天下，执政党和反对派形成分庭抗礼之局。在此背景下，米奇尼克提出的“自我克制的革命”这一斗争策略，并非一厢情愿的想象，而是审时度势之后的明智选择。

正是在知识界、工人和天主教这三者合力推动之下，波兰最早实现了由共产极权转入自由民主的伟大变革。但这些因素在当今中国全数缺位。中国没有能影响大部分社会成员的宗教，知识界的主流已成为政权的同谋，现阶段的工人“运动”只是为了加薪等有限的经济目的聚集抗争——如果说 1976 年瓦文萨与米奇尼克在建立团结工会之初时就提出“反对所有旨在社会及经济方面要求的罢工”的战略，那么在中国现阶段，除了经济方面的要求比如加薪与工资谈判权等，几乎再也没有其它可以将工人组织起来的动员口号。即使是有意避开敏感政治问题（如不谈自由民主等政治改革要求、不谈六四、不与敏感的国际组织联系）、希望“脱敏化操作”的维权活动，目前也因中共政府有针对性地实施“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而几乎陷入停滞状态，中国的民间社会是如此弱小，根本无法凝聚成任何让政府感到威慑的力量。

而与民间力量分散弱小相对的是当下中国政权的异常强大：中共掌握了政治、经济与所有的社会资源，国家牢牢地控制着社会，不允许民间结社，在中国从事环保、慈善、医疗救助的外国 NGO 一律被政府视为“颜色革命的工具”，想方设法限制其活动。经济发展成果也被用来强化政权的压制力量，2009 年中国政府投入的“维稳费用”高达 5,140 亿元，占 GDP 总量（335,353 亿元）的 1.53%。比较一下同年教育经费只占 GDP 总量的 3.48% 这一事实，从中可以看到中共担心亡党的恐惧感之强烈及其不惜一切代价保持执政权的决心。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共就将一切反对力量扼杀在萌芽状态确定为治国战略。由于各种源于对社会不满的泄愤型报复事件频发，今年 5 月 30 日，政府竟藉《瞭望》新闻周刊宣布中国有 1 亿多精神病患者需要逐步收治，为了保持政权稳定，将整个国家变成“第六病室”亦在所不惜。

徐友渔一直崇尚和平转型，主张耐心等待中共变革。在这次座谈会后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却表示：“当他（米奇尼克）谈到和解的时候，我最大的启发是中国现实条件和当时波兰的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方不能绝对压倒一方的时候，才能提和解，但是如果现在统治者自认为可以使用暴力绝对压制对方的话、根本没把对方当一回事的时候，谈和解是不行的。你知道中国近年也有很多人提和解，并成立了一些相关的东西，理念上我当然是赞成的。谈和解要掌权者对你有一定程度的尊重、有一定能力让他们认真倾听你的声音，如果没有的话，现在谈和解纯粹是一厢情愿的。”

➤ 波兰经验能够适用于中国吗？


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垮台之后，亚洲共产党政权却顽强地延续下来，中国更是借经济改革获得了更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民主先进们的思考并不轻松，“为什么东欧能够完成政治变革而我们中国却不能”成了压在他们心头的一块巨石。

与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先驱们交流相关经验，对于中国的民主先进们绝对必要。但如果因为人家的成功就罔顾国情地将其所有经验奉为圭臬，确实又有胶柱鼓瑟之嫌。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毛式共产主义革命与苏联十月革命都属于原发性的，在这两个革命的摇篮里，崇拜威权与暴力革命都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去除其影响非常不易，比如已经完成民主化的俄罗斯在普京的强权统治下有回归前苏联的明显倾向。而波兰、捷克、东

德等国的共产党政权则是苏联在二战后用坦克机枪送进去的，即外部强力输入型政权，统治者绝大多数是经过苏联政权挑选出来并在莫斯科培训的“代理人”，共产革命在这些国家本就缺乏原发性基础。作为“苏联代理人”的共产党政权始终面临本国民族独立和社会自由的强烈诉求。显然，在这两种国度里祛共产主义之魅的难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波兰本土并无共产主义革命的基础，这个国家历史上的灾难大多由外国制造，其中也包括曾经吞并其大片领土、残杀波兰数万精英的苏联共产政权。正因为如此，它与捷克一样，无论是当政的波共还是民间力量，早就与莫斯科离心离德。也因为如此，米奇尼克得以在波共统治下致力于创建一个“公民社会”，并在时机成熟时推动整个国家脱离苏联阵营，实现波兰国民数代人的独立自由梦想。但米奇尼克如果生在中国，恐怕就没有这种好运了。中国知识界关于这一点的思考由来已久，早在2004年，毕巧林在“米奇尼克方式适于中国吗——读书断想”一文中就谈到：“东欧的统治者与民众之间有许多可以相互妥协与谈判的因素，除人道主义传统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而外，民族主义——对苏联严密控制的共同反感，恐怕也起作用。这使统治者不想过多地加害民众，不想成为历史的罪人。亚洲一些类似国家不具备波兰和东欧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权力阶层是最自私、最没人道意识、最无现代政治理念、最无能，因而最喜欢用最凶残、最简单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群。因而对他们不可抱有希望。他们从青年时代起就都是小爬虫，现在也不会有多大改变。按米氏和哈氏的办法，在亚洲很容易变成犬儒主义。”希望了解中国社会的犬儒病如何形成，胡平的文集《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是本很好的读物。

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的权力之路未经历过暴力革命，其权位不是“靠流血牺牲、拿人头换来”的，因此少有依靠“菜刀、盒子炮”起家之徒的那种心狠手辣及不择手段。而亚洲的共产党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在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前并无比较发达的市民社会和建立在普及现代教育基础之上的公民文化，在这样的社会里，共产党的暴力革命比较容易得逞。更重要的是，亚洲共产党国家的权力阶层普遍缺乏现代文明的熏陶，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迷恋暴力，放纵权力并蔑视民众。长期的暴政统治极易养成犬儒主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与其说东欧共产政权晚期的经验可资借鉴，还不如说通过比对中国与东欧社会的差距，可以反思中国更需要什么。

还是借用黄万盛在“革命不是原罪”中所讲的一个小故事来做为本文的结尾吧。“哈佛的罗尔斯是自由主义的重要学者，一次，他在课堂上讲关于‘无知之幕’的理论，那是他的公正理论的逻辑起点，突然，一个学生举手提问：老师，你讲得很好，我都能接受，可是，这套理论如果碰到了希特勒，怎么办？罗尔斯怔住了，他说，让我想一想，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他在课堂上沉思，整个教室了无声息静静地等着，十分钟以后，罗尔斯抬起眼来，严肃而平和地给出了一个答复：我们只有杀了他，才能讨论建设公正的问题。” 

2010年7月16日

■ 波兰的昨天和我们的今天

刘荻

米奇尼克他们组织飞行大学，在学者家中举办讲座。今天我们也举办讲座，而且有自己的场地。今天我们还有从事环保、慈善和医疗救助等工作的外国 NGO 和以企业名义注册的国内 NGO，我们有市场化媒体，有维权律师，有互联网，有家庭教会（虽然中国传统上不是宗教国家，教会不可能获得天主教会在波兰的影响力）。这部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私营经济的发展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

近日，曾经担任波兰团结工会顾问、现任波兰《选举日报》主编的米奇尼克先生访问中国，与中国网友进行了交流。海外有些人对米奇尼克先生在中国的言论颇有微词。笔者认为，米奇尼克先生说他不了解中国，这或许并不是谦辞，因为他对中国的了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交流时在座的关心中国现状的网友们；但是另一方面，米奇尼克先生对中国的了解要远远超过海外某些自认为了解中国的中国人。

海外有些人先是说极权主义制度无法和平转型，在别人反驳说苏联就是最典型的极权主义制度，而且恰恰是和平转型之后，他们又说中国和苏东的“国情”不一样，用何清涟女士的话来说：“亚洲一些类似国家不具备波兰和东欧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权力阶层是最自私、最没人类意识、最无现代政治理念、最无能，因而最喜欢用最凶残、最简单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群。因而对他们不可抱有希望。”

情况果真如此吗？且不说米奇尼克确定他的行动纲领是否真如何清涟女士所说，是由于波兰当局的“改革”和“开放姿态”。（米奇尼克在《新演进》一文中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新演进”源于 1970 年和 1976 年工人罢工遭到镇压之后，人们对波党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和来自天主教会的“新实证主义者”改革派希望的破灭。他抨击哥穆尔卡“臭名昭著，丢脸之至”。但他认为波党内部不信仰辩证唯物主义的实用主义者虽然没有理由追求民主，但出于实用主义考虑却是有理由与民主反对派达成妥协的，因此他们有可能成为民主反对派的伙伴。）本文主要探讨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否“不具备波兰和东欧的条件”。

何清涟女士说：“中共掌握了政治、经济与所有的社会资源，国家牢牢地控制着社会，不允许民间结社，在中国从事环保、慈善、医疗救助的外国 NGO 一律被政府视为“颜色革命的工具”，想方设法限制其活动。”我不知道何清涟女士说这话的时候是否想过，上世纪 70 年代米奇尼克等人组织“保护工人委员会”，建设公民社会的时候，波兰是否有外国 NGO 的存在？外国 NGO 可以在中国公开合法地活动，只是受到限制，这说明今天中国的社会空间比当年波兰的更大还是更小？

让我们仔细想想，究竟有什么事是当年米奇尼克他们可以做，而今天我们不能做的吗？米奇尼克他们组织保护工人委员会，为 1976 年大罢工中被捕的工人请律师，为他们的家属发抚恤金。此类工作我们一直在做：丁子霖老师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为 64 死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发救济金，独立中文笔会成立几年来也一直在向因言获罪者提供法律和经济方面的帮助。



刘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本科毕业生。生于 1980 年 10 月 9 日，2001 年开始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论及时政。现在从事翻译和写作。2007 年 11 月 16 日加入独立中文笔会。

米奇尼克他们以打字和油印的形式出版地下出版物。现在我们不仅可以出版印刷质量和正规出版物相差无几的地下出版物，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发表自己的观点。米奇尼克他们地下出版的书籍包括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苏联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和布罗茨基等人的作品，当时这些作品无法在官方出版社出版；而在今天的中国，上述作者的作品都能够在正规出版社出版，在新华书店出售，最近广东花城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收录转型前东欧国家地下出版物上刊登的文章的文集。

米奇尼克他们组织飞行大学，在学者家中举办讲座。今天我们也举办讲座，而且有自己的场地。今天我们还有从事环保、慈善和医疗救助等工作的外国 NGO 和以企业名义注册的国内 NGO，我们有市场化媒体，有维权律师，有互联网，有家庭教会（虽然中国传统上不是宗教国家，教会不可能获得天主教会在波兰的影响力）。这部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私营经济的发展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在上世纪 70 年代的波兰，在一个几乎没有私营经济的国家里，工人被工厂开除就意味着失去一切，甚至得不到医疗保健。作家布兰迪斯在《华沙日记》中写道：“人们仍然有所顾忌——工资、住房、小孩上大学、旅游、日常生活，”这些都掌握在政府手中，“这就足以让人们畏惧。”

哈维尔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后极权社会：“我们有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时常有人用这句话来抨击当今中国社会的“犬儒化”。但是笔者认为，哈维尔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明白“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意味着什么。人们要想真正拥有“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就必须也拥有不受政府干涉地生产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而要实现这一自由就必然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让社会拥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在一个像哈维尔文章所描述的那样，水果店里的水果是政府和“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标语一起发下来的国家里，人们是不可能真正拥有“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的。经济自由和自由所带来的财富不是别的，正是每个人实现自己目标的基础，而且这一自由只有在拥有之后才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在一个工资、住房、小孩上大学、旅游和日常生活都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国家里，人们更难去追求更加高尚的目标。

中国当局进行的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或许存在种种弊端，但其结果确实是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使民间社会拥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也为中国的转型创造了条件。海外某些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评论中国问题时就只能令人啼笑皆非。 T

2010 年 7 月 30 日

■ 把老虎赶进笼子里

崔卫平

但是除了“远景”，我们能不能有一些近景？除了我们想要去完成的蓝图，我们能不能考虑眼下能够做起来的？而如何去做，取决于对于眼下形势的分析，对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判断估计，对于自身力量的估计，包括也许要想一想，对方正在干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

题记：古人云，苛政猛于虎。不受限制的权力，叫它做“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一样的。

➤ 不能光看离权力较近的那一头

波兰反对派运动的设计者亚当·米奇尼克来北京，由网上所释放的信息，引发了不同意见的争论。其中一些是善意的提醒，值得关注。这同时也说明了米奇尼克的思想面貌比较复杂，拥有多重维度而具有相当的张力，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目前的争论本身，提供了接近这个人思想的又一个机会。

争论的焦点在米奇尼克所说的有关“和解”、“妥协”“自我限制”以及提及“党内改革力量”方面。无疑这些是米奇尼克思想（及波兰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米奇尼克的思想（及波兰经验）却远远不止于此。在推特上王天成先生说得十分中肯：“他这次访华，建议民间力量依靠党内改革派，这话容易引起误解。这是波兰的经验，但不是波兰经验的全部。由于团结工会的力量，波兰才分裂出党内改革派，提议与团结工会谈判。反对派的强大是前提，这是要记住的。”

应该说，饱受争议的这些内容，只是在一个艰难困苦的长过程中，出现在靠近结尾部分上的东西（它们也更加靠近权力）；但是这个部分，实际上是在这个长过程中，通过靠近开端上的部分来保证、延伸以及呼唤出来的。而我们谈论米奇尼克，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仅仅关注靠近权力的“后半部”，光看故事的结局，而忽视这个故事最初独立的、首创性的起点。

米奇尼克先生经历了那个结尾。这个结尾翻过去也已二十多年有余，这之后米奇尼克先生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正像我们并不十分关心他目前头脑中的问题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米奇尼克先生在短期内，一下子回到二十多年前某一个特定阶段中去，尤其是完完全全回到遥远的起点本身。而这个起点其实是最为重要的，起点上的东西是最富有动力、活力和引起激发的。当然，只有在起点上出现的，在终点上才有可能呈现。这个往前“翻页”的动作，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做的，也是一件需要耐心的工作，米奇尼克称“不了解中国”，这没有什么奇怪的。然而趁此机会，我们是否也试着想一下——身为中国人，懂得中文，我们就一定像我们自己以为的那样，或者像我们应该做到的那样，更加了解这个国家？有能力把握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任何关于中国的认识和表述，都同时释放了这个人的某个处境，他本人所处的那个位置，以及他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自身的处境，其中不排除这个人自己的处境及行为而进行的辩护，到头来却是强化了这种处境。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艺理论和当代中国先锋文学。近年来同时从事思想文化评论写作，并译有当代中东欧思想及文学，主要译著为米奇尼克《通往同胞社会》。代表作品《带伤的黎明》，《看不见的声音》，《我见过美丽的景象》。

仅仅从权力更替的结尾部分，理解米奇尼克是远远不够的。认为现在已经论及“转型技巧”，这才叫做不符合我们自身的处境和位置。显然，我们刚刚开始的工作，更加接近米奇尼克（波兰经验）的那个起点，而不是离权力（更迭）接近的终点。我们还有太长的道路要走。

➤ 你想要成为那块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

首先在想，为什么阅读米奇尼克的写作，与阅读哈维尔一样，比较能够引起共鸣？

第一，他们始终身处那个糟糕的环境当中，时时刻刻吸入那种浑浊的空气；他们承受了那个环境中的所有压力，知道自己说出的哪一句话，可能引来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也不认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都只配去死。他们缺少自由，但是可以争取自由；缺少人的尊严，但是可以争取这种尊严。在奋力争取的意义上，他们所享受的自由与尊严，并不比任何人要少。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米奇尼克强调“我发誓永远不离开波兰”，这既是对于波兰的信念，也是对于自由与尊严的信念。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拥有完整的自由与尊严。

第二，承受自身蒙羞的处境，时刻感到脚面上的沉重，意味着在这种局促的条件之下，你不会想到要去发明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你能够做到的，或许只能发明属于自己的真理。你也不能想象存在一种神秘力量，单单挑选了你的真理，给你配发十二名使徒而不给别人，从而让你的真理能够在大地得到实现。实际上，哈维尔、米奇尼克们他们所说的，只能由他们自己去实行。在这一点上，他们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策士”或者“幕僚”，他们是将“自身”带进有关这个世界的“真理”当中。他们所说的，需要以自己看得见的行动来跟进。你的肉身不能隐藏在你的言辞背后看不见的地方。每当你自己那样去说，你需要同时回答一个问题，你打算怎样去做呢？

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他于八十年代后期拍摄的十个短片《十诫》中的第二诫《进退两难》里，通过人物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有一个够自己用的上帝。这是一个非常坚实的表达：我的上帝让我体悟到的真理，也许它仅仅属于我一个人，但是这个真理，至少与我这样一个具体的人联系了起来，让我受用，让我本人获益。如此，通往真理的道路便与个人的足下联系了起来，他这个人的生活与生命本身，便有可能具有一种真理性，从而得到提升。比较之下，那些策士、幕僚，他们给权威提交方案，却始终将自己排除在外，如同“净身”一般。在这个意义上，策士这个群体更接近传统的宦官，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肉身及其所需要的尊严。

第三，如果真理不能脱离“人自身”，那么历史与现实同样不能。1968年哈维尔与昆德拉争论，反对昆德拉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描绘为一部被外部入侵的宿命史，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在推卸责任，是在为自己不去行动寻找借口。“历史并不在我们之外，我们也不在历史之外”，哈维尔说。他强调我们自己的行为，同样也能够成为历史的起点。1982年团结工会被取缔之后，米奇尼克被关押在比亚沃文卡的监狱里，他写文章引用了波兰诗人米沃什的一句诗：“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了个身”。他自己接着写道：“于是，你想要成为那块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

“你想要成为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而不是别人。因为有你，事情不应该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不应该停留于现在这个样子。即使现实条件不具备，因为你的存在，也要促使让事情往应该如是的样子去扭转，促使相应的条件能够出现。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引领方向的“石子”。事实证明，哈维尔与米奇尼克他们对了！虽然他们在若干年内经常出入于监狱，但是历史就从囚禁他们的牢房，开始了新的出发。由牢房来指示历史前进的方向，在许多民族民主进程中都有这一幕；这同时也说明这个进程在继续，并进展到了某个阶段。

在这批监狱写作中，米奇尼克特别提到了一种“被囚禁心理”。它既意味着“冷漠”与“去政治化”，同时意味着诸如无力、怨恨等精神状态。“被囚禁者们”因为多年的被边缘化，长期“从自己的理想与语言中被剥离出来”，因而“剩下来的只有仇恨。”仇恨是无助的表现，这些人从来没有环境来培育他们自己的力量，没有习惯养成清晰从容地表达自己的要求，因而容易陷入那种混杂着“盲目”、“孤独”、“怨恨”和“发泄”的情绪当中，并不善于理性地站出来担负起责任。没有人曾经要求和希望他们那样做。

这种被囚禁心理或许还应该包括，在许多方面无意识地模仿自己的对手，甚至抄袭对手。他们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和经历的，而宁愿顺着狱卒的手指引的方向去看这个世界——狱卒愿意表明自己是强大的，他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看法；狱卒愿意向世人证明牢房是万年万万年的，他们也不愿意看到中国正在发生某些重要的变化。任何对于中国也许朝向民主转变的事实（公民努力与抗争的结果），对于中国正在出现的新生力量，他们都不愿意正视。因此，他们生活的意义，就这样与狱卒捆绑在了一起。

哈维尔们的做法相反。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先是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然后从中发展出反对的意义；先是有自己生活的轨道和框架，然后从中发展出反对的轨道和框架。在他们看来，“反对”还包括许多看起来并不相关的事情，比如如何学习做一个公民、如何开会、如何对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抱一种宽容的态度、与他们一道工作，以及如何遏制自己人性中的恶、化解自己体内曾经吸收过的狼奶等等。

于是你想也要成为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从自己出发，将自己变成所需要条件的一部分，是可以试试的。为什么不？一个人如果他自己也正好参与，准备为我们民族的民主化出一份力，他就不那么太强调外国民主的月亮也比中国圆了。人们总是为自己不去行动而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这不仅是犬儒主义的（犬儒主义是有意识的，是一种人生观），而且也是出于被囚禁的心理和被囚禁的习惯，是按照狱卒对自己的要求，来要求自己。

➤ 要么选择民主的反对派，要么选择暴力革命

与目前人们对他的误解完全相反，米奇尼克从一个体制外的起点开始。他没有完全放弃体制内的改革力量，始终在等待和呼吁这种力量的出现，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体制内的人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将民族的民主化寄托在体制本身及体制内的人们身上。在他的开山之作《新演进》（1976）中，他毫不含混地表达：“我还要不揣冒昧地说，多一个杜布切克，多一份对于风起云涌的反对派的损害”。在这篇文章中，他直接使用了“民主的反对派”（the democratic opposition）的称呼。这在整个东欧反对派运动中，是非常独树一帜的。哈维尔就没有运用过这个词。这种情况也不像有人喜欢解释的，那是因为波兰如何如何。当然，波兰是一回事，但是若没有米奇尼克他们在其中，波兰就是另一回事。

他的看法建立在现实经验之上。自五十年代开始，一批被称之为修正主义的知识分子，力图赋予这个体制以“人道主义面孔”，对于当权者做法给予了严厉批评，留下了丰富的精神及批判的资源。但是这批人在波兰 1968 年事件之后遭到严厉肃清。1968 年 1 月，华沙剧院上演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反俄诗剧《先人祭》，演出很快演变为反苏大示威，随即爆发了以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抗议活动，此时为华沙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的米奇尼克是令人瞩目的活跃分子。3 月 8 日，他与一批大学生被当局开除。同时对知识分子大规模整肃开始了。波兰享誉世界的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被开除公职，接着被迫流亡。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提到过他所在的波兰罗兹电影学院，最好的老师们在这个期间被迫流亡，有人去了以色列。从此，修正主义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与党“断了脐带”（米奇尼克）。这个过程其实有点像我们这里的王若水、刘宾雁被清除出党。其中有一部分人仍

然留在党内，声称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但其实未必。

米奇尼克继承了老师们这份遗产。他不可能再回过头走这条已经证明是失败的路线。“很难想像，现在有一个运动仍然将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或者其中的一个元素，来推进今天的波兰改革。”（米奇尼克，1976）在被大学开除之后，米奇尼克到一个叫做“罗莎·卢森堡”的工厂当了钳工，这个工厂生产电灯泡。这期间他参加和组织过工人的抗议活动。而促使他与库隆（此人曾经任职波兰共青团中央）、里普斯基（Lipski）在1976年9月做成KOR（保卫工人委员会），还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原因。

这个时间“知识分子受一种复杂的情绪所折磨，那就是他们在1970年工人流血时保持沉默。”他这句话有一个可以找到的旁证，那便是波兰大导演瓦伊达拍摄的关于团结工会的影片《铁人》（1981），其中有一对父子。1968年3月儿子汤姆亚克要往外冲，被工人父亲一个巴掌打回去，工人阶级不准参加这个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运动。而在1970年，波兰政府提高生活品的价格，工人们走上街头，父亲和他的工友在窗外眼巴巴地等待学生前来声援，宿舍里的汤姆亚克与他的同学们却把头深深埋进了枕头里。这次冲突有44人被打死，受伤千余人。影片中的父亲在冲突中被打死。接下来儿子不干了。这便酿成了团结工会（1981）两股力量的合流。而KOR可以说是团结工会的前身。1976年在拉多姆和乌尔苏斯工人抗议运动遭到镇压之后，米奇尼克和库隆们决定不能对受难工人坐视不管。顺便地说，米奇尼克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创建“团结工会”，他所参与塑造的KOR的理念，为团结工会所接受和延续。

► KOR 伊始，不理解的人们讥笑他们是如同发放救济金的“社会工作者”，

看上去无足轻重、无关宏旨，缺乏任何前景。这些貌似“社会工作者”，同时称自己是“民主的反对派”。为什么执意要当这个令人狐疑的“反对派”？不当“反对派”行不行？能不能放弃当一个“反对派”？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新演进》）

必须有这样一个或者多个反对派压力团体的存在，他们若不能在体制内存在，那他们就在体制外存在，但不能不存在。这是因为如果说当权者的做法是缺少价值的，那么必须有人要表达的社会基本价值；如果说当权者的做法是隐瞒真相的，那么必须有人要揭示被遮蔽的真相；如果当权者的许多做法是违反法制的，那么必须有人要维护这个国家的宪法；如果说当权者因维护自身特权而不惜将社会割裂为不同区域，陷入种种隔离隔阂乃至敌视仇视状态，那么必须有人要恢复基本的社会纽带、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而如果说当权者的做法是“无人负责”，那么必须有人站出来，表明自己愿意对于民族的今天和未来承担起责任。

由于它们的存在，才能够让政府在压力和对话中，能够习惯听取不同声音，调整自己的政策和做法，改变专横任性以及贪婪的习性，从而培养和训练出民主的品格，乃至最终形成民主的格局和制度。仅仅依靠对手本身，指望它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自身就能够走向民主化的道路，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今天，这个道理在中国也已经是妇孺皆知。最近四川好人谭作人先生九十岁的岳母同样也说：“没有不同意见，社会不能进步。”

第二也即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米奇尼克与他的朋友们想要彻底放弃暴力革命的思路，他们必须找一条非暴力的途径来取代它。这就是在不同意见、利益、思想、信仰的人们之间，需要找到一些方法和形式，开始学会共同相处，而不是重复一部人消灭另一部分人的做法。反对派的出发点是民主，这要求他们本身的做法是民主的，即通过和平的、理性的、协商的方法，来表达不同利益的诉求，并解决人们之间的矛盾纠纷。

既要推动民族的民主化，落实让每一个人拥有同等的权利，但是又不能像以往那样，通过一种暴力革命的途径来解决问题，这在米奇尼克们，经过了长期深思熟虑地思考。米奇尼克说道：“极权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暴力的运用。我父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相信革命暴力能够带来社会公正。这给他带来了八年牢狱之灾，那是在1930年代的一次莫斯科审判。他肯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需要重蹈斯大林审判的覆辙吗？我也向自己重复这个问题，答案是暴力毁坏了使用它的人，令其陷入非道德。……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通往公民社会，展望波兰民主》，1988）

放弃暴力，同时意味着放弃暴力革命的那个思想出发点，即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思路，认为只有将对方从肉体上消灭，才能实现所谓“革命”的成功。而在革命成功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这种思路实际上都还会延续。始终将一部分人视为贱民，需要从肉体开始加以鄙视和实行管制，不管他们是“知识分子”，还是“地富反坏右”。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教训，堪称十分严重。

顺便地说，受暴力革命的思想浸淫很深的人，头脑中总是摆脱不掉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想象。他自己过去对别人这么做过，他也担心未来的某一天，这个景象会轮到自己头上。因此不惜一切代价攫取民族的未来，来满足这些人个人的安全感。但是这些人想过没有，仅仅运用暴力（进行统治），或许他们自己的安全得到保障，但是这并不能为他们本人的子子孙孙提供同样的安全，也不能为其他人的子子孙孙带来安全，不能为这个民族的未来的和平提供保障。暴力是最容易模仿的。眼下中国有点盛行的个人恐怖主义，难道不正是这种暴力革命和暴力统治的逻辑延伸以及必然结果？

民主的反对派的思路，是想从根本上结束暴力革命带来的恶性循环，是想通过民主制度的方式，来释放社会不同要求、解决社会矛盾以及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而不是允许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压得粉碎。实际上，反对派甫一诞生，便意味着这些人将要在社会中存在继续下去，不仅是掌权者和其他人们要适应他们的存在，反对派们也要学会能够与所有的人们一道相处，包括共产党人。这些人绝对不可能是新出壳的神风突击队员，这与民主的要求相去甚远。最有可能，一个人越是反对派，他便越不极端。因为他想得比较远，也深知自己行为的重量，时时意识到自己作为建设者的责任。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权者是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同样需要在接受暴力反抗与走民主道路之间做一个选择？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了断，同时意味着是选择容忍能够与未来下一轮社会接轨的民主的反对派，还是接受大大小小的暴力以及它们所制造的新的难以弥合的伤口？不管哪个民族，最终总是要走向民主，这个大趋势不可阻挡。专制可能是几十年，一百年，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专制者加起来也就两千年，但是不可能是一万年，更不能是万万年。摆在我们子孙面前的将会是怎样一个世界，或我们交给子孙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是今天那些声称为国家负责的人们不得不考虑的。

➤ 自我限制的革命——反对派的政治之一

我必须将这个问题当面交给米奇尼克，这就是作为反对派如何处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其实，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还在于反对派要不要考虑政治？

当然，道德必然成为反对派的主要战场，一意孤行的专制制度贯穿了一个基本特色，那就是明显违反人们的道德感，结果造成谎言盛行、不负责任至上的沉沦局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互相利用的关系，对上则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对下则是轻视冷漠，乃至肆意践踏。但是民主的反对派是否仅仅停留在某种道德情绪上面，是否仅仅是靠道德义愤就能够解决问题？是否越是这样，事情就到了快要解决的地步？

不揣冒昧地说，我的同胞当中不乏有人仍然继承了一种类似巫术的心理，是不发生直接接触的交感巫术那种。潜意识中相信只要我在这里念动几句咒语，那边就有一个人应声倒下了。这帮助说明被压迫者的天空总是低矮的，在他们的多种基本权利受到限制时，他们政治上的想象力也同样会受到损害，但是这并不能够证明，他们便不需要一些政治上的眼光？不可以提出他们政治上的规划？

说到“政治上的规划”，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一些“前景”，这当然是需要的。“08 宪章”则是一个前景式的表达，概括地表达了人们究竟想要什么。但是除了“远景”，我们能不能有一些近景？除了我们想要去完成的蓝图，我们能不能考虑眼下能够做起来的？而如何去做，取决于对于眼下形势的分析，对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判断估计，对于自身力量的估计，包括也许要想一想，对方正在干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

这才是米奇尼克真正的长处。他说过他的分析始终对于处境的分析，因此也有说他是“战略家”。今天我们介绍和谈论米奇尼克这个人，并不意味着要照搬波兰的经验，有谁说过波兰与中国一样吗？但是反对派如何拥有一种政治意识、具有政治眼光和自身的政治策略，而不仅仅停留在道德控诉以及揭露的层面，这对于我们恐怕不是一个过时话题。人们是多么容易与他的环境长成一体的啊。在压制言论自由的环境之下，人们的思路会仅仅停留在书面写作方面，当然这永远是重要的，但是很可能因此而看不到另外一些事情的意义。米奇尼克在某处将“持异见者”与“反对派”区别开来，这是有意思的。我的理解是，前者是个人性的、文化性的，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的工作，比如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但是这并不代表工作的全部。“伦理并不能成为政治纲领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波兰和苏联关系的前景”。（《新演进》）。

政治如同爱情，是“你”与“我”的关系，是一个人出现在另一个人的身边，是一个人站到了另一个人的身边，是互相看得见眼睛和鼻子，而不是仅凭柏拉图式的想象泛泛而谈。在那个年代，米奇尼克们怎么谈论自己呢？如何说明自己的存在呢？他们会在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框架之下开展自己的工作？如何给自己一些限定，而不被老虎当作美餐一口吃掉？

这就有了“在‘勃列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内才能进行”。这话其实无关意识形态，而是一个地缘政治学的考量，一个十足现实主义的考量。作为“反对派”要怎么活动才好呢？不要闹到引来苏联军队，这是一条大限。经历了 1956 年出兵匈牙利和 1968 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就苏联方面而言，它也不想再次手上沾血；而波兰统一工人党虽然面临苏联压力，但是其中也没有人想以“卖国贼”为业，成为波兰民众千夫所指。但是这并不是说，苏军入侵完全不可能。就它的本性来说，莫斯科一定想这样做。“如果所有的人都失掉了常识、现实感和节制，那么这也许成为不可避免”，米奇尼克分析道。换句话说，老虎没有马上来吃掉你，这在老虎已经是有所顾忌了，你就要做到不急于把自己送到老虎嘴边。这样说其中绝无感激老虎的意思，只是说不要过分为难老虎，要求它在短期之内一定要吃掉你，从而增添它新罪行的名目。其实它有多少罪名这在它已经无所谓了，但是目前他想使得事情能有一点挽回，赢得一点美名。作为老虎，或许它也会想到逐步地改变自己原来的食物习惯，不管这是否真正能够做到。

所谓“苏联军队”、“雅尔塔条约”在今天听起来已经是十分遥远了，但是相关意思可以翻译为——民主的反对派需要在“在现有宪法赋予的框架之内活动”，不要超出这个已有的框架。这个表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如出一辙。称之为“七七宪章”，区区几千字，就是一个中心思想，请掌权的老虎同志们，真正落实这个国家的宪法上已经写明的人权条款，落实你已经向全世界表明已经加入的赫尔辛基人权条约。依拙见，当年的“七七宪章”比我本人也加入签署的“08 宪章”更加完美，因为签署七七宪章的人们没有想到对一只“活色生香”的老虎去说，“我想要什么”或者“我认为什么好吃”，而是说，“你必须做到你自己所承诺过的”。比较起来，08 宪章

的签署者们看上去有点不太了解政治，他们（我们）书生气十足。你怎么可以对老虎说，我也想分享你的大餐，在宪法方面下些功夫。结果老虎说，“我已经知道了你喜欢联邦制。但是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我喜欢吃你。”

运用现有框架，不超出现有框架，还有一个更为深沉的考虑，那就是不希望再次看到某种突然爆发的场景，不希望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突如其来的喷发与骚乱当中，认为那样一种状态，并不能真正推动民族的民主化进程，并不带来新的起点，而且很可能导致倒退。米奇尼克提到当年他们与哈维尔在捷波边境一个叫做白山的地方非法聚会，想来他们就此深入交换过意见，看法完全一致。哈维尔说：这种时刻“有着旺盛的暴躁的仇恨、报复性的愤怒，和一种对于所有忍受的屈辱自己弥补的狂热要求。”而掌权的人们感到自己“曝光于前所未闻的威胁中时，会毫不犹豫地调来上百万外国士兵来拯救他们自己和这个世界。”（1975）当然，如果本国的军队足够的话，便不需要向外搬兵。米奇尼克说：“民主的反对派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更加宽广的问题，它和一种急切爆发的可能性没有必然关系。一种爆发可能导致社会压力的正常渠道被关闭。”（1979）。

在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是两个起点，既是道德的，又是政治的，这两个起点如何统一时，米奇尼克答道：“既然我们已经给出了道德上的起点，承诺要反对专制，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生涯。因此，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希望上的规划，充满希望的规划，它不仅停留于一些道德上的做法和举措，要有一个现实意义上的战略，以期取得一些变化……我们需要找到通向自由的道路本身，如何将自由变成一种日常生活。”因而，这个“自我限制的革命”所启动的层面，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是那些身边的细小末节，人们不需要离开自己原来的位置，只是换一些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便可以加入到这场“革命”中来。

比如，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从今天起就做一个自由的人；比如，不是为了“打倒委员会，而是为了建设你自己”，若是专制曾经轻视你，那么从今天开始你就挺起腰杆做人；比如，不是从一个“全局”开始，而是从一些“局部”开始，从自己能够上手的任何事情出发；比如立即照你自己所说的去做，而不要等着别人做了给你看，你完全可以做给别人看；比如，开始承担起你自己的责任，因为专制制度中，个人是不需要负责的，如此等等。他们有一个说法叫做“as if”，即在目前这种条件下，如同自己是一个自由人那样去行动。只要按照自己认为应该做的那样去做每一件事情，力量就会从自己的脚后跟升起。这时候除了需要勇气，还需要想象力，运用想象力来创造自己的生活（这回米奇尼克在北京与人们交流时，也再次提到了“想象力”）。《新演进》的最后写道，所创造的“不仅仅是一个宪政结构，而是真正的、日益改进的自由人们的共同体。”

如果从现在起，就开始过一种自由而符合尊严的生活，那个结尾（“最终一击”）什么时候到来，已经不重要了，时间表也已经完全不重要了。于是，这个“自我限制的革命”，便彻底区别于列宁主义的“革命观”——不仅在于完全放弃暴力，而且在于不是那么在意权力，也不在意权力的更替，不在意如何将今天当权的人们拉下马，换上一批自己的人上去。这个“自我限制的革命”，是生活的革命，道德的革命，人的尊严的革命。因而，有人将波兰的天鹅绒革命称之为“十诫的革命”（《圣经》中的“十诫”）。

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啊，是不是等待所有条件都齐备了，才开始从事我们的民主呢？我们虽然没有宗教，我们不是也有基本的道德感吗？在这方面有不少中国传统资源。转化是一回事，但不等于完全抹杀。我们的古人完全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生活的，也不是鲁迅先生所写，除了“吃人”之外没别的。这只是一个文学上的隐喻而已，并不是人们实际生活的历史。每个民族都有自己道德精神方面的智慧和积累，否则她不可能延续下来。看看1949年之前的知识分子就略微知道一些。而假如没有来自生活和道德的革命，没有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即使更换权力也没有用。很显然，如果掌权者越是执意与道德为敌、与人的尊严为敌，那么它只能是越来越缺乏基础、摇摇晃晃的。

在现有宪法的框架之内，每个人都来动手进行“日常生活的革命”、“道德的革命”，“尊严的革命”，如此这般，“道德”与“政治”又神奇地统一了起来。

➤ 重建社会的自主性——反对派的政治之二

打个比方来说。比如一个乌尔苏斯的工人因为罢工而被开除和关押，一个拉多姆的工人因为携带了一些违禁传单而被捕，他们家庭的平衡因此就被打破，家中的妻子孩子的生活变得没有来源。就这个家庭的妇女儿童来说，她们起码需要一些经济方面的帮助。按照惯例，能够给贫困家庭提供援助的是官方的慈善机构，能够发放补助的人们希望“统一”发放。因为那也是一种权力，控制的权力。但这时候有人也拿出了 200 块钱，送给这个急需的家庭，他觉着可以自己在官方的体制之外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人就是 KOR——“保卫工人委员会”，是他们给那些受害工人家庭，提供的经济、法律以及医疗方面的援助。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永无休止》，其中女主角的丈夫就是这样一位律师，他车祸身亡之后，女主人又给找了一位年长的律师。扮演这位年长律师的男演员，也是前面提到的在镜头面前说“我有一个够自己用的上帝”那位资深演员。

这个工作就是“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比较起修改宪法，或为某个受难群体平反，以及组个竞争的政党，它看上去不那么敏感。而且因为直接面对具体人们的要求和苦难，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不以政治的面貌出现，而是以社会的面貌出现，看上去比较“非政治化”。如果说狭义的政治即意味着“竞争”，那么波兰的人们不主张以一种竞争的姿态而出现——是民主的，但不是竞争的。这个工作框架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维权”，停留在一些具体工作、具体人们的层面，但是当时他们没有找到“维权”这个词。这个最初启动的阶段，其实是有类比性的。除了帮助具体的人们，拥有“社会”视野，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创造“独立的公众舆论”，要能够面对整个社会说话，提取和创造全社会的共同语言，而不是小圈子自说自画，那样做与极权政府自说自画恰恰形成同构。

放在当时波兰的语境中，这些做法的“政治含义”不可避免地释放出来。称之为“极权主义”，它的本性就是想控制一切，它的权力覆盖社会的每个角落，它希望能够掌握和控制所有的主动权，只有它自己是主动的，别人都是被动的和服从的。因此，力量只是从他自己的方向施加下来，而人们都像是臂膀上缠了绷带，腿上打了石膏，不要动弹、不许动弹，处于麻痹和半麻痹状态。这是它的本性使然，是它从一开始自以为掌握了全部真理那里开始的：一方面是永远正确、万寿无疆，另一方面就只有生活在没有完结的错误、耻辱以及无能为力。

从这样的“世界观”看问题，任何一个不再体制框架之内的起点，从人们从自身出发的起点，都会被看作是对于这个万无一失的权威的“挑战”，看作是针对它的“刺激”。比如说你要去帮助别人，这个举动包含了起码三点它所不喜欢的：第一，你挑开了某个伤口，而它们本来是需要掩饰的。你的意思是说“有人需要帮助”，那就等于批评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第二，你怎么能够成为施加力量者，你怎么能够有力量？你为什么还有力量，而不乖乖地呆在某处原地不动？第三，你想要与另外一些人们接触吗？你是不是通过这种接触，来发展自己的力量，你为什么要强大起来呢？强大的只有我们！试图隔断所有人们互相之间的联系，为此不惜使用所有不合法的途径，让人们陷入“分而治之”的黑暗中，是这个制度最为宏伟的梦想！

尤其是第三点，是现代极权主义不同于古代专制的地方。古代专制比如中国那么多代皇帝，除了极个别极为残暴的，一般来说，只要你不造反，不喊打倒皇帝，而皇帝并不关心那么多你自己的事情，你于是可以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们组个诗社啊、赏月俱乐部什么的，没有人怀疑其中有什么阴谋。实际上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基本上是地方自治、乡村自治，中国传统的乡绅便是所处乡间的社会组织者。同时还有各种行业协会包括宗教团体，将人们凝聚在一起拥有自己的归属，不至于因为孤独隔离而退回到野蛮状态。在孤独带来的虚无中，人是什么都做

得出来的。今天人们谈论社会溃败，既是人与人关系的溃败，也是人心的溃败，道德的溃败。这是若干年切断了人们之间任何横向联系的结果，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再可能成为互助的和互为依托的关系，而仅仅成为虎狼关系，互相利用、互相倾轧，用冉云飞先生的话来说，造成一个“互害”的社会。

但是国家不可能来解决所有问题，是不是？还有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让别人来一道解决？那些没有什么油水的疑难、遗留问题，是否也允许别人来分担和承担？不行，极权制度答道。在它看来，NGO 总是别有企图。它们的结果是，你壮大了你自己（这就等于削弱了我），你的羽翼开始变得丰满，你的权力和说服力变得增强。除非像螺丝钉雷锋同志那样可以，在一种匿名的、偷偷摸摸的情况下，将事情办好。但是有些事情一个人做不了怎么办呢？为什么有人做了起码的本职工作，就上电视、大张旗鼓地给自己鼓掌喝彩，而别人做了其他的许多好事，却必须背着这样那样的嫌疑和黑锅？遭到被歧视和被取缔？

KOR 的成员面临不断地逮捕、审讯、被关押和被判刑，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然而即使在高压之下，他们也不想发展成为秘密团体，密谋只会进一步损害社会。所有那些不能在阳光之下进行的，都极具破坏性。不提出直接的政治诉求，并不意味着回避政治。当官方以“政治”的名义抓捕他们的时候，或者抓捕其他工人的时候，为被捕者进行呼吁、奔走、营救就不能不是政治的。完全回避政治，绕着政治走，看到政治的门就不敢进去，这属于市侩的做法。“社会的，就是政治的”，这是在极权主义条件下，“社会”与“政治”之间特殊的“辩证法”。

问题还在于，KOR 成为一个独立的新起点，这个原则是否能够得到彻底贯彻，比如说其成员是否同时拥有这种起点，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开展自己的工作，而不受所谓组织形式的约束？回答是肯定的。KOR 的工作原则有四条：第一、真实性；第二，公开性；第三，行动的自主性；第四条，互相信任。而后两条，则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它们同时也回答了 KOR 并非一个严密的组织，不需要有“领导”来吩咐其他人干什么，尤其是让他做不愿意做的事情。里普斯基写了一本关于 KOR 的书，其中谈到“这个原则是，如果有人想做一件事情，而又不违反 KOR 的原则，他们应该被允许追寻自己的理念。”而这就尤其需要互相信任的保障：“在共识之内信任每一个人。”

不搞小圈子，不在小圈子弄出另一套权力中心论来，任何起点都被认为有其自身的理由、过程和收获，应该得到信任和鼓励，使得 KOR 的活动拥有一种真正的开放性，可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KOR 的一个长远目标是促使不同地区产生独立自主的新的中心，促使更多 KOR 式的独立社会组织出现。”里普斯基说。最早就有 KOR 的成员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组织工人罢工，米奇尼克前往帮助工人进行谈判。接着他们一千人被捕，群情激愤，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导致了团结工会的诞生。而在团结工会成立之后，KOR 即宣告解散，库隆与米奇尼克做了团结工会的顾问。也许，这种不求个人得失、不搞小政治，而将整个社会视为一盘棋的做法，面对整个社会来发言做事情，是需要我们借鉴的。

比较起来，哈维尔更加具有哲学及艺术家的气质，他着重强调了恢复“个人的自主性”，即以良心为起点；即便是政治，也希望是良心的政治。米奇尼克和他的同胞所强调的是恢复“社会的自主性”，即从个人扩展到人与人之间，扩展到社会。这是一对孪生的自主性。在北京他谈到了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不一样在于——比较起来，捷克人的做法更加精英，这同样是有意义的。而波兰最大的特点是丰富多样，在各个群体人们内部，都有生气勃勃的公民草根运动。比如在大学内部举办不同的研讨会，地下工会的形式、农民团体的形式等等。

“平行”、“平行机构”这个表达应该来自匈牙利人的表达，但是在当时的东欧流传甚广，即建立各种与政府相平行的平台，不是为了夺取政府的权力，也不是为了与政府作对，而是在它旁边同时建设我们的社会、所有人的社会。

由此可见出，反对派并不是想将社会拉到自己这方面来，让社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办，弄出一个东西来强加于社会，相反，而是创造条件让社会自我发育，让社会了解它自己要什么、将要去什么方向以及有什么潜力。它让社会及个人发挥自己的高尚想象（见徐贲），而不是一再陷入丑闻和难以自拔的泥潭当中。无疑，东欧的反对派们重新激活了古老的“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激活和体现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公民的首创精神”。90年代之后它一度在美国的大学里、研究机构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光彩。

➤ 要结束的是专制统治，不是共产党的统治——反对派的政治之三

与共产党的关系，如何看待共产党和体制内，是米奇尼克这次来北京为人诟病的主要对象。他在北京回答推友的这一段话被单独拿出来：“我认为在目前民主条件下的共产党人，已经不是共产主义者，只不过是旧制度下的一个党派，他们接受了市场经济，他们变成了资产阶级。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共产人是当权的共产党人，是维护权力的教条的人，他们有时候并不真正仇视民主。”顺便地说，迄今还没有关于米奇尼克与众人谈话问答的完整版。而推特这个工具特点是快，不足是只能容纳 140 个字，因而不能不是最为简略的。同时即使是再好的翻译，在不熟悉该话题的情况下，在现场也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地准确。因为找不到波兰语翻译，只能请来一位法语翻译，因此必须请米奇尼克先生讲法语，而不是他的母语。因此，虽然是面对面，但还是隔山隔海的。

米奇尼克这段话前半部分适用于目前条件下的前共产主义者，即已经完成民主转型条件下的原共产党人，他们接受了市场经济，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引起人不快的应该是后半段，指称共产党人“有时候并不真正仇视民主”，这被认为是米奇尼克先生“健忘”的体现。但是，这并不是米奇尼克在北京才这样说，也不是因为二十年过去了才这样说，他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他的贯穿始终的基本立场。

在《新演进》中他是这样说的：“实用主义使得这些人削弱了意识形态的教条，而更多谈论教育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世界更有力的科学技术的合作以及开展竞争，显然，这并不是说这些人会去追求民主。一个党的实用主义者没有理由将目标定为民主的转变，定为多元化和真正的自治。但是，他有理由理解及赞同与多元化的力量之间进行协商而不是残酷地镇压。因为他知道镇压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为下一个社会不满的大爆发准备前提。”其中的意思很明显，既然已经成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作为个人他已经不再有什么确信，为什么要一定相信“专制”才是唯一的出路？对于民主他虽然谈不上亲近，谈不上自己去实行，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抱有恶感？难道他们是一些“特殊材料”做成的？比如当他们在强调“民主不适合中国”时，不同时就等于说在说这个东西也许“不错”，就是不能“拿”过来吗？

影响他采取决定的是他屁股底下的那个位置和他自身的利益。而同时不是别的，正是这个位置和利益也要求他不能像从前那样，对任何不同意见进行残酷地镇压，像在东欧五十年代，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在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之后，即进入所谓的“后极权主义”之后，政府不得不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们采取了新的策略——“在容忍和镇压之间进行选择”，米奇尼克在北京说道。发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主要也不是老虎本身，而是持续不断的“公众舆论以及民族经济压力的影响。”

不指望党内改革派能够解决问题，对他们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将他们的出发点当作自己的起点，这并不意味着将这个体制内所有可能的进步力量一棍子打死，从而也堵死了任何对话、互动的途径，民主社会毕竟需要民主的方式来建立，这并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便需要信仰——是的，信仰。相信民主的力量一定会胜利，专制一定会结束。这需要一个长远的眼光，而不是专制者那样的短视。“从长远来看，我们有理由乐观，但我们必须和这个独裁的执政党并肩行动。”（米奇尼克《论反对派和 1979 年波兰总的形势》。）

只有能够看出这个执政党其实是在变化，才有可能去进一步促使这个变化，使得事情往好的方面转变。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才会去做一些事情。这也不等于说重新出发再去寻找一个党内的代理人，就像这个党总是在批评民主人士是外国反华势力的代理人一样。没有代理人和庇护人这一说。起点的不同决定了面貌和性质的区别。但是为了民族的民主化考虑，反对派其实可以说一句话——即使目前这个党内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改革派力量，那么无论如何也要帮助它再度创造一个出来。如果今天没有，那么让它明天肯定有；如果现在没有，那么让它将来肯定有。前几年流行一个说法，叫做“打造一个中产阶级给党用”，借用这个句式，那么，民主的反对派需要重新创造一个党内改革派，创造那样一种政治现实，为了民族的未来。在这个人（这些人们）身上，应该体现来自社会的压力，人民的要求，民族的历史责任。即使他不愿意，也一定要让他这么做。

将波兰的经验看成是“妥协”的经验，难免以偏概全。准确地说，波兰的经验是“驯虎记”，是把老虎赶进笼子里。因为是老虎，它就必须进笼子，否则它就要吃人，成为灾难本身。说到底这是权力的本性，而不是人的差别。不受限制的权力，叫它做国民党、共产党，都是一样的。根本目的在于让这个民族永远结束专制的统治，而不是共产党的统治。前者才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矢志，也真正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

即使是公开地谈论这一切，也没有什么不合适。我在推特上面写道：“找到自己驯虎师的位置，才是强而有力的反对派。”前面提到的王天成先生也给了我回应。他说：“是的，波兰的经验是驯兽记。争取自由民主的历史，就是驯化统治者的历史。1215 年英国贵族用刀剑将大宪章强加给国王，是近代驯兽的序幕。今天刀剑不好使了，需要用强有力的‘柔道’，也就是非暴力抗争。”

顺便地说，散养的老虎对它本身也非常不利。“权力的老虎”与大自然的老虎不一样在于，它不仅吃人，也吞噬自己。贺卫方先生最近在香港有一个精彩演讲，提到网上流传一篇文章叫做《胡长青临死前谈新闻自由》，其中说道：“胡长清说，如果江西省和全国的报纸能像美国记者揭露克林顿丑闻那样揭露我的话，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啊？何至于面对死刑？我痛苦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是前倨而后恭。那些现在的省委书记，他们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报纸每天都在报道他们又在会议上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牢记”八荣八耻“，天天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啦，这个人这么腐败啊！（笑声）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媒体环境对于官员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这让一个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这种诱惑，……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死的边缘了。”

简短地回顾共产党所走过的道路，也许是必要的。共产党从哪里走出来的？什么是它最初的宗旨？不正是为了民主自由、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我本人相信这个党的成员中曾经有过非常优秀的人们，他们是我们民族最为杰出的儿女，我们许多人的父辈甚至更早一辈或几辈都在其中。但是包括这些人在内，最终却走上了一条与自己的目标完全相反的道路，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这个惨痛的教训，是今天立志要让我们民族走上民主道路的人们，不得不认真反思的——如何才能找到新的起点和途径，而不是重复他们过去的道路？

作为民主的反对派没有必要将拯救这个党本身也当作自己的工作任务，他们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这件事情应该由这个党的成员本身来做，比如党校的那些人们可以考虑得更多一些。这个党内如果还有对党忠诚的，有愿意为这个党负责的，也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考虑的，于是人们就“有理由”等待看到出现党内自我拯救的力量。当他们考虑自我拯救时，这便是出现转机的时刻。光靠少数反对派本身，这也是天方夜谭。任何社会变动社会进步，都是多种合力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单方面的。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每次具有公共危机性质的事件发生，体制内的有关人们，尤其是那些新闻官员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是如实向公众报告呢？还是按照某些内定的尺度隐瞒其中的一部分？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采取了后者，因此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众矢之的”，引发公众的进一步不满。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人对于公众的要求好像充耳不闻，但其实来自民众的呼声，对于他们还是有压力的，这种压力实际上越积越大。等到下次再出现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就需要想一想，至少更加感到自己身上的压力。而公众也在一如既往地等待，等待他们在某一刻会公布那个真实数字。人们自然抱有这样的期待，正是这种期待构成了对于他们的压力。取消了期待，也就等于取消了压力。近期发生的通缉记者而后上门道歉，就是人们“期待—压力”的结果。

长话短说。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在群情汹涌的面前，能够保护这些人们，保留他们生命最后的尊严，不是别人，正是主张非暴力的民主的反对派。在某种意义上，米奇尼克扮演了雅鲁泽尔斯基“保护人”的角色。1992年他与这位将军之间有过一个对话：“我们可以谈话，没有仇恨。”因篇幅关系，具体内容在此恕不复述。在波兰后来的“清算”中，米奇尼克坚决反对严酷。这回他来北京，不止一个人问他与雅鲁泽尔斯基的关系如何，他答道：“现在倒与他有一些私交和走动了”。

➤ 生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

旧意识形态喜欢到处拿出一副“决裂”的架势。与过去的“历史”决裂，与从前的“价值”决裂，尤其是在人与人之间，弄出这样那样的名目来，目的就是制造人们之间的隔离与割裂。米奇尼克不仅是反对派，而且还是犹太人，在这方面他也没有少受气。那些审讯他的人会问他：“你为什么不去特拉维夫？”这真是一个混帐问题。

米奇尼克相反，他强调的是“延续”和“共存”。他强调知识分子除了“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还要成为价值的保存者——“捍卫基本原则”。在专制条件下，“不服从”成了波兰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传统。在一篇叫做《蛆虫与天使》的文章结尾，米奇尼克写道：“一个不尊重社会连续价值的运动，不能够有效和成熟地承担起社会的重建。”关于这篇文章，还要说几句。不要以为米奇尼克关于“妥协”、“对话”的想法，在波兰是多么容易接受。这个国家在近代史上是一个饱受蹂躏的国家，因而人们在不得不接受奴役（不得不当“蛆虫”）的同时，却同时发展出一种“天使”的学说，对于任何“妥协”抱有一种天然的深度敌视。在这篇文章中，米奇尼克试图超越这两者。

当米奇尼克作为反对派，当他与他的朋友提倡“并存”“平行”，发起“重建社会”、“平行机构”、“日常生活的革命”等，所有这些，没有一个不能带入社会的下一个阶段，在新一轮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被其包容、吸收和继续发挥作用，它们只是提前创造了新的社会风气以及某些社会结构或机构。这些人们确实做到了手段与目标的一致，自己之前说的和后来做的一致。

他要这样去说和去做就变成十分自然的了：前是雅鲁泽尔斯基不让我们生活在波兰，今天我们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不让他们生活在这个共同的家园。从前的意识形态在人们之间制造各种对立，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则是创造一种共同语言，创造一种共同的秩序，让所有的人们都能够生活在自己的祖国，而不至于背井离乡或者在自己的家乡流浪。“他们反对一个波兰的原则，反对波兰属于所有的人。而我们则要说，我们只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

1988年，当法国大名鼎鼎的六八年人丹尼尔·科恩·邦迪问他：“亚当，为什么你老是令人想起你是一个波兰人，我却发现自己的民族性没有那么重要。”米奇尼克答道：“我认可自己的波兰人身份，是因为我认同所有弱者、被压迫者和被羞辱者。如果波兰是一个超级大国，我也许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和吉普赛人。但是，波兰是被压迫者和被羞辱者，波兰人民生活悲惨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定地和一些人们、这种语言结合在一起的原因。”

他在北京接受最后一个问题是在饭桌上。7月10日是世界杯正酣的时候，80后的专栏作家贾葭问他喜欢哪支球队，他回答说自己是爱国者，所以喜欢波兰球队。但是波兰球队与中国球队差不多，表现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他只好喜欢西班牙球队。听到他仍然喜欢说自己是“爱国者”，虽然他爱的是自己的祖国波兰，却加深了我对于这个人的深深认同。 T

2010年7月31日

■ 为了共同的家园——关于米奇尼克北京之行争论之我见

何清涟

有关中国转型的讨论与行动还将继续。“路是长的，门是窄的”，每一步脚下都会踩着荆棘。但在民主化实现之前，中国人还得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我虽身居海外，却愿与我的同胞风雨同行。

主张“自我克制的革命”的米奇尼克来了一趟中国，提了一些对中国人的建议后又走了。在他看来，只是与异国人士的一次交谈。但由于这些建议被上升成中国今后和平转型的指南，因此成了“圣物”。一些对米奇尼克开出的转型药方有不同意见的国内人士及海外政治流亡人士，因为对米氏建议——“只有依靠党内改革派才能实现非暴力转型”，要对共产党保持“想象力”等提出批评意见，因此最后酿成一场局部性的思想争论。由于这种争论今后还会发生，我想将这次争论涉及到的一些重要规则写出来，留为今后参照。

➤ 有关米奇尼克北京之行讨论概述

为了行文方便，姑且将双方称之为拥米派与质疑者。这次思想对垒留下了一些经过认真思考的文章：

拥米派的主要文章如下：崔卫平《在社会冲突中寻找共同语言——访问亚当·米奇尼克》、《米奇尼克对话中国公民（整理版）》。崔卫平后写的《把老虎赶进笼子里》（以下简称《老虎》）发表于第一轮争论之后，影响不如前两文大，留后再论。

拥米派对米奇尼克思想最为推崇的就是要社会公众无条件地放弃对统治集团的严重不满，在政府对其暴政日益变本加厉的条件下“弥合”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裂痕。如“只有依靠党内改革派才能实现非暴力转型”，“面对共产党，我们缺乏想象力”等都是围绕这一观点的阐发。总之，还是以前那套“我们不做政治反对派”，等待共产党慢慢自我改革思路的延伸。

通过参与与米氏座谈的戴晴女士那篇“米奇尼克到北京”，我才知道上述两文对米奇尼克北京之行的介绍并不完整。面对中国转型这个问题，中国知识界的思考其实都很沉重，他们对中国现状有清醒的认识。从戴晴文章介

绍的内容来看，参与这次座谈的知识界人士，不少只是将与米氏的交流当作一种信息参考，米氏甚至未能充分理解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重要性，对中国问题甚是隔膜。

崔卫平女士对米氏的采访与《米奇尼克对话中国公民》发表后，质疑之声四起，只有小圈子里的一些人仍然热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质疑是以下几篇，按发表时间顺序列于下：

刘自立先生发表了《米尼齐克的波兰观不适应中国》。这篇文章的要点是：波兰社会转型前，其社会主义财产结构和权力结构，既未发展到毛泽东时期的绝对贫困，也不是邓式富裕时期的亿万 资产太子化。而这两大结构的存在，形成了一种由财产主导的中共资源垄断，是中国施行改革， 革命挚肘的根本性前提。其次则是当时的国际局势非常有利，苏联瓦解和无力应付东欧政局，是东欧与波兰人民借此推翻共产政权的前提，甚至唯一前提。因此，参考波兰这个小国的经验，根本不是中国应选之策。

笔者之文名《他人的经验与我们的现实——有关米奇尼克中国对话的几点思考》，从分析 1989 年以前中国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历史入手，指出米奇尼克要中国人将和平转型希望寄托在中共党内改革派身上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继之指出中波两国在社会条件根本不同。米奇尼克介绍的波兰和平转型成功的前提，即波兰自由运动三大因素：知识界、工人和天主教等，在今天的中国基本缺位。笔者在文中还指出另一重要条件：“苏东波”到来时，波兰的国家与社会已成二元对立之格局：国家（即政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而社会却已经是民主派的天下，执政党和反对派形成分庭抗礼之局。中国现实并无此等条件。文章末尾，笔者指出中国要想建立以社会公正为目标的民主社会，只有“杀死希特勒”（极权体制）才有出路。

仲维光先生在《质疑米奇尼克》一文中，对米氏北京之行表达的观点感到震惊不解，认为有悖于米氏一贯思想。他梳理了米氏思想的脉络，再次强调他认为米奇尼克的这段话不仅对西欧、东欧，而且对中国、北朝鲜、乃至古巴仍然无条件地有效：“没有不是极权主义的共产党。要么它是极权主义的，要么它就不再是共产党了。”还学文在《对米奇尼克访问北京的另一种疑问》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她凭着自己多年来对米氏的了解，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对米氏座谈不完整的介绍上，并提出一个非常 SHARP 的问题：“比这个新闻报导的常识问题，Who?When?Where and What? 更令人关注的是，借米奇尼克的来访，“要给百姓和网络提供什么样子的信息”？提供了什么信息，现在大家都见到了；舆论是什么反应，大家也见到了”。并希望主办方崔卫平女士能够提供更为透明开放的真相。

吴庸先生在查证了大量资料之后，写了一篇《米奇尼克的幻想与波兰转型的实际》，认为米奇尼克有意忽视了波兰历史的真实状态。事实是：波兰从未出现过人民与当局者无条件的合作，波兰曾经处于一度被军管的险峻状态，是波兰工人与异议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做艰苦抗争，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有力支持，波兰工人阶级和异议人士才将这个列宁斯大林式的共产党埋葬，开辟了民主与专制抗衡史 的新纪元，它导致柏林墙的倒塌，导致欧洲共产党重新调整夺权路径。曹长青先生的《米奇尼克给中国开错药方》一文因为上网较迟，其时有关“资格不等论”的争论已经停止。本文不予评述。

应该说，上述分析并无任何攻击性语言。但由于海外作者中有人质疑了米氏应邀访华的背景不透明，于是引发了一些意气之争，拥米派干脆将上述质疑者冠之以“反米小集团”之称。其实，上述质疑者当中，除仲、还学文两位居住德国且是夫妻可能有商量之外，我本人与这些作者没有任何书信往来，完全是各抒己见，连一个统一的发表阵地都没有。而国内那个小圈子的存在及同气相应，有目共睹。

刘荻则写了一篇文章《波兰的昨天与我们的今天》（自由亚洲电台 7 月 30 日），该文的要点是制造了一个谈论

中国的“资格不等式”：海外流亡人士不如波兰的米奇尼克“懂中国”，而米奇尼克不如包括她在内的与米氏对话的中国人士“懂中国”，因此最好不要再谈论，以免“令人啼笑皆非”。并明确宣布她在内的小群体在国内已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与固定场所。

这些争执牵涉到下一个重要问题：

➤ 如何看待当局默许某些人拥有活动空间存在？

这是当今中国异议运动与社会抗争中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但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过去每次讨论均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卡了壳，无论怎样有意义的讨论都由此导向道德批判的方向。无空间方诘问的是：为什么当局只允许这种意见存在而要打压其他意见（包括有空间方的打压在内）？有空间方则想绕开这点，以免成为靶子。这种回避式的态度不仅没解决任何争论，反而导致各方裂痕越来越深，无法形成更深刻的讨论。

米奇尼克访问中国并举行几次座谈，中国当局容许某些异议的活动空间存使外部观察者受到鼓舞。除了刘荻小姐在其文中承认她所归属的小群体有活动空间并有固定场所，一向对这个国内群体高度支持的一平认为，“不言而喻，在中国现行制度下，米氏与异议者座谈，需要得到官方的默许”。胡平在“这场对话不寻常”中亦持同样看法。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大家对这种默许下拥有活动空间的人士及其活动应该如何看待？

我个人认为，对当局默许的某些异议活动空间的存在，主要看他们起什么作用。

米奇尼克在中国发表的观点如果能够得到全面介绍，并且只将其当作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种参考而非唯一备选建议，这当然没有问题。问题是：一，米氏北京之行的活动组织者崔卫平女士对此行介绍的资讯处于“不完全状态”。这点王天成先生已经指出，“他这次访华，建议民间力量依靠党内改革派，这话容易引起误解。这是波兰的经验，但不是波兰经验的全部”。崔女士也已在其后来发表的《老虎》一文中也部分接受了王天成的批评。二，刘荻之文的重点不在于学术思想讨论（因为她将波共两任书记统治时期的不同政治生态混成一锅煮），而是忙于从中推出了一个研究中国的“资格不等论”：米奇尼克比海外民运人士懂中国，而参与讨论的诸人比米奇尼克更懂，因此海外人士不应该就中国问题发言，发言只会“令人啼笑皆非”。对这样一篇无论是史实还是结论都有严重缺陷的文章，崔女士竟然在自己7月31日的推特上介绍说是“好文”，由此引发笔者的质问，请她解释此文“好”在哪里？并指出所谓“资格不等论”后面隐藏的是话语权之争。表达的意思是：利用目前他们拥有的独特空间，垄断中国的话语权；别人都不懂中国，意即中国的现状应当由他们说了算，备选道路也由他们说了算。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允许某些异议空间存在，这是极权政治下的特殊现象，被剥夺了活动空间的人士再反对也改变不了这一现实，过分纠缠于这一问题上反而会导致正常讨论无法深入。倘若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都能获得相对松动的活动空间，则无疑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和转型具有指标意义。通过这次争论，被中国当局默许存在并允许有活动空间的群体至少应该给自己划条行为底线：不应该凭仗自己的特许权来剥夺他人的发言权与行动权，即使当局允许其拥有存在空间的本意是要造成如此局面。只要拥有空间者不理直气壮地制造“资格不等论”、不打压他人的言论与行动自由，有这种经过当局允许放行的空间存在，比完全没有要好一点。这是我的第一点建议。

第二点建议，拥有空间者既然希望就现实问题发言，无论如何请多读点研究中国现实的学者的文献，这样在其引领中国转型讨论时才不至于漫无边际甚至让人不知所云。比如崔卫平女士的《老虎》一文，标题听起来很好，但其主旨无非是希望民众不要有仇恨与加强社会自主性。不知她是完全不知道以下中国问题的存在还是故

意避开？一、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不要视百姓如寇讎，动辄暴力相向（6月湖北武汉发生维稳办厅座太太被当作上访者殴打即一例）。二、是谁剥夺了社会的自主性？中国对 NGO 形成的分类控制模式，并视外国 NGO（包括拿外国资助）为颜色革命工具不断收缩其生存空间，今年由国家外汇局下发“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导致一些被中国当局视为“政治敏感”的 NGO 面临“断粮”之虞等类事情，似乎都不在她关心的视野之内；三、中国民众是否拥有制定“驯兽规则”的权利。而上述这些，在孙立平先生领衔的清华课题组有关维稳形势分析报告里谈得很清楚：是当局体制性防卫过当（意即施暴过多），希望政府能够理性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矛盾的特征和性质重新判断，不要把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于建嵘先生的有关刚性维稳的论述也很到位。这与崔卫平女士的劝说对象定位完全不同。孙、于两位劝说的是政府，希望政府不要继续施暴，而崔女士劝说的是民众不要仇恨，等待隐含的意思是忍受。

第三点建议，正确认识公民社会的制度平台与官方默许存在的小空间之本质差异。民间各种反抗与维权活动此起彼伏，但因陷入孤立而未能互相呼应，无一能免于被官方镇压的下场。散沙般的个人行动转化为集体行动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这些，在集体行动理论与社会运动理论中均有很清楚地阐释，中国政府目前扼杀的就是民间的自组织能力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作为学者，我一直关注形成社会压力集团的各种条件的萌芽与变化，以及压力传导是否有可能形成制度化通道。如果将极其狭小的、经当局默许而存在并严格限制的“空间”当作“公民社会”已经足够壮大的论据，如刘荻小姐等人那样，只能说是自欺欺人之谈。即使是艾未未先生、冯正虎先生等韧性反抗，目前也只能算是一种有民意基础的个人反抗，与当局之间并未形成任何制度性反馈。尽管他们的努力是通向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行动积累，我个人对此也怀有很高的敬意。（我不同意西方有评论将艾未未的反抗类比为 68 年人或者嬉皮士，因为艾的行动无论是所承受的巨大风险还是其尖锐激烈程度与社会影响方面，都与后者不在一个层级上。）

➤ 对今后中国转型路径选择的看法

由于朝野掌握的资源及力量处于完全不对称状态，可以说，如何选择转型路径，左右中国转型走向的主动权在官方手中而非民间手中，这点我想大家都应该没有歧见。有歧见的是如何迫使官方作出理性选择。

中国目前的危局除了瞞天自大、闭目塞听的当局之外，凡有头脑且愿意睁开眼睛看现实的人都能看见。且不说每天发生于各地的社会抗争与各种暴力事件的蔓延，即使是精英集团也有人开始反思。有官方背景的共识网本着“补屋”的精神保持了网站的相对开放性，在当局容忍的极限内让该网站成为一个国内所没有的意见平台。头脑清醒的学者们也纷纷以各种形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如中国模式的讨论与维稳的讨论），作为老太子党成员的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从今年一月以来，在好些场合都坚持发表过自己对中国转型的看法，认为不应该坚持所谓“中国模式”，要遵循普世价值建立一套保障实现个人权利的制度。一向以不得罪政府为原则的企业界人士也有人大胆表态，比如搜狐总裁张朝阳今年 2 月曾发表演讲“不完整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内允许自由竞争。一句话，穷则变，变则通。大家都希望当政者能够高尚一次或者清醒过来，为中国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

从底层人民受剥夺的情况来看，以任何形式改变中国目前的政治格局都有道义基础。但问题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人民并无任何有效的组织资源与支撑组织行动的经济资源。中国实现和平转型是所有人（包括国际社会）的梦想，但中国的现状却注定这条路在中国目前看来有点渺茫。面对转型困局，我只能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人们可以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向当局抗争，但选择了某种方式的人不能因为别人选择了不同方式就拼命打压，用各种方式将别人污名化弱化并打击之。要知道海外流亡人士因当年的抗争失去了家园，但并没有失去讨论中

国问题的资格。他们讨论中国问题的能力与水平如何，读者自有判断能力。而且我还提醒国内同胞：对于海外流亡人士来说，促进中国实现民主化与其说与他们的利益相关，还不如说只是与其理想相关。于我本人来说，斯国，斯土，与其说是我的生存之地，还不如说是情感安放之地。大家天天在谈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抗争运动，根本不知道这场运动的早期领袖人物当中，还有选择了完全退隐的室利阿罗频多（《周天集》的作者）。我本人就非常喜欢这位圣哲在心灵上的恬淡出世。民主理想如能实现，我在不在中国又有何妨？

无论如何，本轮争论中我看到了一点希望：与上一轮“有敌无敌论”之讨论相比，这一轮要相对有理性得多。“拥米派”的核心小圈子最初也玩过以前打群架骂人的把戏，但这势头只在推特上出现过一会，很快就被止住了。而一些活跃推友这次没有以阵营为线无条件支持“资格不等论”，而是从道理出发，对“资格不等论”表达了某种否定。崔女士最后也间接否认了自己推重刘荻小姐的“资格不等论”，表现出了理性与克制。

有关中国转型的讨论与行动还将继续。“路是长的，门是窄的”，每一步脚下都会踩着荆棘。但在民主化实现之前，中国人还得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我虽身居海外，却愿与我的同胞风雨同行。 T

（原文发表于《纵览中国》网站，2010年8月5日）

自由从何而来？

刘荻

英国的立法者曾经认为：议会不能创造法律，而只能是“发现”社会生活中现已存在的“法律”并加以确认。从这个角度来说，自由一定是先于保障自由的正式制度而存在的；自由是无数人行动和博弈的产物，制度只能对现实存在的自由加以确认，而不能创造自由。

曾经担任波兰团结工会顾问、现任波兰《选举日报》主编的米奇尼克先生访问中国，在中国网友中引起了一些争论。何清涟女士在文章中说：“亚洲一些类似国家不具备波兰和东欧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权力阶层是最自私、最没人类意识、最无现代政治理念、最无能，因而最喜欢用最凶残、最简单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群。因而对他们不可抱有希望。”对此，笔者在《波兰的昨天和我们的今天》一文中写道“让我们仔细想想，究竟有什么事是当年米奇尼克他们可以做，而今天我们不能做的吗？”笔者的文章认为，米奇尼克当年在波兰从事的公民社会建设工作，在今天的中国都是我们可以做的，而且今天我们能做的事更多，今天的中国社会比上世纪70年代的波兰有着更多的行动空间。

何清涟女士回应说：“正确认识公民社会的制度平台与官方默许存在的小空之本质差异”，“如果将极其狭小的、经当局默许而存在并严格限制的‘空间’当作‘公民社会’已经足够壮大的论据，如刘荻小姐等人那样，只能说是自欺欺人之谈”，“即使是艾未未先生、冯正虎先生等韧性反抗，目前也只能算是一种有民意基础的个人反抗，

与当局之间并未形成任何制度性反馈”。

笔者认为，上述言论单独看来并无大错，但并不能构成对笔者观点的驳斥。笔者从未认为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足够壮大。在中国建设公民社会，这是现在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但是笔者认为与上世纪 70 年代的波兰相比，在今天的中国建设公民社会的条件更成熟，自由空间更大，能做的事也更多。

用“公民社会的制度平台与官方默许存在的小空之本质差异”和“某些个人反抗与当局之间并未形成任何制度性反馈”来驳斥笔者，这是转移话题，也是混淆因果关系。“公民社会的制度平台”和“与当局之间形成制度性反馈”，只能是公民社会建设的结果。如果公民社会的制度平台已经建立，与当局之间的制度性反馈已经形成，那么可以说民主制度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或者即将建立起来。因此建设公民社会和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一定会存在一个尚未建立起“公民社会的制度平台”，尚未形成“与当局之间的制度性反馈”的阶段（很可能还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如果认为因为今天的中国不存在“公民社会的制度平台”和“与当局之间的制度性反馈”，所以不具备走向民主的条件，这就像是某人吃五个烧饼才饱，因此认为前面的四个烧饼没必要吃。波兰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也正是在何清涟女士所谓的“极其狭小的、经当局默许而存在并严格限制的‘空间’”中逐渐生长出来的，上世纪 70 年代米奇尼克等人在波兰建设公民社会时，恐怕根本没指望过马上建立起“公民社会的制度平台”和形成“与当局之间的制度性反馈”。

这场争论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自由是如何产生的？笔者不认为自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也不认为自由是统治者发善心的结果，笔者认为自由只能是无数人行动和博弈的产物。笔者在 twitter 上说：“一开始当局不许你做一件事，只要做就会受到惩罚；但是后来这么做的人多了，法不责众，就相当于当局默许你这样做了；再下一步，这种默许成了惯例，然后再成为正式的制度。自由就是这么产生的。”当局的默许和有制度保障的自由之间当然是有区别的，但保障自由的制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争取自由是一个过程，而当局“默许”下的自由空间也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英国的立法者曾经认为：议会不能创造法律，而只能是“发现”社会生活中现已存在的“法律”并加以确认。从这个角度来说，自由一定是先于保障自由的正式制度而存在的；自由是无数人行动和博弈的产物，制度只能对现实存在的自由加以确认，而不能创造自由。

自由不是一蹴而就的，自由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心理学家朱建军说：“死亡可以一次完成，而生命则需不断努力。”自由也是如此，让我们共同为自由而努力吧。 T

2010 年 08 月 26 日

研究专栏

编者按：本期研究专栏我们继续连载郭玉闪关于企业理论的系列读书笔记，以及杨孚瑞的医改文章《台湾全民健康保险计划缩影》，大陆医改先是有卫生部副部长宣传“失败”，现在公立医院改革同样雷声大雨点小，至今没有整理出一个明确的思路来。民间对医改成功几乎没有信心，更不要提患者对目前医保的满意度。本文放眼海峡两岸医疗体系之模式，其经验和教训都值得大陆地区学习。

华新民女士多年来为保护北京四合院四处奔走呼吁，近日她为我们惠寄了最新写就的《告诉你：土地不是“国家的”》一文，在此刊载，感谢华女士。精神病人强制收治问题，近年来国内学界讨论不休，8月7日，传知行主办召开了“精神病与行政强制收治立法”研讨会，探讨将出台的《精神卫生法》及《行政强制法》中精神病人的权利保障问题。本所研究员楚望台做了题为《强制收治应当遵循的三个原则》发言，在此我们全文刊登此演讲稿，欢迎大家讨论。

■ 企业有没有边界？

郭玉闪

参考文献：

I The Theory of the Firm, Bengt R. Holmstrom and Jean Tirole,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1, Richard Schmalensee and Robert D. Willig(ed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9, Ch.2, pp61-133

II The nature of the firm: the influence, Ronald Coase, 1988

III “论新制度经济学”，1991，出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张五常，商务印书馆，2001



郭玉闪 Guo Yushan

在 Bengt Holmstrom 以及 Jean Tirole 合写的关于企业理论综述的文章里(The Thoery of The firm, 1989)，他们特地总结道，今天经济学家都是在合约的基础上摸索对企业的更深理解；确实，从七八十年代的企业理论文献看，合约分析或者与合约有关的分析占了相当大一部分。

从合约角度看企业，企业可被视为多个利益方之间的一份合约，这些（显性或隐性）合约安排的存在，主要作用是降低企业生产所涉及各方之间的交易成本，应当说，这依然是受科斯的企业理论传统影响，但又有所区别。

正如我在以前的读书笔记里提过的，企业理论会出现，是因为经济学家发现，在新古典经济学里无法理解什么是企业以及为什么企业会存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极度离散的市场里价格如何配置资源。所以，当科斯把企业性质拿出来做开创性讨论时，在他心里，企业与市场是两回事，是配置资源的两种方式，而企业理论的任务之一，就是找到能让企业比市场有生产力的各种因素，这也是为什么 Demsetz 在关于企业理论文章里爱用“the firm productivity”这样的字眼。

有趣的是，把企业视为合约的解释方法，虽然受科斯影响，但在看待市场与企业区别时会得出与科斯正好相反的看法。把合约方法在逻辑上推到极致，则不仅可以把企业看做一组合约，市场也可以看做合约。此时，企业与市场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区别的只是合约的完整程度以及时间长短。如此，也就不存在企业边界这一类问题了。

举个例子，中关村电子市场，究竟是一个市场、无数个企业（商铺）还是一个大企业？到中关村去买电子产品，随便找一个商铺，他都可以通过调动其他商铺的货源把客户所需要的所有电子产品配齐：与一家商铺交易等于与所有商铺交易。如果坚持企业是有边界的，那就很难解释这家商铺的边界到底在哪。还有一例子是张五常爱举的，有计件安排的工厂，它的企业边界也是不清楚的，因为跟工厂按计件合作的工人，究竟算是工厂的职工还是独立承包商，是很难说明白。

在企业与市场的区别上，张五常与科斯的观点截然相反。张五常 1983 年写了一篇论文《企业的合约本质》，主要逻辑就是从合约角度看待企业与市场。后来在 1991 年，科斯得诺贝尔奖时，张五常与科斯还有一次正面交锋。张五常受邀在诺贝尔专题讨论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新制度经济学”，在文内又提及用合约来理解企业与市场，科斯与贝克尔对此文章分别做了评论。在科斯的评论里，对张五常的观点“合约安排使我们很难辨别企业从哪里开始，又在何处结束”做了明确的反对，他认为“存在着企业，大多数经济活动是在它们的内部发生的”，也就是说，存在着明确的企业边界，而“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进目前相当粗糙的企业理论”。



《经济解释》，作者：张五常。

科斯同时还认为，张五常会犯此错误，原因还是他自己在 1937 年《企业的性质》文章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结果误导了包括张五常在内的经济学家的注意力。1987 年，Williamson 举办科斯《企业的性质》五十周年纪念会时，科斯在发言里也着重提出了这个错误，即把企业结构视为“雇主—雇员”，也就是把企业内部结构只集中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上，企业用权威替代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被简化为工人自愿服从企业经理的命令，实际上，用科斯的说法，企业的本质工作是“running a business”，不仅仅包括劳动力，还包括用企业的行政管理结构（managerial structures）来调配各类非人力资本。企业的生产力就体现在这个行政管理结构在配置资源上优于市场价格手段，同时企业与市场的边界也由这个行政管理结构体现、标识。

实际上，与科斯一样，多少人提到企业就只会想到资本家与工人关系，这种观点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可以一路追到马克思；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简单观点不仅给经济理论也给社会实践增加了无穷纠纷。 T

台湾全民健康保险计划缩影

杨孚瑞

台湾全民健保虽然也是政府统一管理，但是没有出现大陆特有的高药价、看病难、医患关系恶化等顽疾，而且，70%以上的满意率说明了民间对全民健保的认可。而大陆的医改先是有卫生部副部长宣传“失败”，现在公立医院改革同样雷声大雨点小，至今没有整理出一个明确的思路来。民间对医改成功几乎没有信心，更不要提患者对目前医保的满意度。

台湾学者徐斯俭教授来京进行学术交流时，因笔者研究新农合及医改，于是谈到了台湾的全民健康保险计划。徐教授还出示了他的健保卡，表示如果他看病的话，除了挂号费，其他费用基本不用再出。台湾现在实行的全民健康保险计划几乎将全部人口纳入到健康保险的计划之中，有效的解决了大陆地区看病难的问题。但是其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其经验和教训都值得大陆地区学习。

大陆政府于 2009 年三月提出的医改总设计中，也有“以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行政管理的统一”这样的描述。虽然目前只有神木一个地方实现了城乡统一的全民基本免费医疗模式，但全民医保毕竟是总体目标。因此，象政治经济方面的发展一样，在医疗保健上的台湾经验也有其独特的价值。本文只是一个简单介绍，有兴趣的研究者可以参看更多的资料。



杨孚瑞 Yang Furui

台湾全民健保的背景

台湾在 1995 年实行全民健康保险制度以前，大致存在四类医疗保险。1950 年出现的劳工保险，针对的保险人群是企业雇员。1953 年出现军人保险，1958 年开始有政府公务人员的保险。后来还有针对农民和渔民的保险制度。这些保险制度并不只是针对以医疗，而是包括医疗在内，还包括生育、伤残等其他保险内容，基本属于综合性保险。

1994 年，在国内政治压力下，台湾的立法会于 1994 年 7 月 19 日通过全民健保法，行政院决定 1995 年 3 月 1 日开始实施全民健保。在全民健保实施前，未参加既有四大医疗保险的人数占 42.5%，每千人医师 1.1 人，每千人病床数 4.5 张，人均医疗费用 571 美元，占人均 GDP 的 4.9%。相对于 1960 年代末，每千人 0.5 名医师和 2.5 张病床，改善并不像经济进步那么大。

相比之下，我国大陆 2008 年每千人拥有医师 1.3 人，包括助理医师则为 2.9 人，每千人病床数 3.1 张，人均卫生总费用 868 元（2007），约合 127 美元。可见，我国大陆目前的医疗资源大概相当于台湾的七八十年代。（以上数字根据卫生部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

涵盖的人群

全民健保法实施一年后，投保人数达到应保人数的 95%。到 1997 年 12 月末，投保人数 2045 万，占应投保

人数 96.3%。但原住民参保率低于 90%。2001 年 2 月 1 日起，军人也纳入到全民健康保险体系中。

1999 年和 2003 年，全民健保法经过两次修改，主要是针对弱势人群和边缘人群，尽量把他们也纳入到全民健保中。1999 年通过《纾困方案》，2003 年通过《经济困难民众纳保优惠专案》。经过这两次完善后，2004 年底，参保人数达到 2208.34 万人，超过了应保人员的 99%，可以说已经普及到全民。

目前，参保对象不包括犯人和失踪者，但包括合法居住的外国人。

➤ 筹资

全民健保法把被保险人分六大类：雇员或业主；工会会员；农会会员；军人；低收入者；荣民及眷属。各类投保金额基准和政府补贴的比例不同。各类不同的人的投保金额是不一样的，这点和我国神木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不同。台湾全民健保的投保金额共分 30 个等级，从最低的 1 级每月 15840 元新台币到最高的 30 级 60800 元。

缴费准则是“量能负担原则”，也就是根据收入水平为基础，缴纳一定比例的保险费。这有别于商业保险。一个人收入越高，就划入越高的保险等级，月保险金额就越高。当然，要缴纳的保险费也越多。保险费=保险金额×保险费率（开始是 4.25%，目前是 4.55%）。在缴纳的保险费中，个人、雇主、政府出资根据不同人群而各不相同。大体上，公务人员自交 40%，政府补贴 60%；劳工自交 30%，雇主出 60%，政府补贴 10%；无雇主劳工（相当于个体户）自交 60%，政府补贴 40%；农民自交 30%，政府补贴 70%；低收入者政府补贴 100%。

政府补贴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薪资税（不是所得税），其他财源还有彩券和芋酒税。

➤ 管理机构

台湾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是行政院，行政院下有卫生署。全民健保制度在设计之初就选择了“单一公办公营”模式。卫生署为全民健保之主管机关。在卫生署下成立了中央健康保险局，作为单一保险人，负责全民健保的业务经营，包括办理承保、保费和保险的收缴和支付，以及选择、审查、支付特约医疗院所（即定点医疗机构）。

另外，卫生署还下设了三个合议机构：全民健保监理委员会、医疗费用协定委员会、争议审议委员会。监理会负责监督；费协会负责医疗费用的协定和分配；争审会负责有关保险人与保险对象、投保单位、医疗机构之间的争议事件的审议。

不过要注意，这里的争议审议委员会主要解决的争议一般并不是医患纠纷，而大部分是保险人和医院对诊疗费用是否过高存在的争议。

➤ 医疗机构

至 1997 年 12 月底，中央健保局特约了 737 家医院、8331 家西医诊所、4979 家牙医诊所和 1826 家中医诊所，作为参保人就医的定点医疗机构。其中，医院分为医学中心、区域医院、地区医院。医院的特约率达 94%，西医、牙医、中医诊所的特约率分别是 90%、97%、85%。这说明大部分医疗机构进入特约名单，这就避免了大陆医改中的定点医院往往是少数公立医院从而缺乏竞争的缺点。

在大陆有福利性质的医疗保险，如新农合或城镇居民医保，基本是不包括牙医的，由此也可见台湾全民健保的医疗服务范围是很广大的。参保人可以自由选择这些特约（即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而这些机构在提供医疗服务后可以向中央保监局申请诊疗资金。这种病人选医院的机制鼓励了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

➤ 偿付方式

全民健保不像大陆的城镇居民医保需要患者先垫付医疗费再取得现金补偿的医疗保险金，而是直接采取提供医疗服务的方式给付。从效果上看，有点近似我国农村推行的新农合直补，亦即在医院治疗完毕后直接得到补偿。实际上不必垫付全部医疗费，只支付自己应付的部分即可。

医疗机构在向被保险人提供医疗服务后，在向保险人即中央保监局申请相应的医疗资金。在技术上，每个参加全民健保的被保险人都有一张健保卡，上面有详细的个人信息，目前已经实现了电子办公。全民健保实施后，原先的公、劳、农保的医疗给付（实物部分）抽离，但现金部分保留。也就是一个人如果原来参加过其他保险，在以医疗服务形式得到全民健康保险的偿付后，原来参加保险的现金补偿仍可以得到。

全民健保的参保人并不是看病时一分钱不花。被保险人除负担 50-100 元的挂号费之外，还要负担 20% 的门诊费用或 10% 的住院费用。住院超过 30 天则需另外负担 10-30% 的医疗费用。相对于大陆的三大医保，病人负担的费用比例是较低的。这种设计同样含有节约医疗资源、鼓励从需求上减少浪费的含义。

➤ 特点

- 强制性全民投保。这是为了覆盖全体国民，将医保变成了一种类似义务教育的强制福利。这种强制是否合乎台湾宪法是有争议的，但司法院曾给出解释，认为合法。
- 统一综合医疗偿付。不像我国的新农合或城镇居民医保，各地的筹资水平和医疗偿付政策各部相同，台湾全民健保的筹资和偿付标准是统一的。当然这和其地域较小有关。
- 患者看病部分负担。这是为了从需求上鼓励节约医疗资源。
- “量能负担原则”，投保人收入越高缴费越多，而低收入者完全由政府补贴保险费。这有一定的二次分配色彩。
- 拟议中的总额预算制和前瞻性付费制度。由于具体的困难，尚未实施。其所谓前瞻性付费制也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预付费制度。有些类似于美国的诊断关系群制度（DGR）。

➤ 实施后的情况

- 医疗服务量大幅增加

下表是原来没有医保的全民健保新投保人的医疗服务量对比：

	全民健保前	全民健保后	增加百分比
住院诊疗次数	0.04	0.11	175%
急诊次数	0.05	0.11	120%
门诊次数	0.21	0.48	129%

- 医疗机构的医疗费用变化

医疗院所等级	1994 劳动保险	1995 全民健康保险	增加百分比 %
每次门诊费用			
诊所	255	311	22.0
地区医院	495	662	33.7
区域医院	829	1055	27.3
医学中心	1102	1289	17.0
每日住诊费用			
地区医院	1458	1946	33.4
区域医院	2843	3472	22.1
医学中心	4063	4818	18.6

● 费用比例情况

A, 按住院治疗和门诊治疗分: 住院 32%; 门诊 68%; 其中: 西医门诊 54%, 牙医 8%, 中医 5%。相比之下, 大陆的医保的住院费用普遍超过门诊费用;

B, 按类别分: 诊疗费 30%; 药费 30%; 其他 (处置费、检验费) 40%。相比之下, 大陆医保的药费往往占 50% 左右。住院费用中, 病房费 19%; 药费 18%; 手术费 18%; 检验费 15%; 处置费 9%; 其他 (材料、观察) 25%;

C, 按医院级别分: 医学中心 24%; 区域医院 20%; 地区医院 21%; 基层医院 35%。

● 被保险人的满意度

从 1995 年 4 月到 1997 年 2 月, 满意者从 20% 上升到 70%。不满者则从 60% 下降到 24%。可见, 随着全民健保制度的实施, 满意度从基本不满上升到了基本满意。

● 主要存在问题

研究者认为主要的问题是财政上是否能持续下去。2005 年被保险人、雇主和政府分别缴纳保险费的 38%、26%、36%。行政费用占医疗总费用的 2.5%。中央健保局每月收 220 亿, 支出 210 多, 勉强维持平衡。

除了财政问题, 受到批评的问题还有: 保费制度的公平性、各级政府负担补贴额度、医疗资源浪费、健保局员工待遇等等。

➤ 结语

台湾实行的全民健保制度基本做到了“低保费，高保障”，大体是成功的。这对于我们有诸多启示。

首先，该制度的实施是台湾基本民主化之后，执政党在政治压力下力促实施的。而之前虽然经济发展很迅速，但民生和社会事业并没有同步跟上，有 40% 多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这说明民主政治对民生事业是有实际助益的。在民主化转型之前，我们很难期待掌握公权力的人宁愿把资源投向公平的民生事业而不是用于增加 GDP 或维稳。

其次，台湾的全民健保是以法律的形式制度化的。除了最初的《全民健康保险法》和其数十个子法，后来的完善和补充的形式，也都是立法机关通过了相关的法律。这样的制度不但有权威性，而且真正反映了民众需求。反观大陆的医改，政策的制定者往往局限于国务院下属的几个部，甚至开始是卫生部一个部，这样形成的政策往往反映的不是全民利益而是部委的部门利益。

再次，全民健保制度消除了先前各类社会性医疗保险不平衡的弱点，不但把几乎全体国民纳入医保体系，而且做到了基本公平。而大陆目前实行的各类医保各自为政，不公平性很强。比如新农合经过数次大幅提高保费，其人均筹资只有 150 元，而城镇职工医保达到了 1200 元以上。在许多穷人比如城市流民没有任何医保的情况下，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明显属于富人阶层）则享有完全免费的公费医疗。

总之，台湾全民健保虽然也是政府统一管理，但是没有出现大陆特有的高药价、看病难、医患关系恶化等顽疾，而且，70% 以上的满意率说明了民间对全民健保的认可。而大陆的医改先是有卫生部副部长宣传“失败”，现在公立医院改革同样雷声大雨点小，至今没有整理出一个明确的思路来。民间对医改成功几乎没有信心，更不要提患者对目前医保的满意度。这些对比都不得不令我们深思。

最后，感谢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徐斯俭先生发来若干台湾全民健保的研究资料。 T

参考资料：

- 1, 江东亮：1995 年台湾医疗改革（2006）；
- 2, 李玉君：全民健康保险制度之回顾、检讨与再造（2008）；
- 3, 蔡茂寅：全民健康保险现行制度分析与探讨（2008）。

■ 强制收治应当遵循的三个原则

楚望台

2010年8月7日，传知行主办召开了“精神病与行政强制收治立法”研讨会，探讨将出台的《精神卫生法》及《行政强制法》中精神病人的权利保障问题。本文为楚望台研究员与会现场的发言稿。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法学界和医学界争议很久的话题。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今天我们请来的主要是一线工作的律师和医师。用意就是，希望能探讨精神病强制收治程序中更多的细节问题。医师与律师站的角度不一样，会有分歧。这个分歧在刚才的讨论中已经呈现出来了。刚才闫大夫讲，医生关注的角度很单纯：一个人有没有病，应该怎么治。但是在法律人眼里，他不仅是一个病人，也是一个公民，享有宪法赋予他的各种权利。



楚望台 Chu Wangtai

我们从宪法讲起。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这里用的是非法剥夺或限制。什么是非法剥夺和限制？立法法第八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精神病人的行政强制收治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要实施这种强制，必须通过法律。这里的法律指的是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我们来看行政强制法的三审稿。第九条讲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第一项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下面三项是关于财产的强制。第十条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尚未制定法律，或者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本法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以外的行政强制措施。第十一条讲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条件、种类作了规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作出扩大规定。法律中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增设行政强制措施。

在宪法和行政法这个体系里，以上三部法律讲的很明确。目前我国所有依据国务院的法规、各部委的规章进行的行政强制收治，都是非法的，也可以说是违宪的。《行政强制法》对于这些越权的行政强制怎么处理？行政强制法也作了规定，是它的第六十四条：“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违反本法规定的权限设定的行政强制无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撤销。部门规章设定的行政强制无效，由国务院予以撤销。地方政府规章设定的行政强制无效，由国务院或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撤销。”立法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问题就来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强制收治精神病人的法律。哪怕是必要的收治，也找不到有效的法律依据。唯一有可能规定这个问题的是《精神卫生法》，从1985年开始制定，到现在还在草案阶段。



必要的规定至少应该有三点：第一，强制收治的条件。第二，入院的法律程序。第三，出院的法律程序。我们来看一下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

关于强制收治的条件，及入院的程序，都是在该法的二十七条第一二款里面。它这样规定：精神疾病患者或者疑似精神疾病患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的，经精神专科执业医师检查评估，确认需要住院治疗，其监护人应当为其办理住院手续；必要时，由公安机关予以协助。

民政部门、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发现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疑似精神疾病

患者，应当将其护送至当地政府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评估、治疗。第三款规定的是复诊。

我们可以发现，“危害公共安全”这个规定相当宽泛。这不是一个医学标准，甚至也不是一个法律标准，而是取决于警察的定义。在现实当中，有很多上访的人，精神很正常，就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理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再比如彭宝泉，看到城管打人，拍了几张照片，也被送到精神病院里去了，这六个字实际上是在公民权利上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这个强制收治的标准，我认为应该是病人具有暴力倾向，具有攻击性。这是个更专业的问题，希望在场的各位医师能展开讨论。

再就是入院和出院的法律程序。我们强调这是一个法律程序，而不单是一个医学程序或者一个医疗单位的内部规章制度。因为这是针对一个公民人身自由所作的限制，必须进入法律的轨道。非常遗憾，在精神卫生法的草案里面，看不到这个程序。唯一有关的一条，是它的第三十三条：“精神疾病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对依照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实施的住院治疗和依照本法第三十条规定实施的约束或者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有异议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现实中经常发生的情况，公安机关把一个人送到精神病院里，要求医生收治他。精神病院对他实施了强制性的住院治疗。我现在提出这些问题：

第一，精神卫生法规定这个人有权提起诉讼，他应该起诉谁？是起诉公安机关，还是起诉精神病院？这个诉讼是行政诉讼，还是关于非法拘禁的刑事诉讼？一方面，是公安机关在实施强制收治，但是强制收治是否合法，完全取决于医师的检查评估，精神卫生法还规定公安机关是一个“予以协助”的角色。另一方面，如果评估的医师认为这个人需要住院治疗，这个人就应当住院治疗，程序上也是合法的。

第二，这个诉讼不可能胜诉。因为按照精神卫生法，胜诉的标准只是医学标准。这个人有没有病，需不需要住院，是由医生决定的。医生和医院不可能在法庭上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如果法院要再做鉴定，很可能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已经和入院时不一致了。

第三，很关键的一点。该法规定“其监护人应当为其办理入院手续”、“精神病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可以提起诉讼”。请问，谁是精神病人的监护人？我们知道，监护人是一个法律概念，按照民法的规定，两种人有监护人，一种是未成年人，一种是限制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只有法院以判决的形式宣告了一个人因精神病限制

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监护人这个身份才成立。也就是说，没有法院判决宣告，精神病人就没有监护人，包括他的近亲属也没有监护权。精神卫生法在这里作了一个非常混乱的规定。除非法院已经作了判决宣告，否则根本没有监护人能够办理入院和出院的手续。

另外一种情况，有些病人确有精神疾患，但是不至于发生社会危险性，不需要再进行强制收治。但是他被监护人抛弃掉了，监护人希望他呆在精神病院里。这里面有经济因素，有社会歧视的因素，现实中我们能看到很多。

更甚者，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情况，行政机关把人送到医院里就不管了。法律规定他有通知近亲属的义务，但是他不肯通知，说找不到近亲属。我的亲人认为我失踪了。

这些情况下，我被强制收治之后，怎么能保障我自己的权利？只能靠我本人。我被关在医院里面，和外边的一切联系都隔绝了，我怎么跑到法院去诉讼？飞越疯人院。这个条款，是一句彻彻底底的废话。

第四，怎么出院？谁来给精神病人办出院手续？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被法官判了刑，总有个固定的刑期。但是被医生判了刑，这个刑期就是不确定的。如果是一个正常人被强制收治，他要承担比刑事犯更大的痛苦。他生活在一群精神病人之间，跟社会隔绝开来，并且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去。

我读了媒体对海口安宁医院院长的一个采访。这位院长抱怨说，医院床位超员了三倍，只进人不出人。警方送来的精神病人中，有的已经可以出院，但没有一个部门给他们办理出院手续，医院无力承担这些消费。如果是非精神病人，医院也无法处理。

非常遗憾，精神卫生法在这一方面没有任何规定。其他的收治程序问题，比如期间、送达等等，全部没有。可以说没有任何可操作性。

目前的情况，我的总体感觉是医生的权力太大、责任太大、医院的负担也太大。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参照民事诉讼法中的特别程序，建立一套强制收治的司法审查体系。行政机关对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疑似精神病人进行检查，在我们行政强制理论上称为即时强制，短期的、临时性的，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如果行政机关认为这个人需要长期入院收治，就需要进入司法程序。

为什么强制收治需要法院来决定，而不是医生来决定？如果说一个人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需要人民法院来判决，那么他能否享有人身自由，就应该更加慎重。医学上的意见，可以作为法官的参考。在这个基础上，我提出三个原则：

第一、司法审查原则：强制收治应当通过司法审查，实施强制收治必须同时符合医学标准和法律要件；

第二、谁实施，谁申请的原则：实施强制收治的机关，有责任主动向法院提起收治申请。

第三、定期报告原则。收治机构有责任定期向人民法院报告病患的康复情况，由法院决定是否终止治疗。



■ 告诉你：土地不是“国家的”

华新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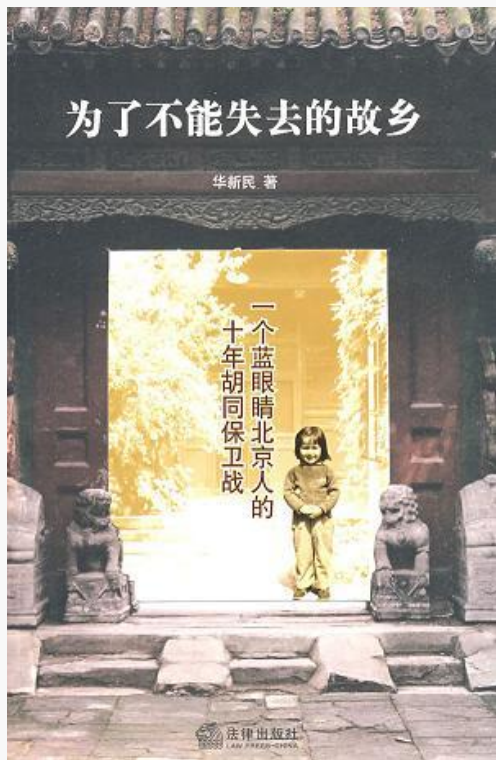
在1982年的宪法里，增添了这么一条：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这只能是一个行政管辖意义上的“所有”，而非财产权意义上的“所有”，已经拥有私人房地产的四合院主人并没有因为这两个字而丧失自己的土地财产权。

去年，我在法律出版社出了一本书：“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其主旨之一是揭示一个真相——如果你拥有一处住宅的话，那么房屋和其相关的土地都是你自己的私有产权。而大部分国人却都以为，并且斩钉截铁地对我表示：土地是“国家的”啊！

我是从保护北京四合院开始关注土地问题的，因为几位四合院的主人们向我展示了他们收在箱子里的房地产所有证，那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在1949年至1966年之间签发的，上面有院落的蓝图和其地籍号。我又发现，其它绝大多数业主的房地产所有证都在恐怖“文革”中被逼迫交给各区的房管部门保管了，而且至今没有归还。北京如此，全国的大部分城市也都一样。我自己家在胡同里也有私宅，我在那里长大，却也被后来的种种政治风暴迷住了眼睛，没有看到那紧锁在院墙里的史实。我走进房管部门，亲眼见到了自家的房地产所有证，虽没有能要出原件，但给了我复印件，加盖了该部门的图章，这对于法院来讲，其效力是与原件相同的。



华新民，1954年生于北京，中法混血，散文作家，民间古城保护人士。著有《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个蓝眼睛北京人的十年胡同保卫战》。



图为华新民著《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个蓝眼睛北京人的十年胡同保卫战》一书封面。

“文革”劫难后清退了部分私宅，尽管此时发给业主的是新制作的产权证，但从宗地蓝图上可以看出相关宅院的财产权利是一直保留下来的，而且是永久的。

从自己家重返社会，我开始认真寻找大陆中国整体城市土地的真相，并逐渐理出了六十年以前至六十年以来的一个清晰的城市宅基地产权脉络。我并且希望把所有的人都带出误区，不要再以为土地“是国家的”了。

在1982年的宪法里，增添了这么一条：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这只能是一个行政管辖意义上的“所有”，而非财产权意义上的“所有”，已经拥有私人房地产的四合院主人并没有因为这两个字而丧失自己的土地财产权，这不单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而且也是在八八年至九五年的若干法律中规定的。同样，对于产生于1988年土地出让制度之后的新房产的主人，由于此“出让”在大陆中国是土地产权转移的意思，与香港的

“土地批租”有本质上的区别——香港政府作为香港土地的所有者，与每一位购房者都签定了租赁土地的合同，而在我们这里是不存在这纸契约和这种关系的。我们的城市政府不是土地的所有者，我们每一位业主手中的土地使用权证显示着对土地财产权的拥有，而非“使用土地”的权利。老宅主人是从其它私人手里买来的土地，新宅主人是从代国家行使权力的地方政府（通过开发商）手里买来的土地，无论是哪一种形式，业主的身份在我们这里都是“地主”，而非“地客”，也因此根本不存在地方政府动不动就“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前提。不存在“收回”，也就不应该存在地方政府的无视私人产权的任意“规划”，以及之后发生的必须“服从”该城市规划的“拆迁”。然而可悲的是，现在整个社会都在把视线放在“拆迁”当中发生的腐败和暴力行为上，放在所谓“拆迁补偿”数额的高低上，而不去追踪产生“拆迁”的根源，这等于是在集体默认我们这种“拆迁”的合法性。

对于 82 宪法的“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土地管理法”解释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这种解释并不是新鲜的。早在中华民国 1947 年宪法的第 143 条里就已经表示：“中华民国领土内之土地属于国民全体”，然而这个“属于国民全体”当然不是指全民拥有属于每家每户私人所有的土地，不是指全民拥有业主个人的私人财产，和我们现在的道理是同样的。

“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书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呼吁对历史建筑和历史城市的抢救，希望停止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破坏。但如果没有土地权利的稳定，一切呼吁都是徒劳的。

在我的书里，“人”和“家”的份量是很重的，人与建筑和文化是同生共死的。我的献词，献给了“所有希望安居乐业的人”。 T

封面专题 · 减税，中国税改的方向与契机

(策划：黄凯平)



(图片设计：魏强)

编者按：9月10日，社科院发布了《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这个报告称2009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达到了GDP的32.2%，这比以前的官方数据要高出不少。但这也只是一种说法，因为不同的结论只是因为统计口径不同而已，有的选择了窄口径，只统计税收收入，有的选择的口径稍宽一点，把非税收入也算了一部分。

然而这些数据都不是中国宏观税负的真相，即使是所谓全口径，也无法包括政府的那些人了小金库之类的等等不为人知的真金白银。真相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这没有统计数据，只有难以言说的痛感。

9月份另外还有一则新闻，美国《世界日报》报道说中国越来越多的富豪加速移民海外，据粗略计算，目前中国富豪向加拿大、美国和澳洲3国移民一年耗资达50亿，最近3年至少有170亿元资金流向国外。真是“苛政猛于虎”？这么多银子哗哗地往外流，留在中国不是很好吗？本所研究员黄凯平的《税制与国家竞争力》一文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从这篇文章来看，前面所说的这两则新闻并不是孤立的事件。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税收竞争日益激烈，世界各国纷纷降低税负拼命吸引投资与人才。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税制就是这场战争的战略武器。正如古人所说“财赋者，邦国之本，如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轻重系焉。”

中国的税制需要改革，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怎么改？这总会激起一波又一波的争论。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伟光教授的《减税是中国税改的必要步骤》一文围绕减税对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减税不止是一个简单的手段，它更是一个契机，是建构新型税制的契机，中国税改，可以从减税开始。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研究员的《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应该废弃》一文分析了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功能与调节功能。面对中国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众多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都把目光聚集在税收的调节功能上，把“均贫富”的希望寄托在个人所得税上。在这种背景下，刘尚希提出废弃个税的累进税率，这是需要相当大的胆识与勇气的，这对舍本求末的“均贫富”来说也是一副难得的清醒剂。减少甚至废弃累进税率，必然是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方向。

财税之事千头万绪，三言两语自难道尽。最后感谢李炜光教授与刘尚希研究员专门为本刊赐稿，特此致敬！

■ 税制与国家竞争力

黄凯平

现在，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栖身之地，人才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安身之所，正如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其 2005 年的一本畅销书中所说，世界经济正在“扁平化”。在“扁平化”的世界里，一个国家的税制对于资本与人才是否有吸引力，将影响这个国家的竞争力。



黄凯平 Huang Kaiping

➤ 美国的减税政策

今年 9 月 8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一个 2000 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如果这一计划获得批准，美国企业在 2011 年的新增投资将 100% 免税，除了对固产投资的一般减税外，该计划还将对企业研发实行永久性减税。

然而这并非奥巴马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小布什政府也曾先后三次大举减税，以期降低企业负担而促进经济增长。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法案将在 2010 年年底到期，对于该减税法案是否延期的问题，美国各界的争论非常多。奥巴马政府计划对年收入不足 25 万美元的家庭以及不足 20 万美元的个人继续实行减税政策，另一方面则认为对富人减税太多，必须停止对富人减税的措施。尽管奥巴马政府对减税并不积极，但不管怎么，美国的减税政策不会被废弃。

美国在全球减税潮中曾领一时风气之先，率先于 1981 与 1986 年率先两度减税。到 1986 年时，美国成了全世界企业所得税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由此也创造了美国接下来的经济繁荣。但在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美国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减税政策出台，而其它国家则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减税，现在美国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将高达 40%，在全世界中仅次于日本排名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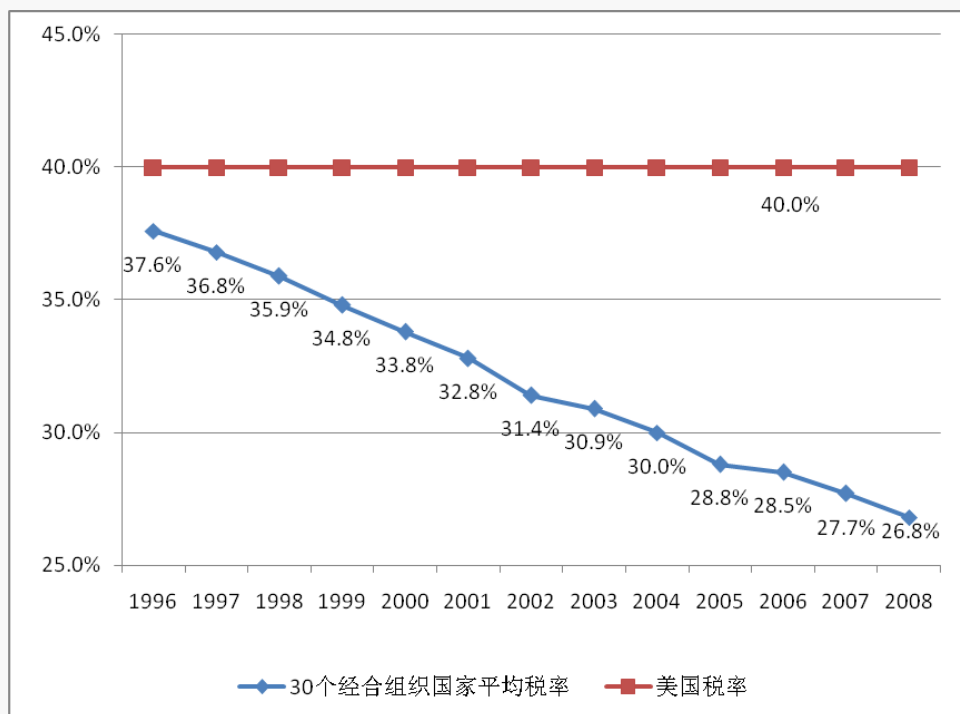
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的高税率让美国企业苦不堪言，英特尔公司说在国外投资办一个半导体工厂的成本比在美国至少要低 10 亿美元，英特尔的 CEO 保罗·奥特里尼称大部分额外的成本“是因为美国无法提供像其它地方那样的税收优惠”。英特尔公司董事会主席克雷格·贝瑞特(Craig Barrett)说：

很多国家都在吸引英特尔公司去他们那里投资建厂，他们相互竞争得非常激烈……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吸引高科技产业与最新型最尖端的工厂，如英特尔。过去，他们都缺少必要的基础设施与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但现在他们都有了，而且许多国家还提供了一揽子非常诱人的税收政策。

《华尔街日报》在 2007 年的一篇报道说“明尼苏达矿业制造股份有限公司（3M）这个制造业企业集团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把更多的业务移往税收更低的国外，以降低公司整体的税收成本。”该公司在美国的实际税率为 33%，高于它在国外的竞争对手，如果它把一些业务移往国外，一年就可以节省上亿美元的税收成本。

也许，这些企业家的报怨可以让政府无动于衷，但面对很多企业为了逃避高税负而纷纷将资本转移到其它低税负的国家投资办厂，使税基大量流失，美国政府却坐立不安，只有被迫寻求对策了。小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的减税政策都在美国经济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出台的，但事实上要求他们减税的压力不仅来自糟糕的经济环境，也来自全球税收竞争，其它国家不断降低税率以吸引资本和人才，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挑战。不管是否存在经济危机，美国减税的压力都非常大。

图：1996 年~2008 年经合组织国家企业所得税平均最高税率



资料来源：Chris Edwards & Daniel J. Mitchell, Global tax revolution: the rise of tax competition and the battle to defend it. Cato Institute, 2008. P46.

在上世纪最后十年的第二轮全球税收竞争中，美国已经全面落伍了。正是这种背景下，小布什政府一上台就在 2001 年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因为在今天的全球化经济中，如果一个国家仍然这样坚持这样的高税率，这个国家的资本与人才外流是必然的，那它的落后将是必然的。

➤ 税制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竞争力

全球化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任何一个国家现在再也不可能关上国门可以过上好日子。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税制也不再是关起门来就可以依据本国国情来制定的，而是必须放眼世界，以全球税收竞争的眼光来考量本国的税收政策。

现在，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栖身之地，人才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安身之所，正如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其 2005 年的一本畅销书中所说，世界经济正在“扁平化”。在“扁平化”的世界里，一个国家的税制对于资本与人才是否有吸引力，将影响这个国家的竞争力。

繁重的税负会把一个国家的资本与人才赶出国门，然而资本与人才不止是与富人有关。在任何一个国家，资本与人才都是生产的发动机，没有这些，经济增长就会陷入停滞，技术也很难创新，政府收入的降低自然不用说，还会导致失业率升高，大量穷人找不到工作，最终会降低整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损失的还是全体国民的福利。

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资本的跨国流动开始变得自由，各国对资本的管制也在一步步放松，随之而来的是日益激烈全球税收竞争。各国为了吸引人才与资本，都纷纷在降低本国的税率，稍有迟疑，大量资本与人才就被税率更低的邻国的抢走了。

在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减税之后，加拿大立刻感受到了威胁，因为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美国的公司可以通过转移投资等手段把利润从加拿大的子公司中抽走。于是加拿大很快也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率以防止税基流失。

在亚洲，激烈的税收竞争也在上演。2007 年，新加坡将其公司税降至 18% 变得与香港一样，但香港反应非常迅速，马上将其公司税降至 16.5%。《国际税务快讯》（Tax Notes International）称这次减税“是香港为了保持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而采取的措施，以应对来自新加坡与上海的竞争”。

香港在 2005 年废除了遗产税，以保证香港作为企业与投资天堂的优势地位。在过去 20 年间，这一区域包括印度、马来西亚、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废除了

遗产税，香港要保持竞争力自然也不能掉队。香港的行动促使新加坡在 2008 年也废除了遗产税，新加坡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对新加坡人与外国人有吸引力的地方，使他们能在新加坡投资与积累财富。”

德国曾经是欧洲税负很低的一个国家，但现在德国的地位正面临着一波又一波的挑战，现在捷克、匈牙利等德国的一些邻国都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税率，这迫使德国在 2007 年也把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从 38% 降至 30%。虽然德国的财政部长说这是为了使德国具有“国际性的竞争力”，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欧盟成员国中已有 8 个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差不多为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德国财政部长在减税之前曾批评奥地利将公司税减至 25% 是搞“财政倾销”有失公正，抱怨其“试图把企业引入奥地利的野心”。但德国也毫无他法，只有降低本国税率来保持本国的竞争力。

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的平均税率已从 1996 年的 38% 下降到了 2008 年的 27%。就在最近十年



图片来源于漫画中国。

里，30 个经合组织中有 27 个国家又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其中加拿大、德国、希腊、意大利、波兰和土耳其的下降幅度特别大。这种下降的趋势还在加剧。

面对日益激烈的税收竞争，经合组织提出了有害税收竞争论，认为各国应该为防止税收竞争而采取措施协调各国的税收，以防止恶性竞争。欧盟也随之提出了一揽子建议来阻止其成员国的税收竞争。但十年来，这两个组织围堵税收竞争的战役几乎已经濒临崩溃，全然无法阻止税收竞争。

➤ 减税创造经济繁荣

经合组织与欧盟围堵税收竞争的战役以失败告终，原因故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各国不愿意也无法摆脱税收竞争，因为低税率给国民带了更多自由，为本国创造了经济繁荣。降低税收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随着税基的扩大，政府也可以获取更多的税收收入。

从 1984 年开始，美国对非本国居民在美国银行存款、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与公司债券时所获得的利息都免征利息税，这一措施为美国吸引了大量闲置资本，到 2007 年为止，储存在美国银行的国外资本已高达 2.6 万亿美元。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爱尔兰。在上世纪 80 年代，爱尔兰人的人均收入比欧洲平均水平要低 30%。但爱尔兰改革税制，对制造业采用税率为 10% 的企业所得税，这种低税率接着又扩展到高技术行业、金融服务业和其它产业。现在，爱尔兰对所有公司都采用 12.5% 的税率，这是目前全世界税率最低的企业所得税之一。爱尔兰岛的计算机业、保险业、银行业、高科技护肤品业和其它产业现在都享受着高增长的繁荣。这一减税政策为经济停滞不前的爱尔兰带来了空前繁荣，今天，爱尔兰的人均收入要超过欧洲平均水平 40%，并获得了“凯尔特之虎（Celtic Tiger）”的美誉。

中国的经济特区也是一个例子。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30 周年庆典时，很多人抱怨现在“特区不特”，优势尽失。现在回头来年，当年所谓的“特区之特”无非就是税收优惠、减少公司注册的成本与程序并破除资本管制。正是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才创造了深圳奇迹，而现在，这种深圳的优势显然已经丧失了，因为 30 年后的今天，全国很多城市都拥有了与深圳一样的“特殊政策”。对于深圳来说，要继续吸引人才与资本再续特区的辉煌，除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外，降税是重要的一条。

最近，美国《世界日报》报道说中国越来越多的富豪加速移民海外，导致中国财富和人才大量流失，据粗略计算，目前中国富豪向加拿大、美国和澳洲 3 国移民一年耗资达 50 亿，最近 3 年至少有 170 亿元资金流向国外，这还不包括他们对移民国的其他投资。先且不谈论这个数据的精确性，但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中国富人大量移民国外这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自然不会忘记《建国大业》中阵容豪华的明星中有 20 多位已加入了外国籍。一些调查显示移民主要是为了获得安全感，这应该也是事实。但移民国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享受到低税率。

比如，巩俐 2008 年加入新加坡籍，她说是考虑的是新加坡的签证比中国好用，其实对她实在的好处怕是新加坡的低税率。新加坡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为 20%，而中国的最高税率为 45%，免征额为假如巩俐的年收入为 1000 万人民币，那她一年就可以省下高达 250 万元的税款。

当一个国家的人才与财富都持续不断地大量外流时，这个国家的警钟也就敲响了。要吸引人才与财富，除了要有保障人权的法治外，减税也是必要的途径。 T

■ 减税是中国税改的必要步骤

李炜光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世界税法学会理事,中国高校财税法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天津市法理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河南大学兼职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合作博导。

与前些年税收问题少有关心不同,有关纳税人权利、等政府职能定位及公共服务质量、税制结构极征收量等,目前已经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这是因为,由纳税所引起的“税痛”,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须面对的“诸痛”之一,对纳税人的切身利益构成直接性的影响,无法回避,于是眼下存在诸多争议的“减税”问题也就为“亿众”所瞩目。但目前围绕着减税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还是多限于就事论事的浅层而未加深入,这就使其较多地停留在学术和舆论领域,形成实际政策的过程显得较为缓慢而艰难。

➤ 减税意愿已成潮流

十几年来,我国一直执行增税的政策。从1994年开始,我国税收始终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而且增长幅度越来越大,目前已经到了“颠峰”阶段。由于持续增税,目前我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6%以上¹,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高。据此做出我国税负总体上处于偏重状态的结论,应无大错。

其实如果仅仅是税负偏高并不可怕,问题出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企业投资发展创新的能力因税负过高而受到影响;二是政府征税多而民众福利改善却不理想;三是政府把税收用在自己身上过多。所以增税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税收的连续高速增长,极大地刺激了政府扩大支出的欲望,财政支出规模追逐着税收而迅速膨胀,推动着政府的职能和规模的无限扩张。税征得越多,政府越大;政府越大,税的需求也就越多。即使历来习惯于逆来顺受的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在养活着一个规模超级大、职能无限扩展的政府,而且有越来越养活不起的感觉,这才有了社会上日益广泛的减税呼声。

形势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在印证着人们的看法。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06年公布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有67%的公众认为政府应减税,希望政府能够采取切实措施,降低总体征税水平,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把节约下来的钱用到改善社会保障方面去。

税并不是征得越多越好,政府支出的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那种人大代表为政府征税多而鼓掌欢呼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现象。这种颇具思想深度的认识,如今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呼吁减税的行列中

¹这里所说的“大口径”,包括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制度外收入、债务收入、企业亏损补贴等,合为税费总收入,亦称“政府收入”,其占GDP的比重,即为“大口径宏观税负”。36%是根据周天勇教授的2007年全年政府收入9万亿元的说法与全年24.95万亿元人民币之比推测出来的。

来。历来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及其官员们应当明智地看到我们这个社会所发生的这一新的变化，一个公民社会应有的现象，一个转型社会正在进步的标志。我们应为之庆幸，为之高兴。

➤ 减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益处



《李炜光说财税》封面，作者：李炜光。

不必费力去探访大牌经济学家，用最简单的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即可明白，当前之所以需要减税，是因为政府增加税收所减少的购买力，已经超过了政府增加投资所起的同样的作用，说明增税部分所带来的货币购买力效益比较差。所以，减税比政府增加投资更能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税收多半是从有效益的企业征收上来的，是“最有生产力的钱”，把这些钱用在效益相对差的领域，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减税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维系了多年，能否持续增长下去，关键在于今后中国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是否能出新意，是否合理，如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化等。这些终究要解决的问题不能无限期拖下去，而减税可以为经济结构的优化提供机会：增值税转型、降低边际税率、企业所得税计工资规定的废除、R&D（技术或产品的研发）费用税前扣除标准的提高、增加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等，都有利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水平，培育新型产业。

过度占有社会财富不应是政府追求的目标，因为长期实行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会使资源日益向政府集中，不仅导致资源使用效率低下、快速枯竭，而且极易造就一个超大的无限政

府，反过来危害市场的正常运行。所以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可能依靠强大的政府或强大的国有经济来实现稳定持续的发展。

从理论上说，税收收入的增长幅度应该低于 GDP 的增长率才是合理的，而中国的现实情况与理论完全相悖，税收增长远超 GDP 增长，这种政策在短期是可以理解的，长期实行便不正常、也不应该。减税后，税收的增长幅度的降低可使税收与可以促进税收与 GDP 的相关性，如此税收也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税收是价格的组成部分，在价格一定的条件下，税额的大小就会影响到企业可支配利润的多少。企业经营追求的是税后利润的最大化，近年来宏观调控的效果之所以不甚理想，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太低，说白了，就是“干了半天，没多大意思”，民间投资和经营的积极性自然会受打击。

而减税之后，人们马上就会看到它的巨大效应：减税意味着外部因素直接导致企业成本下降、赢利空间扩大，其中一部分转化为价格优势，增强竞争力，一部分成为资本所得，有利于下一轮周期的扩大再生产，还有一部分将转化为劳动者收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长期不振的内需就能被启动起来，其作用又为增发国债等措施所不及，等等。在减税政策下，公众的创业热情定将高涨，弱势行业生存空间扩大，投资预期不明朗的行业风险降低，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就业空间扩大，总体财富增加，整个社会将更加充满活力，同时税基拓宽，创造更加深

远的财政基础。总之，减税之下，每个企业、每个人，包括官方自己，都会大为受益，何乐而不为？

记得一两年前减税声音鹊起之时，官方的回应还是比较生硬的，税收的刚性原则又被提起，但比他们声音更大的事来自于民间的减税呼声，有媒体积极配合，部分身处国内外的学者积极响应，近来减税的声音终于以绝对压倒优势占了上风，反对减税者们终于不再理直气壮。

➤ 减税政策应秉持的原则

现在大家都在呼吁减税，但究竟应该减什么、怎么减、减多少合适以及减税的实质性意义何在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解决，我们还缺少一个一般性的指导原则。

我的看法是，减税政策的制定，应当把创造财富的领域的生产经营领域的法定税负水平，减到不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技术更新换代能力的水平上，而居民日常生活领域的法定税负，应当减到不影响“老百姓”日常过日子，并随着经济发展而生活质量不断有所提高的水平上。世界上没有出现因增税而促进经济繁荣的案例，也找不出一个因减税而导致政府“贫穷”的案例来。中国也不例外。

我在两年前就曾呼吁，要把我们中国建成世界上税负最轻的国家，现在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只要不影响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不影响必要的公共支出，税负就应当尽可能地确定在最低水平线上。实质性的税制改革（如增值税全面转型）迟迟不动，其原因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担心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其实，如果把税制调整好了，通过激励民间投资和消费，做大做实税基，减税政府不仅不会减少财政收入，恰恰相反，将是未来税收的长久性的增加。上个世纪 80 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兴起了减税运动，没听说哪个国家因为减税而过不下去日子，也没听说哪个国家因减税而经济增长水平下降的，反倒经常听说某些国家因减税而税收增加更多，经济发展更快，这就验证了“拉弗曲线”确实存在和强大的解释力：要持久地增加税收，先得降低税率。

减税并不意味着减收，其中的道理，一是名义税负的下调可直接增加企业盈利，个人可支配收入提高，企业投资额和居民消费量就因被激励而迅速增加，经济增长就会加快，这就给税收的增长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二是由于名义微观税负下降，纳税人偷逃税的动机就会减少，而减税的同时如果再伴随着税制的简化，能取得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中国赋税问题的根子，在于用钱的人用着别人的钱却可以不受约束、监督和制裁，而钱被别人用的人（纳税人）则无权决定和追究自己的钱的使用，无力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样的制度之下，政府的财政支出很难讲求经济效率，所以，通过征税、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增长，是个得不偿失的政策，不如减轻企业负担，激励企业投资发展。成千上万的企业效益提高了，政府财政的日子没有不好过的道理。

➤ 减税不应是毛毛雨式的小打小闹

减税只是针对名义税负和微观税负而言的，并不排斥其他税种税负的增加。实际上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如英国在降低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的同时，对垄断行业开征了暴利税和烟草税；德国在大规模实施减税方案的同时，增加了生态环境等税的征收；俄罗斯在实行取消销售税等一系列减税政策的同时，新开征了统一农业税，等等。这与减税并不矛盾，反而使其成为这一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保证。这些国家后来发生的事实也证明，只有主体税种的减少或税负的下降才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我国也可以选择一些规模小、涉及影响面小的税种予以配合性的增税，比如资源税。政府目前所得到的资源所有者收益性质的资源税，微乎其微，有征税的巨大空间，可补偿减征增值税所带来的政府税收损失，缓解因减税给政府财政带来的压力，做得好，甚可优化税制结构。

中国减税，不应是毛毛雨式的小打小闹，而是大刀阔斧式的减税，减主体税种和重要税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有学者总是说，流转税（也叫间接税，增值税就是典型的流转税）由于其基本特征是税负可以转嫁，减税不会产生明显的效应。这些朋友没有看到，任何税收转嫁都是有条件的，而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受制于价格变动的供需弹性，在供给大于需求，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税负是很难转嫁出去的；即使存在转嫁由于减税而形成的这部分资源总体上是在企业和居民之间流动，并且其“大头”一般不会流到富人的手里去，从而其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效应明显是存在的。

多年来，中国的税收一直以远高于 GDP 的幅度增长，由于中国税制是以商品税为主体，而商品税一般是采用比例税率的，这就使中国税制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累退性，不能认为是一种可以长期依靠的税类。减税应当首先从流转税（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入手。如增值税转型，就是实实在在的减税措施，在我国已经“试点”了多年，应尽快将其推向全国。再如营业税，亦存在明显的弊端，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一是重复征税问题严重；二是出口不退税、不免税，人为地降低我国自己的服务性企业与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三是不能抵扣，只有货物运费中的营业税可以在增值税中抵扣。特别是转让无形资产的营业税不能抵扣，显然不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²等等。

目前我国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总额偏低的格局已经转变，继续上升的趋势非常明显，加上个人所得税也处于快速上升的态势，所得税作为主体税种，地位越来越重要了。调整后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从 33% 降为 25%，仍然高于经合组织 30 个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制定减税政策的时候，不应也不能把所得税排除在外。

➤ 减税是中国税改的第一步

当然，要使中国经济能够长期稳定增长，光靠减税是不成的，最好的办法是把减税作为重新构造我国税收组合，优化我国税收体系的实际步骤，应取消一切形式的歧视，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的纳税人，鼓励民间投资而不是政府自己投资，使税收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而不是阻滞的作用，并为今后的长期发展蓄积力量。

中国未来的税收组合应该是简单的，而不是复杂的。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收入渠道过多，除了 21 个税种，政府还大量参与经济建设，通过盈利性的工商业活动而享有投资收益、一般性的经营收入和行政性垄断经营的超额利润，如每年 5000 亿以上（且仍在高速增长）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这就有简化、归并税制和收费体制的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减税就更不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政策，而是应当长期实行的战略性政策。经过若干年的建设，中国实行的应该是一种税种简略、税负尚轻、征管严格而合理、有利于企业投资与创新发展，有利于国民福利水平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的税制，那时候，可以说构建中国新型税收组合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



²参见安体富：“中国税收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理论前沿（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

■ 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应该废弃

刘尚希

2000 年 OECD 的资料显示，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占国家税收收入总额的平均比重达到 29%，若把社会保险税考虑进来，这个比重则高达 51%。在我国，现在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约为 7%。

面对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公平更多的思考。不少人用“基尼系数”来说明我国的贫富差距已高于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此强调收入分配问题在我国的严重性。2002 年以来关于“富人 not 纳税”现象的广泛讨论，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社会公平的重视。实现社会公平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应当做出努力。个人所得税在理想状态下具有很强的调节功能，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对象，强化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的呼吁不绝于耳。有的甚至把社会公平的实现寄希望于设计一套完美的个人所得税制，以为这样，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就可以得到遏制。

这种主张陷入了一个误区。这种误区的产生，既有社会公众不了解税收的原因，更有学术理念上的误导。确实，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在我国已客观存在，这是我们必须面对也是应该设法予以解决的。但是，针对现阶段的收入分配状况，是不是用个人所得税就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呢？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现实对此做出的回答并不令人满意。尽管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对工资、薪金所得采用了超额九级累进税率，设计了调节功能，但这种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之所以导致这种状况，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与个人所得税的制度设计相关。

我们认为，应当面对现实，对我国现阶段的个人所得税功能重新定位，并对个人所得税制进行相应的改革。

➤ 个人所得税的两大功能：收入功能与调节功能

在理论上，个人所得税具有两大功能：一是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简称“收入功能”），即通过对个人所得的征税，可以扩大公共收入的来源，增加政府可支配的财力。二是对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调节的功能（简称“调节功能”），即在向个人所得征税的过程中，通过起征点的设置、适用税率的变化和税前扣除范围的调整，调节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以此促进社会公平。

从逻辑上看，两大功能不是并列的。组织收入是税收的基本功能，这是任何税种的共性，个人所得税当然也不例外。只有在组织收入的过程中，调节功能的发挥才有了场所；只有组织的收入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调节功能才可能有足够的力度。试想，在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相当小的情况下，它对社会收入分配格局能有多大规模的调节呢？就此而言，收入功能是调节功能的前提和条件，前者是基本的，后者是派生的，或者是从属的。明了这一点，对税制设计是非常重要的。我国上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税收万能论”就是在这一点上模糊不清而导致的结果，以至于当时的整个税制设计本末倒置，一遇到什么问题，就设计一个税种去调节，过分夸大了税收的调节功能。



刘尚希，湖南桃江人，现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博士，注重经济学研究的实践性和本土性，从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出发，撰写了一系列论著、论文、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其内容涉及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公共风险、财政风险、公共财政、公共政策等方面。

再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功能是第一位的，调节功能是第二位的，或者说，是先有收入功能，然后才有调节功能。从国内外个人所得税产生的历史过程来分析，开征个人所得税都是以增加公共收入，满足政府财力需要为出发点的。下面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若无政府财力紧张的压力，个人所得税根本就不会产生，更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复杂的形态。

清朝末年，我国首次有开征所得税的提议，但屡议屡辍，直到中华民国政府，我国才有了第一部个人得税法。1921年，该税实际收入只有3万元，与预计的500万元相去甚远，故而停征。可见，其开征的动机完全在于所得税的财政收入功能。新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开征是以1980年9月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为标志的。当时设立这一税种的意图主要是向外籍人员征税，以维护税收主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税源的分布发生了



图片来源于漫画中国。

变化，为了更好地组织财政收入，于1986年、1987年分别开征了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这两个税种在性质上与个人所得税没有什么区别。1993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1994年1月1日起施行。至此，我国个人所得税这一税种以较完整的形式开始运行。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的背景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税源的分布出现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局面。与此同时，国家财政相当困难，1994年以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是下降的，不断扩大的支出压力导致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可以说，税源的变化和政府财力的紧张，是导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的首要原因。也许有调节收入分配的愿望内含于个人所得税的变迁过程之中，但它的实际作用主要体现在其组织财政收入的功能上。何况，在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不大的情况下，要想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英美个人所得税开征的历史中得到佐证。英国是最早开征所得税的国家，其开征的原因是18世纪末拿破仑战争使英国的军事支出大幅度增加，入不敷出。这个税种的开征为当时的英国提供了约20%的财政收入。与此类似，美国也是为了筹措南北战争期间的战争费用，于1862年开征了个人所得税，至1866年个人所得税已占联邦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25%。从当今现实来看，个人所得税组织收入的功能日益增强。2000年OECD的资料显示，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占国家税收收入总额的平均比重达到29%，若把社会保险税考虑进来，这个比重则高达51%。在我国，现在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约为7%。

个人所得税一开始并不以调节收入分配为己任，其主要目标是以不同的税种来取得财政收入。

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是在所得税制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附加”上去的。各国的所得税在开征时，大多采用比例税率，以后才逐步演变成累进税率。这说明在所得税开征之初，政府并非注重所得税的调节功能。英国自 1789 年实行了所得税，采用的是 10% 的比例税率，至 1909 年，开始采用局部累进税率，直到 1973 年，才正式实行综合累进税率。美国在 1862 年开始征所得税时，也是实行 3% 的比例税率，在 1864 年，实行了 5% 和 10% 的两级税率，到 1913 年，所得税累进税制才逐步建立起来。法国等其它西方国家也大都经历了相似的变化过程。比例税率与累进税率相比，前者偏重于收入功能，而累进税率则更偏向于调节功能。累进税率的普遍采用，只是个人所得税变迁历史中的一段插曲，仅仅表明了在一定条件下政府对市场初次分配结果的一种干预，但并不说明这种干预的天然有效性。

累进的所得税制在西方国家广泛地流行开来，不是无条件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资本的快速集中，导致财富分配差距扩大，社会公平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致使税制设计越来越注重调节功能，边际税率趋高，扣除、减免的规定日益繁杂。以 80 年代中期美国税制改革为标志，累进税制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缺陷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其地位和作用也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把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摆在首位的做法，在理论上本末倒置，在实践中造成扭曲，税收成本不断扩大。1994 年版的美国联邦税法两厚卷，多达 1400 页，而解释和细化的联邦税则达到 5 大卷，其中前四卷是解释联邦所得税的税务细则，有 6400 页之多。美国国内收入署每年向一亿多纳税人寄送多达 800 亿页的税务表格和填写说明书，首尾相接，这些表格和说明书足可绕地球 28 圈。而且，一旦走上了复杂化这条路，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从 2001 年到 2008 年，美国内收入法典修改了 3250 处，平均每天修改一处以上，仅 2008 年就对 500 处进行了修改。法典自 1975 年以来其规模翻了三倍。美国一部繁杂的个人所得税制，养活了七八十万税务师，浪费了纳税人大量的钱财、时间和精力。普通人由于请不起税务师，相对税负可能比富人还要重。

从个人所得税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到，收入功能是首要的，也是基本的和恒久的。因为捐税是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在国家消亡以前，税收的收入功能是不会消失的。调节功能是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因而是附加的和非恒久的。就如流转税的调节功能在我国趋于淡化（即中性化）一样，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也会淡化，这将会成为一种新的历史趋势。

进一步分析，在现阶段过分夸大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可能既造成效率损失，又无助于公平的实现。

税收效率包括税收的征收效率和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影响。征收效率是指政府在通过税收组织财政收入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征收成本。一般地说，税制越是复杂，税收征收成本就会越高，相应地，征收效率就会越低。而且，税制越是复杂，其扭曲程度就越高，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妨碍就会越多，从而会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现有繁杂的个人所得税税制，不仅客观上耗费了纳税人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为不少纳税人所痛恨，简化税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本世纪初，美国共和党议员罗博波特曼就在最近提出了一项简化税法和纳税程序的议案。之所以会产生简化税制的呼声，是因为繁杂税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大。

在累进税制下，政府为了同时考虑经济增长目标或因利益集团的压力，一般会加上许多扣除、减免等优惠条款，从而使富有者相对地少纳税，难以实现纵向公平；同时，面对繁杂的附则，有些纳税人可以通过纳税筹划等活动来避税，极易造成横向不公平。累进税制所带来的这种事实上的不公平，极大地制约了其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发挥，是与累进税制设计的初衷相违背的。为了追求公平，税制设计越来越复杂，而税制越是复杂，其漏洞就会越多，偷逃税的动机就会越强，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得到的是不公平。美国个人所得税的偷漏税规模达到千亿美元以上，而且每年在扩大。

➤ 新趋势：税收功能单一化、中性化



图片来源于新华网。

不可否认，采用累进税率，如果税制能得到有效实施，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再分配上的调节功能确实是其他税种所难以比拟的。但是，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还未具备用累进税制大幅度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经济条件、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个人所得税至少在现阶段还难以担当调节收入分配的重任，而把它的主要功能定位在组织财政收入上，进而简化税制，是较为现实的选择。

赋予税收过多的功能，反而会使税收的基本功能——收入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这一现象并不仅仅为我国所独有。有鉴于此，世界各国都对税制进行了许多尝试。其总的改革趋势是使税收功能单一化和中性化。单一化

和中性化的趋势，反映了发达国家在税制效率与公平间的重新选择，也反映了政府利用税收这个手段干预经济的重新考量。

单一税最早是由胡佛研究所的罗伯特·E·霍尔和阿尔文·拉布什卡于1995年提出来的。在他俩的文章《单一税：简单、累进的消费税》中指出：“对所有年份的全部收入实行同一税率，是单一税最基本的目标”；单一税制避免了美国现行税制中的非效率现象；“简化又是我们税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单一税最基本的特征是单一税率，强化税制“中性”。从单一税制的内容和特性来分析，采用单一税制将具有以下意义：第一，使税制简单明了，有利于降低直接的税收成本，提高征管效率。第二，避免个人花许多精力和时间与政府征税机关博弈，使个人从利用累进税率和优惠政策的税收筹划中走出来，并由此降低税收的社会成本。第三，在当前条件下，单一税制反而更有助于公平的实现。第四，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单一税制降低了边际税率，有利于扩大开放，若将之运用于公司所得税，将有利于公司的创业，鼓励投资，有助于经济增长。正如前述，现行的累进税制，由于种种原因，不仅没能解决好既有的不公平，反而造成新的不公平。而单一税制因其对征管水平要求比较低，可以在现有征管水平下较好地防范逃税，并可以有效地缩小纳税筹划的空间，更有利于横向公平的实现。若是再以较高的起征点相配合，则以另一种方式体现税收的累进性，更有利于纵向公平的实现。

国外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思想和实践，说明单一化已成为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趋势。1996年，美国得克萨斯州国会议员也提出了实施单一税的建议，他们认为单一税将有利于刺激投资和提高就业，并使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

到应有的提高。当然，改革建议能否成为现实还取决于诸多因素，这一建议未被采用也不足为奇，但至少表明，国外在反思长期以累进税率为特征的个人所得税制。再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实践来看，牙买加是最早较为彻底地实行单一税的国家，在 1986 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出台了单一税的一系列举措，到 1992 年进一步作了以扩大税基、提高标准扣除额、降低税率为基本内容的改革，既发挥了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功能，又取得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税制效应。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一直致力于税制改革，其总的趋势也是简化税制。俄罗斯政府在 2001 年将个人所得税改为单一税率，从 30% 的平均税率水平调低为 13% 的比例税率，当年该税收入增长 46%，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增长 28%，其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由于单一税的诸多优点，我国的香港地区、加拿大的阿尔伯特省均已实行了具有单一税特性的个人所得税，新加坡、挪威等国也正准备实施这一改革。至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大约 25 个国家实施了单一税率的个人所得税。

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了以家庭征收转向以个人为单位征收。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丹麦、芬兰、意大利、荷兰、瑞典和英国等 7 个国家陆续由以家庭为课税单位转变成以个人为课税单位。完全以个人为课税单位的 OECD 国家目前已经达到 17 个。

中性化是指税制应尽量减少对资源配置、经营行为选择的扭曲作用，单一税不仅实现简化，也体现了中性化的要求。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所得税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流转税的比重则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从八十年代到 1994 年，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下降了 2 个百分点，一般消费税的比重则上升了 2 个百分点。从 OECD 国家来看，1986—1990 年个人所得税占 GDP 的比重为 12.2%，2001—2002 年下降为 10.7%，降低了 1.5 个百分点；同期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由 32.1% 下降到 27.9%，降低了 4.2 个百分点。这种变化体现了西方国家税制改革追求中性化的意图。再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新西兰、意大利等国纷纷取消遗产税，英、日、美提高遗产税的扣除额、降低税率的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出税收的调节功能在淡化。在整个所得税地位发生变化的形势下，个人所得税不再以调节收入分配为首要目标，而以组织财政收入放在首位，这似乎是一个合乎历史和逻辑的新趋势。

当然，西方国家的税制结构改革与它们的经济增长状况以及社会保障等政策的调整是密切相关的。国外的税制改革并不足以成为我们税制设计及作出选择的理由，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但许多国家所经历的多次反复的实践，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教训，这些教训至少可让我们少走弯路，不至于使我们把国外的昨天当成我们的明天。



转型译丛



张大军 Zhang Dajun

编者按：张大军先生主持传知行研究所的中国转型研究、转型译丛，目前已翻译了《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等介绍转型理论的专著。本期“转型译丛”我们继续连载张大军先生的最新译著《非武装反抗——非民主政体中的人民力量运动》。如需阅读已刊登过的部分请去[传知行主网页](#)下载往期《通讯》。

■ 非武装反抗—非民主政体中的人民力量运动（之四）

——受到压制的人民力量：缅甸和中国

著：Kurt Schock

译：张大军

在第三波民主化时期，一党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于 1980 年代初崛起于波兰，到 1980 年代晚期时扩散到东方集团的其他国家。亚洲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权并非没有受到这些事变的影响。在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崛起之后以及柏林墙于 1989 年 11 月开放之前，非武装反抗挑战缅甸军人主导的一党制社会主义政权的统治³，以及中国一党制共产党政权的统治。不过，与东欧的非武装反抗不同，这些反抗没能带来政治上的转型。

1988 年春季，缅甸的非武装反抗在仰光的主要大学里爆发。到夏季时，抗议扩大为具有广泛基础的全国性民主运动，并持续到 1988 年 9 月—那时，当局进行了改组并残酷地镇压了运动。中国的非武装反抗也为时不长。在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胡耀邦于 1989 年 4 月 15 日去世后不久，北京的学生们抓住时机进行集体悼念活动，而且集体行动很快从悼念转变为针对政府腐败的抗议以及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学生运动扩散到其他城市，并且愈演愈烈，在 5 月份开始绝食抗议之后尤其如此。可是，到 1989 年 6 月初时，运动因戒严和军事镇压而失败了。

尽管运动领袖试图提倡非暴力的准则，这些非武装反抗中还是出现了暴力。在缅甸，有些政府官员被愤怒的民众杀害，国家财产在纵火行动中被烧毁，而且反对派中的某些人利用他们能够找到的任何武器与军人搏斗，比如削尖了的雨伞和自行车轮条。当运动被军队镇压时，许多学生逃到该国的边界地带，加入武装反叛力量。可是，自 1960 年代初以来一直控制着种族和共产党叛乱活动的缅甸军人政权从未受到武装反叛者的直接威胁，即便是在

³ 1989 年 7 月，缅甸（Burma）的官方名称被军事当局改为 Myanmar，也即缅甸语中的缅甸。由于非武装反抗发生于 1988 年并且本章主要关注 1989 年 7 月之前的事件，我使用 Burma 这一名称。

1988 年和 1989 年学生加入它们的队伍之后也是如此。另外，当局拥有能够轻易对付发生在仰光和其他城市的暴力反抗的军事能力。对当局更为严重的危险是以非武装抵抗的方式出现的。

在中国，当北京的学生和市民试图阻拦士兵向天安门广场进军时，斗争爆发了。在强迫抗议者离开广场时，愤怒的民众用燃烧弹炸毁一些坦克，杀死了里面的军人，而且有些士兵被打死。不过，与缅甸的情形一样，对当局权力的主要威胁并不是来自暴力手段—因为政府的暴力力量超过了抗争者的暴力力量，而是来自非暴力行动手段。

➤ 缅甸

与共产主义中国的情况形成对比的是，缅甸的军人在治理国家方面发挥了核心的作用。通过对吴努（U Nu）的民主政权发动政变并组织一个二十四人的革命委员会，奈温（Ne Win）将军于 1962 年 3 月攫取了独裁权力。军队主张对国家拥有控制权的主要理由包括：该国被认为是偏离了其创立时的社会主义原则，吴努与非缅甸族的州的领袖谈判给予更大的自主权，以及克伦族（Karen）和掸（Shan）族的州可能会行使其宪法权利，脱离联邦。在宣布实行戒严后，奈温将政治权力集中到中央，并扩大军队在政府、官僚行政以及经济中的作用。



1960 年 1 月，周恩来在北京与缅甸总理奈温在中缅边界问题协定及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字仪式上。图片来源于中华网。

缅甸社会主义计划党于 1962 年成立，作为群众性动员和灌输政治理念的工具，而独立的工会和政党遭禁。在缅甸社会主义计划党内部，农民协会、工人协会以及蓝心青年组织是进行政治动员和控制的主要机构。革命委员会的所有建制性对手都被法律或者武力消灭，与国家有直接关系的新建制被创设出来，独立的协会和报纸被关闭（泰勒（Taylor），1987 年）。

当局的经济政策将控制权和管理权都集中到国家的手里，限制了自主的财富和权力中心的发展。1962 年以后，所有的银行、产业和大型商业企业都被国有化。没有任何赔偿的国有化和去货币化的结果是，几十万名印度裔和中国裔的企业主失去他们的财产和储蓄，并离开这一国家。军人被请来管理企业和行政事务。随后，缅甸试图脱离世界经济，并推行一种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军人管理经济的后果是效率极其低下、腐败蔓延、以及经济下滑，导致民众中出现广泛的不满。

奈温和其他十九位高级官员于 1972 年从军队中退役，并担负起文职。新的宪法生效，同时，人民议会和地方委员会举行了选举。不过，奈温、军队和缅甸社会主义计划党依旧牢牢地控制着政治生活（貌（Maung），1991 年，1992 年；斯尔沃斯坦（Silverstein），1977 年；斯坦伯格（Steinberg），1982 年，1990 年；泰勒，1987 年）。

➤ 民主运动

对缅甸军人统治的反抗总是会碰到暴力镇压。1962年7月，在奈温的军事政变过了四个月，军队杀死了仰光大学的一百位抗议当局的学生。⁴军队随后逮捕了学生；使用炸药铲平学生联合会大楼-自殖民时代起，它一直都是学生政治活动的中心；并将该大学关闭四个月。与此类似，因食品短缺而于1967年在仰光爆发的骚乱以及1969年仰光举行东南亚运动会期间的大学学生骚乱也受到暴力对待。1974年，在实施过有利于农业部门的经济政策之后，仰光的工人和学生因通货膨胀和食品短缺而举行抗议。抗议以国有工厂的罢工为开端，并扩散到大学。它们以当局使用武力和关闭大学而终止-动武的结果是至少二十二人被杀。在那一年的十二月份，学生和佛教和尚抗议国家对联合国前秘书长吴丹（U Thant）葬礼的安排方式。作为回应，政府关闭了大学，逮捕约三千人，并杀死多达一百人（泰勒，1987年）。为抗议政府对待佛教和尚的方式，骚乱爆发了，戒严被强制推行。根据罗伯特·泰勒的看法，军队总是这样对付抗议：“以最少的人力和最大的火力尽可能快速地展示其不让骚乱蔓延的决心，并以此作为阻遏的手段”（泰勒，1987年，336页）。

1980年代公开反对当局的抗议非常少，直到不满在1987年加剧。1987年9月5日，奈温在没有预警和赔偿的情况下改变了该国货币的面额，导致许多人一生的积蓄立刻化为乌有。1987年12月，在军队对经济的管理不善持续几十年后，缅甸被联合国认定为“最不发达国家。”大学学生开始扩展他们的地下政治网络。当一名来自仰光技术学院的学生于1988年3月13日被杀害并且凶手因为与当地缅甸社会主义计划党的关系而没有受到惩罚时，学生们走上街头。接着出现抗议示威和对政府财产的攻击。防暴警察被召来，几名大学生被杀。仰光技术学院的学生抗议杀戮大学生，很快，仰光大学的学生加入到他们的每日抗议中来-这些抗议具有明确的反政府和民主立场。防暴警察再次被召来驱散示威队伍，杀死了几十名学生，并逮捕一千多名学生。3月18日，几百名学生从大学校园游行到仰光的商业中心，沿途吸纳进支持者。到游行队伍抵达商业中心时，反政府抗议者的人数增加到几千人；在商业中心，游行遭遇防暴警察以及军队士兵的暴力。几十名抗议者和围观者被杀，几千人被捕，而且政府关闭大学，迫使运动退回地下（林特内尔（Lintner），1990年；莫克沙（Moksha），1989年）。

当大学于1988年6月第一周重新开放时，学生们开始组织群众运动，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恢复几百名被驱逐的学生的学籍，以及组织独立学生会的权利。到6月中旬时，大规模的示威出现于大学校园的范围之内。几千名学生再次于6月21日走上仰光的街头，加入他们队伍的有佛教和尚以及附近工厂的工人。抗议还从不满和失业的城市居民群体中动员民众。当抗议游行抵达仰光商业中心时，其队伍猛增到几万人。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再次遭遇防暴警察的暴力，大约八十到一百名异议者被杀。新的宵禁被强制执行，大学被再次关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反政府抗议在仰光之外爆发，据报道，培古（Pegu）、普罗姆（Prome）、姆尔美恩（Mulmein）和曼德勒（Mandalay）有抗议活动（林特内尔，1990年；莫克沙，1989年；斯密斯，1991年；泰勒，1991年）。

为应对扩散中的抗议，政府宣布，缅甸社会主义计划党将在下个月举行特别大会。在1988年7月23日举行的大会上，奈温宣布他将辞去其总统职位以及缅甸社会主义计划党主席职位。出人意料的是，他还建议举行全民

⁴ 与美国政府低估（或者更糟糕的是，不去精确计算）它在其他国家所杀害的平民数量的方式类似（比如参见布拉姆（Blum），1995年；乔姆斯基，2001年），诸如缅甸和中国这样的威权政府也低估了它们所杀害的它们自己平民的数量。因此，官方的估计与学者使用的估计数之间乃至学者的估计数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我在本章中采用的死亡、伤害和逮捕以及抗议规模的数字都基于似乎在地区研究专家之间达成共识的信息。

公决以测试公众对多党制的支持度。可是，提议中的全民公决被缅甸社会主义计划党大会否决了。提议的被否决以及山温（Sein Lwin）将军于1988年7月26日被任命为缅甸总统和缅甸社会主义计划党主席—他是遭人普遍憎恶的防暴警察头子—导致新一轮更加猛烈的反政府抗议（林特内尔，1990年；莫克沙，1989年）。

随后，抗争聚焦于驱逐山温将军并施压要求多党选举。一场全国性总罢工计划在数字上吉利的1988年8月8日（8-8-88）那一天举行。一直延续到总罢工的仰光的示威活动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民众，包括学生、和尚、公务员、工人和失业者。8月8日，总罢工开始，仰光的商业中心充满了数以万计的、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和种族团体的、要求民主的和平抗议者。大型的示威活动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和乡镇爆发，包括萨伽因（Sagaing）、曼德勒、陶恩吉（Taunggyi）、普罗姆、皮因马纳尔（Pyinmanar）、姆尔美恩、泰沃伊（Tavoy）以及贝塞恩（Bassein）（貌，1992年，59页；斯密斯，1991年，4页）。

在8月8日的夜晚，当军队以自动化武器开火时，仰光的节日气氛被打破。残酷的屠杀让大约一千到三千名手无寸铁的平民死亡。萨伽因和贝塞恩的示威也被残酷镇压。仰光以及全国各地较小的零散示威活动在面临镇压的形势下仍延续了几天的时间。暴力并不完全是单向的，因为政府大楼受到了攻击，而且据报道，仰光劳工阶层聚居区的三名警察被一群愤怒的民众看头（斯密斯，1991年，5页）。

政府于8月12日宣布，山温将军已经辞职。因此，尽管出现了大屠杀，非武装反抗还是迫使山温将军下台了。政府于8月19日宣布他的继任人为貌貌博士—他是该党职位最高的文职官员，也是军事政权中的“温和派”。第二天，示威活动重新开始，因为数以万计的民众不接受对貌貌博士的任命，并要求终结一党制统治以及组建新的用以安排多党选举的过渡政府。第二次全国性总罢工于8月22日宣布开始。罢工中心在全国各地的乡镇和城市建立，反政府的示威每天都会发生，而且许多工人拒绝在过渡政府成立之前返回工作（林特内尔，1990年；莫克沙，1989年）。

政府的下述作为在当时被视为又一次让步：解除戒严并将军队撤出城市。对因参加抗议而被杀的担心减弱了，8月24日，单单仰光就有大约一百万名民众参与抗议示威，同时其他城市也有几十万名民众抗议（缅甸观察，1989年）。与南非城镇所发生的情况非常相似的是（见第三章），民众开始组建罢工中心和人民委员会以接管当地的行政工作（斯密斯，1991年，6页）。全国各地都有人退出缅甸社会主义计划党。大规模的“烧毁行动”出现了—民众在缅甸社会主义计划党的地方办事处门口将他们的缅甸社会主义计划党会员卡烧毁（费恩科（Fink），2001年，58-60页）。8月26日，大约至少五十万名民众聚集在仰光瑞光大金塔下面的空地上，听昂山素姬—她的父亲昂山将军是缅甸独立的英雄之一—第一次在群众集会上做公开的演讲。她成为民主反对派的主要代言人，呼吁多党制民主、全国团结、非暴力行动以及非暴力纪律（昂山素姬，1991年；克里格（Kreager），1991年）。

总罢工沉重打击了政府，有一段时间，政府似乎要垮台了。然而，到九月初时，缅甸兴冲冲的菲律宾式的人民力量运动变得低沉压抑了。军队的密探和捣乱者连同政府从监狱中释放的犯人一起纵火、抢劫、采用暴力行动并进行其他颠覆性的活动，比如煽动食品和种族骚乱，其目的明显是要为军队恢复“法律与秩序”提供借口。愤怒的民众也以暴力应对，杀死几位据称是密探或者捣乱者的军事情报局特工。随着反政府示威和总罢工的持续，该国陷入混乱之中，因为交通基础设施瘫痪，并且对许多人来说，获取食物变得越来越困难。

9月18日，由奈温组织并由苏貌（Saw Maung）、钦纽（Khin Nyunt）以及丹瑞（Than Shwe）三位将军带领的一

群将军们发动了一场“自我政变”⁵，并宣布成立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其公开的目的是恢复法律与秩序，并让该国准备举行民主选举。戒严被宣布启动，军队回到城市，严厉镇压所有的集体行动。宵禁被强制推行，对发表演讲和举行聚会的限制付诸实施，而且缅甸各地的罢工中心受到攻击。有些人以石块、剑和荆棘枝反击，可是，这些武器当然不是武装部队机关枪和攻击型坦克的对手了。到9月20日，军队重新获得控制权，并在此一过程中杀死几百名平民。对被指控的持异议的组织者的逮捕和草率处决持续到10月份，大学继续被关闭。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所有人回去工作，并威胁说那些不照办的人会有被解聘和逮捕的危险。需要食物和金钱的工人们回去工作了，总罢工失败了（林特内尔，1990年；莫克沙，1989年）。集体行动陷入停顿，当局重新改组并巩固了其权力。

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与菲律宾的马科斯类似的手法（见第三章），确定选举于1990年举行，以抵消国内和国际的压力，为其统治背书，并接受外国的援助。不过，严厉的竞选限制被付诸实施，比如禁止五人或五人以上的会议以及严禁对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军队的批评。由昂山素姬、前将军吴丁乌（U Tin Oo）以及前准将昂基（Aung Gyi）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公开违抗这些限制，⁶继续举行集会并印制批评当局的文字资料。昂山素姬在印度生活期间研究过甘地，并从他的非暴力行动理论和实践中汲取养分（克里格，1991年）。从1988年11月到1989年7月，昂山素姬以及全国民主联盟的领袖们到缅甸各地旅行，动员支持“精神革命”——这是一场支持民主的非暴力运动——的力量。无论昂山素姬在哪里演讲，都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公开违抗对集会的限制并承受被逮捕入狱或者处死的风险。1989年7月20日，昂山素姬被置于软禁之中，随后，全国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被逮捕入狱。到1989年11月时，据估计，缅甸有六千名政治犯（昂山素姬，1991年；克里格，1991年）。

然而，预先安排好的全国议会的选举在1990年5月27日举行。由于在选举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严厉限制组织活动并将反对党领导人逮捕，当局完全相信其会赢得选举，而且实际的投票被认为是相对自由和公平的。由缅甸社会主义计划党衍生出来的全国团结党得到21.2%的选票（2.1%的席位），而军人政府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全国民主联盟——赢得59.9%的选票（80.8%的议席）（古窑特（Guyot），1991年）。因选举结果而感到震怒的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承认它们。然而，到了这个时候，与菲律宾不同的是（见第三章），被拆散的群众运动已不再能够通过不合作运动进行抵制，而且对政权的背叛没有立即出现。因此，经过两年多的抵抗，抗争最终没能成功地推翻军事政权，尽管它成功地将山温赶下台并迫使政府举行多党选举。

➤ 中国

经过外国占领、社会动荡以及内战的百年苦痛之后，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0月1日掌握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统一了中国，并进行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以铲除封建主义并创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试图重新改造中国文化，特别是为了消灭残余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毛于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到毛于1976年去世时，由于极端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危机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国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⁵ 古窑特（1989年，121页）将这些事件称为“自我政变”，在政变中，由军人统治的政府被军人所取代。

⁶ 昂基在1963年被清除出政治精英的队伍。他在1988年的5月和6月发表了严厉批评当局的公开信。他是全国民主联盟最初的领导人之一，不过后来与全国民主联盟决裂，并组建了他自己的政党。



由于哀悼一位高级国家领导人的去世是一种合法的行为，在胡去世时进行集体行动降低了镇压的可能性。资料图片。

士的镇压有所缓解（迈斯纳（Meisner），1999 年；赵鼎新，2001 年）。

到 1980 年代中期时，中国的经济改革正面临严重的问题，因为不平等问题加剧，通货膨胀飞涨，而且腐败蔓延。另外，1978 年之后的改革所导致的后果是让中国的城市居民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由于他们日益意识到其生活水平低于他们的东亚邻居和西方国家，他们了解到跨越国界的民主化浪潮—尤其是最近东欧和苏联的政治变革，以及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苦涩记忆，部分城市居民对当局的批评增多了。

学生和知识分子特别受到经济改革的负面影响。他们期望市场经济会导致普遍的经济繁荣，而且他们尤其期望自己会获益。不过，大学生却更难以在毕业后找到满意的工作，而且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下降，与此同时，未受良好教育的企业家们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则上升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逐渐开始相信，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是自相矛盾的，并且民主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在 1980 年代，小型的抗议在中国并不稀罕，不过，自 1986 年以来，学生的抗议变得更为频繁了，其高潮就是 1989 年的民主运动（赵鼎新，2001 年）。

1989 这一年碰巧是三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历史事件的周年—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中国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由于预期到这些周年纪念，在没有很多协调的情况下，许多政治异议活动于 1988 年浮现，并持续到 1989 年。敦促大赦政治犯并释放魏京生—他因参与 1978-1979 年的民主墙运动而被捕入狱—的请愿运动于 1989 年初开始，主要大学的校园组织起政治研讨会和民主沙龙。大字报出现在公共场所，小型的抗议示威爆发，为 1989 年的运动准备了舞台。当从 1982 到 1987 年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于 1989 年 4 月 15 日死

于心脏病时，大规模集体行动的机会出现了（迪特摩尔（Dittmer），1990 年；赵鼎新，2001 年）。

➤ 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

由于对学生抗议的处置不够严厉，胡于 1987 年 1 月被免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尽管他依旧是政治局的成员。胡的突然去世对学生和知识分子具有重要影响，因为他被视为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内部最为支持政治改革的人物。北京大学在他去世的晚上就出现了几十份大字报，或哀悼他的离世，或批评政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大字报的内容集中于要求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政治改革和反对官员腐败（赵鼎新，2001 年，147-48 页）。⁷

由于哀悼一位高级国家领导人的去世是一种合法的行为，在胡去世时进行集体行动降低了镇压的可能性。来自北京大学的几百名学生于 1989 年 4 月 16 日去到天安门广场这一具有象征性的中国共产党政治中心，为胡敬献花圈。4 月 17 日，北京政法大学的几百名学生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那天晚上，约两千名北京大学的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学生们的焦点从哀悼胡转向要求官方承认独立的学生组织并与政府对话。实际上，他们是在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垄断地位（赛奇（Saich），1990 年；赵鼎新，2001 年，148 页）。

政府宣布，示威者在 1989 年 4 月 22 日将被禁止进入天安门广场，因为在那一天，为胡耀邦举办的官方仪式将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不过，在 4 月 21 日晚上，多达五万名学生从他们在北京的校园游行到广场，违抗禁令在那里过夜，并进行静坐。在葬礼期间，三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约四十分钟，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并要求与李鹏总理对话。李鹏没有出现，这加剧了学生们的愤怒情绪。此后不久，运动组织出现，示威活动被动员起来，罢课开始（赵鼎新，2001 年，150-155 页）。

面对抗议示威的威胁，政府通过 1989 年 4 月 26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论发出明确的警告。政府在社论中将运动判定为由少数阴谋分子煽动的反革命骚乱，并威胁说，如果示威活动继续的话，就会派军队镇压。作为回应，多达十万名学生于 4 月 27 日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反对政府对运动的摸黑并无视其不许再示威的警告-这成为自共产党于 1949 年取得政权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违抗国家的行为。在阻止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时，安全部队只做出象征性的努力，让抗议者们产生一种虚幻的不可战胜的感觉。大约一百万北京市民走上街头，为学生们鼓劲加油（迪特摩尔，1990 年，31 页；赵鼎新，2001 年）。

政府最初容忍了抗议活动，并在媒体中赞扬了胡耀邦，而这激起进一步的动员努力。当警察最终被召来反对学生的活动时，学生们则多次被允许打破人手不够的警察封锁线。在运动的过程中，政府的回应是在让步和威胁之间来回摇摆，这让学生们误读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尽管政府最初通过 4 月 26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对运动进行威胁，在 4 月 27 日的大规模抗议示威之后，政府采取一种更为和解的姿态并与学生举行对话。不过，对政府的对话诚意提出质疑的一群学生提议进行绝食抗议，5 月 13 日，约三百名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绝食抗议成功地动员起更多的活跃分子，参加绝食抗议的人数迅速增加到三千多人。5 月 17 日，一百多万各行各业的北京居民出来表达他们对运动的支持（赵鼎新，2001 年，159-164 页，171 页）。一旦开始，绝食抗议就有了它自己的内在动力了。呼吁终止绝食抗议并停止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被那些呼吁继续这样做的学生领袖边缘化了。

⁷ 抗争者对自由媒体的定义并不是指竞争读者并从广告中获利的商业化媒体，而是客观报道事件的媒体（黎安友，1989 年，24-25 页）。

在北京的中苏会谈结束的第二天，也即 1989 年 5 月 19 日，政府实施戒严。超过十万名士兵进入北京；不过，5 月 20 日，在其向天安门进军时，士兵们被大约两百万名北京市民挡住了。学生们认为士兵的退却是另一次胜利。另外，许多人逐渐相信，政府不会真的使用武力镇压运动，这样就减低了活动的风险。然而，在运动违抗那份措辞强烈的社论，逼退最初的武力压力，并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之后，从政府的观点看来，除了迁就学生的要求，唯一的选择就是以暴力镇压运动。政治精英既然不愿迁就学生的要求，就下令进行军事镇压。军队开始于 6 月 3 日夜晚使用暴力结束示威、绝食抗议以及对天安门广场的静坐占领。大约晚上九点钟，士兵们向天安门广场进军，到 6 月 4 日早晨六点时，天安门广场已经被武力清场了。多达一千人在对抗中被打死，其中多数人是试图阻止军队进军的手无寸铁的民众。此后，政府逮捕了几百名政治活动分子，迫使其他人转入地下或者国外（迪特摩尔，1990 年，34 页；赵鼎新，2001 年，184-207 页）。在强大的打压下，抵抗失败了。

➤ 对非武装反抗的压制

缅甸与中国的非武装反抗在这两个国家的二战后历史中是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自 1962 年以来统治着该国的缅甸军人政权似乎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中国的民主运动则对共产党政权构成了自它于 1949 年创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威胁。上述非武装反抗为何没有像南非和菲律宾（见第三章）或者尼泊尔和泰国（见第五章）的非武装反抗那样成功地推动政治转型呢？预先决定它们命运的既不是政治环境，也不是抗争者的行动。相反，通过降低抗争者的韧性以及限制他们能够对国家所造成的影响，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塑造了运动的轨迹。

➤ 韧性的缺乏

诚然，这两场运动在面临镇压时都没能保持其韧性。尽管缅甸的抗争者采用了许多不同的非暴力行动方法，致使该运动败亡的因素包括：缺少凝聚和协调抵抗行动的全国性联合组织，以及抗争者无法组建平行的政府或者形成一种多个主权实体的局势。

1988 年春季的缅甸民主运动的爆发具有相当的自发性，而当运动在那年夏天重新恢复时，学生活动分子展开极其紧凑的组织活动。当军队于 1988 年 8 月底从城市中撤出时，学生、和尚、专业人士、工人以及公务员的独立组织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仰光、曼德勒以及全国各地的许多城镇，地方罢工委员会由大学生或者和尚组建起来，以处理安全和食品分发问题，维持法律与秩序，并提倡非暴力准则（费恩科，2001 年，58-60 页）。

抗争的带头人是学生；可是，他们的组织却一盘散沙。由莫一尊（Mo Thee Zun）和明国雷（Min Ko Naing）领导的全缅甸学生会联合会成为主要的学生组织，可是，其他几百家学生组织正活动于许多大学校园，并独立采取行动，却没有通盘的协调。正如米亚貌（Mya Maung）所说，“学生抗议运动被挫败的原因是组织不善、帮派主义以及缺少一位带领大家与高度组织化和高效的安全部队战斗的魅力型学生领袖或者组织”（貌，1992 年，86 页）。

另外，学生们没能协调好从社会其他群体中动员出来的支持力量。根据克里斯蒂娜·费恩科的研究，“尽管示威活动得到普遍的参与，统一领导的缺乏却成了一个问题。街区、社区和村庄组织出现，以处理当地的事务，可是，得到认可的全国性组织依然付之阙如。学生团体在组织示威方面起到领导作用，可是，他们却无法建立一个新的行政体系”（费恩科，2001 年，61 页）。1988 年 9 月有一个推动全国性联盟组织的重大举措：总罢工委员会成立了。总罢工委员会代表着一种将不同社会群体团结在一起的努力，比如学生、和尚、工人、和专业人士。超过一百位总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在九月初于仰光开会；不过，由于交通瘫痪且整个缅甸的通讯不易，总罢工委员会无法形成一个协调良好的全国性网络（斯密斯，1991 年，8 页）。

在军队于 1988 年 9 月 18 日进行镇压之前的那段关键时期，民主运动没有被认可的单一的整体领导机制。前总理吴努在 1988 年 9 月 9 日发表一份声明，宣布成立过渡政府，以他自己为总理。然而，他无法获得广泛的支持，因为大多数人都对他失去信心，惊异于他显而易见的机会主义，并对他任命其亲属和自 1950 年代以来的政治亲信担任内阁职务感到失望。随后，为试图组建一个得到普遍支持的过渡政府，9 月 13 日和 14 日举行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吴努、昂山素姬、前将军吴丁乌和昂基，以及学生领袖。不过，吴努坚持所有人都要支持他的政府。其他人则不愿这样做，于是，会议结束时没有产生一个取代军人政权的受到广泛支持的办法（费恩科，2001 年，61 页）。

由于对政治元老们无法组建平行政府感到失望，并且认识到领导机制的缺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有害于抗争，总罢工委员会和全缅甸学生会联合会的年轻活动分子们在 1988 年 9 月 18 日下午召集会议，宣布成立由罢工委员会和工会组成的平行政府。不过，创建地方和或全国性平行政府的机会以及形成双重主权实体的机会——这对南非和菲律宾人民力量运动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见第三章）——已经溜走了。同一天下午，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地对全国实行强力控制（斯密斯，1991 年，15 页）。

为组建全国性联盟组织以协调抵抗行动，1988 年 11 月 5 日在由克伦族人控制的泰国边界附近地区又进行了一次尝试。十八个团体的代表宣布成立全缅甸学生民主阵线。几个星期之后，二十二个政党（包括全缅甸学生民主阵线）的代表在由克伦族人控制的地区开会成立缅甸民主联盟（斯密斯，1991 年，17 页）。不过，由于缅甸民主联盟与缅甸中部的活动分子很少有接触，它在协调抵抗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动方面能够做的事情不多。两年后的 1990 年 12 月 18 日，在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承认选举结果之后，盛温（Sein Win）博士在马那布罗（Manerplaw）（位于克伦族人控制的地区）成立平行政府——缅甸联邦全国联合政府。可是，到了这个时候，群众运动已经瓦解，而缅甸联邦全国联合政府的任务更多地是动员国际社会的支持，而较少是在缅甸国内作为平行政府发挥作用。

由于缺少统一的协调，缅甸的运动采用了极其多样的非暴力行动方法，包括抗议与说服、不合作以及破坏性与建设性非暴力行动（见表四）。不过，当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 1988 年 9 月对全国实行强力控制时，多达一万名学生去到泰国、中国、印度和孟加拉国边界地区，加入武装反叛队伍。根据克里斯蒂娜·费恩科的看法，“军人政权急于让学生们离开城市，因为它意识到，尽管学生们在组织城市地区的民众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他们却不是丛林中的经过战争磨练的缅甸武装部队的对手”（费恩科，2001 年，62 页）。换句话说，军人政权理解它在使用暴力方面的相对优势，而离开城市的学生们却没能认识到他们在非暴力行动手段上的比较优势。鉴于大学被关闭以及学生组织者被追捕、逮捕、虐待和处决的现实状况，为进行人民战争而放弃人民力量运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结果却是，群众运动的韧性和影响力下降，而且反对政府的斗争转而采取那些政府拥有决定性优势的战略。

表四 缅甸主要的非暴力运动和事件，1988-1990 年

行动	日期	地点	非暴力行动方法
游行和抗议示威	1988 年 3 月	仰光	抗议与说服
游行和抗议示威	1988 年 6-9 月	仰光及较大的乡镇	抗议与说服

		与城市	
替代性媒体	1988 年 6-9 月	仰光、曼德勒	建设性非暴力干预
总罢工	1988 年 8 月 8-12 日	全国	不合作
抗议示威	1988 年 8 月 20 日到 9 月 18 日	仰光及较大的乡镇 与城市	抗议与说服
总罢工	1988 年 8 月 22 日到 9 月 18 日	全国	不合作
“烧毁行动”	1988 年 8 月 22 日到 9 月 18 日	仰光	不合作
昂山素姬领导的集 会	1988 年 8 月 26 日到 9 月 18 日	仰光	抗议与说服
绝食抗议	1990 年 9 月 12-18 日	仰光	破坏性非暴力干预
地方民众委员会	1988 年 8 月-9 月	仰光及较大的乡镇 与城市	建设性非暴力干预
和尚拒绝提供服务	1990 年 8 月-10 月	曼德勒	不合作
对竞选活动限制的 公民不服从	1989-1990 年	全国	不合作
平行政府	1990 年 8 月	马那布罗	建设性非暴力干预

注：基于费恩科（2001 年）、林特内尔（1990 年）、貌（1992 年）、莫克沙（1989 年）、斯密斯（1991 年）和外国广播信息服务局（1988-90 年）。

与缅甸的情形非常相似的是，导致中国的运动缺乏韧性的因素包括组织不力以及缺乏受到广泛支持的用以集中和协调抵抗行动的联盟机构。学生运动最初由许多个人和小组通过独立的行动和相互的影响发起，但它缺少任何协调，并且充满了不同学生帮派之间的冲突。反叛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学生组织；不过，所有组织都缺乏历史记录和草根成员，所有的领袖人物都没有通过公认的程序由适当数量的运动参与者选举产生，不同组织的领袖们没有相互协作，而且运动参与者并不一定会遵从组织或者领袖的指令。希望在与政府的互动中采取战略性举措的领袖或者组织被那些想要采取更极端行动的领袖和组织边缘化了，结果就是行动的螺旋式升级，却缺少足够的支持基础（赵鼎新，2001 年，146-147 页）。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该组织成员所用）或高自联（中共所用），是1989年北京各高校大学生寻求民主的运动中，替代学生会而自发自主产生的自治性组织，前身为4月23日发起的北京高校临时学联，4月28日由北京五十多所高等院校学生自治会组成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并推选九所院校为常委院校，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前期北高联采常委会固定主席制，历任主席是周勇军、吾尔开希、封从德，后期北高联改为常委会轮值主席制。图片资料来源于维基百科。

北京大学的学生于1989年4月18日成立第一个学生自治组织。此后不久，第一个全北京的学生组织-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几个大学跟着成立它们自己的独立学生组织。不过，随着更多自治组织的出现，分裂也接着到来了。大学生对话代表团于5月5日成立，以阐述诉求并组织与政府的谈判。在绝食抗议于5月13日开始时，学生绝食抗议代表团成立了。这三个组织处于运动的风口浪尖之上，可是，它们非但没有从战略上协调它们的行动，反而却最终落入相互竞争的地步（赛奇，1990年，35-37页）。

运动的发展不仅将许多新成立的组织推向前台，而且还让许多具有政治抱负且怀着不同想法的学生登台亮相。不管他们是运动组织领导层之内还是之外的人士，这些学生一般都自行其是。随着运动的进展，它变得愈益分散、缺乏协调，并且更多地由自发性的群众运动所支配。对中国问题以及运动目标有着更到位的理解的学生被那些通过提倡更为极端的诉求和行动而获得声望的学生边缘化了。在运动的过程中，不同学生派系之间的冲突加剧了。比如，北京大学的学生于1989年5月14日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了一个广播站。第二天，清华大学的学生建立了一个功能更强的广播站。两个广播站在同一时间进行广播，发布相互矛盾的通知和指令（赵鼎新，2001年，179页）。

以大学生对话代表团和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为代表的组织得更好的部分运动力量无法充分地协调或者指导运

动，因为它们因运动的策略和目标问题而与绝食抗议领袖处于对立状态。到1989年5月18日时，许多学生领袖和活动人士想要终止绝食抗议，以便不给政府提供实行戒严的借口，而对于绝食罢工是否应终止的问题，不同的学生派系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另外，绝食抗议的领袖分成两类，他们自己也处于分裂状态。第一类包括吾尔开希和王丹。他们把绝食抗议当作一个战略性的政治举措，组织它的目的是扩大动员并利用国际媒体的报道机会——它们到北京是为了报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中苏首脑会谈而进行的访问。第二类包括柴玲。他们以更为理想化的视角看待绝食抗议行动，并决定继续绝食抗议，直至政府同意他们的诉求。灵活且愿意与政府谈判并巩固成果的学生领袖被视为叛徒，且被边缘化。吾尔开希和王丹要求终止绝食抗议和占领天安门广场以进行规划并巩固成果的呼吁被忽视了。在绝食抗议开始后，它受到诸如柴玲、封从德、张伯笠【译注：英文原文为Zhang Bole，似乎为张伯笠（Zhang Boli）的笔误】以及李禄之类的理想化人士的控制，而这些人又得到刚从外地赶到北京的学生的支持（赵鼎新，2001年，179-181页）。

五月底，另一个联盟组织高校自治联合会成立。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僵局显然马上就会被打破，因为高校自治联合会——包括柴玲和封从德——投票赞成结束对天安门广场的占领并巩固他们的成果。不过，此后不久，柴玲和封从德改变了他们的主意。柴玲宣布她的总指挥部已决定退出高校自治联合会。从外地赶到北京的学生也拒绝北京的学生领袖所提出的意见，也即他们结束对天安门广场的占领。这些因素导致了学生与政府的正面冲突以及悲剧的结局（赵鼎新，2001年，190-195页）。



图为学生绝食现场，正前方为毛泽东纪念堂。图片来源于香港论坛。

所以，中国人抵抗行动的一个主要组织缺陷就是，尽管之前存在的学生网络能够迅速地动员学生，它们却没有提供为全面协调运动所必需的组织结构。在短暂却紧张的运动期间，组织结构也没有发育出来（加尔胡恩（Calhoun），1989年；夏普和詹金斯，1989年；史密斯，1992年；赵鼎新，2001年）。组建能够有效协调不同学生团体的联盟组织的尝试有过，但所有的联盟组织都无法得到大部分学生的拥护。如果整个运动存在着一个公认的联盟组织，抗争者就可能提出经过认可的要求，在追求其目标时采取战略性的举措，并巩固成果。如果没有足够的协调，这是不可能的。

阻碍运动的韧性的还有策略性问题。占领天安门广场以及绝食抗议之前的大规模公众示威具有极大的象征性意义。⁸不过，对于抗议者来说，占领公共场所总是带有风险的。从更为普遍的视角来看，在面临镇压时，集中的方法—比如抗议与说服（游行、集会）以及破坏性非暴力干预（绝食抗议、静坐占领）—比分散的方法—比如采取不合作与抵制形式—更缺乏韧性。在没有将所采取的非暴力行动手段（见表五）从集中的方法扩展到分散的方法的情况下，一旦镇压升级，中国的运动就无法保持韧性。

表五、中国主要的非暴力运动和事件，1989 年

行动	日期	地点	非暴力行动方法
游行与抗议示威	1989 年 4 月 17 日到 6 月 4 日	北京	抗议与说服
自治组织的成立	开始于四月底	大学（先是在北京， 后来是全国各地）	建设性非暴力干预
罢课	1989 年 4 月 22 日到 五月初	北京	不合作
抗议示威	1989 年 5 月	主要城市	抗议与说服
绝食抗议与占领天安门广场	1989 年 5 月 13 日到 6 月 4 日	北京	破坏性非暴力干预

注：基于赵鼎新（2001 年）和外国广播信息服务局（1989 年）。

➤ 影响力的缺乏

缅甸的抗争对当局所构成的影响受到下述因素的限制：在多党选举之前的那段时期强调挑战当局的制度性手段，缺少精英间的分裂，缺少具有自主性的机构，缺少海外的支持，以及缺少国际势力对当局的有效压力。

尽管抗争者在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 1988 年 9 月 18 日取得控制权之前采取了一系列广泛的非暴力行动手段，在军队重新恢复其权力并宣布多党选举随后会举行之后，行动的范围就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全国民主联盟的总书记昂山素姬于 1989 年 7 月 20 日被软禁，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全国民主联盟工作人员也被捕。一旦

⁸ 根据黎安友的研究（1989 年，24 页），学生们没有把自己视为异议人士，而是视为忠诚的追随者，呼吁当局遵从中国宪法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他们在毛泽东纪念堂前举行绝食抗议，以凸显其爱国的本性，而且它发出这样的信息：学生们视国家的利益高于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这样做时遵从了屈原的传统，后者在公元前四世纪自杀，以证明他对没能听从他的建议的统治者的忠诚。

昂山素姬被软禁，唯一的异议活动就被隔绝，而且基本上成了象征性的举动。此后，所采用的不合作方法就限于对竞选限制的公民不服从行动，比如举行集会和出版政治小册子（克里格，1991年）。更有威胁性的不合作形式——比如罢工和抵制国家机构——没有被付诸实施。昂山素姬及全国民主联盟非但没有继续不合作与非暴力干预运动，反而让自己致力于通过选举推动变革——这一立场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军事当局会认可选举结果。实际上，通过只参加国家控制的政治参与渠道，抗争者最大程度地减弱了其通过不合作与干扰的方式向国家施压的能力。当当局拒绝认可选举结果时，抗争者无法通过不合作运动瓦解当局的现实就确保了它不可能导致政治变革。

当然，影响力的缺乏也取决于运动产生于其中的环境。缅甸的精英们在有关军队的优先地位问题上没有分歧；军队没有分裂；拥有足够多的相对于政府的自主性的第三方不存在——这些第三方本来可能为运动提供支持，并由此增强运动的影响力；对抗争的有形的国际支持以及对当局的压力都缺乏。

精英间分歧的缺失导致形成一种不利的环境。在人民力量运动于1988年开始之前，对奈温统治的唯一重要的挑战来自军队内部的精英，以及缅甸社会主义计划党的最上层（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奈温对实际或者想象中的对他权力的威胁的回应办法是政治清洗。权力仅次于奈温的准将昂基在1963年被清除出党。替代他的位置的准将丁皮（Tin Pe）于1969年被排除出权力核心圈之外。1974年和1975年敦促在应付抗议时保持克制的丁武（Tin U）将军在1976年被清洗。有传言说，武装部队内部分裂成下述两派：一派是支持丁武的战地指挥官派系，他们承担与种族反叛分子战斗的大部分任务，另一派是对国家发展起到领导作用的仰光的军官。1976年7月，七位低阶军官因被指控为图谋暗杀奈温而被捕和受审。丁武将军——有些人将他视为奈温的潜在继承者——被指控为知悉暗杀阴谋，并被捕入狱。不到一年之后，暗杀奈温的另一场图谋也受到指控。缅甸社会主义计划党的两位前官员被捕和受审。此后，国家机关内部以及武装部队内部都有重大的清洗行动，以根除支持丁武的潜在力量并巩固奈温对权力的掌控。丁武（与前一个丁武将军没有关系）是军事情报局的局长和奈温的亲信。他于1983年被清洗，且被判处终身监禁（林特内尔，1990年；貌，1990年；斯尔沃斯坦，1977年）。

1980年代没有关于政变或者暗杀阴谋的报道，而且在1988年的非武装反抗之前或者期间，军事指挥机关内部没有出现精英的分裂。1988年抗议期间唯一记录在案的军事变节的主角是较低层级的军人，他们主要来自外围部门（古窑特，1989年）。高级军官中没有人变节，而且大部分普通士兵都忠实地执行了他们的命令，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因此，在民主抗争之前或者期间，缅甸的军事指挥机关依然保持团结。

另一个限制是缺少可能为运动提供支持的具有自主性的机构。在缅甸僧侣阶层中，部分人士大力支持非武装反抗。比如，在8-8-88总罢工期间，由几百名佛教和尚组成的队列向下拿着他们的钵盂，这象征着全国都在罢工（林特内尔，1990年）⁹。不过，僧侣阶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当局压制僧侣阶层的倾向削弱了僧侣阶层能够给抗争提供的建制性支持。僧侣阶层在1960年代曾成功地抵制了政府为和尚登记的企图——登记是实现了对佛教僧侣控制的一种手段（斯尔沃斯坦，1977年）。此后，奈温政权试图对僧侣阶层施加控制。直到国家与僧侣阶层的关系于1980年5月发生根本改变之时，上述企图一直是相对无效的。凭借着国家支持的第一届净化、永存和传扬佛法之全体僧侣大会，和尚登记规则以及罢黜参加政治活动的和尚之规则都被付诸实施。这一次会议连同1985年的第二次大会导致僧侣阶层中年长的保守派人士以及国家对佛教僧侣有了大得多的控制权（马修斯（Matthews），1993

⁹ 根据马修斯（1993年）和斯坦伯格（1990年）的研究，120,000名佛教和尚中约有80%支持人民力量运动。也参见科茨曼（1998年）。

年；泰勒，1987年；丹（Than），1988年）。僧侣集团的保守的领导人没有公开批评军人政权，并一直不同意和尚参加反政府示威（科茨曼，1998年）。所以，僧侣集团的组织结构相对于国家没有足够大的独立性，以有助于维系面临镇压的运动。持不同政见的和尚组建了全缅甸年轻和尚联盟，该联盟于1990年呼吁将权力转交给民主选举产生的全国大会。然而，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了几百名据称是该联盟成员的和尚，并实际上终止了它的活动。

曼德勒的学生与和尚在1990年8月8日组织了一场纪念8-8-88反叛两周年的活动。几千名民众参加了这一活动，而活动则遭到军队的暴力对付，两名和尚被打死，许多其他人被打伤。为对这些事件做出回应，曼德勒的和尚组织起反对当局的宗教抵制活动。从1990年8月27日开始，参与抵制活动的和尚们拒绝士兵及其家人的施舍，并拒绝为军队人员或者他们的家人举行宗教仪式。在宗教抵制活动持续了将近两个月并且开始向其他城市蔓延之后，当局就展开镇压了。资深方丈们与苏貌将军会谈，并正式呼吁结束抵制活动（貌，1992年，185页）。从1990年10月20日开始，军队将那些继续进行抵制活动的不顺服的和尚剥夺了教籍并逮捕，将那些据称是参与了反政府活动的独立佛教机构—比如全缅甸年轻和尚联盟—解散。军队镇压僧侣集团中的反对派人士的办法是打击曼德勒地区—这是僧侣阶层反对当局活动的中心—的一百多个寺庙，将那里的几百名和尚剥夺教籍，并拷打、监禁和虐待他们（费恩科，2001年；林特内尔，1994年，311-312页；马修斯，1993年；貌，1992年）。

因此，尽管僧侣集团中的重要力量支持或者参与了对军人统治的非武装抗争，僧侣集团领导层拒绝反对当局并且不认可持异议的和尚这一事实加上政府镇压持异议的和尚的意愿表明，僧侣阶层无法成为人民力量运动的一个具有自主性的有影响力的盟友，比如就好像菲律宾的天主教会（见第三章）或者泰国的佛教组织（见第五章）那样。

缅甸运动的影响力也因缺乏国外的有影响力的盟友而受到损害。从历史上看，缅甸一直都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更为孤立，而且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缅甸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中就充满了对外国人和资本主义的疑虑。在1962年政变之后，缅甸隔断了它的大部分国际联系，推行一种不结盟的孤立主义政策，并继续不受其他大国直接的政治影响。去往缅甸的旅行受到限制，而且外国传教士、学者和基金会被迫离开该国（泰勒，1987年）。因此，除1988年“仰光之春”那段短暂的时期之外，缅甸依旧绝缘于跨国社会运动。比如，大赦国际在1988年夏季期间曾短暂地在仰光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不过当军队于9月份重新获得控制权时，它就被关闭了。在军队接管之后，缅甸的推广民主运动的非政府组织出现了，不过，它们位于缅甸之外，主要是在泰国、欧洲或者美国，而且它们与缅甸国内的运动的联系不紧密。另外，所有的跨国社会运动都无法为这一运动提供直接的支持。¹⁰

只是在缅甸的抗争于1988年9月被镇压且政府拒绝认可1990年5月的选举结果之后，缅甸的跨国民主运动才获得了发展。比如，大赦国际直到1990年11月7日才发起一场世界范围的支持缅甸民主与人权的运动。在1990年5月的选举无法获得完满的结果之后，昂山素姬的人权与民主运动极大地改变了国际社会对缅甸局势的认知，

¹⁰ 比如，与菲律宾的情况相比，显示缅甸孤立与缺少跨国联系的一个指标是各国每百万人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的成员数量。缅甸1989年的得分是6.0分，而菲律宾的得分是20.0分（安海尔等人，2001年，287-290页）。有关这种不平衡的另一个指标是各国列在人权索引（1994年人权互联网）之中的社会运动组织的数量。该索引列出了缅甸的28家人权社会运动组织；不过，它们都位于缅甸之外，并因而孤立于国内的运动之外。该索引列出了菲律宾的209家人权社会运动组织，其中只有24家位于该国之外。尽管这些都是1994年的数据，它们却揭示出：就跨国联系而言，缅甸和菲律宾1980年代的人民力量运动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不过，那些被昂山素姬的言辞打动的人士所施加给军人政权的影响力不足以导致政治变革。因此，这种局势不同于南非的情形（见第三章）——在南非，在运动扩大的同时，国际上对运动的支持也增多了；而国际上对缅甸运动的支持只有在它被镇压之后才有了进展。

外国对缅甸当局施加压力的能力也不强。在 1962 年政变之后，缅甸推行一种自给自足的发展政策，并遵循一种严格的中立政策，甚至于 1979 年退出不结盟运动——当时它认为该运动与苏联的联系过于紧密。军人政权多次声明国家拥有最终的主权，而外国干预国内事务是非法的（泰勒，1987 年）。鉴于缅甸相对孤立的状态以及没有对外国强权形成依附关系，任何国家都没有对军政府有效施加压力或者为人民力量运动提供关键支持的影响力。西方大国谴责该政权的残酷行径，但是，除了实施贸易制裁和限制政府援助之外，他们能够做的或者愿意做的很少（古窑特和白基里（Badgley），1990 年）。不过，这些措施产生的影响极小，因为缅甸与西方之间的国际贸易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日本尽管暂时中止了援助，却因其在缅甸的巨大经济利益而拒绝与西方一起在经济上抵制它。

与此同时，泰国政府将逃出边界的异议人士逮捕并遣返，¹¹而通过在缅甸投资几百万美元建立砍伐柚木树的业务以便将其在国际市场上销售，泰国的公司为缅甸军人政府提供了硬通货（联合国，1991 年）。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外国投资和与私人公司成立的合资企业那里获得收入，收入来源包括渔业权、石油开采权、宝石、基础设施开发以及旅游。这些收入来源使得军政府能够从巴基斯坦、新加坡和中国购买武器。由于非武装反抗的影响，缅甸军政府大大加强了其与中国的联系。中国于 1990 年 9 月同意向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价值达十二亿美元的军事硬件设备——这当然是用来镇压缅甸自己的民众的（费恩科，2001 年；貌，1992 年，227 页）。中国也成为缅甸军政府在国际论坛上的重要支持者，因为中国自己也反对外国支持人权的压力并支持国家拥有最终的主权。

与缅甸的情形一样，由于运动的特征以及它所产生于其中的更为广泛的政治背景，中国的抗争的影响力受到了削弱。有人指出，由于缺乏谈判能力，中国的民主运动没能推动政治变革。在有些人看来，“只有在该组织的代表人物能够代表组织做出参与运动的活动人士会遵从的承诺的情况下，”抗争团体才具有谈判的能力（帕古努克（Pagnucco）和斯密斯，1992 年，177 页）。诚然，学生们的组织不善限制了他们的谈判能力，可是，即便学生们具有更为团结的组织，仅凭它们自己也缺少推动政治变革的影响力。一般来说，一方不会与另一方进行谈判，除非后者有某些影响力。政府同意与学生对话的目的实际上不是为了就政治转型进行谈判，而毋宁是向学生们做出明显的让步，以便于在无需采取具有更大潜在风险的暴力镇压行动的情况下结束对天安门广场的占领。尽管对话没能让学生感到满足，学生们却也没有足以迫使政府做出让步的影响力，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组织不善，也在于他们依赖于一组有限的手段，与更广泛的社会基础的联系不够，缺少精英间的分裂，以及缺少国际支持或者国际上对当局的压力（夏普和詹金斯，1989 年）。

运动的核心策略是占领天安门广场与绝食抗争。只有在出现下述情况时，诸如此类的非暴力干预形式才会有力量：它们干扰了正常的活动，动员人们参加不合作运动，动员第三方不再支持当局，或者改变对手的观点。占领公共场所的举动尽管具有破坏性，在镇压面前却缺乏韧性。另外，占领与绝食抗议没能转化政治精英认同他们的追求，没能动员足够多的对政权拥有影响力的第三方支持，也没能动员民众形成能够增强抗争影响力的不合

¹¹ 在政府于 1988 年 8 月和 9 月屠杀缅甸民众之后不久，逃出边界的缅甸人获得泰国的避难许可。不过，在泰国军队总司令差瓦立（Chaowalit）将军于 1988 年 12 月在仰光会见了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的官员之后，泰国改变了它的政策，并开始逮捕和遣送缅甸的难民（大赦国际，1990 年）。

作运动。

实际上，学生运动的飞跃式发展以及冲突向零和游戏的转变耗尽了学生们在政府不让步的情况下可能用来将压力升级的手段。下述两方面的因素之间的不平衡确保了政府会使用暴力终结占领：一方面是运动的政治影响力和学生结束中国共产党政治垄断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政府无法通过和解姿态或者威胁结束对天安门广场的占领。根据赵鼎新的看法，绝食抗议与对天安门广场的占领事实上“将运动转变为一种道义上的诉求与零和游戏。”“从那时开始，直接的碰撞几乎就是无法避免的了”（赵鼎新，2001年，232页）。

除了因无法开展不合作运动而受到削弱之外，学生们的力量还因他们隔绝于其他社会势力而受到削弱。学生运动得到知识分子和记者们的有组织的支持，但却没有得到工人或农民的支持。尽管在后毛泽东时代，对工人们的意识形态控制体系已经弱化，单位却依然是国家借以控制民众的基层组织。大部分工人依赖于大型国有集体企业的工作，这些企业为员工提供一系列的福利，比如工资、住房和医疗。跳槽的比率很低，而且对失去工作的担心让在工厂里进行组织活动受到限制（沃尔德（Walder），1989年）。当工人们参与抗议示威时，他们主要是作为个人而非一个集体这么做的。

当官方主要报纸的审查在五月中旬的短暂时期内崩溃时（后面会讨论这一点），一种有关工人个别地参与的例外情况出现了，让工人们有机会参与到运动中来，同时无需冒被逮捕或者失去工作的危险。在这一短暂的时期里，工人们在其工作单位的组织下出来支持运动。实际上，在这段时期，负责工作单位的政府官员支持工作单位里的动员，因为反对工人参与不仅会让他们变得不受工人的欢迎，而且会让他们看起来像是在反对政府—这是由于官方报纸当时正正面报道运动（赵鼎新，2001年）。不过，一旦5月19日宣布实行戒严，大部分工作单位都停止了示威，因为它明显是违法的，并构成对当局的公开挑战。只有在工人们具有自主的组织的情况下，他们的支持才会继续下去。

工作单位动员的一个例外情况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于1989年5月18日成立。不过，从其参与者、领袖人物、资源以及主要活动来看，工人联合会显然只是学生运动的附庸，并且无法获得大量工人的支持（赵鼎新，2001年，173-176页）。该联合会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因为它的影响没有到达任一工厂，而且它缺乏组织罢工或者怠工以展示其力量的能力（天健（Tianjian），1990年，1203页）。因此，很少有证据表明，工人们能够自主地进行组织或者让威胁性行动产生与之相配的政治影响力，比如停工或者罢工以支持学生运动。

精英间的团结也限制了运动的影响力。政治精英间所存在的政策分歧在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速度以及如何应付学生，而不在于政治统治的方式—这是出现背弃政权行为的先决条件。有些政府领导人在何为应付抗争的最有效战略方面—镇压还是调解—持不同意见，不过，在攸关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地位问题上，精英间没有分歧。政治精英们坚守一党制，而且多数人认为终结中国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没有什么好处。政治精英内唯一支持民主运动的高级官员似乎是赵紫阳，他试图利用运动来挽救他自己的政治命运（迪特摩尔，1990年；黎安友（Nathan），1989年；斯特兰德（Strand），1989年；天健，1990年；赵鼎新，2001年）。

国际资源和对民主运动的资助从海外华人以及香港那里送到北京（赵鼎新，2001年，195-198页），不过，鉴于上面所讨论的组织与协调问题，这些资源没有被有效地用于组织的建构工作。另外，其他国家对中国当局所施加的压力不是很大。比如，天安门大屠杀之后，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制裁措施的用意在于解除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而非是要对中国当局产生任何有价值的影响（霍夫鲍尔（Hufbauer）等人，1990年，93页）。

➤ 镇压的两难

当缅甸的民主运动于 1988 年 3 月发轫时，政府以过分和不分青红皂白的镇压对付集体行动。不过，有些人认为，政府“过度和不加选择地使用武力引发了民众强烈的大规模反应”（莫克沙，1989 年，556 页）。“越来越多的人非但没有变得恐惧，反而加入到运动中来”（林特内尔，1990 年，9 页）。也就是说，在人民力量运动的起始阶段，不分青红皂白的镇压所产生的非意图后果是强化了动员。不过，当军队在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权力后于 9 月 18 日回到城市时，镇压再次变成肆意的行动。按照一位观察者的说法，军队是“一架没有能力加以区别对待的残酷、生硬的武器”（莫克沙，1989 年，554 页）。仰光的部分地区变成自由射击场，士兵们向茶铺、公交车站乃至家里的民众射击（莫克沙，1989 年，549 页）。因此，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镇压的两难性后果是在 1988 年 3 月到 8 月这段时期增强了运动的动员能力，不过，到 1988 年 9 月时，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镇压的后果是瘫痪并压制住运动。这种两难情形可以通过下述方式加以解释：将运动-政府间的互动置于有关机会与约束的更为广阔的图景之中，并确定上述互动是如何影响运动运用各种抵抗方法的能力的。

致使运动无法抵御住镇压的是政府审查与信息流动的缺失。在缅甸 1962 年政变之后，政府控制住所有的出版和通信业，而且对非政府的出版物也进行全面的打压（泰勒，1987 年）。不过，在 1988 年 6 月到 9 月的“仰光之春”这段时期，一系列批评当局的报纸面世。到 1988 年 8 月时，单单仰光就有将近四十家致力于政治批评和动员反对派的独立报纸与杂志（林特内尔，1990 年）。替代性印刷媒体的出现对于把以学生为中心的抗议转变为群众性运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由国家控制的报纸被工人们接管，而工人们则发布有关示威的消息并要求满足运动的诉求（古窑特，1989 年）。不过，当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 1988 年 9 月攫取权力时，它立即重新控制住媒体，将除政府控制的工人日报之外的所有报纸关闭（林特内尔，1990 年）。由于公众无法获得其他的信息，运动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

为应对镇压而进行的动员也受益于当局内部因举行有关多党制民主-也即政治统治方式-的全面公决而出现的明显分歧。不过，到 9 月中旬时，当局已重新改组并重新团结起来，军队指挥官之间也没有分歧-而这些分歧本来是为抗争提供机会的。

因而，当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镇压与精英间被觉察到的分歧以及较少受到限制的信息流动结合在一起时，它有助于动员。不过，当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镇压与精英间分歧的消弭与信息流动的缺失结合在一起时，其后果就是运动的瘫痪。这表明，镇压对异议行动所产生的效果不仅受制于其规模或者强度，而且受制于它所发生于其中的机会环境以及抗争的特性。

与缅甸的情形一样，中国的抗争在动员方面的差异直接与信息流的增多以及被感知到的精英间的分裂有关。根据赵鼎新的研究，从运动的一开始，记者们就试图避免政府的控制并正面报道运动。当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放松时，对运动的正面描述主导了新闻报道。赵鼎新在考察过中国最重要的两份官方报纸所发表的有关运动的新闻报道后发现，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与运动的潮起潮落直接有关。在 1989 年 4 月 28 日之前，政府牢牢控制着媒体，其典型表现就是人民日报在 4 月 26 日发表的有关学生运动的措辞严厉的社论。在社论发表之后，记者们开始参与抗议示威，并施压要求编辑们发表对运动的更正面的描述。在 4 月 28 日到 5 月 13 日这段时间，政府开始失去对主要官方报纸的控制，而越来越多关于学生运动的客观正面报道被发表出来。在 5 月 14 日到 19 日这段时间-绝食抗议就出现在这一时期，政府对主要报纸的审查机制暂时崩溃了。官方报纸这段时间对运动几乎完全正面的报道降低了活动的风险，并产生强大的动员效果，因为几百万北京市民出来支持运动。不过，政府于 5 月 19 日晚上宣布实行戒严，从 5 月 20 日往后，政府开始重新控制住大众媒体，运动降温了。戒严部队于 5 月 25 日占领了北京的

主要新闻机构，而且主要官方媒体发表了关于运动的负面报道。到6月1日时，审查机制重新被强制推行（赵鼎新，2001年，第十章）。

来北京报道中苏首脑峰会的国际媒体也有助于运动的动员。国际媒体报道学生运动，这些报道通过广播传回中国，不仅有助于北京的动员，而且有助于全中国省会城市以及大学城的动员（迪特摩尔，1990年，32页）。不过，到六月份时，对国际邮件的审查机制被重新强制实施，传真机被切断或者受到细心的防备，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的中文无线电广播受到电子干扰，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政府重新对国内大众媒体进行强制审查（迪特摩尔，1990年，37页）。于是，当暴力镇压于6月初开始时，运动的机会图景并不妙，并促成了它的消亡。在信息流动更为自由的那段时期，运动没有抓住规划并采用分散型方法的机会。

与缅甸的情形一样，中国政治精英间被感知到的分歧推动了动员，可是，政治精英的分歧要么不存在，要么很快就弥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于1989年5月4日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年会上就学生运动发表了一个即席讲话，而讲话的调子基本上是正面的。对于学生来说，这似乎表明赵支持运动，而且从更为普遍的视角来看，这也似乎表明精英间有分歧，从而降低了活动的风险并有助于动员。不过，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赵只是在利用运动，以试图改善他在政治精英中岌岌可危的地位（迪特摩尔，1990年；赵鼎新，2001年）。

运动的另一项明显成就是，它能够阻挡住军队最初对天安门广场的占领。戒严于1989年5月20日宣布实行，总数为一万到一万五千名士兵的七到八个分部都试图进入北京。北京居民对于实施戒严感到愤怒，并阻挡住士兵。后者随后于5月22日撤退。就像缅甸的情形那样，士兵的撤退被视为运动的胜利，鼓舞了进一步的动员以及诉求的升级。可是，政府政策的改变主要并非是由于精英的分裂—如学生们所理解的那样，而是由于先前应对办法的无效。根据赵鼎新的说法，“西方的分析家们强调了中国政府在1989年运动期间的帮派特征。然而，至关重要的事实是，在运动期间，政府所有的高层领导事实上都没有支持学生。他们的分歧更多地在于让运动缓和下来的战略”（赵鼎新，2001年，282页）。由于精英们在事关政治统治方式的问题上没有分歧，由于政府不会迁就于运动的诉求，而且由于让步与威胁没能控制住抗争，从政府的立场来看，所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军事镇压。鉴于上面讨论过的因素，镇压产生了它想要的后果。

➤ 结论

在缅甸与中国这两个国家，极端的镇压行动促使抵抗消亡了，可是，它并非决定那些非武装反抗之结局的唯一因素—就非民主体制下依赖于非暴力行动方法的抗争而言，这一点常常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镇压有效地压制住运动，不过，这其中的原由不仅在于更广泛的政治结构以及运动本身的特性所产生的复合影响，也同样在于镇压的强度。

另外，人们普遍假定，非暴力行动要取得成功，一个相对民主的环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非暴力行动可以是这样的一种获得成功的手段：持反对立场的公民社会借此显出自己的威力，然后让它自己免遭政府的压制，并因而推动民主化。缅甸与中国1980年代晚期的抗争都没能成功地颠覆它们的国家体制，不过，它们可能开启了一个进程：培育持反对立场的、将来会带来政治变革的公民社会。

尽管缅甸与中国的抗争出现了上述的结果，全球非武装反抗的浪潮却继续发展。1990年代初，中国的西南邻国尼泊尔和缅甸的东南邻国泰国都遭遇了非武装反抗。与缅甸与中国的情形不同，尼泊尔与泰国的非武装反抗都对民主化有贡献。下一章就将考察这些国家的情况。 **T**

大学论坛

编者按：本期“大学论坛”我们选登了傅国涌先生4月29日在华中农业大学做的题为《回望历史——百年前的大变革》的主题报告。

最近一百年，中国走过了从君国、民国、军国、党国的变革历程。而在百年前历史的变革中有三种政治力量起着决定性作用，即稳健的立宪派、实用的北洋派和激进的革命派，这三派均源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那场战争真正惊醒了中国的精英阶层——士大夫阶层，迫使他们思考中国未来的命运，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对改革现状的认同。

辛亥革命通场被认为是一场有局限性的革命，但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的局限，包括人类本身，局限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如果从现代视角来衡量的话，流血越少的革命越光荣，因为为变革所付出的成本是最低的。辛亥革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通过两场南北和谈出来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

革命成功后，仍有很多人不适应共和的政制，包括孙中山和袁世凯，真正理解共和的人是宋教仁，但却在赴任前夕被暗杀，幕后凶手仍然未被确定。“百年痛失一人，至今伤痛未愈”，宋教仁之死让中国以后的道路更加曲折幽暗，至今未能完全走出。历史并不是被某种规律所必然决定的，在其中存在着很多偶然性的因素，小人物也能改变历史的命运，比如刺杀宋教仁的伍士英。研究历史的乐趣部分也在于此，每条线索下都蕴藏着很多的可能性，可以引发人的无线遐想，让人唏嘘不已。在上帝的眼中，每个人都是同样的重要，没有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区分，只要每个人都能承担自己所能承担的道义责任，历史就会向前推进，这也是建设公民社会的关键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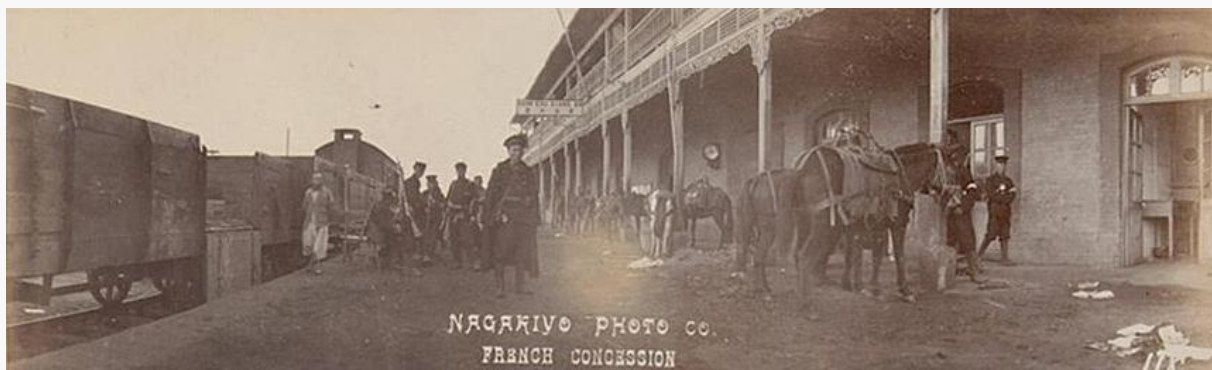


（图为讲座中的傅国涌先生）

■ 回望历史——百年前的大变革

傅国涌

傅国涌：根据树长的大不大，树多不多，判断一个城市的好坏，甚至判断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也是看它街上的树多不多，树大不大；树越大，文明越深，把这些大树都挖掉了，那肯定把文明都挖掉了。所以华中农业大学有很多棵大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学校。虽然我是刚刚知道武汉还有这样一所学校，昨天才知道，真是孤落寡闻，非常地抱歉。以前只知道武汉有一个珞珈山，有一个桂子山，昨天才知道还有一座狮子山。我是昨天下午才知道要到这里来，事先我不知道。有朋友说要我到武汉来，前面是说我要到中科大去，所以我还不知道要到华农大来。后来知道到这里来，所以我特别去查了一下地图，发现这里是狮子山，而且靠南湖。那么我今天的讲题也是从南湖开始的。99年前武昌首义跟南湖有非常深的关系，南湖当时驻的是炮兵，工程营起事之后，炮兵跟上，就决定了一个中国的命运。



上图为武昌起义期间某新军炮兵营驻扎地，下图为汉口火车站附近。从士兵的脸上看不出历史大变革的迹象，波澜之前往往如此平静。图片来源于中国收藏热线。

所以 100 年前中国的社会大变革，它最关键的一个结点上是从武昌开始的，你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南湖，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环节。有的时候一个地方它可以影响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命运。武昌首义确实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在武昌首义之前的中国是漫长的王朝专制时代。武昌首义时代之后的中国开启了中国的第一

个共和一中华民国时代。那么这个共和国就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放在整个世界上也是比较早期的共和国。我们知道共和国和帝国最大的区别就是帝国是有皇帝的，一家一姓统治的；共和就是大家来统治，是民众来治理。政治是什么？孙中山讲“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众人之事就是要由众人自己来管理，那么共和的概念其实就是一个由民众自我管理的概念。

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华民国的历史当中，我们的第一任共和政治的实践和尝试失败了，这个失败有很多的原因。我们本来已经顺利的从帝国进入到了民国，但是民国又成了实际上的军国，当然军国之后是党国。1927 年南京政府建立的国民政府就是一个党国，党在国上面，所以中国就经历了从帝国到民国，民国又没有变成真的民国，而是事实上的军国，然后到了党国，这样的一个发展逻辑，造成我们百年历史振荡不息。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百年大变革当中，我想从几种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开始讲起。在晚清，中国转向民国的过程中，我们中华民族产生了三种能够决定中国方向的政治力量：第一种政治力量就是大家以前非常熟悉的教科书上所告诉我们的，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第二种力量就是我们一贯认为比较保守的，甚至有点反动的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派，后来发展出来就是北洋军阀；第三种政治力量就是长期历来我们教科书不提被忽略掉的，实际上在当时非常重要，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政治力量看上去是那么的不同的，好像是他们之间很难有基本的共识，但是我可以告诉诸位，三派同源，三个派起源于同一个起点，起点是什么？就是改革或者说改良。无论是革命派的孙中山、北洋派的袁世凯、立宪派的张謇、梁启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就是要改良、要改革。他们的起点在时间上都是在 1894 年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战争对中国的震动比这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大，都要深远。



1842 年 8 月 29 日清政府在英国军舰上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资料图片。

我们知道 1840 年鸦片战争在 1842 年结束，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的近代史揭开了序幕。1860 年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烧掉了中国的圆明园，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教科书上反复地提。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无论是英国人还是英法联军都没有把中国人打醒，中国人觉得没有什么，输了也就是割了一些不重要的地，比如香

港。香港当时在英文里是叫“一块不长毛的石头”，也就是一个荒岛，没有几个人居住的地方，是一个不毛之地。是英国人用了 100 年的时间把香港建成世界的一个自由港，一个亚洲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原本交给英国人的时候是一个荒凉、没有人烟的小岛。所以中国人当时并没有觉得割让了香港有什么问题。

所以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间跨越了 50 年，在这 50 多年当中，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特别是读书有了科举功名、中国的社会支柱士大夫阶层，是这些人撑起了中国社会的格局，他们没有人认为我们遇到了危机。鸦片战争以后，50 多年当中，我们都没有觉得中华民族有什么问题，需要改变什么，所以该考秀才的还是考秀才，考举人的照样考举人，该种地的还是种地，该干什么干什么，朝廷没有变，民间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事实上

中国变化真正开始启动是在 1894 年甲午战争，我们被日本人打败了。被英国人打败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屈辱，因为英国人是我们所陌生的，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甚至他们从哪里来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地理知识在那个时代非常的贫乏，我们不知道中国居然不是天下之中心。在我们的观念当中一直认为中国就是天下的绝对中心，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是天下概念，不是国家概念，民族、国家的概念也是在甲午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认为我们是真正的天朝大国。

大家可能还记得 1792 年，英国派出来的使臣到中国朝见乾隆皇帝的时候，乾隆还不愿意见他，他送给乾隆的礼物，乾隆还不愿意收下，乾隆说我们天朝大国、物产丰富，什么都有，你们送给我的东西我不稀罕。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支配了中国非常漫长的时期，甚至在甲午战争之前的 50 多年也没有改变。但是甲午战争不一样，这一次我们是被我们的学生打败了，我们是被我们的地理打败了。日本在中国的观念里一直是一个邻邦的，不起眼的小岛国，人口比我们少，文明比我们低。大家知道唐代的时候，他派了大量的遣唐使来学习我们的文化，所以今天我们中国的文化很多人讲保存的比较完好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日本。日本的茶道，日本的书法都是我们唐代传过去的，他们保存得比我们本土可能更加完整一点。大家基本上都不会写毛笔字了，我也不会，大部分人都不会了，我们很多传统的东西都已经丢失了，在日本保存的比我们好。就这样的日本竟然打败我们，所以我们觉得非常的丢脸。



右图为《马关条约》签订旧址下关春帆楼，左图为中日双方代表李鸿章、伊藤博文。伊藤博文这根日本常青“藤”，已经牢牢地缠绕在中国近代史中，不可分割，更不是简单的情绪褒贬所能定论的。当 72 岁的李鸿章与 54 岁的伊藤博文在马关再度相见，两人感慨万千。就中国的改革开放，伊藤博文说道：“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伊藤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李鸿章要在中国那种更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需要多大的成本和勇气，也无怪乎伊藤安慰李鸿章，甲午之败，绝非李鸿章的问题。资料图片。

这个时候读书人，士大夫阶层开始蒙了，学生何以打败老师，一个比我们国力更弱，这么小的邻邦，居然把我们强大的北洋舰队一举歼灭。北洋舰队在当时全世界排名都是前 10 位的，比日本的海军要强大一点，但是失败了。我们败的不是军事，我们败的是政治制度。我们的政治制度比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所建立的君主立宪制要落后。我们是绝对的君主专制，人家是君主加立宪，已经是一个现代政治制度，我们还是一个传统的古代政治制度。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的中国读书人，包括康有为在内的读书人开始反省，要改变中国就要从制度的变革开始。中国的第一轮真正意义上的变革，不是从洋务运动开始。洋务运动就是学人家，你造枪，我也造枪，你造船我也造船。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习人家的制度，所以才会有戊戌变法，才会有后面的晚清新政。

梁启超、康有为这些人登上历史舞台就是在 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公车上书那个时候开始的。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袁世凯练的兵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军队，而是新式陆军，新式陆军请的教练有很多是德国人，完全是模仿西方样式建立的一个新式军队。最初招募的 7000 士兵就是后来北洋军阀的基础，这支军队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基础，袁世凯是从这个角度切入了中国的变革，他手里掌握了中国最新式的军队。也就是同一年，在 1894 年来自江苏南通的一个读书人张謇考中状元，这个人考中状元以后没有去做官，而是回到了故乡，因为正好他的父亲生病死了，按照清朝的规矩在家守制三年。父母去世，做官的人要回家呆 3 年守孝的，叫守制三年，在 3 年当中就不能再回北京做官了。所以第二年，1895 年还没有调到武汉来做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看中张謇，要张謇办一个现代化的新式纺织厂企业，大生纱厂，这就是后来中国民营纺织企业的龙头老祖宗之一。那么一个状元踏上了一条办企业的道路，这在中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事，当时号称“状元办厂”。当时“状元办厂”的张謇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另外有一个苏州的状元叫陆润庠，他也办了企业，但是他很快就退出了，他对办厂没有兴趣，因为办厂是很辛苦的事情。所以只有张謇坚持下来了，成为一个成功的实业家，最后再反过来影响社会，影响政治。

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1894 年他是一个医生，可是他那个时候的兴趣不在医学上，不是在治病救人上，他不想医人，他想医国。所以他的第一个举动也不是去革命，而是要改良。所以他写了一封万言书——《上李鸿章书》，送到天津，想去见北洋大臣李鸿章。但李鸿章正忙于跟日本人打仗，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孙文。孙文何许人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当然是不会见到。你想想，你今天说你拿着一封信要去见温家宝，温家宝会见你吗？一定不会见你，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他没有见到李鸿章，就失望的回去了，这个失望就让他完成的一个人生的转折。既然改良的道路走不通，万言书都递不上去，人都见不着面，那只有革命造反了，只有自己去推翻这个政权，去建立另外一个自己的政权。所以孙中山离开了中国到他哥哥谋生的地方——美国檀香山，去建立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这个大家都知道。兴中会最大的意义就是它的口号里面已经有创立合众政府这个词，这是一个新的东西，直接导致后来出现的共和。



孙中山在上书李鸿章无比失望之后，一心向往革命。图为他与杨鹤龄、陈少白、尤列的珍贵合影，史称“四大寇”，他们常在香港中环歌赋街二十四号的杨鹤龄祖产商店杨耀记处会面，并议论中国时政，大谈反清逐满及太平天国遗事，倡言革命，鼓吹共和。资料图片。

这样我们要讲的三派力量的代表人物，在 1894-1895 都已经初成了，无论是张謇、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袁世凯、孙中山。所以我说叫“三派同源”，三派都是同一个源头，起源于甲午战争之后的民主危亡的刺激。但是他

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是组织军队；一个是闹革命；一个是或倡导改革，或实业救国，再去推动中国改革。但是三派同源最终走到了一起，叫殊途同归，这三派最后是走上了一条道上。诸位可能很难理解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的实力派为何能走到一起？我们用三个关键词来命名他们三派的话，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这个词，袁世凯很实用，也很功利，很投机，他选择官场上这条按部就班很稳的道路；那么张謇、梁启超他们要推动中国改革是希望走一条渐进变革的道路，他们所选择的路径是稳健。毫无疑问剩下的孙中山只能是激进。激进、稳健和实用这三者之间看似没有共同点，很难找到最大公约数，而社会的基本共识就是要找到最大公约数。如果没有共识这个社会什么事都干不成，最后只能做一件事就是你杀了我或者我杀了你，这件事情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干，干了无数次了。从秦始皇之后我们看到项羽、刘邦非要打个你死我活，决出胜负之后再罢手。后来的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我们知道元朝末年有很多政治势力，徐寿辉、方国珍、张士诚、朱元璋等等，其中朱元璋也只是其中的一支的而已。但是必须要达到什么程度呢？要达到朱元璋把其他的都消灭，在肉体上消亡，这个格局才能稳定下来，才能建立一个新的朝代。明朝末年天下打乱，诸位知道张献忠、李自成这些人揭竿而起，最后是被满洲人得了天下。假如说没有满洲人你以为中国就好了吗？没有满洲人李自成就能坐稳朝廷吗？李自成不是还要面临张献忠、李献忠、王献忠的挑战嘛，张献忠难道甘愿就在成都，他一定要出兵，一定要北上，要跟李自成争夺天下。最后谁打赢了，消平了天下谁才能坐稳江山。中间过来了满洲人，大家都没戏唱，最后都死路一条。其实道理一样，中国的历史只有一条逻辑，就是暴力逻辑。谁暴力最强，暴力最强者说的最算。后来我们中国有一个叫吴思的人，发明了一个词叫“血酬定律”，无论是土匪，是黑社会，是王朝更迭，他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暴力最强者说的算，靠打出来。这个就演变成我们当代的术语，叫枪杆子里出政权。

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和主张用暴力推翻满洲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之间一定找不到共同点。主张渐进变革，稳健推动中国转型的立宪派张謇和革命派孙中山之间，和手里拿枪的袁世凯之间也找不到共识。但是在晚清到民国这一轮转型中，我们非常开心地看到了，中华民族也曾经有那么一刻，有那么一幕，中国的历史竟然不是用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竟然不是用暴力逻辑决定。武昌首义所打响的这一枪，引发的不是一场无限革命，而是一场有限革命。诸位，有限革命这个词，我觉得在中国的辞典里面是非常缺乏的。我们今天知道英国的光荣革命也不是说没有战争，也有，也曾经把英国王室送上断头台。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打了8年，也牺牲了不少人，但是他们的战争都是有限的，所以他们的革命都是有限革命，有限革命就是它只有一个最低目标，没有一个最高目标。只有一个有限目标，没有一个无限目标。我们说革命，继续革命，不断的革命，那就是一个无限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底在哪儿。有限革命是有截止的，打到那步就结束的。比如美国独立战争，它非常的清楚，打到英国王室屈服了，让美利坚民族独立，让他们独立建国，这一步就结束了，就到此为止，战争不再扩大；第二，这个革命是局限在哪一些层面，革命的目标诉求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比如说你的革命只是要完成政治制度的转换，还是要完成整个社会的大洗牌，把很多的社会阶层从这个社会当中清洗出去，这就是很大的不同。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没有触动中国社会的整个结构，没有把整个社会翻一个底朝天，它是相对的有截止的。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就结束呢？让清王朝退位，我们就结束，战争告一段落。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这个目标是有限的，而且只停留在一个层面，就是政治层面，不穿越文化，也不穿越社会。我们知道如果要穿越社会的话，那就是一个阶级之间的革命，就要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一个阶级要去灭掉另外一个阶级，这样才是叫社会革命。文化革命的话，就要涉及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进行清算，而我们实际上知道，满洲人的文明比我们汉人要低，它入关以后所信奉的价值是儒家价值，是我们已经信奉了2千

年的价值。那么辛亥革命没有触动这一套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它只是一个政治革命。

所以政治革命就成了三派之间达成共识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只要这三派在这个目标上达成共识，他们就可以坐下来，用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没有一家全赢，也没有一家全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知道这样的方式对大家都是最有利，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是我们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因为这样不过瘾，没有把敌人打倒，再踩上一万只脚，那很不过瘾。我们有一个痛打落水狗的心态，狗落水了还不行，还要用竹竿去打。所以辛亥革命很长一段时期曾经被我们认为这是一次不彻底的，是一次妥协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次有很多局限性的革命。

其实“局限”这个词不是一个坏词，“局限”恰恰是一个中性词，在有的时候他甚至是好词。我们分析“局限”这个词，谁如果不承认局限，那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不说真话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有局限，包括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同样有局限，包括华盛顿这样的伟人同样有局限，包括孔子这样的圣人同样有局限。除了谁没有局限？只有神没有局限，但是人不是神，神大家又见不到，所以人都是有局限的，那么人所创造的一切也都是有局限的。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当年发现了相对论，物理学上的重大发现，重大突破，今天都已经被物理学界轻轻的超越了，任何的科学发现都不是终极，因为在你的后面若干年以后，有人都会超越你，这就是局限。就像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不能超越顶上的天花板一样，这就是局限。不承认局限意味着夸大自己，膨胀自己，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中都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想，那一代的人，无论是哪一个派的人，最后能够殊途同归，承认现实，最后能坐在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已经有了一种比较好的局限意识。他们意识到了人的局限性，意识到任何政治力量的局限性，没有一家通吃，没有一家全赢的心态，愿意坐下来对话。所以中华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民国，是谈出来的民国，是对话对出来的民国。这在中国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迄今为止所无的。我非常肯定这样的一种结果，因为这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但是一件事它产生了就很可能成为一个传统，让未来的人可以去效仿。因为在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当中，最坏的结果，最坏的事情就是流血过多，死人过多。我们过去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尤其是我这一代人，60年代后期出生的，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流血流的越多，这个革命越光荣，因为牺牲了几千万先烈的生命，这是何等的光荣，用鲜血涂红我们的旗帜，这是何等的美好、光荣。但是今天我岁数越大，我越认为流血越少的革命，流血越少的改革，越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尊重人性。人的生命是不可复制的，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要求另外一个人去牺牲他的生命。

所以在革命当中，如果能减少流血，减少牺牲，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看为宝贵，把每一个士兵的生命都看为宝贵，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族群，就是一个好的族群，是一个文明的族群。所以我想辛亥革命死的人少，就是中国历史上革命当中的一个美好的范例。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结果，靠的不是某一种政治力量，既不是靠革命派单方面的努力，不是靠立宪派单方面的努力，也不是靠北洋派单方面的努力，而是靠三派之间的相互妥协。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来看清朝末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今天我们看起来100年前的中国是何等的糟糕，列强环峙，民不聊生，国力衰弱，好像4万万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如果我们了解真实的历史，其实没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严重，当时的中国农村基本上还是典型的刀耕火种的农业社会，温饱基本没有问题，城市开始出现了工商业，已经在发展起来了，有了新式的企业，新式的银行，新式的商业。更重要的是，经过晚清以来，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外国入侵的冲击，大清王朝已经非常的衰弱。因为清王朝衰弱的，所以他要寻求出路，这个出路就包括他主动地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改革。政治制度改革所走的步伐是我们有史以来走的最快最大的。我们今天回望110多年前的戊戌变法，知道那103天当中光绪皇帝发了103道诏书，雪片一样的飞往各地，

其实大部分都没有得到执行。唯有留下了一个遗产，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当时叫京师大学堂，只有北京大学是戊戌变法的产物。

但是，在 1900 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慈禧太后过了一年多才能够回到北京城，她在路上就有反省，她在路上就有忏悔，她在路上就以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罪己诏”，就是批评自己，反省自己，对不起老百姓。进了北京城以后，就开始主动的实行新政，也就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到了 1903 年以后慢慢推开，到了 1905 年以后渐成高潮，甚至把 1300 年的科举制度都废除了，1300 年的科举制度说废就废，一句话，一道诏书，一个晚上，这是一件大事，诸位，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今天千万不能小看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的震撼，从隋朝皇帝开科取士以来，除了元代短期的断过，1300 多年，中国人一直是靠这一条科举制来维系整个制度。因为它的大部分官僚都是从这个制度选拔出来的，中国读书人也剩下了唯一的一条道路，学成文武艺，迈入帝王家。走科举的道路，从秀才、举人、进士，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去。

这条制度对于维系当时的整个政治格局，政治制度，中国的文化伦理价值，几乎是根本性的，慈禧太后说废就废了。所以前几年有一次我碰到一个河北的中学校长，一个很有名的，在石家庄附近带了一所有 9000 名学生的名校的校长，他在火车上跟我碰到。他就大骂慈禧废除科举制，假如不废科举制，清朝不会垮，我们今天都还生活在大清王朝之下，过着安稳的生活。就因为慈禧把科举制废了，所有的读书人没有活干了，一下子没有出路了，这些人全反了，所以清朝才垮了。他说的话倒不一定全信，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出，科举制的废除确实对中国的震动非常的大。所以我们想，晚清新政的步伐是很大的，连科举制都可以废掉，不要了。科举制废掉不要，意味着他整个干部选拔机制都要动摇了，整个的机制都要变革，原有的一切都要变化。接下来他所迈的步伐要远远超过他亲手镇压掉的戊戌变法的那些纲领。

从废除科举之后，慈禧太后推出的一系列新政都超过了光绪帝在 1898 年想做的那些事。比如说，1906 年 9 月 1 号颁布的那一道《预备立宪诏书》，她宣布立宪，要把国事公诸舆论，最后要建立一个国会，要把皇室的权利缩小，让国会来约束皇帝的权利，这一切都是在 1898 年想不到的，不到 10 年，慈禧太后做的比光绪帝当年还要激进，这是我们今天也比较难以想象。在这个过程中留下来的最主要的成果，政治制度变革的主要成果就是在各个省成立了一个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这个咨



清末立宪运动时期官制改革后的官员。资料图片。

议局在当时中国 22 个行省都已经成立了，除了新疆、西藏没有看到。但是我在 1910 年一个英国记者到新疆旅行的时候拍的照片上看到了，新疆虽然没有选出议员，但是新疆也挂出了牌子，新疆挂出了新疆咨议局的这一块牌子，我不知道选举有没有选，但是牌子都有了，远到新疆都有了。

咨议局这样的一种新生事物，今天看来我们觉得没什么。但是在清朝末年，1908 到 1909 年的中国，100 多年前的中国，那是绝对的新生事物，那是由老百姓自己投票选举出来的议员所组成的，可以来监督政府，可以对政府的预算指手划脚，对政治的施政评头论足，这样的地方议会。所以在很多的地方，像江苏、浙江、广西都曾经发生矛盾，官方和咨议局之间发生尖锐的分歧、冲突，造成了江苏咨议局的局长，也就是议长张謇带着咨议局的常驻议员，曾经以辞职来抗议。因为当时的两江总督张恩俊不服咨议局对他们的监督，对他们的这种制衡，矛盾都发展到这种程度。那么在中央这一级也产生了相当于现在全国人大的机构叫咨政院，咨政院分成几部分的议员，

一部分叫清选议员，就是皇帝所选定的议员，是派出来的；另一部分叫民选议员，就是由各省咨议局选出来的，已经具备国会的雏形。尤其是地方咨议局的选举，我仔细看了一下咨议局的选举条件，他说凡是由受过中学堂或相当于中学堂学历的人，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就着科举功名的，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还有一个条件是家里有 5000 银元的营业资本，或者纳税 200 元以上的具有选举资格和被选举资格。还有其他的就是年龄和居住年限方面的，当然都男人，女性是没有资格的。它的限制条件里面，我仔细地琢磨一下，其实就是两条：一个是受教育程度，要达到中学毕业，才能成为选民或者候选人；第二个其实就是家里要有一定纳税或者一定的财产，这个就是中国人讲的不恒产者无恒心。也就是说限制的条件主要是财产和教育程度。

我们看国外的例子，其实也都是这样，我们知道美国 1787 年建国，就是有宪法，开始选总统。那个时候具有选举资格的人都是要具有一定纳税金额的成年白人男人，这个就是限制条件。白人男子也不是所有人都具有选举权，黑人不算，女人不算，这个过程是一路一路慢慢被打破的禁区。到了后面所有的白人男子，无论是纳税多少都有资格选举，到 19 世纪。再到了 20 世纪中叶，所有女性只要到年龄也都具有选举资格。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才开放到黑人具有选举权。但是美国走完这个过程其实是刚刚走完，一直等到具有黑人血统的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美国才成了所有的到法定年龄的男女都具有选举权和被选，这一步也横跨了好几百年。

英国的例子也一样，因为英国的民主化进程比美国开启的早的多，英国是一个更古老的国家。我们知道 1215 年英国就有大宪章，到一六几几年的时候，它有权利请愿法，它整个的过程一步一步走过来，到了女性都有选举权，也是到 20 世纪，可能有 600 年到 700 年的过程。总的来说没有发现一个古老的国家，有历史的国家，在一开始启动选举的时候就是一步到位，所有的人都具有选举权。

所以中国在他的最早期的开放选举当中，做了一些财产、教育程度的限制，其实是世界通例，是一个正常的行为。这次选举正式登记的选民只占了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千分之四，一千个人里面只有 4 个人参加了选举，所以人是很少的。但是所选出来的人平均年龄 43 岁，议员的平均年龄被选出的是 43 岁，所有的人都受过旧的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或者受过新式的教育，有很多人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总体的教育程度都很整齐很高，代表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精英，是大家没有异议的，选出来的结果是社会公众所认可的，他们的表现今天看来也都是站得住脚的，也就是为选民所划的。为什么选民人数会这么少？只占总人口千分之四，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有一条财产限制，有把很多人挡住了，为什么挡住？不是你家里没有 5000 元，有，但是我不登记。中国人不是说钱财不能露白嘛，我登记了人家不就知道我家有钱嘛，我宁愿不参加选举，我也不能让你知道我家有这么多钱。所以去登记的人其实都是按教育程度去登记的。

因为他这几条限制条件里是这样的，只要你够一条就可以去了，他不是说你要具备这 4 条，这样的人太少了，家里既有钱，又有学历，这样合在一块的人是很少的，所以他只要够一条就行。就像教育程度也提供了两个选项，或者是受过新式教育，中学以上，相当于中学，这个口子就很大了，只要有教育机构，只要有资格证明证明你相当于中学学历你就可以去了，弹性还是很大的。所以一般去参加选举的人都是因为教育的这条指标合上去选的。

晚清中国咨议局的选举这件事就可以告诉我们，在这一轮的大变革当中，慈禧太后虽然当时她推动改革的动机是保住她的大清王朝，但是客观上的结果是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 100 多年前，慈禧太后恐怕不是一个什么好的政治家，但是在那个阶段她确实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张謇这样的立宪派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冒出来的，因为有选举作为他们的一个合法的途径，中国的立宪派几乎在各个省的选举当中都获得了胜利，成为了议员，然后他们之间相互串联，相互认识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成立了很多的横向组织，什么咨议局联合会之类的组织有好几个。所以从 1909 年到 1911 年之间，他

们发动了至少 3 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国当时新兴的工商业阶层、读书人都卷入了这个国会请愿运动，要求皇帝，要求朝廷早一天开国会。在这一场国会请愿运动当中，就慢慢的凝聚成了一个立宪派的核心，就是以张謇、汤寿潜这些名流为代表的，就成了立宪运动的中心人物，有了一些全国性的影响力。

那袁世凯在这个过程当中起了什么作用呢？他基本上是赞成立宪，他愿意中国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中国当时的中上层社会，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基本上都赞同走立宪不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所以我们看 1911 年辛亥革命发生以后，为什么革命派会愿意和立宪派、北洋派坐下来谈出了一个新的民国，而不是跟他们打出一个全新的民国。谈出来的民国一定是不彻底的，半新半旧的，因为没有把那些力量从肉体上消灭掉，他们还存在，存在就有问题，是因为当时整个的民心所向，君主立宪制是更大的主流。把清朝连根拔起不是当时的主流，改革是民心所向，革命只是部分人所向往的。

即使在低层社会，我们看鲁迅在《阿 Q 正传》之类的小说所写的，像未庄，当然是鲁迅虚构的，就是绍兴的某一个村庄，阿 Q 这样的人或者阿 Q 身边这样的人，吴妈这样的人，他们其实也不赞同革命，因为他们也根本不知道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也只是革命派少数精英们所推动的，跟君主立宪相比，他们的力量要更弱一点。所以等到革命之事已成，革命派发现他们所面对的局面，驾驭局面的能力是很脆弱的，尤其是最关键的一条，他们在财政上解决不了，他们的军队筹不到足够的军饷，要打仗，继续北伐，就要有足够的军饷，让部队打上北京，但是这个很难解决。所以最终大家的力量都有限，有限的力量面对有限的力量就只能坐下来谈判了，你也吃不掉我，我也吃不掉你，那就不能拼杀，只能妥协，只能三赢，而不能一家独赢。

最后他们所实现的结局，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互动的结果。这个互动我给它一个词，它算不上是良性互动，当然也不是恶性互动，而是一个中性互动。其实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往往都是中性的结局，就像很多的词汇，都是不带有色彩的，都是中性词，就像所有的人当中，从观念来说大部分人都是中间的道路，中间的思想，任何时候其实都是这样的。只不过是这一面的人或者被那一面的人裹挟着走。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很幸运，这三派力量都没有足够大到把其他的力量吃掉，所以他们就坐下来对话了。这个对话就是教科书告诉我们的“南北和谈”。北方袁世凯派出的代表是唐绍仪，南方派出的代表是伍廷芳，两个都是有美国教育背景，都曾经在美国做过公使，非常熟悉西方，非常了解西方。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都是广东人，他们都是广东人，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也都是广东人，广东人大家在一起好说话，这是广东人与广东人的谈判。



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举行，图为全体代表合影。资料图片。

那个时代还没有录音，所以我们今天无法知道唐绍仪和伍廷芳在上海谈判的时候是不是用广东话说的，也许是用英语说的，因为他们的英语都非常好，他们的英语都已经跟母语一样的好，而且他们的谈判是在租界里面谈的。我看到一个材料，为了保护唐绍仪，租界当局提供了好像是 60 个印度的巡捕跟着他，保护他，保镖，所以英国人也是很出力的，非常希望中国能够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因为这次谈判是面上的谈判，大家也都有所知，我不多讲。我想讲的是，其实在这个谈判的背后

还另有一个谈判，就是我们以前不太知道，不太留意的，“南北和谈”背后另外一个南北和谈。这个南北和谈是表面上的，是伍廷芳与唐绍仪在谈，另外一个谈判也是南北和谈，但是是军人和军人在谈。北方派出的代表叫寥

雨辰，是北洋的一个军校的校长，南方派出的代表是黄兴任命的一个代表叫顾中琛，本来这个顾中琛叫顾中深，黄兴写任命书的时候写错别字了，把这个深字三点水写成了王字旁，就变成琛了，所以顾中深在历史上消失了，顾中琛就在历史上出现了。当时在谈判的时候，寥雨辰还笑话过这个顾中琛，说这是为我们这一段南北和谈留下一段佳话，名字也写错了。那么这两个人的谈话，某种意义上带有更大的实质性，是军队跟军队的代表在谈，他们谈成了，其实基本上就谈成了。所以我把前面的那个南北和谈叫“文和谈”，后面那个叫“武和谈”。

这个武的和谈就决定了三派殊途同归，寥雨辰和顾中琛最后达成的 5 条协议，今天看来这 5 条协议就决定了中华民国的诞生，决定了清朝的垮台：

第一条，建立共和政体，就决定要抛弃满清王朝。

第二条，明确写明本来北方主张推袁世凯为大总统，但是南方不同意，怎么可以把某一个人的名字写进这样的协议呢，反复的讨价还价，最后达到了这样一条妥协的协议：先推翻清廷者为大总统，谁先把清廷推倒谁做大总统，那肯定是袁世凯，袁世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可以把清廷逼下来，其实上就确定了袁世凯要当总统。

第三条，满汉南北将士凡出力者一律优待，不予追究。这是为什么呢？北方的将士怕共和达成之后秋后算帐，他们把汉口烧了，杀了很多，怕南方最后会对他们不客气，所以他们特意关照要写上这一条，南北满汉将士凡出力者一律优待，不予追究，以前的事既往不咎。

第四条，要建立国会，恢复各省次序。

第五条，优待清廷，清廷虽然要把它推倒，要创立共和体制，但是要优待清廷，小皇帝还是要优待于他，这个就是后面达到的条款，每年给他 400 万两白银，然后让他继续居住在故宫和颐和园两处。这个达成以后，清朝其实就结束了，但是这个签字的时候是 1911 年 12 月 17 号上海，清朝在这个后面还挣扎了将近 2 个多月，为什么将近两三个月呢？清朝哪知道北洋军早就跟南方革命党人达成了这样的条款，它不知道，所以他们还在那里继续地讨价还价。最后一等到段祺瑞带了 47 个将领，10 万部队联名写了一个折子给朝廷，说必须得退位，赞成共和，要不然我们就上来了，要用军队来解决了，以武力逼宫，最后朝廷没戏唱了。那时候的朝廷是孤儿寡母，宣统皇帝只有 3 岁，什么事也不知道。我们看傅仪写的《我的前半生》，里面讲他退位的事情，大概都是后面听说的，因为他那个时候还不记事，在龙椅上还撒尿。

隆裕太后也是一个已经平庸的太后，不像慈禧，面对这样的内外交困，面对袁世凯那种层出不穷的诡计，她根本招架不住。袁世凯是一个善于使用权谋的，一世之奸雄，谋略极高，曹操式的人物。他的逼宫手段也很高明，他把太后身边的那个最宠爱的太监，小德张收买了，让小德张每天都在太后的耳朵边说革命党人如何如何的强大，说我们打不过他，讲这些话，然后说我们只有主动的把王位交出来，我们才能保证安全，每天都吹这个耳边风，让这个太后怕。同时又花大价钱收买满洲的王公重臣，就是说你们赞同退位，我给你们好处，以后我来保护你们的安全。这样造成太后开王公大臣会的时候，主张继续跟南方打仗的人也只有两三个人，大部分的人都赞同我们退位算了，保命吧。而且当时满洲贵族，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也确实到了极为不堪的地步。

举一个例子，武昌起义以来，朝廷都要垮台了，袁世凯逼他们出钱，除了隆裕太后自己从宫廷里面拿出 8 万两黄金，这当然是一笔大钱，那些人都不肯出钱，那些家里最有钱的，那些贪污，家里都有几十万两白银的人，都只出十万两，出一点点，都不肯掏钱，一个比一个要吝啬。在朝廷都保不住，人头都要落地的情况下，他们把钱财仍然看的比什么都重要。就是这样的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面对危机、面临挑战的时候，确实一败涂地，不

堪入目。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清朝垮台时那些掌权的集团，那些太子党们，那些王公贵族们，那些满洲子弟，真的只剩下了一件事，会托一个鸟笼遛鸟，别的啥也不会。一不会打仗，二又不愿意出钱，你还是干嘛。不就两件事嘛，危机关头出钱、出力嘛，出不了力就出钱啊，出钱又不肯，出力又不会。当时他们所有的军权几乎都掌握在满洲人手里，所有的重要岗位都在他们的手里。满洲的王公贵族开政治局的会议，坐着一桌子，汉人只有一两个，都是满洲人，都是王室的。

荫昌在德国学过陆军，没有打过仗，纸上谈兵，他是陆军大臣，就是派他第一个出来到武昌镇压武昌起义的。临行的时候，太后问他，荫昌你这个仗准备怎么打？他说回太后，我从来没有打过仗，我也不知道怎么打。就他来带兵打，那怎么打。而且闹了一个笑话，兵到湖北的交界的武胜关，发现有些是带了炮没有炮弹的，有些是带了炮弹没有带了炮的，就这么一个军队，所以就在那里等了 20 天，就在武胜关足足等了 20 天，等那个炮弹运过来，等这个炮筒运过来。这 20 天南方好几个省独立了，湖南独立了，九江独立了，广西独立了，陕西响应的，山西响应了，这个火到处都点起来。假如没有这 20 天，真的是胜负之数还难说。所以有时候你看那样的一个朝代，他不垮才怪，他一定要垮，他也撑不下去了。因为那一批人，当时的参谋总长，也就是军资大臣载涛，26 岁，你能想象吗？一个 26 岁的人坐一个全军的总参谋长，他懂什么啊？他不就是因为他的血统里面留着爱新觉罗的血嘛。就凭这个血统他当这个参谋总长，他当然不会打仗了，这些人都是这样。所以最后他们被迫起用曾经想要杀掉的袁世凯，袁世凯是北洋派的灵魂，所以袁世凯就掌握了决定清朝命运的钥匙。如果不是清廷这么没用，袁世凯已经被消职回乡了，已经不在位置上了，根本没有他的事。那么最后他们能够谈判达成这样一个妥协，创立中华民国，袁世凯也承认要建立共和这个事，到 1912 年 2 月就全部解决了。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样的一幕，1912 年冬天到 1913 年的春天，中国完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的全国国会参众两院的直接选举。这次选举是继 5 年前地方咨议局选举之后的一次全国性的大选，这次选举由 4 个不同的政治党派参加，还有无党派的跨党的人参加，都是民间推出的候选人。从选举的人口比例来看，比咨议局选举要扩大很多，有 10.4% 的人口参加了选举，虽然还是少部分人，但是这个面积要扩大了很多，当时也不是说没有限制条件，有，仍然是教育和财产方面的限制。但是在财产上降低上很多，家里拥有 500 元的不动产，或者每年缴纳的直接税 2 块银元的，都有资格参加选举，比那个 5000 要降低了很多；还有一个就是教育程度，教育程度也降低了，以前不是讲要中学堂或者相当于中学，这次降低到小学或相当于小学毕业的人就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样的话中国就有 2400 多万人参加的选举，占当时人口比例的 10.4%，选出来的国会议员年龄比上一次也降低了很多，平均年龄 36 岁。那么年轻的一批国会议员，800 多人，当时号称 800 罗汉。当时也不是说所有的省份，所有的地方都没有任何贿选，也有，也有人买票，但是只是支流，不是主流，大部分的地方选举都比较正常。

我们今天听起来好像很难，选举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其实说选也就选了，因为这个选举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进行，是划分选区的，也不是中国人民都到北京天安门去选举，那当然挤不下去。武汉就在武汉选，而且也不是都到阅马场去选，你可以在南湖这里选的嘛。你选的人也只是到你这里来宣传过，你看到过的几个不同党派的候选人，肯定都要来跟你见面的，你觉得哪一个长的漂亮一点，你就投他就行了。马英九最帅，马英九当总统，他肯定有一个标准嘛。女性选民一般是看哪一个长的帅一点投哪一个，男性已经理性一点，就看谁讲得好一点就选谁。就像美国人，他选了那么多年，他不还选奥巴马嘛，奥巴马不就帅气一点嘛，所以选举有时候是比较感性的。选举不是选优，尤其不是选最优，选举是淘汰劣，选举是淘汰最劣的。

这就是选举的基本规则，凡是正常在选举中产生的人，他不一定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最精英的人，但他一定不是最次的那个人，信不信？因为他是选出来的，大家的眼光总是亮的，所以能够选出来的人一

定不是最差的，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那个阶段的选举当中，4个政治党派：国民党、民主党、统一党、共和党。后来选举的结果是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拿到的2/3的席位，这个主要是国民党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其他的党派，重新组成的一个新的党派，当时带有革命的合法性，同时他的领袖人物宋教仁又是中国现代政党制度的一个推手，所以他对推动中国这一轮的宪政民主的过程中起很大的作用。当时宋教仁回到了湖南的老家桃园，然后从桃园出来到了长沙，从长沙出来就到了武汉，从武汉一路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到安徽，到南京，到上海，到杭州，一路演讲。1913年的春天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道非常灿烂风景的就是宋教仁，今天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宋教仁旋风”。因为这样的一幕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昙花一现的一次。宋教仁一路演讲，批评袁世凯政府施政不得当，提出他的政治主张。如果说国民党执政，成为两院的都督，他们组成的内阁会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主张，在经济上怎么样，在外交上什么样，内政上什么样，一系列的主张，倾倒了当时中国中产以上的阶层。

所以朝野上下对宋教仁都是仰望星星一样，宋教仁曾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明星，类似今天的奥巴马在世界上的那种灿烂。那时候没有麦克风，所以我想他讲话一定很吃力的。据当时的报纸所摘，他所到之处都是人头攒动、万人空巷，很多女人本来是不能出门的，但是因为要去看宋教仁演讲，那个时候去看不是叫听演讲，因为你事实上是听不见的，因为你站在后面就听不见了，你只有在前排才能听得见嘛，所以叫看演讲，不是听演讲，看

也是很远的地方去看。所以宋教仁他的贡献，我们中国后面其实也没有足够的评估，因为我们这条路没有继续下去，民国的路在以后就中断了。百年痛失一人，这个伤痛至今未愈，因为宋教仁很快就被暗杀了。我们不知道宋教仁到底是被谁暗杀的，以往都说袁世凯把他杀掉了，袁世凯是他的最大政治受益者，袁世凯扼杀了宋教仁，袁世凯可以完成他的独裁的大梦，最后可以做皇帝的梦。



宋教仁是最早也最为坚定地否定孙中山“做事近于专制跋扈”的第一人，同时也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宋教仁被暗杀，民国的方向被逆转，转向军国，军国又被党国所取代。资料图片。

我以前也很相信，甚至也非常相信，因为一直都这么说，从来没有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就想，袁世凯真是一个坏蛋，竟然把这么好的宋教仁给杀了。但是岁数越大，读书越多，我就越不相信这就是一个命定的答案，就像很多的历史我们都要继续去寻找真相一样。袁世凯到底是不是真的杀了宋教仁？今天看来，结论也不能下的太绝对，因为我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比如说是革命党人内部杀死了宋教仁，因为宋教仁太红了，太灿烂，他的光环遮掩了孙中山。那么那些忠心追随孙中山的死党，比如说陈英士会不会动了杀机，因为当时的报纸上有些是这么登的，是陈英士杀的宋教仁。因为杀宋教仁的那把手枪上刻了陈英士的名字。这把手枪是宋教仁送给他手下的

特务科科长（那时候叫电报科科长）应夔丞的。应夔丞曾经做过南京总统府，孙中山手下的总务科长，因为贪污被孙中山赶走的。他又做过上海都督府陈英士的电报科长，是陈英士把他派到南京去保卫孙中山的。他有这么复杂的背景，这把手枪是陈英士送给应夔丞的，应夔丞交给一个小流氓叫武士英，武士英开枪打死了宋教仁。

所以当时有些报纸上说是陈英士杀死了宋教仁，但是更多的证据说武士英受应夔丞的指示杀死宋教仁，但背后的指使者是洪书祖，内务部的一个秘书，洪书祖的背后是内部总长，当时是国务总理的赵秉钧，特务头子赵秉钧，因为有一条证据指向了赵秉钧，但是只有一条证据是孤证，在法律当中也是孤证，在历史当中当然也是孤证了。所以这都是历史不同的可能性，历史的可爱就是这样，他有很多不同的线索，拉起这条线索就是一串，拉起另外一条线索又是一串，他呈现了不同的可能性，它有很多丰富的层面，让历史都永远都无法穷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要的只有一件东西，就是真相，真相比结论更重要，我们需要的是不断地向真相靠近，而不需要一个现成的结论，任何事情都一样。因为宋教仁之死这件事太大了，大到影响了我们的今天，影响了整个的未来。

1913年的春天，3月20号，上海火车站一声枪响就把整个中华民国打穿了一个洞，晨光熹微的民国被打破了，从此民国就不安宁了。民国向军国转型，这一枪是一个关键环节。首先选择暴力的是孙中山，不是袁世凯。但是袁世凯抓住了这个历史机会，大家知道袁世凯是练兵起家的，他最熟悉的不是谈判桌、不是国会，他最熟悉的是暴力。你使用暴力他最开心，因为暴力是他最熟悉的东西，你不使用暴力他还没有机会首先使用暴力，你一动武他就更加高兴了，他马上就用比你大的武力把你吞掉。所以历史又一次逆转——从三派同源、殊途同归，用和平方式共同造成的一个中华民国马上就逆转，以后的方向就往暴力的方向逆转。把中国再一次扭回到用暴力决定一切的道路上去，以后的历史都用暴力来决定了。

南北和谈以后虽然也有过谈判，但再也不会结果了。我们知道1919年也有一个南北和谈，但是没有成功，什么也没有谈出来。1919年之后的中国更不会有，虽然也有过，但都失败了。所以我想中国的历史，民国的出现是峰回路转，是往开阔的道路上转的关键一环。宋教仁被杀，又是往狭窄处转回去的一环，一个“之”字型，历史就是这样，因为历史从来没有直线。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各国历史，比较好的，顺利的，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美国的宪法自从创立以来没有动过，只有10条修正案，很稳定，中间虽然有过一次南北战争，但是它的内部基本上没有问题。本来日本也很好的，明治维新以后一直比较稳定，但日本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他的道路走的也不顺。中国出现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本来是中国往人类文明比较高的点上攀上去的一步。但是这一步因为宋教仁之死又被逆转，假如宋教仁不死，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但历史不能假设，我们这个假设是一种非历史的假设。他不死，他那一天要去干什么呢？他那一天要坐火车到北京，国民党已经获得大选的胜利，他是多数党的领袖，他要到国会做那个总理，组织一个政党内阁，就是内阁的各个部长都是由国民党人来担任。袁世凯虽然仍然是总统，但是袁世凯这个总统是受到内阁约束的总统，因为袁世凯所有的大总统令必须由内阁复述才能够生效，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虚位的元首，实权在内阁。这样的格局就是一个民主宪政的格局。如果有这样的格局，袁世凯之后是不会发生北洋军阀混战的。北洋军阀要竞争政治上的地位，也必须在这条轨道上，也必须在这条已经设定的制度框架里面来竞争。

所以宋教仁在武汉曾经说过，他说过去我们是革命党，要拿出铁血的精神去跟敌人拼命。今天我们是普通政党，从革命党往普通政党转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你不能永远的都做革命党的。革命都已经结束了，你这个革命党要变成一个普通政党。今天台湾的国民党已经从一个革命党转型为普通的政党，是可上可下的，已经完成了政党轮替了。他说今天我们是一个普通政党就拿出政见去跟我们的政敌竞争，这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第二段话，宋教仁说作为一个普通政党，进而在朝，也就是说在选举中获胜，坐在执政的位置上，我们就可以实行

我们的主张，推行我们的政见；退而在野，选举失败，我们成为在野党，我们就监督政府，使政府有所惮，就是那个惧怕的惮，而不敢任意妄为。这两段话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现代政治的基本准则。宋教仁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今天台湾也已经实践得清清楚楚。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宋教仁的理想已经在台湾开花结果，宋教仁没有看到。但是他今天可以稍稍的有所告慰了，因为他那一套主张，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在一个局部已经变成现实。

回到我们前面的三派上来，之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宋教仁被暗杀，民国的方向被逆转，转向军国，军国又被党国所取代。我们今天如果重新追溯往事，要去找教训的话，甚至不能怪任何一派，单方面地去怪。既不能说是袁世凯一派造成了这个历史的后果，也不能怪孙中山这一派，也不能怪张謇、梁启超的立宪派。但是他们三派同样都犯有不可饶恕的错误，或者说都有不可原谅的缺陷。

先讲梁启超的缺陷，假如说在民国成立以后，梁启超在流亡了16年以后回到了中国，他能够看清楚时代，看清楚政治变局的方向，能够做一个独立的政治家，做一个独立的反对党领袖，在野党的领袖。或者做一个不参与政治的，独立的政治评价家，独立的知识分子。不是把一只脚踏进袁世凯的房间里，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假如说张謇，他当时是中国最有声望的实业家，一个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的，资深的不在朝的政治家。所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孙中山一开始选择他做财政部长，他坚决不干，于是孙中山才任命他做实业总长，当然他几个月以后就辞职了。但是当袁世凯把孙中山击败以后，孙中山再一次流亡日本，张謇完全可以选择退出政府，

在南通办他的企业就行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到北京去做官就意味着对袁世凯的支持，而这个时候他恰恰接受了袁

世凯对他的任命，当上了农商总长，就是农业部长加工商部长，合在一起叫农商部长。张謇、梁启超作为立宪派

的两个主要领袖，这个时候的选择对于袁世凯轻而易举的击败革命派，当上中国头号专制的总统，进一步要去称

帝，其实是为他铺平了道路。

再说革命派，革命派也不是什么责任都没有，我们前面讲，我为什么说也不能排除陈英士杀宋教仁的可能性，至少嫌疑有。倒不是说那把手枪上有他的名字，如果那样他更可能摆脱关系，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拿一把上面刻着自己名字的枪，叫别人去杀人，那不是卖了自己嘛，所以这个不能作为证据。我的证据是一个旁证，比杀宋教仁更早。一年前中华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号陶耳山人，汉族，浙江会稽陶堰人。少有志向，以排满反清为已任。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太后未果，只身东渡日本学习陆军，参加组建光复会相关活动。1911，为广州起义、上海起义的主要组织者，率部攻克南京。又积极准备北伐，设北伐筹餉局、光复军司令部，任总司令。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第14日午夜，上海都督陈其美派人将陶成章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年仅35岁，他没有死在清政府的屠刀下，却死在党人的枪口下。资料图片。

民国在南京刚刚诞生，陈英士就派蒋介石杀掉了光复会的头号领袖陶成章，这件事已经在历史上没有争议了，已经铁板定钉，蒋介石都承认了。蒋介石现在解密的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已经看到了。蒋介石说我当年把陶成章杀掉，这件事总理（他说的总理指的是孙中山）从未跟我说起。但是他说，我私下认为，我之所以成为总理选择的接班人，总理之所以信任我、重用我，很可能跟这个有关。他认为政治领袖就需要那些体会领袖的心意，领袖说不出的话，你去做，领袖心里开心。因为陶成章是孙中山的仇人，陶成章曾经用非常尖锐甚至过分的言词在日本攻击过孙中山，而且陶成章是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的领袖。光复会从来没有合并进同盟会，只是以个人的身份参加过同盟会。

所以当孙中山受到陶成章攻击，陶成章又另立门户，推章太炎做精神领袖，恢复光复会的独立活动，光复会在长三角地区的影响又特别大，能够把杭州拿下，上海拿下，甚至南京拿下，光复会的贡献很大。又有军队，是实力派，陶成章又很吃苦耐劳，很能干。所以他们很担心革命的正统将来会发生问题，与其这样不如早下手为强，先把他杀掉。所以趁陶成章在上海广智医院养病的时候，蒋介石带了一个杀手，深夜潜入。因为蒋介石讲宁波话和绍兴话接近，原来他们也认识，地方都很近，奉化西口和陶成章的绍兴很接近，他也见过蒋介石，所以蒋介石就顺利的进去，进去就把他杀了。后来有很多的证据都已经证明是陈英士指示蒋介石杀掉了陶成章。既然革命党人可以干出杀革命党人的事，所以下一次的暗杀也未必就完全洗脱了嫌疑，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证据。这一些都是历史当中留下的疑点，埋下的伏笔，需要后世的人去澄清的。

再说宋教仁死后，国民党在国会依然占有多数，宋教仁死后，民国的司法独立仍然没有问题，所以上海的检察厅发出传票，传国务总理赵秉钧到庭作证，你能想象传总理吗？总理就算真杀人你能传他吗？不可能，更何况这是嫌疑。所以那个时候的司法独立没有受到大的伤害，国会也没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合法的途径，合并的体制内框架，对袁世凯的那种制衡来解决宋教仁问题，没有走到尽头，至少还可以进行一段时期。但是孙中山非常着急，在第一时间就决定要跟袁世凯摊牌，要武力对抗，要用南方的武力跟袁世凯叫板。这件事实际上就逆转了整个民国的方向，让袁世凯用武力。所以总体上看革命派也不是没有责任，立宪派有责任，当然毫无疑问袁世凯的北洋派有更大的责任，因为他是执政者，他是在位的总统，他掌握最大的政治资源，他是政治上最大的受益者，谁掌握的资源越多，这身负的责任就越重大，这手里的权位越高，所负的责任也越大，这是一个正比例关系。三派为这个历史的结果，今天看来都要负相应的应该负的那部分责任。

当然回过头来讲，我们中国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普通的中国人，像鲁迅笔下所写的那些人，我们同样要承担我们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因为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你自己的那一份，你可以做一个看客。我最近特别想鲁迅发明“看客”这个词其实不是一个坏词，以前我们一直用坏词来看待。到了今天或者到了哪一天，如果中国人连看客都不愿意做了，或者说欲做看客而不得，或者连看客都不想做，那才是危险。愿意去做看客去旁观、去看，至少还尽到了做看客的这一份责任。当然仅尽这个责任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做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所以我更强调在看客之外的那个词，叫群角，就是群众演员，跑龙套的，只有一句台词的，或者只有一个动作没有台词的，在舞台上出现的时候就是甲乙丙丁，就是无名者。无名者其实恰恰是历史中不可回避的一个环节，因为历史是由无数的环节构成的。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历史是大人物创造的，没有错，但是它同时也是小人物创造的，是小人物书写的。历史就像一张巨大的网，但是构成这张历史大网的由无数的网点、网节，一个节一个节，每一个人都是这张大网当中的一个节，一个环节出问题，可能整个的网都会有问题。我们回过头想一想，那个杀死宋教仁的小人物武士英算什么人物啊？他不就是上海的一个乞丐嘛，一个名不见经传，微不足道的一个地痞嘛，他当过兵，流落上海街头，生活无着，一个小痞子。所以才会被人家用几百大洋买通他杀人，他也不知道杀的是

谁，但是他开出的几枪就干倒了一个民国，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就改变了，你说小人物不重要吗？小人物很重要啊。

假如说武士英在开枪的时候良心发现，把枪打偏一点，不打中宋教仁的心脏，打中他的胳膊、大腿，可不可以？凭他的训练，他是职业军人出生，完全可以啊，历史不就改变了？宋教仁又没有打死，受了伤进了医院，治好了出来，那这个声望就更加的如日中天，中国的未来就是由宋教仁的道路所决定，那就不是孙文道路，不是袁世凯道路了，那就是宋教仁道路的，那是 3 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所以很多的时候历史很可能也是由小人物来书写的，的小人物在历史上何止万千，像武士英这样的小角色，但是同时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的小人物在历史上何止万千。所以说每一个人在他承受到了历史那个重量的时候，他只要稍稍的挪一下他的肩膀，也许历史就改变了。你不需要付出的太多，你只付出那一点点，你所能承受得了的部分，承受不了的你让别人去承受就够了。

所以从做看客开始，到做群角，跑龙套，每一个人其实都很重要。在上帝的眼里每一个人都是不可复制的，就像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上帝创造的奇妙就是这样，你去树上看任何两片叶子都不一样，就像你去世界上找两个完全相同的人，绝对没有。就像我们看外国人，好像他们长的都一样，外国人看中国人可能也一样，其实那两个人天差地别，性格不一样，智商不一样，情感不一样，受的教育不一样，很多东西都不一样，没有相同的人。所以每一个人都一样的重要，孙中山和武士英一样的重要，袁世凯和他的仆人一样的重要。我们知道罗马皇帝往往都是他的仆人干掉了，假如说袁世凯有一个仆人干掉了袁世凯，历史不就改变了嘛，很简单啊。所以其实放在历史当中，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重要。一个偶然就改变了一切，所以历史是由无数的偶然性构成的，无数的偶然加在一起也许它成了不偶然。但是最终无数的偶然还是有偶然，因为无数的偶然的偶然还是偶然，但是这个偶然的后面可能有不偶然，所以偶然、不偶然之间靠每一个人他的性格、他的教育、他的思维、他的生活去把握。历史就是写下来的，谢谢大家！



逝者

沉痛悼念谢韬同志



图为谢韬老先生追悼会现场，图片来源于网络。

编者按：2010年注定是思想明星凋落的一年，我们刚刚送走了朱厚泽先生，又传来谢韬先生去世的噩耗。谢韬，原名谢道炉，早年参加革命，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社总社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晚年的突出贡献是在公共领域重新亮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他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发表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以后，顿时成为中国大陆思想界一个时期的焦点。

为了悼念谢韬老先生，本期我们特别制作了“逝者”一栏，收录了一系列学者的相关纪念文章，并全文刊登了谢老的这篇闪亮之作——《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另外还刊登了谢老追忆李慎之先生的《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文，他和李慎之是上世纪40年代共同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老朋友，这篇文章，是谢韬对他和李慎之六十年的交往的回忆。

■ 怀念谢韬老

张博树

仇国运 八旬老者笔下生风 良知传四海
倡民主 一代名士肝胆之心 风骨昭日月

惊闻谢韬老仙逝，在慨叹岁月无情的同时，也自然回想起与老先生接触的一些往事。

谢韬先生是我所尊敬的学界老前辈。说起来，我和谢老还有一段师生情缘。那是20多年前，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时，谢老是研究生院的第一副院长。1987年，我们曾同乘一列火车到襄樊游览古隆中诸葛亮故居，后到湖南张家界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有机会向谢老当面对教，包括那个把谢老牵连进去的胡风案件。

时隔多年后师生再次见面，谢老已因他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名噪海内外。2008年9月21日，朱厚泽、吴明喻、辛子陵、林京耀、张显扬诸老齐聚北京国际饭店，商讨编辑、出版《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谢韬老也应邀出席。席间，谢老一口答应要为这本书专门写篇文章，一方面表达他对耀邦的敬意，另方面也借此机会阐发他对中国改革问题的一些新的思考。

过了一段时间，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和一位年轻助手去谢老家拜访谢老，讨论谢老提供文章的主题。记得谢老当时精神非常好，我把刚刚在香港出版的拙作《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送给他，老先生非常高兴，连说“‘从五四到六四’，这个书名起得好！”。接着，谢老谈起自己一生的经历，说“长寿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看了几个全本，包括民国时代蒋介石、国民党的全本，毛泽东当政的全本，也看了邓小平时期的全本”。老先生晚年写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这样的惊世鸿篇，显然不是偶然的，是一生阅历与思考的结晶。关于耀邦研究这本书，我们商定谢老这篇文章的主题将围绕执政党的组织转型话题展开。谢老已经就这个话题写过一篇短文，发表在第20期《领导者》杂志上，但言犹未尽，很想就此机会做一个更深入的探讨。谢老还索要了一些有关耀邦的资料，表示在访谈、写作前再做些研究准备。

我知谢老近来身体不是很好，这次谈话，本来想一个小时结束，但老先生精神状态极佳，与晚辈围坐沙发，侃侃而谈近两个小时。最后还是我不得不提议下次找时间再聊，才恋恋不舍地辞别老人出来。遗憾的是，后来再没能有这样促膝长谈的机会！

这件研究和写作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谢老就突发脑血管病住进了医院。幸亏抢救及时，当时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继续原来的写作计划显然是不现实的。有鉴于此，《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收录了谢老在《领导者》刊发过的那篇文章“共产党组织转型的思考”。这篇文章指出，共产党强调自己的“先锋队”性质，组织上奉行“集中制”和“集权制”，在政党组织形态上其实是极其落后的。“先锋队”理论完全不能适用于建设一个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开放的、群众性的现代政党。这样一个政党应该强调“民主”而不是“集中”，强调“分权”而



张博树，独立学者，著名宪政研究专家。1991年分别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曾长期任职于该院哲学研究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张博树先生专注于制度现代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学领域，近年来逐渐确定了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的研究主题，一直致力于中国批判理论的建构与20世纪中国制度现代化历史进程及经验教训的研究。

不是“集权”。谢老还以国民党为例，指出“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党，已经经历了从革命党到专政党再到宪政党的转变。1948年‘行宪’后，本来国民党就应当向宪政党转化了，由于在内战中失败，国民党先是在大陆后来在台湾实行了四十年‘戒严状态’，延误了组织转型。中国共产党要获得新生，也必然要走国民党走过的宪政之路。觉悟越早，转型越及时，对于党的未来发展就越有利。”——这真是一位老共产党人拳拳爱国、爱党、又企图去“救党”的肺腑之言！

我们本来都希望，谢老能早日康复，继续为我们这个民族展现他的良知，贡献他的智慧。但生命无情，谢老毕竟还是离我们而去了。知8月30日将在八宝山举行谢韬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张显扬先生和我相约，特致挽联一首，寄托哀思：

忧国运 八旬老者笔下生风 良知传四海
倡民主 一代名士肝胆之心 风骨昭日月

谢韬老，请一路走好！ T

■ 好人谢韬

肖雪慧

一“进城”就上万言书并因此罹祸，给自己招致多年牢狱之灾和牢狱之外的无休止苦难。能象他那样很快洞穿欺骗性的人不多——即使那些保留了思考能力的人，也大多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目睹了越来越多事实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热情和努力被导向的是什么样的结果；能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为遭受背信弃义的群体和派别说话的就更是少之又少。

三年前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谢韬。

说起来，谢韬是我的老校长。82年、8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期间，他正好是时任常务副校长。80年代，还来成都作过一次哲学演讲，我去了。他的观点明显跟官方哲学有距离，印象较深。但真正认识，是2005年底了。一天，应邀去学校，过去的系主任冯来电话说一位老人想认识我。她说了是谢韬。按约定时间去学校附近一个叫“老房子”的地方，到了才知道是谢韬85岁大寿。那天来人很多，但学界好像就冯跟我。卸任官员很多，都很高龄了，几个前任省委宣传部长也在场，聊起来，个个很开放，毫无沟通困难。我想，也许是经历了文革，痛定思痛，清楚问题在哪里；也许人老了，无所谓了……我相信还有很重要一点：毕竟他们当年不是冲着特权、冲着官民两重天的结局挤进去的，而是怀抱理想投身进去的，而那个向他们招手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把民主、自由的未来中国作为许诺的，这一点对知识分子有很大感召力。可后来的现实跟理想南辕北辙，仅此一点就足令人痛苦和反思。



肖雪慧，女，著名伦理学家、社会学家，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从事以伦理学为主研方向的广泛的人文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的伦理、社会问题及其对策，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在《中国改革》、《光明日报》、《南风窗》与《社会科学论坛》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百篇。除学术性著述以外，另有大量杂文、随笔、政论文，以伸张人道、民主、理性、人权。

这些人的个人素养也大不同于他们的后任，95岁高龄的马识途本人就是一个作家，刚上初中时就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那个时候，我很喜欢这本书。89年时，这位早已离任的省委宣传部长叱咤风云，发表演说、

书写文章，后来的情况就不说了。反正，传言很多。寿筵这天，他第一个当场挥毫写诗。诗的内容不记得了，但感觉不错。另一位副部长，是一位朋友的父亲，他说第二天在四川师大有个讲座，准备讲教育问题，想听听我的看法。对教育，我一箩筐不合时宜。我说，我的观点你不方便讲的。他说：“怎么不方便！”看样子还真想要放炮呢。第二天怎么放的，就不知道了。

寿筵聚会是彭真一位老部下张罗的，这天也是他主持。他的祝寿词《好人谢韬》，我至今难忘。从这篇祝寿词我才知道谢韬的经历：早年投身革命，权力易鼎后，对一系列针对民主党派、民族资本家的背信弃义、过河拆桥做法有看法，向毛上万言书，结果进了秦城监狱。如果没记错的话，据祝寿词，谢韬是秦城监狱关的第一个共产党。文革时期谢韬又被发配自贡，经历新的磨难。直到文革结束后的赵主政时期，赵点将启用，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黄金时代，谢韬按他所理解的大学，对这所带浓厚党校色彩的学校作了大手术、大换血。可以说，这所学校摆脱党校色彩并迅速在80年代的学术重镇中占有一席之地，谢韬起了关键性作用。

但最令我感佩的是他那段传奇经历。谢韬具有一种基于纯正理想的敏锐，而且为人正直，把所思所想毫无隐讳的说出来。正因为如此，一“进城”就上万言书并因此罹祸，给自己招致多年牢狱之灾和牢狱之外的无休止苦难。能象他那样很快洞穿欺骗性的人不多——即使那些保留了思考能力的人，也大多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目睹了越来越多事实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热情和努力被导向的是什么样的结果；能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为遭受背信弃义的群体和派别说话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但这位外表朴实、谦和的老人兼具不凡的见识和不寻常的勇气，是真正称得上思想勇士和当得起“高风亮节”四个字的那种很稀少的人之一。

“好人谢韬”——在谢韬身上，这个“好”字，回归了最本原的意义。 **T**

注：伯桥精舍30日留言指出这篇文章有误：上书的不是谢老，是胡风。胡风上书30万言，内中要引证许多马列的原文，他怕引文有误，所以，请谢韬帮他查证资料（谢当时是人大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于是被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高参，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5年发配回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监督劳动”，又是13年！

谢谢指谬。已打电话核实，是我记漏，所以一直认为这是不同于胡风上书的另一次上书。不过，胡风上书好像不涉及对民族资本家、民主党派的政策问题。这应该是谢老本人的意见。

■ 缅怀谢韬先生

丁东

谢韬也清楚，从理论上说，他的这篇文章仍有不严密之处。我听他亲口说，这篇文章主要意义不在学术方面，而是从政治方面表示一种取向，是对中国现实的发言。他们那一代人，年轻时向往民主，投身革命，支持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却尝够了专制的苦果。到了晚年，最大的梦想莫过于让国家重新走上民主的轨道。2010 年是中国痛失思想家的一年，春天刚刚送走了朱厚泽先生，夏天又传来了谢韬先生去世的噩耗。

谢韬先生是李慎之的老朋友，好朋友。如果说，李慎之晚年的突出贡献是在公共领域重新亮出自由主义的旗帜，那么谢韬晚年的突出贡献就是在公共领域重新亮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

过去人们只知道谢韬早年参加革命，1950 年代在马克思主义教学方面颇有影响，后来因牵连进胡风集团成为阶下囚，改革开放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等职，没有想到他在政治思想领域有巨大的能量。但他为辛子陵《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序言《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以《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在《炎黄春秋》2007 年第 2 期发表以后，却成了中国大陆思想界一个时期的焦点。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列宁、斯大林的暴力社会主义是“左”的修正主义。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谢韬的文章如一石击水，引起了左派的猛烈围攻，他们四处开会，连篇累牍，声讨谢韬。同时也引起许多主张革新中国政治的有识之士的热烈关注，他们对谢韬的文章或认同，或补充，或商榷，或发挥。中共当局既不愿意接受谢韬的主张，又不便公然与世界上诸多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政党为敌，于是采取了低姿态，在《人民日报》第九版发表答读者问，以示与谢韬保持距离。

谢老的文章说：“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最近，我到瑞典、挪威、芬兰、丹麦旅游，虽系走马观花，也深感北欧国家社会公正，政府清廉，生态良好，生活美满，民风健康，崇尚和平，处处居于当今人类文明的前列。联想中华民族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盲目追随列宁、斯大林所走的弯路，所尝的苦头，真是感慨万千。谢韬作为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规劝为政者告别列宁主义，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丁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直接组织了《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的整理与付梓；间接促成了韦君宜《思痛录》、黄万里传《长河孤旅》、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等著作的出版；参与编辑的《老照片》文丛和三册《大学人文读本》等等，都是文化含量相当高的精神食粮。

当然，谢韬也清楚，从理论上说，他的这篇文章仍有不严密之处。我听他亲口说，这篇文章主要意义不在学术方面，而是从政治方面表示一种取向，是对中国现实的发言。他们那一代人，年轻时向往民主，投身革命，支持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却尝够了专制的苦果。到了晚年，最大的梦想莫过于让国家重新走上民主的轨道。

谢韬成为公众人物以后，有朋友建议我们夫妇为谢老作口述史。2007年，我和邢小群曾为此事到谢老府上拜访。谢老表示，提出要采访他的人有好几个。接触了一下，有的历史知识不够，不合适。你们比较合适。他对我们说，最值得谈的是1950年代秦城监狱的经历。谢老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后，吴玉章力图保护他免受牢狱之灾，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力争，让谢韬在吴老家院子里住了一年，算是接受审查。一年后，官方还是要把他关进秦城监狱。据他的学生丁弘回忆，谢韬表示，不能叫吴老为难，我去坐牢！一坐就是七年。当时秦城监狱刚刚建成，共产党内的大批高级政治犯还没有产生，秦城就成了关押杜聿明等国民党高级战犯的场所。谢韬既是囚犯，又是国民党高级战犯的政治理论教员。谢老告诉我，和这些国民党将领朝夕相处，有很多生动的故事。谢老本来就是一个开朗达观的人，我想，这些往事经他讲出，一定十分精彩。但是，谢老又说，现在顾不上口述。现实的问题我不能回避，有些攻击不能不回应，把我的精力都牵扯进去了，最近正在赶写一篇文章，等过了这段时间再说吧。

以后，我和谢老在公共场合见面多次，也几次和他提起口述史的事，我和邢小群也搜集阅读了相关史料，但他都说再等一等，直到他去年脑溢血，彻底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口述历史的设想也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 要民主还是要专制——从谢韬文章谈起

胡平

本文作于2007年8月，文章虽久，话题不老，谢韬仙逝，经作者同意现转载于此，以示哀悼。

今年2月《炎黄春秋》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文章明确提出应该放弃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并且早已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晚年所放弃。文章还指出，以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已经被实践所否定，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例如瑞典模式）是成功的；中共共产党应当把自己转变成社会民主党，中国应当走民主社会主义之路。

谢韬的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争论。一些专家学者在北京、上海等地举行座谈会研讨会，不同观点，针锋相对。迄今为止，这场争论主要都发表在互联网上，官方媒体对此仍多有回避。5月10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刊出一篇短文，以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民主社会主义。不过对于谢文提出的共产主义是空想应当放弃的观点却未置一词。这表明在今天，共产党内已经没人再相信共产主义了。如果在不久后的某一天，中共在它的文件中乃至在党章里去掉共产主义的字眼，恐怕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换句话说，在今日中共内



胡平，1947 年生于北京，78 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主修西方哲学史，获哲学硕士学位，79 年投入民主墙运动，于民间刊物《沃土》上发表《言论自由》长文，87 年 1 月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课程，88 年当选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至 91 年），先后在《中国之春》杂志和《北京之春》杂志主持笔政，现居纽约，任《北京之春》主编。

部，要不要放弃共产主义终极目标几乎已经不是问题，现在争议的焦点是要不要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假如说中共还迟迟不肯在它的文件和党章里去掉共产主义的字眼，那也不是因为它还在坚持共产主义的目标，那只是因为它担心公开承认放弃共产主义的目标会危及到它的一党专政而已。

谢韬提出中国共产党应把自己转变成社会民主党。对此一建议，我当然乐于支持。不过我想指出的是，尽管今日中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决不是变得接近社会民主党。当今世界，政党林立，多如牛毛。我敢说，没有哪个政党能比中共和社会民主党更不相象的了。社会民主党有两大特点，一是坚持社会主义，一是坚持民主。先说民主。社会民主党始终坚持民主，而中国共产党则始终反对民主。再说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坚持社会主义，不过其内涵先后发生过许多变化。最初，社会民主党坚持的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后来改成高税收高福利，近些年来，社会民主党又从福利国家的理念后退，变得和自由主义没有太大差别，但仍然保留了传统左派的若干特点，如关怀劳工权益，保护弱势群体，强调公共福利，等等。中共呢？中共虽是极左派出身，但是现在变得面目全非，把传统左派的特点丢得一乾二净。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最不关怀劳工权益，最不保护弱势群体，最不强调公共福利。难道不是吗？

谈到社会主义模式，谢韬认为有两种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暴力社会主义，一种是以北欧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我以为这种说法未必准确。这里有个问题必须澄清。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社会主义政策。这是两件很不相同的东西，我们务必要区分清楚。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要实行某些社会主义政策，那就是在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进行较多干预和调整。社会主义制度却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政府是在否定自由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基础之上，支配和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实际上，瑞典和美国在制度上并无原则性的差异，它们同样都是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制度。只不过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人连续多年赢得选举得以长期执政，实行了较多的带有社会主义政策；美国也有社会民主党，但美国的社会民主党一直没有上台执政的机会，包括在 2000 年总统大选中的绿党候选人纳德，其政治纲领中就带有不少社会主义色彩，但是他只赢得了 2、74% 的选票。谢韬也指出，构成民主社会主义的要素之一是民主宪政，没有民主的保障，其他都谈不上。准确地说，民主宪政的问题才是制度的问题。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要采用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在于中国是否要实行民主。《人民日报》5 月 10 日那篇答读者问的短文再次重复官方一贯的陈词滥调，声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这就表明中共当局继续坚持专政和反对民主的立场。

李洪林先生对谢韬的文章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李洪林说在八十年代他也曾大力鼓吹民主，并且总是给自己的主张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试图为共产党实行民主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但说到底，党不需要你这种理论。李洪林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到理论的彻底性与现实的可能性的矛盾，我觉得，提起来千斤放下四两，讲民主就是讲民主，民主就是一面旗帜，现在就是不民主，甚至连自己的宪法都违背了。

不消说，我对谢韬文章是很支持的，但同时我更希望，无论党内党外，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更直接地呼吁

自由民主，尤其是着眼于那些可兑现可操作可验证的问题，而不只是周旋于这种或那种说法，首先就是要真正兑现言论自由。你为党提出的理论或建议再好，党不需要也没办法。但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突破口，凝聚起一种力量，构成一种压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

■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谢韬

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1847年10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27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

20世纪是人类理论的高峰。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随者，打着他们所信奉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场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供人类在较长时段内，听其言，观其行，通过理性的比较作出判断和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

20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13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



谢老身前留影，照片来源于网络。

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2003年4月16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见证下，欧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局面的终结。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这个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

1965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

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若干人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2000年6月3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会议公报强调：“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61名议员（全属民主党）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



社会党国际（英语缩写：SI），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及其他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社会党国际由英国工党发起，于1951年6月30日至社会党国际的官方标志7月3日在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会议上宣告成立。社会党国际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联合体，截至2004年2月，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168个，其中有50多个成员党在约50个国家执政或参政，是当今世界上规模与影响力最大的国际性政党联盟。资料来源于维基百科。

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

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2003年9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70%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1500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9），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1000至1200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1800至2000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达8000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21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6%。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等同志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温家宝总理在世界扶贫大会上宣布：“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9年到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由3624亿元，增加到116900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8.4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9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2003年，创造了高于1978年33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2003年11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由此引发了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检讨。大多数人是怀着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善意献计献策，以期纠正偏差，发展大好形势。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

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左派”的外交主张更骇人听闻：“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2005年10月张德勤网文：《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文）

当胡锦涛向世界宣示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实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时，“左派”要通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变中央的内政外交路线。他们认为现在的改革开放是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和平演变，“是受到了老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思维’之类谬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今日极左理论大回潮，“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我以为这是27年来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

正当我“杞人忧天”之际，老友陈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专家）向我推荐辛子陵的一部书稿。这书稿我读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别是画龙点睛的理论部分《导言》和《结束语》，兴奋不已。我们两个共同认为，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部书稿的《结束语》指出：

1866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版，第504页）

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

“在股份公司内部，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

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年6月出版。

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12年之久，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1895年8月5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斯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斯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我们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930年才在苏联出版，1956年才在中国出版），他们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便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凭借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们的影响。我们曾经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的发展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

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操纵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现代经济科学称之为“基尼系数”），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其结果都是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让位给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度”。苏联、东欧（包括中国上世纪一段时间）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也发挥不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

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列宁在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2页）

我们党在1956年12月完成了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也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提出过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同志就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250万人（工业160万，商业90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

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 年] 第 308 页）

这是我们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还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我们当时认识到但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新经济政策。不要因噎废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论》第一卷，1966 年人民出版社第 962 页）

如果把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比作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消灭了。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其次，辛子陵这部书稿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书稿《导言》里指出：

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1847 年 10 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 27 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 年 5 月 11 日恩格斯 73 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

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一个带领人民前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

建立天国的想法，表现了科学尚不昌明时代人类对具体地改善处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无奈，把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事情推向遥远的未来。所谓“共产主义”大目标在各个历史时代是不同的，是具体的，变化的。马克思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不会想到人人需要一部电脑；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了。

我们在延安时代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拥有、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

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反“右派”以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顾准说：“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我们曾经奉行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

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辛子陵这部书稿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渡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

晚清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有一条祖训：“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学工业，学科学，学教育，这是所谓“用”的部分；至于“体”，即这一套体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变的。祖宗传下来的这一套，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改进

一下都不行。


孙中山创立民国，有了宪法，有了国会，但蒋介石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党在宪法国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还是专制独裁。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

2004 年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郑重昭告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这些说法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

如果实行了这个转变，我们的党就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就一定会赢得世界近百个国家民主社会党的欢迎，与欧洲各国及美国民主势力共建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就会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同盟军。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将加强而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我们将举得更高，举得更有力。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开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航道。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党我国如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体制改革紧紧跟上去，说重点的话，我们真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 1994 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这一部书稿，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

■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忆李慎之

谢韬



谢韬和李慎之是上世纪40年代共同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老朋友，后来都到了延安中央机关，又大约同时进了北京城。一个在人民大学教马克思主义，一个在新华通讯社负责编发国际新闻和主要供中南海要人阅读的参考资料。50年代，先是谢韬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后是李慎之被划为“极右分子”。这篇文章，是谢韬对他和李慎之六十年的交往的回忆。

我和李慎之成为朋友，从1943年开始，直到2003年李慎之去世，正好六十年。从癸未到癸未，一个“甲子”周期。这大半个世纪是一个大时代，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我们的经历和自己的思想的变化，也是波涛起伏，既深且巨。我们共荣辱、同浮沉，始终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在我被打成“反革命”他被打成“极右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在我们交往长达六十年的朋友中，而今除我之外，大都已经离开人世，许多事情我不说，别人也许就无从知晓了。我虽

李慎之，原名李中，生于江苏无锡。青年时先后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经济系、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和成都燕京大学，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1946年，进入新华日报社，后去延安，在新华通讯社国际部任编辑。1949年起，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组组长、副主任，负责《参考数据》，曾参加板门店谈判。反右期间，因为提倡“大民主”而被毛泽东亲自打成右派，开除党籍。1973年回京工作，参加中共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其间，陪同邓小平出访美国，担任顾问。1980年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筹建，任该所所长。1985年后，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晚年研究自由主义，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和政治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被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誉为中国世纪之交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著有《风雨苍黄五十年》。

然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还想把李慎之想要做而没有做完或没有做成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这里谈谈我们俩甘苦与共的六十年交往的历程，谈谈我们对共同经历的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和前途进行的思考。通过这些，可以看到李慎之和我六十年间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也就是：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要走到哪里去。供后来者借鉴。

➤ 思想发展的起点

李慎之1923年8月15日生于江苏无锡，祖父是米行小老板，早已去世，祖母出身书香门第，守寡养大儿子，

把他培养成知识分子，就是李慎之的父亲。他父亲跟钱钟书的父亲是世交，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在法院里当过录事，在县商会当过文书；自己办过在当地有些地位的报纸，做过上海《申报》、《新闻报》驻无锡的记者。李慎之从小熟读经史子集，深受中国士大夫的美德与气节的影响：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顾炎武），“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汉书·司马迁传》）；二是傲视权贵，为民请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礼记·大学》）；三是敢于独立思考，勇于讲出真话，“朝无争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汉书·萧望之传》），“谔谔能昌唯唯亡”（唐·周昙）。

我祖父一代是福建龙岩人，参加了太平军，随石达开部进入四川。太平天国失败后，祖父流落在川北，主要靠在川江拉纤为生，还在自贡农村租了一点地种。在清朝，太平军的后代被称为“匪属”，不许上学。祖辈吃了不识字之苦，父亲就搭别人家的私塾，在村里读了两年书。以后到一个布店做学徒，仍然勤奋自学。后来得到一个机会，到成都最早的一家现代银行（聚兴成）做职员，兢兢业业，逐步升任经理，成为高级职员。我1922年1月在重庆临江门铜鼓台出生的时候，家道小康。两岁时候随父亲迁居富顺县（今自贡市）自流井。四岁多开始读私塾七年，才上高小、初中。父亲后来经营失败，生活又陷于贫困。我舅舅周尚志是1925—27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任四川地下省委常委，共青团地下省委书记。1928年执行上级指示发起暴动，失败后被捕。当时反动政府杀害了十名共产党员，他是其中之一。我母亲性格刚烈，对我舅舅非常佩服，在我小时候常对我讲她这个兄弟如何如何好。

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是初中三年级学生。我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自贡市学生救亡工作团，和两个同学成了这个二百多人的团体的头头。这是我参加革命活动的起步，心里充满了革命激情。1938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考上成都华西协和中学读高中。这是个教会学校，华西大学的附属中学。学校里有中共的地下组织，有一些进步社团。《大声》周刊社（车耀先、韩天石他们办的）在这个学校也有活动。我和一些同学做了《大声》的推销员，利用周末、星期日，打起鼓，吹起号，在街上叫卖：“请买抗日周刊《大声》！”每次卖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免费到车耀先办的“努力餐”饭馆去“努力餐”一顿。这时候，受到比我年长一些的进步学生如胡绩伟等的“星芒社”的影响，他们当时已是大学生。我的生活圈子渐渐扩大，结识的进步朋友渐渐多了起来，有些成为我终生的好友。1939年，我表哥以“赤色分子”的罪名被绥靖公署逮捕，关押在成都的拘留所。看守人员天天打牌、喝酒，来人只要塞给他们一些钱，就可以同关在里面的人见面。我常去看望表哥，送吃的，送衣物。从此我对专制独裁的当局越来越憎恨。

慎之和我都在基督教会办的学校中受过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得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等思想的熏陶。慎之在上高中的时候，遇到一个好老师，是无锡的民主革命元老。他最早让慎之看的是《公民》课本，一开头就讲宪法，讲人民的权利和义务。还把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撕掉封皮给慎之看，还有巴金的小说。他还主动找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看。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看了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来改名《大众哲学》）。后来读了一本薄薄的《中国历史教程》，它不按中国的朝代讲，而是讲中国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他读的古书不少，还曾通读过《资治通鉴》，没见过这样讲历史的，就觉得这本小书里有大学问，社会发展五阶段在他脑子里留下很深的印象。1940年高中毕业时考进燕京大学，因病一年后到北平入学。不料刚刚一百天，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解散封门。他到上海在圣约翰大学借读，1942年秋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他在这年冬天到成都复学。

我很羡慕大学生的比较自由的学习生活，等不到高中毕业，就在1939年初以“同等学力”考进当时在成都的朝阳法学院，半年后又考上了从南京内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我原想学化学，觉得物质的化学变化奇妙有趣，这个瓶子里的东西倒在那个瓶子里，就变出新的东西来。而且金陵大学的化学系很有名，有吸引力。偶然碰到一位

姓林的，上海之江大学毕业生，他问我考大学准备学甚么，我说想学化学。他说：在当今中国学了化学能干什么？不过是做点雪花膏、肥皂什么的，至多像天津的久大公司那样，搞点盐碱。他还说：“我在大学学铁路建设，你看我现在能干什么，还不是一个‘孔乙己’！中国的社会这样腐败，又大敌当前，只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改造了社会，才能发挥每个人的才智和能力……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报考了社会系。

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华大地，国民政府军队虽然也曾有一部分浴血奋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绩，但由于总体上的专制独裁、腐败无能，在强敌的攻势下常常溃不成军，大片大片国土沦丧，亿万人民呻吟于日寇的残暴统治之下。不愿作亡国奴的青年学生，纷纷流亡到大后方，对当局由期望转为失望。家在大后方的青年学生，眼见亲历当局的蛮横腐败，日益苦闷彷徨。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自然不甘心忍受这种状况，反专制、反腐败、争民主、争自由，要求团结抗战的呼声日渐高昂。1944年日寇更深入西南，中华民族面临沦为亡国奴的危险。因此，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我和慎之这一代年轻人首先思考的大问题。

在那个时代，现实社会十分黑暗丑恶，军、警、宪、特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我们眼见广大地区民不聊生。蒋介石集团强化一党专政，实施党管国家、党管军队、党管一切的独裁政策。国家政权腐败无能而又无法无天，人民没有人权，没有应有的一切自由。这些都是我们亲身感受到的现实。因此，我和慎之这一代人，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专制政权，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建设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新中国，作为理想，作为我们毕生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李慎之和我这一代人思想发展的起点，或者说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发展的基础。这种思想的起点和基础，并不只属于任何个人，它是时代的客观的产物，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和李慎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相识的。他当时名叫李中，我名叫谢道炉。当时，各个大学的学生为了商讨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办法，自发组成了各种名目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社团，我们俩各自在就读的大学里参加了这样的组织。在各个社团成员相互串联秘密接触中，我和李中渐渐熟悉起来。我们都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熏陶，古文、现代文、英文都学得不错，谈起话来十分投机，彼此只恨相识太晚。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对我们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先经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实现民主自由，经过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进入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当时进步青年成立的各种组织，都围绕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

当时在进步青年群体中流行着一句话：“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照耀着全人类的前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知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主动宣布取消沙皇俄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这使我们相信苏联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俄国和苏联作家，如托尔斯泰、高尔基、法捷耶夫、萧洛霍夫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人性的描写，也影响了我们一代人。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工农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是一个自由、民主、幸福的人间天堂。（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对稍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残暴镇压，在1956年以前，都被严严实实地隐瞒了，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当时决心跟共产党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十年后，有人问李慎之：如果时光倒流，你还会坚持原来的选择吗？他回答：当时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我们要抗日，看到的却是国军不断溃退；我们要民主，感受到的是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而共产党则高举抗日

和民主的大旗。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只要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就不会选择另一条路。

► 民主运动的实践

1944 年，成都各校学生社团之间联系日益频繁，开始联合行动。1944 年 10 月组织了两千多人参加的“国事座谈会”（名为座谈，实为群众集会），谴责一党专政，要求民主自由，是 1941 年初皖南事变以后大后方陷于白色恐怖状态中的第一次公开大型集会，引起轰动。接着，“双十一”（11 月 11 日）举行了全市六千多人参加的反对当局指使警察殴打中学生的示威游行；结果反动当局被迫撤换了成都市长和警察局长，群情振奋。1945 年 5 月 4 日，九所大学师生两千多人举行了烛光晚会，发扬“五四”精神，推进民主与科学强烈批评专制当局的独裁腐败、倒行逆施。会后大家举起火炬在成都主要街道上大游行。当时李中在这些活动中都是组织者之一，还曾担任与反动当局对话的主要发言人。

当时我和李中都不是共产党员，但越来越心向共产党，因为不但共产党的主张和理论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们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周恩来称“双十一”为新的“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指出：“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民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鼓励学生继续为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报刊几乎每天都在呼唤民主自由，宣称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而且声称，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只要国事包揽于一党之手，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我们每次看到这些言论都为之兴奋不已。

1944 年夏，我毕业后留在金陵大学哲学系做助教，1945 年暑期，李中也毕业了。我们的活动引起了专制当局的特务们的高度注意。他们要抓人了。有人告诉我们，有个抓人的黑名单，李中和我都名列其中。在共同斗争中遭到共同的患难，我们两个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结成生死之交。虽然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中共党组织对我们十分关心，既支持我们参加民主运动，而又关怀我们的安危。省委负责人吴玉章、张友渔认为我留在成都有被捕的危险，建议我回家乡自贡市另谋职业。李中也得离开成都。

我回到自贡市，改名谢逸明，在蜀光中学任教。这是盐业企业家和开明教育家联合举办的学校，张伯苓、喻传鉴等曾任董事长或校长，按南开模式办学，反对国民党进驻学校，主张民主办学、专家治校，教导主任陈著常（后来任校长）毕业于北京大学，深受蔡元培办学思想的影响。李中也到这个中学来了。相继而来的还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毕业的一些民主运动积极分子。我们组成一个小组，经常到我家里聚会，议论时局。《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在我们中间秘密流传。我和李中两人住在一间宿舍。他和我曾经反复阅读这些著作，一起议论。我们相信，中国社会一定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向新民主主义，经过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时期，再走向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的社会主义。

那时候，李中就教全校的“公民”课，讲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还借此机会大讲“新三民主义”，大讲社会发展史。我教地理、历史，还在上音乐课的大教室开设哲学课，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主要内容。我们还向学生介绍鲁迅、高尔基的作品，在学生中传阅中共、民盟、民协的报刊。学生们经常到我们俩的宿舍谈论时事，特别是各地民主运动的情况，专制统治者镇压民主运动的真相。在我们的影响下，学生成立了一些社团，出了一些壁报。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消息传到自贡的时候，学生十分忿怒，在壁报上声讨反动派的罪行。我们到蜀光中学半年多，学生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活动就开展起来。

这些又引起专制当局的特务的注意，他们故意露出别在腰间的手枪，威胁我们。朋友和家人都劝我们俩离开自贡。我们俩商量后，决定抢在特务动手之前秘密出走。这半年多，蜀光中学学生们的纯真、热情，他们对民主自由的向往，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李中到晚年，还念念不忘当一名“公民”课教员。我到今天还同当年蜀光的师生保持着密切联系。

为了防备特务追捕，我俩在不同时间、取不同路线秘密重返成都。在成都很快找到中共地下组织。我们向以基督教活动为掩护的老党员陈鼎文汇报了在蜀光中学的情况，表达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我们认定，我们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建设富强幸福的新中国的理想，与当时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致的。共产党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政治主张，使我们感受到强大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促使我们下定决心成为共产党人。

我们倾心长谈，同感在蜀光中学这大半年工作中太莽撞了，只图痛快，不谨慎，不踏实，结果弄得自己没有立足之地，而且暴露了那些与我们有联系的朋友和进步学生。于是，李中改名李慎之，我改名谢实之。后来，由于“谢实之”三个字都是仄声，不好念，就从邹韬奋的名字中取了一个“韬”字，改名谢韬。

➤ 跟着共产党走到延安，走进北京



图为抗战时期的重庆《新华日报》夜班编辑部。资料图片。

张友渔与南方局联系，得知重庆《新华日报》当时急需我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就要我俩前往。还是为了躲避追捕，我俩还得分两路走。我走北路，经过三台去重庆。他走南路，经过宜宾到重庆。到了报馆，我被分配到采访部，他被分配到编辑部资料室。这样，不仅可以经常得到党的指引，而且有了为民主自由进行活动的公开身份，不用再担心被特务秘密逮捕了。这期间，在这里，慎之和我如鱼得水，工作得十分愉快。在新华日报馆工作期间，由张友渔做介绍人，我和李慎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期间，我作为记者，按照报馆的安排，访问过许多民主派人士。在访问

胡风的时候，胡风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坚决拥护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主张。他在反动统治下如此公开表示和共产党站在一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与他很少来往，更无私交。只是在成都与我一同组织“现实学社”的好友方然，与他熟识，我曾通过方然的关系，到他家约他为《新华日报》写稿。

那时候常能遇见周恩来，他对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十分亲切，有一次我回到报馆门口，正好他乘车出门，他从车上看见我，特意伸出头来向我招手，亲切地叫着：“小谢，小谢！你采访回来啦！”

1946年夏，周恩来带着潘梓年、章汉夫、熊瑾玎、乔冠华、章文晋、宋平、陈家康、林默涵等人去了南京、上海，李慎之是无锡人，就跟周恩来去了上海，参与筹办《新华日报》上海版。我是四川人，仍然留在重庆新华日报馆。

这时候，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挂牌成立，公开活动，吴玉章任省委书记，重庆新华日报馆由吴老直接领导。吴老是我们自贡市荣县人，他领导的荣县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比武昌起义早半个月宣布荣县独立，成立了荣县军政府。我第一次见吴老是张友渔引见的。吴老笑眯眯地说：“你也是自贡人。”向我问起自贡的情况，问我的家庭和妻子的情况。我说到我舅舅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而且是 1928 年在成都被国民党枪杀的十四人之一，吴老说：“我知道那次屠杀，二三十年过去了，革命不是更壮大了吗！”我只觉得吴老是个无比仁厚的蔼然长者，与我心目中的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开国英杰的形象似乎不完全一致。但稍一接触，就感到他容貌谦逊而身有盛德，在不言中就足以使人顽廉懦立。

1946 年初在重庆达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被国民党内的极端反动势力推翻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的公开机关遭到驱逐，先后撤到延安。在延安，我与慎之再次相逢，喜不自胜。我俩都被分配到新华通讯社总社工作，慎之在国际部，部主任是吴冷西。我在国统区部，部主任是廖盖隆。

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攻打延安，毛泽东和部分中央领导人，继续留在陕北；刘少奇和中央的另一部分领导人组成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到山西。新华通讯社组成的精干队伍随刘少奇的中央工委行动，迅速转移到山西。留下老弱病残和未成年的孩子，总共一百多人，组成一个大队，其中有新华通讯社的老干部韦君宜、杨述，瞿秋白的女儿独伊和女婿李何，以及方实、白天、王丹一等，还有李慎之的妻子张贻（原名张秀敏，原是 1940 年在北平入学的燕京大学西语系学生，1941 年随校到成都复学，1946 年曾到一度解放了的张家口参与外语训练班，从张家口撤退后到延安广播电台和新华通讯社工作，在那里与李慎之结婚）因为怀孕挺着大肚子，只好留在这个大队中。我的妻子卢玉带着一个小孩，负责大队的医护工作，张贻则是她的重点护理对象之一。新华通讯社领导同志任命李慎之担任大队长，我当大队支部书记。我们必须带着这支老弱病残孕与未成年的孩子们组成的大队，安全地撤离陕北，东渡黄河到山西柳林，再转到临县三交镇，同新华通讯社总社会合。总社只给我们派了两个战士，带着一长一短两支枪，负责保卫工作，其他所有事情都由李慎之和我全权处理。这个任务对我和慎之来说是十分艰巨的。我们人生地不熟，听不懂当地百姓的土话，百姓也不懂我们的话，只能边说边做手势，才勉强明白对方的意思。尽管如此，我通过地方政府找到当地老百姓，千方百计弄到了一百多匹骡马和毛驴，还有部分车辆，解决了尽速撤离的关键问题。李慎之对我大加赞扬。

撤离延安时，正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不仅行路十分艰辛，还要解决一百多人的吃和住的问题。我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晨出发时吃一顿，晚上到住宿地再吃一顿，中午饿了就拿出硬梆梆的干馒头，使劲啃才能啃下一小块。李慎之跟随大队前进，跑前跑后照料老人、小孩、孕妇、病号。我则先行一步，走在大队的前头，一边做路标，一边寻找住宿地。在一个老乡家不到五、六平米的炕上，要挤上四、五家人。实在没有地方住，我和慎之就把猪圈打扫一下，与猪同眠。第二天一大早天还不明，我就要提前上路。有一回我 24 小时没有休息，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爬山涉水行进了 120 里路，实际行程超过 150 里。事后谈起来，许多人都不相信，两个被人讥笑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教书先生，居然带着这支老弱病残的队伍，在北国的凛凛寒冬中翻山越岭，安全到达目的地。时至今日，回忆起这段经历，都感到当时那股干劲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提起这段往事，我只想说说明慎之与我，包括当年到延安的大批知识分子，无论是牺牲了的还是活着的，无论是升了官的还是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的，都曾经舍生忘死、备受艰辛、真心实意地为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贡献过自己的青春年华。

新华通讯社从晋西临县转移到太行山武安县（原属河南省，后属河北省）的冶陶镇，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我和李慎之在那里参加了整党运动，整党的内容是“三查”（查阶级成分、查个人历史、查思想立场）。当时能够

上大学的人，不可能是无产者或贫农家庭出身，查上三代，几乎每个人的家里都能查出一堆“问题”。我和李慎之的家庭成分是高级职员，比上（无产者、贫农）不足，比下（地主、资本家）有余，还算是比较好的。在个人历史方面，没有参加过反动党团，没有被捕过，十分清白。可是还不能不做自我检查，我们只好批评自己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不安心工作、不服从组织纪律等“小资产阶级思想”。每个人都必须把各式各样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扣，把自己说得越臭越好。当时还有一个理论，说是无产阶级思想是不会自发产生的，共产主义思想必须强行灌输。我和慎之都在教会学校念过书，我们就悄悄议论：这种说法跟基督教的“原罪论”有什么区别？

半年整党把大家都弄得灰溜溜的。但是这种情绪很快就被胜利的喜悦冲淡了。国民党专制政权以想象不到的速度土崩瓦解，我们被告知迅速做好准备，去国统区接管政权。真没有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觉得“毛主席的领导是多么伟大、多么英明！”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董必武任主席。为了培养建国后急需的大量干部，设立华北大学，吴玉章当校长。吴老知道我在金陵大学当过助教，要调我到华北大学当教师。当时新华通讯社社长由中宣部副部长廖承志兼任。新华通讯社当时虽然已经有编辑、记者四百多人，可是全国解放之后，要在每个省设立分社，人手就不够了，因此不同意放我。吴老找到刘少奇同志请他帮忙，刘少奇把意见转告廖承志，廖承志说要听听我的意见，我没有表示要留在新华通讯社，只说：“服从组织分配。”这样，同年8月我到了设在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当时学校最缺的是“马列”课教员，我一面学一面教，担负起“马列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任务。

1949年3月，华北大学迁到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北大学于1950年改名中国人民大学，1952年起我担任了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负责人。1954年12月被评定为教授。全国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师，大都是在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研究班培养的，我也成了这个研究班的教授。

1949年进城以后，李慎之之仍在新华通讯社总社。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当了几天“打虎”组长，不久又被调去朝鲜，以红十字会名义与“联合国军”交换战俘。在谈判没结果时，又被调进中央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考察团，到苏联和东欧考察。一个多月后又被召回朝鲜，调查战俘情况。在朝鲜，他写过《开城观察家评谈判局势》，发回国内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1957年以前，周总理重要出访都要他作为笔杆子跟着去。亚非会议，写了关于《亚非会议的介绍》；日内瓦会议，写了《日内瓦会议日记》、《日内瓦会议最后的报导》。他还直接给周总理起草公告。他自称是外交部的“客卿”，周总理要出国，就找乔冠华，乔就找他。有时是总理直接点名叫他去。

当时，他是个走红的干部。他的正式工作是担任新华社国际部的副主任，分工管《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参考资料》一天要出三大本，而且一定得在早上8点、中午1点、晚上7点送到中南海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中央领导人对国际动向的了解，主要通过这个渠道。这样“一日三参”，工作繁重。甚至周末和假日都难得休息。我们相见的时间少了，但直到1955年我失去行动自由之前，仍然一有机会就相聚交流思想，议论时事。

➤ 当时我们议论了些什么？

我们不能忘怀，当初我们倾向共产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最热衷的是新民主主义。1949年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庄严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了作为开国的根本大法的《共同纲领》，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的自由权”；经济政策是促使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和慎之同全国人民一样，浸沉在胜利的喜悦中。

仅仅过了三年，就风云突变。1952 年秋天以后，特别是年 1953 夏天以后，我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被抛弃了，《共同纲领》不算数了，急匆匆宣布进入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人民民主专政一变而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有点联合政府的样子中央人民政府也改组了，成为清一色的共产党政府了，而且常常只有一个人说了算。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几乎都还没有真正开始实行，阻碍生产发展、阻碍民主生活的东西还那么多，落后于先进国家一百多年的中国，怎能这样快“蹦”进社会主义呢？慎之和我都十分不解。



《共同纲领》发布的当日报纸。资料图片。

我们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还说“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950 年，他还说：“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些，怎么转眼之间都无效了呢？

经过自己学习和党的反复教育，似乎“明白了”，承认自己思想落后于时代了，跟不上伟大领袖的新的战略部署，其实内心并没有真弄清楚。我们依然崇敬伟大领袖，不知道毛泽东已经不是我们原先心目中的那个毛泽东了。更没有料到，中国从此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专制黑暗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也就是要各级干部以至群众进行“整人”的斗争，这次“整人”的人们下次又挨“整”。这是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方法。当然，还要加上种种不同的监狱和“劳改”农场，一整套自上而下四面八方无远弗届的空前严密的党的和社会的网络组织系统。

➤ 1955 年 1957 年两人先后遭难

1955 年，毛泽东突然宣布有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我根据在重庆的时候直接了解的胡风的政治倾向，不同意说胡风是国民党特务，认为共产党不能过河拆桥。我为胡风打抱不平，毛泽东知道了，十分生气。我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经毛泽东批准，由公安部逮捕，对我实行专政。其实，我与胡风仅有的一点关系，只是他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知道我在大学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委托我查对过两条语录。听说吴老亲自同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联系，说：谢韬是人大教师，这个人的情况我了解，人民大学有责任查清他的问题，是不是查清之后，再考虑要不要捕人？

不久后，公安部来了一位处长，让我带上行李走进一辆小卧车随他离校。我自忖：会被投入何处铁窗中去？谁知小卧车把我送到东四 6 条胡同 39 号小院吴老的家中。安排我住在东厢房，就在吴老看管下接受审查。半年后，把我迁到一处叫嘎嘎胡同的人民大学宿舍内，继续接受审查。当时担任北京市第一副市长的张友渔，我的入党介

绍人，专程前往看望我，他先问了问我认识胡风的经过，我说完后他没有责备我，叫我一定要相信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向党说清楚自己同胡风的交往，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不可乱说。

对我的审查一直没完。实际上没有审出任何问题，只因为是毛泽东亲自批捕的，谁也不敢说毛批错了。我心里明白，在毛泽东生前，老人家是不可能承认错误的，我若能苟且偷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只可惜自己的青春年华，只能付诸东流之水了。

1960年，因“大跃进”造成大灾难之后供应困难，我不能在人民大学白吃饭，公安部把我“调”进秦城监狱，与范汉杰、廖耀湘、黄维等关在一起。想当年我出生入死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如今却在共产党的铁窗中成了国民党战犯们的狱中“难友”。1965年不少战犯出狱了，我才被宣布“免于刑事起诉”，户口仍留在北京，人回老家自贡市去。

回到自贡，被安排到自流井盐业博物馆总务科当办事员。半年左右，“文革”开始了，我成了自贡“最大的反革命”，每次批判自贡市“走资派”的时候，我都被拉去陪斗。

1966年岁末，我在自贡街上拉架架车，边赶路边看街上的大字报和贴报栏。作为监管对象，不准阅读任何书报，可我总是想弄清我们的党和国家为什么像患了恶性疟疾似的，只能从这里获取一点消息。忽然从贴报栏中看到一行黑体字：吴玉章同志逝世！这条消息让我五内俱焚，我不能在大街上动容哭泣，卸罢车回到斗室中，我的眼泪才毫无顾忌地流淌下来。云山千里，道路阻隔，身不由己，不能前往吊唁。我只能遥望北方，臆想京都，呈诗一首：

十载相随受教深，拨云驱雾感宝箴。山城一别承多训，临县重逢叙斗争。
奉召石庄蒙重托，执鞭人大时相亲。拜辞未遂初衷愿，哀悼灵旗泪满襟。

1979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准备办一个《中国社会科学》杂志，需要一批有较高理论水平的编辑人员。成都“民协”时代老友王晶焄知道我还蒙难在家乡自贡，就向杂志社推荐，于光远和黎澍不顾我的冤案尚未平反，立即同自贡有关单位联系，把我“借调”到社科院。自贡方面把我当作包袱，乐得放行。于是，我回到了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任哲学编辑室主任。有一天，在建国门内社科院院部附近遇到多年前从陕北到河北同行的杨述，他头一句话就是：“你还活着呀！”相对苦笑之后，第二句是：“你受了不少苦！”惊喜和感叹之中浓缩着三十年的风雨血泪。

胡风集团冤案昭雪后，我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常务副社长。1982年底，中国人民大学要求我回到学校任副校长兼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回校后，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党籍在学校里竟然还完好地保存着。校党委决定：谢韬由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组织关系中断，现在恢复组织生活。全国所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一律被开除党籍，在北师大工作的我的妻子卢玉，由于与我“划不清界限”也早已被党组织无辜除名。听说当年处理我的党籍时，吴老曾表示：“既然尚未审查清楚，做什么组织结论呢？”我可能是全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党员中唯一没有被开除党籍的。

李慎之1957年遭难的时候，我还在被禁闭审查之中，后来才听他谈了他被定为“极右分子”的前因后果。定他为右派的材料列举的第一条罪状，居然是说他“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这使他大为惊讶。在批判会上，从来也没有人这么说过。况且，他主持《参考资料》本是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任务，他还认为在这方面是很有功劳的。不但“一日三参”反映情况详尽及时，而且除了几十期专辑，如各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关于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第一部类第二部类孰先孰后问题的议论，等等，毛泽东曾一再表示满意，予以嘉奖，称赞“新华社的工作做得很好嘛”。李慎之曾被评选为中央机关的先进工作者，也就自认为是党的宠儿，很有党性，总是和党赤诚相见。但正是这种赤诚相见，在新华社使人认为他的“右派言论”是最多的。他也觉得自己说话“没边儿”，有话就直说明说，不打弯，不加保护色。他后来才悟到，因为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抢救那样的政治运动，不知道“运动”的厉害。（实际上，被打成右派，与他兴之所至发明了“大民主”这个词儿有关。这个问题后面再谈。）

反右派运动正式开始是 1957 年 6 月 8 日，处理、降级、放逐、开除党籍则大都在 1958 年 3 月以后。本来，新华社党委除一个人外，都不同意把李慎之划为右派。但由不得他们。上边已经决定了，下级谁也无法改变。1958 年 3 月 8 日，支部通知他：你已经被定为极右分子，从现在起不再是共产党员了。他说，那时候真觉得自己好像成了离开娘的孩子。

► 他为呼唤民主而成为“极右分子”

李慎之是怎样被打成“右派”而且被定为“极右分子”的？

他在担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期间，不但负责编译大量的《参考资料》供领导人了解天下大事，1965 年还出了二十本《苏共二十大文集》。他后来说：“那时候如果在世界上找对苏共二十大了解最多的人，我算一个。吴冷西对我说，中共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八大以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乎天天开会，这是我党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会议主要讨论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要求我们国际部搜集全世界对此问题的反应。我和当时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姚臻一起编的《批判斯大林问题集》，在搜集各国的反应方面，可以说是最完备的。国际问题资料一直是新华社的‘专利’，而当时新华社的国际新闻就靠我们了。如果说需要把国外的新闻报道经过过滤，为我们所用，作意识形态转换，我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当时我年轻力壮，一天十几个小时地干。毛泽东每天都要花时间看我们编的《参考资料》。（当然无论什么，他总是用他的眼光看问题，别人改变不了他。定我右派的罪状说我企图用内参影响中央，岂非无稽之谈！）苏共二十大对我们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毛泽东来说，这非常意外。他处于矛盾状态。斯大林曾给中国共产党出过一些坏主意，而且不信任他，他对斯大林是不满意的；他也可能很早就意识到斯大林的某些问题。但是他认为，斯大林治理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是不能放弃的。因此，他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因为这会危及他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看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的秘密报告后，人们有的相信说的事情是真的，有人则不相信。我是相信的。因为我看过很多苏联清党文件以及乌克兰大饥荒的报道，还看过一本书叫《我选择自由》。看的时候我还不相信，后来赫鲁晓夫报告对其中涉及的时间、地点都有印证，看来不是什么帝国主义造谣，我就相信了。”

赫鲁晓夫的报告在全世界引起强烈的震动，冲击波不断扩大，以致在波兰、匈牙利出现乱局。李慎之后来说：“我自己在铺天盖地的外国新闻报道日日夜夜的冲击下，也是忧心忡忡，到了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的程度。我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太严重了，希望只能寄托在胜利才七年而领导着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为全世界革命人民众望所归、一贯提倡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而且素有宽容与开明之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希望由他在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一个民主与宽容的范例。”1956 年，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越来越宽松的一年。大家相信毛泽东说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要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提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皆大欢喜，一心想着向科学进军。5 月间宣布了以往在社会主义阵营从来没有提出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苏共二十大提出反对个人迷信，也促进了许多人的思想解放。李慎之说：“我在这样的大潮激荡下，思想也越来越转向寻求所谓社会主义民主。”

这年秋天，波匈事件闹得不可开交以后，毛主席派秘书林克到新华社国际部向当时接触有关情况最多的王飞（当时的国际部主任）和他，征询对事件的看法和我们如何应对的意见。（林克自 1949 年起在李慎之手下工作，曾任《参考消息》选报组组长，1954 年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帮助毛看一天几十万字的《参考资料》。）两人对林克放言：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套民主制度。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说，是因为能够“通天”的为毛泽东所信任的吴冷西对他们讲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李慎之想到这些话，就坦然地对林克说：“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小学中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者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应当实行大民主，应当建立宪法法院。”李慎之说：毛泽东引用《红楼梦》人物凤姐的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更使我钦佩他老人家胸襟之宽阔，气魄之宏大。因此，我放大胆提出：“革命胜利以后就是要搞点改良主义……”这些话，都是从上述毛泽东的话引发出来的。当时，慎之还以为自己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没想到自己对毛的本意并未真正理解，弄得南辕北辙了。

1956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讲法很形象化，他们就借用这个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323 页）这段话说的就是李慎之和王飞。其实他们当时的职务是处级，但因为是十一级干部，相当于司局级。当时新华社社长也才是司局级，因为过去它隶属于新闻总署之下。（后来，1982 年，在玉泉山起草“十二大”文件，胡乔木把李慎之叫去，向大家介绍说：“这就是当年主张‘大民主’的李慎之。”）

后来吴冷西对他和王飞说，毛主席说：“大民主就是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他后来说：“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我并没有想到要上大街。我是说过，我们现在是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但是确实没有说过‘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的话。‘大民主’、‘小民主’是我讲得忘乎所以的时候的临时‘发明’。我说的大民主，是指国家在大政方针上应该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是指政治制度问题。当时我感到，虽然政治上大体可称清明，却又痛感人民群众没有多少参政议政的权力，认为这是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苏联既然出了问题，中国也必须改弦更张，实行大民主，即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和自由，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我说的小民主太多也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调资定级工作刚刚过去。那次调级，我坚决反对上级给我提级，对于几乎天天都有我们国际部的人到我办公室，甚至到我家来诉苦，我十分反感。来的人都说自己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现在级别是多少，别的什么人跟他同时或比他还晚参加工作，现在级别是多少。我以为一个人自己到上级面前伸手要求提级是岂有此理的事。几乎人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一次调级，半年不太平。此外，分房子，调工作……一概如此。我说的小民主太多，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这都是太讲人情、不讲法治的结果。我自以为所见甚是。不了，过了几天，毛泽东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我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

后来吴冷西特为此事找王飞和李慎之传达：“主席说，这两个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又说，“这不仅是个人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思潮。”林克知道了毛主席的讲话内容，又来找李慎之，问是不是他把李的话传错了，颇有歉意。李说：“我没觉得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只是要再次声明，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想法。我的大民主是针对小民主而说的，而且是认为敌人已经被打倒了，我们才可以搞大民主。”林克听了他的话，又去向毛泽东解释了一番。毛说：“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什么不同。”于是，家住新华社大院的林克又把毛的这句话向李慎之传达了一遍。

当时李慎之听了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但还是并不在意，不认为自己犯了大错误，当时也的确没有人当面批评他。随后他就跟周总理出访亚欧十一国了。回国以后几天，就听到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他说：听了这个报告以后，心头越来越热，心潮澎湃，认为毛主席要带领我们走一条全新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了。因此还是故态不改，放言无忌，终于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行政级别降六级。大概由于毛泽东在批评“大民主”的时候曾说过“这两个人是老同志”，不便再算这笔账，在李慎之被定为“极右分子”的最后定案的罪状中并没有写上“大民主”这一条。实际上，这一条是“题中应有之义”。

► 多情却被无情恼

当年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慎之被打成“极右分子”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还常常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还自作多情，向党向毛主席表忠心，说要认真改造自己。慎之在“反右派”运动结束的时候，还给自己做了一副对子：“自作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自作多情，多情却被无情恼。”他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匿名信，引用了这样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右派分子”。说明自己对党的感情。他说：他被打为“右派”以后，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一想起来就会掉眼泪。还是椎心泣血日思夜想怎么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绝没有一丝一毫反对他老人家的意思。自己给自己做思想工作，总是从内心说服自己：为了“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这两句话，自己理所当然得当右派。听贝多芬《命运》交响乐，为其中面对命运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所感动，也曾一时激动：要抗争，抗争！另一个自己就站出来说：你就是错了嘛，抗争什么？不要抗争，不要抗争了。实际上，自己脑子里也还有些多年间灌输进来的“左”的思想，一下子消除不了，还在那里做戏。

六十年代初，“大跃进”引起大饥荒以后，看到听到遍及城乡的悲惨景象，想想我们当初投身革命的愿望和理想，看看残酷的现实与毛泽东当年宣告的建设富强、民主、幸福的新中国的许诺截然相反，我们才开始比较清醒了，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开始滋生了怀疑以至异议。对比现实，“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绝大的讽刺。我们觉得不能再自己骗自己了，没有必要再在心里做假戏了。慎之说，那时候，他就借用《封神演义》中哪吒的话对自己说了八个字：“削肉还母，剔骨还父。”

我和慎之虽然被打倒在地，还被踏上一只脚，但是我们的脑子还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在宣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出现如此荒谬如此黑暗的新式专制时代？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会走向以至走到反民主反自由的专制主义？慎之在“劳改”中，我在共产党的监狱中，虽然没有联系也不能联系，却都开始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1971和1972两年的8月15日，他48周岁和49周岁生日，还在新华社“干校”劳动，各写了一首诗：

无花无酒更无人，独立苍茫影弔形。长城中坏到今日，沧海横流观我生。

生入玉门未有信，上穷碧落又何情？微吟自寄幽兰怨，不作清秋变徵声。

干校当然不会无人，这里说的是没有知音和亲人，思想独立的他四顾苍茫，心中充满孤独之感。中华民族的元气和优良传统已遭破坏而中断，自己一生都在沧海横流之中。生命进入宫阙玉门而得不到诚信，“通天”了又有什么情义？悄悄地自吟寄托高洁的幽怨，却也不采取悲伤的音调。

曾经四十九风霜，镜里头颅谗未苍。入世无心远忧虑，献身有愿立刚强。

三生慧业销难尽，九死形骸老更狂。呵壁问天天不语，微吟渐似入微茫。

他的“天问”，问的正是当时难以回答而日夜思索的问题。“三生慧业”，即贯通过去、现在、未来的智慧的业缘，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无论怎样折磨也不能放弃，思考还要进行下去，青年时代献身民主自由的志

愿依然刚强。虽九死而犹未悔，老而更烈。好在虽然经受了几十年风霜，并未白发苍苍，身体还是健壮的，精神还是年轻的。

他是 1973 年周总理点名让他回北京的。那时候，“文革”把国际宣传、对外联系大为削弱了，急需恢复和加强。周总理把新华社军代处张纪之找去，说，朱穆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出来工作嘛！李慎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出来工作嘛！这样，慎之就回到了新华社。这年生日，他又赋诗抒怀：

难得金刚不坏身，偶拈髀肉只惊心。百年已半阅今古，一事无成感鬼神。

渐觉知非兼知命，应能忧道不忧贫。补天填海情未了，独对斜阳鞭影频。

虽然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尚未解决，总算又回到岗位了。历经许多折磨，体格依然强健还是可以庆幸的。偶尔拍拍大腿激动一下，也只是所见所闻使人有点心惊而已。五十年来阅历了不少历史和现实，专制传统和造神运动总在作祟，当初理想中的目标都还没有达到。到了知命之年，已经渐渐觉悟什么是谬误，什么是客观规律，并不为自己困苦发愁，只是为理想中的大道未行忧虑。补救民主与科学缺失的大工程的热情依然激励着自己，虽然已近黄昏了，时不我待，但是历史责任仍然像鞭影一样频频驱使自己奋进。

1976 年 8 月，还是在他的生日，他敏锐地感觉到，“文革”已是强弩之末，新的变局正在酝酿之中。他又以诗言志：

回首苍梧云正愁，覆棋一局未全休。曾经沧海鱼龙壮，已迷归程燕雀秋。

四塞河山横落日，八方风雨逼皇州。戴盆郁郁成何意，且向樽前摩蒯缠。

这里的苍梧指湖南九嶷山。愁云弥漫，“文革”已是残局。这年清明节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民主运动，已经显示出来反对专制的力量正在壮大，我们这些曾经投身民主运动的老人壮心未已；而维护专制权威的那些跳梁小丑已经像迷路的小鸟一样在秋风中挣扎着。“红太阳”正在西沉，大地河山阴影横陈，八方风雨正在逼近京城。岂能“戴盆望天，不见星辰”，郁闷寡欢，痛饮一杯好酒，手握草绳缠绕的剑柄准备战斗吧！二十多天后“红太阳”终于落山。不久，“四人帮”就擒，四海欢腾。“文革”不宣而止。

那时候错划“右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1978 年 3、4 月，胡乔木忽然让第一个改正了错划“右派”的温济泽对李慎之说：你赶快写个报告，检查一下，要求重新入党。慎之坚持自己并没有可检查的，首先得宣布我是冤枉的，把党票还给我，而不是重新入党。拖到 1979 年 1 月，上面指定要李慎之随邓小平出访美国，当顾问，新华社才加速给他办完了改正错划右派和恢复党籍的手续。他并没有作什么“检查”。后来他在给党支部写的一封信中说：“我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我曾经承认了我没有犯过的罪。”

自从我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之后，就同李慎之失去了联系。1979 年我回到北京后我就去找他。他们夫妻俩与三十多岁的女儿，同住在复兴门外黄亭子一个 15 平米左右的房间里。生活虽然艰苦，但夫妻俩都很乐观。我们离别二十多年，劫后相逢，感慨万千，想起来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谈起件件往事，无不催人泪下。

1980 年，他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组建美国研究所，任所长。1984 年 1 月，担任赵紫阳总理率领的访问美国代表团的特别助理。1985 年，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8 年初，当选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选为主席团委员和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委员。这些年，他又满怀希望地奔忙起来，为的是中国能够早日进入世界民主潮流。在历经苦难的中国大地上，尽管还泛起过“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逆流，改革开放的主流一经形成，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拽住它前进的总趋势的。

1989 年春天，以中国新一代青年学生为主力的爱国民主运动勃然兴起，洪流滚滚。其中难免混入一些别有用心心的极少数人，而执掌特权的某些人也就捕风捉影，借此陷害和打击满怀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号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领导人竟然惊慌失措，调动几十万大军对待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酿成史无前例的流血惨案。最后，不知是为了缓和还是为了掩盖，用了一个中性名词，叫做“政治风波”。我们作为四十年代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参与者，完全理解新一代爱国青年学生们纯洁无私的心灵。李慎之很自然地站在青年学生一边，反对无端戒严，反对武装镇压。他坦诚表示不愿在刺刀底下“做官”。于是，他又一次成了“犯了严重错误”的人。1990 年 9 月被免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之职。1995 年离休。我在 1985 年人民大学调整领导班子后保留了一个校务委员和顾问的名义。1986 年 9 月到 1988 年 8 月应胡绳同志之邀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1990 年秋就离休了。

我俩重逢以后，特别是离休后，直到他去世前，经常来往，一起反思历史与现实，对中国，对世界，上天下地，无所不谈。我们的思绪一起发展变化，互相启发，互相激励，互相应和。真可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八十年代初，当我们从“地狱”出来重新回到“人间”的时候，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健忘症”或“僵化症”患者和不肯放弃从专制制度中获取的特权的人们以外，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亿万人民，都在反思同样的问题。在这场没有人发动、没有人号召、没有人领导、没有人组织的全民大反思中，一些知识分子，一些经历丰富的老同志，走在最前列。李慎之自然也带着自己二十多年间已有的反思，走进这个浩浩荡荡的反思大军。

他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熟悉世界各国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博古通今，视野开阔，自然想得很多很多。但是，在 1989 年“政治风波”以前，他几乎没有以书面形式发表过自己的所思所想。1999 年，在为《燕京大学人物志》写的《李慎之自述》中，他曾坦言：“我还是一个胆小鬼。八十年代，我虽然也在若干全国性的学会当领导，出席各种学术会议，高谈阔论，但是并不敢写什么文章，原因只是因为心有余悸，怕让人抓住把柄。九十年代开始，有时也敢写点文章了，然而瞻前顾后，不敢尽辞，而且一年顶多也不过一两篇到五六篇”。

敢于公开说出自己“胆小”，这正是一种难得的勇气。而且，这恰恰说明，在这个国家里，公民还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不论如何，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二年，终于说出了心中沉寂多年的话，发出了我们时代反专制、反垄断、争民主、争自由的最强音。“数”不在多，有“质”则灵。只是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就风传海内海外，具有雷霆万钧之力。十二年间发表了将近五十篇，几乎每篇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精辟的议论。这里只能作些简要的介绍。

➤ 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1999 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这年元旦，我写了一首诗：

九九新年桃符新，中华五十历征尘。英雄鲜血铺前路，烈士遗言警后程。

肝胆陈词真国士，逢迎腐败多小人。艰危时局风云骤，向背何归系人民。

为纪念“五四”，李慎之“肝胆陈词”，写了一篇大文章，题目是《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最后大声疾呼：“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启蒙的火炬重新点燃起来！”这可以说是这十几年他做的大量工作的主旨。由于种种缘故，“五四”启蒙运动八十年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这是中国人民多年来遭受的一切灾难的总根源。启蒙，主要是揭开专制主义对人们的蒙蔽。

到了二十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实现民主化，为什么中国还是专制社会？李慎之认为，这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他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不同的概

念。“传统文化”是指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比如：诗、词、曲、赋，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学说，政治、宗教、礼仪、风俗等。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丰富的、复杂的，是不断产生又不断消亡的。“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渗透在各种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神或灵魂，它是基本不变的、相对稳定的、单一的，贯穿在上述各种形式的传统文化之中，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一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它的核心就是：“九五之尊，至高无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在皇帝被推翻以后的一百多年里，专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仍然长盛不衰。

我和李慎之在上初中的时候，学过一首歌，头几句就是“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几十年来全国人民都得高唱《东方红》，歌颂“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一个什么“救星”，这就是专制主义的另一面——奴隶主义。专制主义这个合二而一的结构，决定了中国的政教礼俗，也决定了中国的国民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民众被训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胸前佩戴毛的像章，手中挥着毛的小红书，口中喊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种专制下的狂热，比起三十年代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法西斯狂热，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专制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李慎之把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称帝，算作中国专制主义的起源。中国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持续了大约二千二百多年，在世界历史上是最悠久的了。从 1840 年算起，中国向现代文明的过渡，已经有 160 多年的历史。在这 160 年中，各代在物质文明方面都有所成就。但政治文化传统变化很少。中国专制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顽强，不但为两千多年间历代皇帝所实行和发展，而且在帝制被推翻以后，还为一代又一代的当权者所死守，视为巩固自己的特权的无可代替的法宝。

1999 年国庆之夜，慎之在《风雨苍黄五十年》这篇血泪文字中写道：

五十年前，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国建立后的大政方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最重要的一段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最初读到的时候，心头不免一震。但马上就想，这不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气派表达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直到 1956 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共识：“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后若干年，再回想在西柏坡的时候，听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敢于胜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扫龙庭坐天下”；又再过若干年，听到毛主席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才憬悟到其中有一个贯通的东西，有一个规律，那就是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而那是我在开国的时候不但理解不了，而且想象不到的。

李慎之揭示：实行言论管制，愚民政策，这是中国专制主义最可恶、最黑暗的一个特点，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在中国以言获罪，以文字贾祸的，代不绝书。毛泽东时代，几乎每次政治运动，都抓住人们的言论来批斗、定罪。不只是政论，还有诗歌、小说，不仅是公开发表的文字，甚至搜罗人们的私人通信、日记、笔记。到今天，报纸、书刊、甚至互联网上发表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列入中宣部的“黑名单”，从此禁言，或者以“颠覆国家安全”的罪名，判言者有罪。

中国专制文化传统之一是把专制主义虚伪地伦理化、人情化，老百姓是“子民”，历代统治者都“爱民如子”，而儿子必须绝对服从老子。直到现在“父母官”还挂在人们嘴上。“文革”期间更是大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中国近代的许多思想家，都批判过专制主义，倡导过民主主义，李慎之的创见是把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区别开来（也有其他一些学者持相同或相近的观点），从而比较深刻地揭露出来毛泽东推行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中国专制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毛泽东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是打着革命旗号的专制政治体制。

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从“焚书坑儒”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一直在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的桎梏下。如何才能拔除专制主义这个毒根呢？李慎之呼吁：首先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和民主启蒙教育，而且只有先实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才能完成大众的民主启蒙教育。

➤ 究竟什么是民主？

我们这一代人从年轻时候参加民主运动，但是许多人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李慎之说：我曾问一个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分人的认识。甚至我们的师长，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亦是如此。在“五四”运动中高举民主旗帜的陈独秀，当时也不十分清楚民主的含义，曾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当他晚年病在四川江津时才醒悟到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分，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导致个人独裁。但这时他已不能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了。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如果国家不建立民主体制，民众不具有民主意识，那么把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可能会被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在中国，似乎谁打下江山谁就该永远坐江山。结果是“以暴易暴”，独裁者一个接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台”，专制主义香火不断。

争民主必须反独裁，但是反掉独裁之后如果不建立民主的国家体制，如果不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教育，保证公民学会行使手中的民主权利，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那么新的独裁者就会应运而生。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实际上当年的民主国家都有类似的教训，如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仑一世和三世，都曾反对专制独裁斗争的领导人，他们一旦取得政权，就利用自己的威望，重新走上专制独裁之路。在苏联和中国出现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新的专制主义，打着最革命的旗号复辟专制主义，具有迷惑群众的特征。不断揭露这种新的专制主义，还民主的真实面貌，这是我们早年争民主争自由反专制反独裁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李慎之对中国人民的重要贡献。

在中国，许多人是懂什么叫民主的，突出表现在“民主”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泛化已极。慎之说：“就我个人经验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儿的。”常有人说：某某人作风民主，某某人作风不民主。或者说：这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类说词，在国内几乎处处可以听到。对外简直无法翻译。这些年，李慎之特别求索了民主的确切内涵。他追究了民主这个概念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根据世界上大多数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确认民主应当严格地归于政治范畴，它由互相联系的两项内容组成：第一，民主是用来表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即国家政权的组织、管理和运作机制。第二，民主是用来表示公民拥有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的，即公民拥有选举、监督、罢免国家领导人和决定国家重大事情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利是普适的、不可剥夺的。“争民主”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国家的民主体制，保证全体公民拥有普适的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

李慎之认为政治改革必然有一定的风险，但付出的代价是最小的。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中国大陆在民主的发展上，不但远远落后于俄罗斯，而且落后于印度。俄国行，印度行，中国为什么不行？如果不及时启动政治改革，中国将来的经济改革可能像飞机在空中失速一样，造成惨剧。

李慎之“发明”了“大民主”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后来却在全中国甚至几个民主国家里，闹得鸡犬不宁。这

怪不着李慎之，是毛泽东接过这个词儿赋予它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内容。毛在 1956 年批评了李慎之提出的大民主，到了“文化大革命”却又提倡“大民主”，甚至把体现他的“大民主”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塞进了“宪法”。他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实同李慎之心目中的大民主截然相反。当时新华社有几个造反派头头对李慎之说：“你这个右派分子也该翻翻身了。毛主席也主张大民主，你说大民主有什么错？”李慎之说：对这，我只能木然以对，渐渐在心里凑成这么四句：

十年前事已成尘，不向天花悟昨因。洗尽狂名销尽想，笑他多事解铃人。

他说：在“文革”中我已经悟到，毛泽东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实与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至少是用以巩固专政的一种手段。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与“文化大革命”其实都是他所说的“大民主”。只不过，相对而言，反右派与反右倾是比较小一点的“大民主”，而“文化大革命”则是特大的“大民主”。奇妙的是，“十年风水轮流转”！又过了十年，邓小平又否定了毛的“大民主”，取消了“四大”。慎之说，他小时候受过一些孔孟之道的教育，长大了又受过一些西方老派自由主义的影响，一贯警惕群氓心理，痛恨暴民政治，从心里眼里反对“四大”。

➤ 削肉还母，剔骨还父

李慎之从个人迷信中开始觉醒的时候，说要“削肉还母，剔骨还父”。这不仅是要把受之于自己长期崇拜的那个人的几乎成为自己的血肉的那些思想，抛还给那个人。经过以后反思再反思，这句话的含义，也包括了曾经长期支配我们一切的所谓“红色经典”——实际上是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那些东西。

前边在“思想发展的起点”那一部分已经提及，我们这些人当初倾向共产党和参加革命的一个因素是受到书报上所介绍的苏联的美好景象的影响。自然，连带着也就很容易地接受了苏联化、教条化（经过斯大林炮制）的“马列主义”的某些概念。中共又把这些概念神圣化，使之成为支持我们的理想的骨架。

苏共二十大以后世界上接连发生的许多震撼人心的事件，早已引起李慎之的思考。1957 年夏天“反右派”运动开始的信号，是《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后来，在李慎之的脑子里，不知道出现过多少个“这是为什么？”世界上一年又一年出现的很多实际情况，看来看去，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那些理论，总是对不上茬。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1989 年夏天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以后，同年冬天到次年年初 74 年前“一声炮响”出现的那个庞然大物突然崩解以后，人们都在更加深入地反思。是脱胎换骨的时候了。

李慎之是这场大反思中的佼佼者。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新华通讯社担任国际部副主任时，主持过《参考资料》的选材、翻译、编辑工作；先后担任过周恩来、邓小平、赵紫阳的外交顾问、出访助手，熟悉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在担任社科院副院长期间，主管美国、日本和西欧等研究所的学术工作；经常出国访问、交流及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因此，他能及时地获得未经歪曲的国外真实信息。他本人有很高的外语和中文水平，不仅能直接阅读和使用外文资料，还能发现过去“经典”翻译中的错误，这些错误往往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密切关系。他主观上有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进行反思的强烈愿望，客观上又有如此有利的条件，因此在二十世纪末，他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不足为奇的。

在反思中，认识到自己早年特别信奉的关于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的理论并不正确，而关于人类社会分为三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是符合世界各国历史情况的，也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这三个发展阶段是：原始（狩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此相应的发展阶段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也叫现代文明）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从 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开始的。虽然发达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具有不

同特点，但具有共同规律。传统社会有很多不同的类别，现代社会却基本是相似的：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体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从三十年代开始，我和慎之就领略了当代共产党人观察分析世界的方法：即将世界分为两大营垒：一个是资本主义的营垒，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营垒。前者是黑暗的、没落的，后者是光明的、欣欣向荣的。无论发生什么天灾人祸，国内形势任何时候都是一片“大好”。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种认识和分析世界的观点和方法，大概维持了四十年。到毛泽东晚年：曾提倡“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他，才又别出心裁地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取代“东风”与“西风”。过了十来年，柏林墙被推倒，苏联解体：“三个世界”理论随之失效。就像走夜路的人曾经需要拿一盏灯笼或者拿一个手电筒一样，否则就无法迈步，那么中国人在失去“马列”这盏灯笼或手电筒之后，应如何认识当今世界的发展呢？

李慎之处于世纪之交，回顾过去的一百年，展望今后的一百年，肯定无疑地预测：对于二十一世纪来说，现代文明即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化”的进程必然会继续下去。在中国，李慎之第一个提出了“全球化”理论。我认为，全球化理论是他的思想的又一精华，是他经过多年反思，抛弃社会发展五阶段的理论，认识到“英特纳雄纳尔”不可能实现之后，对人类社会和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

他清醒地看到，中国从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包括经济、政治与生活习惯在内的广义的文化，要向一种全新的文化转变（不仅要向工业化时代的文化转变，还要向信息时代的文化转变），这是一个激烈而痛苦的过程，交织着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当务之急就是要发掘出我国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与其他各民族文化共同的价值观念，加速汉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和，从而促使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逐步融入全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之中。他特别警惕，中国经济和文化的振兴，如果走上沙文主义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祸；如果走上全球主义的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福。

李慎之特别期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出一个“全球价值”来，这也是自古以来贤哲的理想。人类早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这类比较抽象的概念，渐成“全球伦理”，各个国际组织所制定的各种公约，如联合国“人权宣言”等“游戏规则”将会更加规范。在二十一世纪，专制主义、权威主义、暴力理论必然要消失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球价值之中。个人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同属现代化的三要素，而在中国传统中压根儿没有个人主义，“五四”之后刚介绍进来，不久就被批倒、批臭。没有大批富有进取心和创造性的自由的个人，现代化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是搞不起来的。当然，分散的个人并不能形成最有效的力量，要把有进取心、创造性的自由的个人组织到真民主真法治的社会中来。也可以说，只有实实在在的民主法治社会才能培养出这样的个人来。

➤ 晚年的企盼——做个启蒙的公民教员

李慎之重温了世界史，确知所有现代化的国家，从农业文明转轨到现代文明，都经历了反对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启蒙运动。而且，启蒙的过程中都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艰苦工作。欧洲的启蒙运动继承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反对中世纪以神本主义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成果，尽管如此，仍然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经历了种种风刀霜剑。在这过程中难免有反复，曾经信誓旦旦为民主而奋斗的某些人，一旦掌握了统治权，过不了多久就会重新专制独裁起来，或明或暗地登上皇帝的宝座。这在历史上并不罕见。

李慎之回顾了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实行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的时间特别长，启蒙运动更不是可以短时间完成的。从十九世纪末的戊戌维新算起，经历了一百多年，曲曲折折，至今离完成还很遥远。“五四”

运动，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杆大旗，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进步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在胜利进军中蒋介石一变脸，又成了专制独裁。抗战时期，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大旗，反专制争民主的运动风起云涌，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理想，在爱国青年中广泛流传。抗战胜利以后，人们认为实行宪政民主已经伸手可及了，出现了又一次民主运动的高潮。这场运动持续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告停顿。而启蒙的任务远未完成。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启蒙运动的停止，也是十九世纪末以来八十年间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最后结束。但是，“五四”的火炬在人们心中长存不灭。

李慎之经过细研深思，弄明白了：“五四”先贤的思想倾向就是三百年来早已成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在人类社会由现代文明向信息文明前进时，重大的科学发明都是从个人开始，然后通过信息共享成为全人类的财富。这些事实说明：当人类社会向信息文明迈进时，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与人权，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亿万中国人都从奴隶主义和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成为现代文明需要的富有个性的充满创造力的思想解放的自由人，中国才能有真正的现代化。

李慎之分析了毛泽东批判的所谓“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认定两者与真正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毫不相干，是把具有正面意义和精确内涵的学说庸俗化了，败坏了在启蒙运动史上有积极作用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名誉。毛的批判，实际上是提倡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和奴隶主义，在五、六十年代生活过的人，都还记得在反右斗争后开展的批判个人主义运动，提倡做共产党的“驯服工具”，做“小小螺丝钉”。虽然这个“比奴隶主义还奴隶主义”的工具说与螺钉说，在今天已经无人提及，但将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视作洪水猛兽者，还大有人在。李慎之特别希望重新回到“五四”，为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正名，真正做到“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在李慎之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像个孩子一样，经常突发奇想。他想得最多的是两件事：

第一，望能做个大学校长，为国家培养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高水平的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化人才。他批评我：你当过大学校长，但不能实行你的办学思想，学校成了党化和政治化的工具。这是我们一代人的悲哀。大学本来应该是进行启蒙的最好的场所。

第二，如果有“来生”愿意当一辈子中小学“公民”课教员。希望能够为中小生编一套12册的《公民》课本。要让新一代中国青少年从小就知道民主、自由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力；从小就知道批评和监督国家和地方领导人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从小就知道如何保卫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如何完成自己应尽的批评和监督领导人的义务。这是最起码的启蒙。

我们企盼着那一天早些到来，那时候，每个公民都成为懂得并且切实实行和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合格的公民。我们深信：“五四”先贤的遗教绝响必然会重新振作，他们的嘉言懿行必然会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他们的信念必然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信念。九曲黄河归大海，万流虽细必朝宗。到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人人都能尊严地以自由、自律、自强、自胜的姿态参加全球价值的建设工作。

我们从争民主的运动中走来，还要向建立完美的民主制度的境域走去。

我们老了，但只要一息尚存，总要尽力向那里走去。 

副刊

编者按：本期副刊我们选择了两篇散文，一篇是曾金燕女士的《查拉图斯特拉新说》，一篇是野夫先生的新作《畸人刘镇西》。今年不满 28 岁的曾金燕女士，是著名维权人士胡佳的妻子，2007 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当年“影响世界一百人”，并于 2008 年获得德国之声博客大赛“记者无疆界”奖。从事各类社会维权事业之余酷爱文学，勤于写作。

野夫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作家，在当代诗歌、散文、小说等领域均有建树。他的文章，承接古风，呼应民国，在汉语、文体、历史与情感之间，找到了最稳固的平衡点。他的部份作品无法在中国公开发表，流传于网络，或由海外出版商出版。

■ 查拉图斯特拉新说——以查拉图斯特拉纪念屈原

曾金燕

➤ 泥潭

查拉图斯特拉滑进泥潭，发着恶臭的肮脏淤泥慢慢地吞噬他，妄图把他变成雕塑。查拉图斯特拉毫不惊慌，他直直地挺立，不久便停止了下沉——淤泥只是齐腰。他伸手抓起一把淤泥，看到带着腐肉的骸骨。

查拉图斯特拉大声笑了：

是的！你改变了你的外形，不再当油锅——吱地一声就把人烤焦；也不再做刀山——无论扔到哪个方位，都一刀毙命。你如今化作泥潭，拉住路人的双脚，让他们在惊恐的挣扎中倒下，窒息身亡。

在坚定者面前，你不过是只纸老虎！恐惧者死于你的虚张声势。信息一旦传播出去，他们就会明白，你这个浅薄的烂泥潭，经不起人们挺直腰杆，有何可怕！太阳会一直暴晒，吸干你的水分，你还有什么能力害人！勤劳的世人，会把你变成肥沃的农田，春天播种，秋天收割。

放牛的小童被查拉图斯特拉的骂声引过来，看见站在泥潭中的查拉图斯特拉两眼灼灼有光。小童倒地便拜：

啊！你是神明吗？啊！你是救世主吧！在这个大

泥潭里，你居然活着！

这个泥潭，夺去了我的爷爷、我的父亲和我的哥哥的生命，还夺走了我家中唯一的绵羊。而你，站在泥潭中央，痛斥它，解了我心头的、仇恨与悲伤。

传说中这个日益扩大的泥潭，吞噬了无数小孩的灵魂。谁要是反抗它，谁就会在漆黑的夜晚被龙卷风带走，被埋葬在泥潭中央。我们都充满了恐惧，远远地躲开它。

查拉图斯特拉叹了口气，对小童说：

孩子，我不是神明，也不是救世主。我只不过是一个路人，我挺直了腰杆，泥潭也奈何不了我！不要惊慌，它只是一个低浅的泥潭。



曾金燕，1983 年生人，Blogger，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07 “影响世界一百人”，获 2008 德国之声博客大赛“记者无疆界”奖。酷爱文学，勤于写作。

查拉图斯特拉爬上岸来，洗净淤泥，向前方走去。
小童目瞪口呆。

► 卖艺者

查拉图斯特拉还没有出现，集市上已经到处传播：查拉图斯特拉就要来到！骑着大马的士兵，鞭打街边的小贩，驱逐蹒跚的老妇和调皮的孩子。集市变成广场，圈出一块空地，女人的鲜血和眼泪，渗入集市的泥土。

卖艺者在空地上搭台，他们将在这里欢迎查拉图斯特拉。舞台上彩旗飘扬，卖艺者衣着鲜亮，围观者身蒙尘土，手里持有艳丽的花朵。一个被胡子覆盖了半张脸的老人出现了，人群里欢呼雷动。啊！伟大神圣的查拉图斯特拉，宇宙间最睿智的长者，和平的信使，查拉图斯特拉！

查拉图斯特拉吃惊地向四周看去，卖艺者并不是向他欢呼，而是朝一个老人的胡子致敬。查拉图斯特拉被围观的人群拥着往前走，观看卖艺者高空走钢丝，命悬一线，钢丝下并没有安全网。卖艺者翻腾得越多，人群的欢呼声越响亮。

查拉图斯特拉看见那个老人竭力说话，但是却被他长长的胡须淹没。查拉图斯特拉对身边的人说：

我站在一块血腥的土地上！狂欢的人群向一个老人的胡子膜拜！以智慧与和平的名义，践踏弱者的尊严！为什么还叫他查拉图斯特拉？世界上难道凑巧有两个人同名，还是根本就是盗用我的名义！我也不是智者，我也不能带来和平，我最为得意的力量，也已被岁月消磨。

狂欢者暴怒，撕去查拉图斯特拉的衣服，他们呼喊着：你妒忌查拉图斯特拉了吧！你才是个虚荣的冒名顶替者！我们需要一个狂欢的理由，不要扫了我们的兴致！快滚！否则撕碎的就是你老朽的身体。

查拉图斯特拉摇头叹息。人群散尽时，舞台拆去，卖艺者竖起石碑：查拉图斯特拉到此一游。 T

■ 畸人刘镇西

野夫

畸人，是伟大的庄子为汉语贡献的一个名词。他认为这样的人，“畸于人而侔于天”；也就是说他们在人世间孤独无匹，却与天道完美契合。



野夫，本名郑世平，作家、编剧、出版人。1962年生，湖北恩施，1978年考入湖北民族学院中文系，1982年组织成立鄂西第一个诗歌社团“剥枣诗社”，1985年担任湖北青年诗歌学会常务理事。1986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组建“后现代诗人沙龙”。毕业后做过警察、民营书商、自由撰稿人等多种职业，发表作品百余万字。2010年获台北国际书展非虚构类图书大奖。代表作有散文集《尘世挽歌》，长篇小说《父亲的战争》。

我每每看见这个词，就想起故乡的莫逆之交老刘。在这个世界，我有幸结交过万千奇人，但是真正能当得起这个“畸人”称名的，似乎非他莫属。

最近的一次还乡，我们又坐到了一起。朋友们问我——为什么还不写老刘？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老刘自己便解释——他说要等我死了才写的，可是我偏生是个老不死的，看来诸位还得等了。

大家笑罢，我忽然内心涌出一丝歉疚和凄凉。难道我真的要到他坟前去焚稿，才能倾尽我们三十年的交谊吗？我何不趁他健在，就给他朗读我积年的知遇和敬重呢？

是的，是朗读而不是给他看，他早已看不见我的文字了。他圆睁的双眼在这个世界始终像怒目金刚，可是却早已被黑暗遮蔽。他每天在孤老院里，拿着我的书去祈求那些识字的护理员读给他听，听着听着那

枯井般的眼眶就泉涌两行。

就是这样的一个睁眼瞎，每天却拒绝策杖；他独自像明眼人一样横行于闹市通衢，而且总要高唱着自己所谱的歌曲，旁若无人地行走在他的江湖生涯中。

二

1977 年我还在利川高中读书时，便认识了老刘。但是那时他不认识我，那时他在广场的戏台上被反绑着示众，然后我们这些集合去参会的学生，惊骇地看着他被宣判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刑八年，然后被恐怖呼啸的刑车带到了省城监狱。

1981 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小城，浮躁孟浪地成为了一个薄有姓名的诗人。一日，我和文化局长刘湘松在书店闲转，正在翻看新到的《中国古典十大悲剧》。忽然一个带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中年男人急匆匆闯来，近乎无礼地直接我们从手中夺过该书开始翻阅。他一边看目录，一边嘀咕——牡丹亭怎么也收进了悲剧？

刘湘松是儒雅富学的人，便搭腔道——这个在学界也有争议，可算悲喜剧吧。他一听我们的议论接近内行，立马回眸打量问道——两位高姓大名啊？我们眼见此人古怪，寒暄着自报家门；他突然双手各自紧拽我俩，高声笑道——神交已久，缘悭一面。未曾想今日邂逅，请两位务必到寒舍小坐。

我们赶紧模拟他的古旧声腔，回问阁下怎么称呼；他爽朗答曰在下刘镇西便是。我们都记起了这个小城著名的政治犯，想到初识不便登门，便委婉客气曰改日拜访云云。哪知他完全不由分说，直接强拉着我们跟他进入一个歪斜的木楼。

上得楼来，他家却柴门深锁，我们又急忙托故说下次下次。他哪里肯听，直接将我们按进邻居的椅子，说他去去便来。只听他在院子里喊了几声老妻，便去敲隔壁一家的门借斧头。我们像遇见强人打劫一般，急忙出去拉住他说，千万别如此，我们改日一定再来。他已然利器在手，口中念念有词曰——幸有嘉宾至，何妨破门入。手起刀落，门锁已被他砍成两截。就这样，我们在他不足十平米的暗室，杯茶订交，成了今

生头颅相许的朋友。

三

老刘似乎是一个始终活在古代的人。他无论言谈举止，处处都透着古风。上面那些对话，外人以为我乃虚构明清小说的口吻，殊不知利川的百姓，但凡接近过老刘的人，皆知我所言非虚。

那时的他约略四十多岁，皮肤漆黑，额上皱纹深刻如横写的川字。浓密的眉毛几乎要连接在一起，下面是一副宽边的五千度的眼镜。他自嘲说根据古代相术，他就是天生的苦相。我看他的形貌，不需要懂麻衣柳庄，那也是绝对可以看得出的悲苦。

那时他刚刚平反提前出狱，原本没有工作，故而不存在补偿工资一说，三年多的深牢大狱那算是白坐了。问起案由，则才知道其中的荒诞。原来他早在 1958 年，就因同情右派乱说反动言论，曾经被劳教过三年。两劳人员在中国，属于地富反坏右之中的坏分子一角，属于要永远监督惩罚的对象。

但凡国家有大事，基层政权都要集中这些五类分子学习训话，观察反应。1976 年的打倒四人帮，自然是审看这些所谓反动派的最好时机。他被叫到了城关镇政府，问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老刘一生耿介磊落，反问主官是要听真话还是假话。主官一向反感其桀骜不驯，自然窃喜说要听真话。他说——那你等我回去把后事安排一下，马上就来回答。

老刘回家收拾一床薄被（那时坐牢是要自带被子的），妻问他干嘛，他说明缘由——要去镇上讲真话，肯定就会坐牢。他把妻女托付给一家朋友看顾，妻是文盲，抱着他的腿哭泣不放，哀求他不要去管什么国家的闲事。他是那种绝不屈服和畏惧的人，还是悲风扑面地走向了衙门。

他对那些主官慷慨激昂地说——四人帮固然是极左，但华国锋也是极左出身。但凡了解他在湘潭地委书记任上的作为，以及文革中的火箭突起，就可以断定这次宫廷政变不过是窝里斗。历史最终将证明，他只是个过路桥，还有人将踏着他过河并最后拆桥的。

此番高论在当时自然石破天惊，很快便获刑八年。求仁得仁，于他而言不过是换一个碗吃饭。但是历史却很快证明了他的预言，于是他得以提前解脱桎梏。问题是在中国，这样的人还能活下来，多数则是要谢皇恩浩荡的，哪里有国家赔偿一说。他只好重操旧业，靠在搪瓷碗盆上烧字养活妻女。

四

烧字这一手艺，在今天已然绝迹。那时各个单位学校食堂，多是使用统一的搪瓷碗盆，为了防止被人偷窃，往往便要烧上某某食堂几个字做记号。学校毕业生或军队转业者，也都喜欢发一个某某纪念的碗盆。于是，操此手艺者就能勉强求食。

烧字的工序是先用一种红色的瓷粉矿物质，在器皿上书法，然后再用高压煤油喷灯，像氧焊一样把那些字融进器皿，冷却之后就再也洗刷不掉了。但是一个单位烧过了，基本永远不会再有需要。也因此这一手艺者，注定要在各地流浪乞食。我认识老刘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背着一个简单的木头工具箱，走遍了二十几个省的无数县镇的。

他和那些江湖手艺人唯一的不同是，他的工具箱里永远放着《楚辞》。那些异乡的青灯雨夜，屈子的骚赋一直伴随着他的自我放逐。没有人相信这个衣衫落拓的苦命人，竟然是楚辞的横流倒背者，且更是楚辞古韵和名物的民间研究者。

他的生涯便是这样越走越远的，赚来一点钱，路上便邮寄给妻子，自己只留下到下一站的车票。每半年左右回来一次，休息十天半月就又要上路。每次倦游归来，首先便要到我处小坐，谈谈在路上的故事，以及沿途见闻的国家走向。

他比我大二十几岁，萧条异代，我们却成了山城最密切的忘年之交。那时的小城多雨而寂寥，冬天往往深雪覆盖。他在许多个夜晚踏雪而来，在我的斗室围炉长话；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江湖老男人，读完我的《致毛泽东》而掩面恸哭。他的青春被毛时代毁灭殆尽，内心的苦楚无人可诉，我则是他唯一信托的兄弟。

我也常去他的陋室看他，他是著名的围棋迷，在我们那边远小城，那时熟稔这种玩意的不多几人。因此全县的棋赛，他也往往可以入围前三。有次我去，看见他正和一位老师手谈。他的妻子一会过来对他耳语——中午没米下锅了，要他去找人借米。他人棋正深，挥手不语。妻子眼看断炊，又来高声催促，希望对手封盘，下午再战。对手尴尬起身，却被老刘一把按住，只好接着迎战。其妻再也按捺不住，一把掀翻棋盘；老刘恼羞成怒，几乎要动手，终也还是被我劝住。我才知道他家的日子，竟然窘迫至此。

次日，老刘来我这羞涩地借钱，他说只要五块钱，够他上路的车票即可。我要多给，他却坚持不要。我只好将吃不完的粮票塞给了他，看他摸索着远行他乡。

五

老刘的妻子叫桂枝，我们没大没小也就直叫老嫂子。嫂子也是那种苦相的人，没有工作，独自带着一个上小学的女儿，每天依门守候着老刘的挂号信——那是他们母女赖以存活的一指望。

偶尔我会看见嫂子在街边嗑瓜子，年轻的我好恶分明，想到老刘终年流浪的辛苦和谋生的艰难，便有些郁郁不乐，觉得她不该这样好吃零食。

一次老刘归来，沉重地找我诉说——想要离婚。说这个女人太不理解他了，唯一的一点读书下棋爱好都要被剥夺。那时的我真是不谙世事，立马就表示支持，而且说这个女人太拖累他，希望他早日解脱。

老刘似乎找到了他最在乎的动力，仿佛下定了决心一般出门而去。几天之后，他又颓丧地来了，我以为他已经办完手续。哪知他沉痛地对我说——我不离了。我询之，他这才告诉我，关于他的婚姻与爱情、、、、

老刘十几岁就被劳教，出来之后带着坏分子的帽子，自然没有人敢嫁他。那时的他靠当泥瓦工在建筑队糊口，整个青春完全与女人无缘。到了1975年左右，终于有媒人说合，给他介绍了现在的妻子。媒人只说是乡下农妇，守寡带着一个女孩，且女孩还是婆家在喂养。老刘正当年，却又寒促逼人，如何可以挑

别对方的条件，两人很快就结合了。

婚后未几，妻子告诉他自己已经结扎，再也不能生育。女儿是送给别家的，病了需要救治。老刘虽然有些憋屈，但立刻就答应把女儿接回来喂养了。就这样，一个弱小的生命，被老刘抚育到那时。

老刘泪眼朦胧地对我说——我不能离，离了后这个孩子就失去了生活，肯定不是死就是被卖出去。她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孩子，可是我把她养大，就是养个猫狗，那也养出了感情。再说这孩子心地善良，对我如亲父，我岂能看着她被遗弃啊。

当我知道这一深层原因之后，顿觉脸红；在老刘的善良高尚面前，我愧觉了自己的少不更事。他们夫妻此后再也没有什么纷争了，但是哀伤的故事却远远不止这些。

六

我在这个国家，见过无数悲苦的女人。但是像老刘妻子这样的悲剧人物，我还真没见过超乎其上的苦命。有时不免想，这是怎样的一种因缘啊，天地之间竟然把这样两个极端苦难的男女组合在一起，仿佛就是要为这个邪恶的时代立此存照。

老刘新婚未久，某天回家，突然看见高矮一顺溜多出了另外三个孩子。每个孩子都面黄肌瘦，嗷嗷待哺的样子，惊恐地看着他。妻子正在打骂那些孩子，看见他出现也一时手足无措，紧张地不知如何说起，只知道泪流满面。他把妻子拉到一边细问，这才捅开一个天大的秘密。

原来桂枝在嫁给他以前，已经有过三次婚史和四个儿女。前面的三个男人，一个病逝，一个坐牢离婚，一个车祸身亡。她一个无助的女人，怎么也无法独自抚养四个孩子，况且还在那样一个农村极端贫苦的年代。因此，寻求再嫁一个城里人，找一份供应粮，是她唯一求生的可能。于是，她把那几个稍大一点的孩子，各自托付给他们不同的爷爷奶奶家，自己则在媒婆的隐瞒下，找到了老刘这样一个忠厚人。

那个年代到处打零工的老刘，无论怎样善良，实际上都无法养活老婆和四个孩子。桂枝也深知这一点，不愿太拖累他，只敢带回最小的女儿，而继续隐瞒着前面的婚事和孩子。哪知道十多岁的大儿子，听说母亲嫁到了城里，知道弟妹们在各家都在挨饿，便相约一起进城寻母，只为要吃一顿饱饭。

这群半大不小的孩子自个打听，竟然饥肠辘辘地找到了母亲。贫穷的母亲看着瘦骨嶙峋的孩子们，垂泪不已，但是她实在没有能力和勇气抚养他们，也不敢让老刘知道她还有如此沉重的负担和卑微的历史。只好赶紧让他们吃一顿饱饭之后，催促他们回去。孩子们也渴望母爱，恋恋不舍磨蹭着想留下，想和小妹妹一样有人疼爱。母亲万般无奈流泪打骂他们，要他们赶紧趁天黑之前回家。这时，老刘疲惫地回来了。

突然知道这些情况，我想对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毕竟一个女人似乎隐瞒了太多的往事，且无端添出了这么多的责任。老刘听罢妻子哭诉，二话不说，带着这群孩子就进了一个餐馆，他将当天收入的钱全部拿出，为孩子们点了一大盆红烧肉，看着他们饱餐。然后对他们说，他实在养不活全家，甚至唯一的一间房也住不下大家。孩子们还是得回到各自的爷爷奶奶家去，但是每月可以进城来打一顿牙祭。

七

我在1980年代与老刘时相过往之时，他的日子稍微好过一些，养女已经在小学。他一直是利川的文化人之一，爱写诗歌，新旧体都写，与我也不时唱和。他还爱谱曲，偶尔发表在一些基层刊物上，便也其乐陶陶。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一直在默默地研究楚辞的古韵和名物。他的足迹主要活动在古代的楚文化地域，因此他有心在各地方言中去求证古音韵的残留现象，以及楚辞中的大量植物名称与现在楚地的存活植物的对应关系。

音韵学一直是中文系称为“绝学”的学问，我在第一个大学时，古汉语老师讲到音韵学时，便明确说自己不懂，大家自学粗通即可。老刘这样一个从未上过大学的民间爱好者，且又时刻处在乱离岁月中，与

学界毫无联系，他怎么要迷恋这样一种孤僻的学问呢？为了成全他的爱好，我还是送了他不少楚辞研究的书籍。

悲剧还是要上演了。某日他兴冲冲地找来，从怀里掏出一卷书稿对我自得地说——我终于完成这本书了，半生的研究总算有个结果。我拿过来一看，原来是楚辞韵读的手写稿。也就是说，楚辞按今天的普通话读，很多已经不押韵，但是在古代，它是押韵的。它在古代究竟是怎样的读音，老刘给你一一标注出来——这就叫上古音韵学和方言研究。

我翻看了一下他的稿子，心中犹豫再三，不忍破坏他的快乐；但是最终又不能不告诉他真相。我从书架上抽出我刚买的王力先生《楚辞韵读》和《诗经韵读》给他，对他说——老刘，你晚了一步。老刘急忙打开翻阅，一会只见眼泪滴答在书页上，最后竟然伏在我膝盖上嚎啕起来。

一个民间学人，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更没有学术信息，完全不知道学界的发展状态；他就像一个暗夜的瞎子一样，完全靠自己摸索前进。钱钟书先生曾说，意大利有一个典故成语叫——发明伞的人。老刘实际上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人。此后他焚稿断痴，再也不谈楚辞了。只有在极少的朋友圈子谈起某个乡间植物时，他会指出，这就是楚辞中的某某。

八

一个两劳释放人员，一个高度近视接近盲眼的人，没有固定工作，更没有社会福利，还要加上拖家带口，其日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好转更多。更不要说老刘的性格耿直孤介，不善与人相处了。

一日在小街上，我远远看见他岔开双脚，举步维艰地移动向前；急忙过去扶住他问。他痛苦摇头叹息说，他不幸染上了“坐板疮”，屁股长满脓疮，不能出门谋生，只好在家养病。我问他去医院看看没有，他说哪里有钱看病，就靠自己每天热水烫洗，也许慢慢就好了。

这次我是第一次对他发火了，我大声呵斥他为何

不来找我，他说欠我太多，不好意思再添麻烦了。我说你不知道我是公费医疗吗？我带你去医院以我的名义看病开药，我都是可以报销的，你难道还要为这个鸡毛国家省钱吗？你不赶紧治病出门谋生，你一家子怎么活啊？他说已经借了不少人的米了。我愤怒而哀伤地拉着他直奔医院，打针开药，这么点小感染，对西医来说不费吹灰之力。

他很快好了，又来嗷嗷着借钱上路，总是三五块，反正他每次回家是首先必来还钱的。但是他的生意却是越来越难做了。80年代的改革开放，各单位再也不把盆盆钵钵当一回事了，因此烧字做记号或发放做纪念的，就越来越少。20世纪的突飞猛进，已经残酷地淘汰了太多古老的手艺人，老刘这样的畸零者，面对着时代张皇失措，实在想不出怎样才能跟进别人的脚步。

但他是一生难得低头的人，多年的江湖游历，使得他生命力极强。养家活口——这是男人的使命，他必须硬扛着生活寻求变局。他决定放下他那老旧的工具箱，且很快学会了自己配制老鼠药。他每周一天驱赶出妻女，自己闭户锁门调配那些剧毒品，几乎成了东邪西毒一样的世外高人；然后再去各个乡间赶集出售。感于他的身世况味，我尝赠诗云——垂老街头作药师，一生偃蹇为诗痴。古时君子时终悼，当世高人世莫知。天性淳真不苟俗，秉心清苦已忘机。每回相对还相哭，寒士风姿让我思。

我看他生意清淡，决定帮他义卖一次。那时我在县委工作，满街都是熟人朋友。我让他站一边收钱，我拿着半导体喇叭帮他守着摊子叫卖。过往人群见我卖药，都觉滑稽好笑，一时围观看热闹者甚众。我逮住每一个熟人要求他们必须买，有朋友哀求家里无鼠，买去实在没用。我说不管那些，买去两口子自己吃也行，反正掏钱才能走人。

那天算是帮老刘挣了一笔，但是，这终究不过相濡以沫而已。

九

武大毕业，我要南下海口了。回乡揖别亲友，老刘在街上拦住我说——我受了你多年的恩，却没请你吃过一餐饭。此次你远行，也不知再见之日。你嫂子桂枝说，无论如何要请你去家里喝一杯。

我深知他家窘境，婉拒说你我之间，无需这些俗礼。他像抓贼一样抓住我哽咽说，我也请不起更多的人作陪，就请了你的至交苏家桥，你们俩要是不肯给我这个薄面，那我们今生也就到此为止了。

晚上我只好带着苏家桥去了，桌子上果然没有多的菜，两荤一素一汤，却只放着两副碗筷和酒杯。我诧异，他喃喃云他们全家都先吃了，就想看着我们喝酒聊天，他们一家便足矣。我怎么也要拉他们上席，但是连初中的女儿都坚拒不肯。

我和苏家桥只好坐下开饮，世间这样的请客法，平生我也就看见这一次。酒到微醺，老刘取出他那一把二胡说——我为送你远行，填了一首词并谱曲，且教会了桂枝和女儿。现在聊助两位酒兴，我们全家一起为你们合唱一下。唱得不好，万勿笑话。

就在那空空如也的陋室，苍凉的二胡声开始回旋。他沙哑的嗓子，和着他五音不全的文盲妻子的如泣如诉，再加上一个少女脆生生的童音，像三重奏一样唱起来，且歌词又是他的妻女尚无法全懂的文言。我和苏家桥再也无法忍住我们的眼泪，他们就那样投入地缠绵回环地长歌，我们就这样涕泗交流地低泣。连初懂事的孩子，都唱出了眼泪，这是怎样朴素苦情的一家啊。

那一夜的别情，至今想来还是酸涩。之后，我果然差点真就是相见无日了。

十

我坐牢那几年，每年冬天都要收到老刘寄来的一双老棉鞋。那是老嫂子桂枝一针一线手扎的，温暖结实。武汉的冬天凄冷难言，那些来自山中故人的暖意从脚底升起，使我今生都能笑对尘世炎凉。

刚一释放，老刘就来信说要来看我。间关千里，我不忍要他奔波，但他还是摸到了我那脏乱差的出租屋。这时，我才知道他的眼睛已经基本失去视力了。他拿着我在狱中写的诗集，完全是鼻子顶在纸面上，才能勉强分辨阅读。我劝他不要读了，他坚持要读，他从中读出了我和他两代人共同的那些经历和记忆，他不时狂笑如疯子，不时嚎啕似孩儿。

他的老鼠药因为太有效，国家不许民间配制剧毒，他又失去了生计。但是这样的人注定是天地难杀的人杰，他又改行做起了肥猪增长剂的生意，依旧是瞎眼去赶周边的乡场勉强活命。这时，他的养女已经辍学，小小年纪就到福建沿海打工去了。

那时正是我也走投无路之日，无从帮他，大家布衣相交一场，还得各奔生路。哪知当年底，我为彻底轻身远行，回乡要去为外婆拾骨迁坟，又只有找他帮我出力了。故乡是土葬，偌大的坟堆和沉重的棺材，十年入土的尸身究竟何般模样，这都是我独自无力料理的难事。老刘带着工具和几个晚辈大早随我上山，在乱坟岗上找到我外婆的碑刻，他说——你跪拜完就到一边去等着，这个时候你是难以面对的，就让我代你为婆婆尽孝吧。

他瞎着老眼在那里一点一点地刨土，生怕那些晚辈挖烂了外婆的棺材。最后启开棺盖，我们一起细细地将外婆的骨殖一寸一寸地捡起来，他和我一起扛着已然不到十斤的骨头下山。我们再一次挥泪而别，皆不知未来还有何等厄运在等着。

十一

老刘 70 年代入狱之后，骤然再度失去生活来源的桂枝和女儿，岂是朋友真能彻底照管的。杯水车薪不足以解救艰危时日，更不要说政治上的牵连之虑了。

迫于无奈的桂枝，再次被人介绍到了鄂东的乡下，带着孩子跟一个男人勉强度日。她没有和老刘离婚，心中依旧惦记着这个倔强而善良的男人。老刘出狱之后，人去楼空，他四处打探妻女的下落。没有这个女人，他在这个世界那是真的连家的感觉都没了。桂枝

那边也一直在关注故乡的消息，她终于等到了寻找而来的老刘。贫贱夫妻的劫后重逢，大悲大喜都只换成了清泪两行。那个同居的男人并未为难他们，他们终于又破镜重圆了。

这个有过五个男人的悲剧女人，在 90 年代似乎才开始过上一点安稳的生活。这时，她的其他几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分别工作成家。最小的女儿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跟人远去福建打工，每月给他们寄回一些钱来。老刘真是没有白疼这些个孩子，现在渐渐失去谋生能力的他，终于可以得到孩子们的反哺了。

他们依旧节衣缩食地在底层挣扎。肥猪药的市场被四川刘氏集团垄断之后，老刘的生意也每况愈下了。那年初有改观的我，春节前从北京还乡去看他。嫂子坐在没有生火的屋里瑟瑟发抖，我知道故乡的严寒，问她为何不生火，她说没钱买煤。我问老刘呢，她说上街去写春联卖去了。

我赶到街头，远远看见老刘摆着一个简陋的案子，在那里几乎鼻子贴着红纸，用毛笔书法着给万户千家的吉祥话。他的清涕就在刺骨的风中悬挂着，不时要垂落到纸面。我急忙过去夺过他的毛笔，我说你歇着，我来帮你写。他惊喜地搓手顿足，在一边乐呵呵地看着。

他对我欣慰地说，孩子们都有孝心，他们已经攒下了几千元，终于买了一个破房子，现在正在简单修理，明年就可以搬进自己的屋了。他们一生都是在廉租房里度过的，我能想象他那种终于有家的快乐。

嫂子也渐有老相了，我终于看见了她展眉一笑的容颜。看见这对苦难夫妻，似乎终于熬到了头，我也就略略安心了。谁知道次年突然传来消息——嫂子失足摔死了。我急忙去电详问，原来两口子修好那破屋之后，前去验收，嫂子在二楼一脚踏空，当场就断气了。还没搬进新家享受一日之福，就这样撒手人寰。命运于她，实在是太过薄幸了。

十二

老刘像庄子一样鼓盆而歌，送走患难相依几十年的荆妻，自己也骤临老境了。他一生酷爱的读书写字，因为眼睛几乎完全失明而不得不舍下。女儿每月给他寄一点生活费，基本能保证他的饱暖；但是做饭洗衣这样的事情，他在他的长夜里却实在难以自理了。

恰好我的一个同学这时当上了民政局长，我给她电话说，利川是对不起老刘的。这样一个民间文化人，无缘无故两陷冤狱。而今失明的孤老一个，你们福利院不救助这样的人，那实在不近人情。同学亦善士，很快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哪知他却梗犟不愿去吃这嗟来之食。我只好给他电话，我说人要服老，没有一个朋友可以永远伺候你。你的养女已经很孝顺，但是她在外也不能照管你太多，她也还要开始自己的生活。这样老刘才搬进了福利院。

福利院的住客多是文盲残疾孤老，无人可与交流，自然愁煞老刘。他的女儿安家在西双版纳，夫妻做熟食维持生计。刚好我亦在大理栖居，老刘决定暮年滇游，来看望我以及他一生都视同己出的女儿。我担心他形同盲翁，如何完成这数千里往返。他笑答平生遍历江湖，沿途自会找到相助者。某日凌晨，我接到一陌生电话，要我去车站接他。赶去果见一对父女陪护着风中的老刘，要亲手将他转交给我才放心而去。

在大理，老刘与我一如荒山野老，在夜雨寒窗之下检点平生往事，遥远的伤痛再次令他泪满青衫——老刘的童年是在抗战烽烟下的奉节度过的，后来母亲去世，十来岁的他竟然独自徒步来到利川寻父。父亲是民国利川粮站的一个吏员，1949 之后作为伪职人员饱受打压。他在 50 年代初考上农校，却为莫名其妙的一件小事被开除。反右倾时又因为言论忤逆而被强行劳教，等他释放回来时，父亲已经在饥寒中奄奄一息。他为父亲找来了一点食物，结果饿得太久而狠狠饱餐的父亲，却被胀死了。

他的一生几乎从来没有摆脱过贫困，底层人民的所有苦难他都亲历遍尝。我从未看见过他有任何自怨自艾的时候，他始终乐观地面对一切厄运。我很少看

见比他还耐活的男人，他说他一定要亲眼见证这个罪恶时代的消亡。

而今，我和他都在等着。他每天长歌穿过闹市，在世人的眼里像一个疯子一样的自得其乐。只有我深知，他悲苦的内心有着怎样的痛与恨；在他终年的黑暗里，是在怎样地渴望重见天日那一刻。 T

传知行推荐

■ 好书

一个伟大思想传统的发展与传承

——《奥地利学派译丛》推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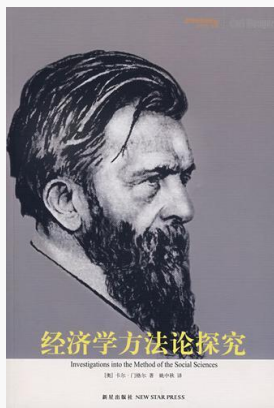
由晨立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魅力，在于其思想和视角的特立独行，在于其语言的毫不留情和敏锐锋利，更在于其对自由市场经济半步不让的固守与坚持。而今天在这里向大家推荐的，倒不全是奥地利学派的经典代表，而是由冯兴元先生主编、新星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奥地利学派译丛》。

奥地利学派形成的标志，恐怕要溯源于门格尔 1871 年完工的大作《国民经济学原理》。门格尔一生专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和思考，但却惜墨如金。他本来计划在晚年完成一部四卷本的经济学通论，却在完成第一部之后就仙逝而去。这有限的第一部完成之后，门格尔并没有继之而起后面的写作工作，而是像犯了强迫症一样的不断修改和斟酌。而另外一个他没有将巨著持续进行的原因，就是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论战中，意识到方法论探索的重要性，于是投入了《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一书的写作工作中。本套译丛中的这本《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初版于 1883 年，是学术界公认与《原理》一书具有同等重要价值的门格尔作品。如果说《原理》一书彻底驳斥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各种荒诞无稽的谬论，并且开边际革命之先河，奠定了奥地利学派的学术根基的话。那么《方法论探究》一书就是在和德国历史学派的论争中，将个人主义方法论充分发扬并使其屹立于现代经济分析中的扛鼎之作。正是这两本巨著，使得在继承了英格兰斯密—穆勒和法兰西魁奈—巴斯夏两股源流之后，经济学在维也纳汇聚而成了奥地利学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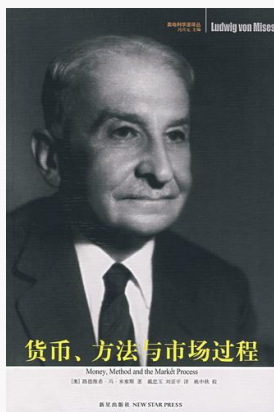


由晨立 You Chen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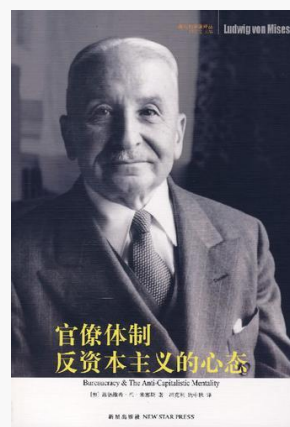
门格尔的思想影响了当时维也纳的众多学子，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虽然不是门格尔真正意义上的入室弟子，但两人都为门格尔的经济学理论所吸引，并加入阐释和继承这一经济传统的阵容中。维塞尔和门格尔一样，后来成为维也纳大学教授，也是最早阐述奥地利学派思想并从事进一步探索的第二代奥地利学人。和他同时代的庞巴维克，不仅是写就了第二代奥地利学派代表作《资本与利息》的思想家，而且三度出任当时如日中天的奥匈帝国的财政部长，长时期负责奥国币制委员会的工作。难以想见，当一位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定信仰者执掌财政大权，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怎能不一日千里。辞去行政工作后，庞巴维克回到维也纳大学教授经济学，更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以讨论班的形式发扬光大。奥地利学派颠覆德国历史学派教学传统的思想，其个人主义方法和自由市场理念深深感染了维也纳的年轻学人。在这群人中，就包括未来成为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的米塞斯。

米塞斯早年求学期间就参与庞巴维克经济学讨论班的讨论。获得博士学位后，米塞斯成为奥国政府的经济顾问。在此期间，他在维也纳大学任教，创办自己的私人经济学研讨会，并成立了著名的商业周期研究所。在此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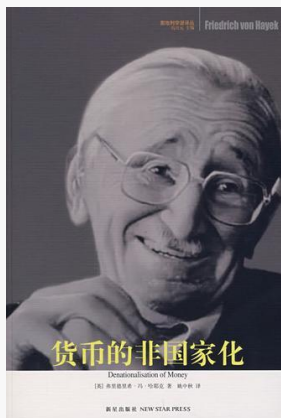


间，他较为重要的两本经济学著作——《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和《社会主义》问世。前者是一本延续奥派风格，重申经济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普及读物。相较于普通的经济学理论著作，它更像是一本政治哲学和社会学作品。而《社会主义》的原名是《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这是一本在共产主义思想蔓延全世界，美好的、乌托邦的计划经济美梦陶醉了众多伟大思想家的时候，米塞斯作出的一份冷静、深邃得令人惊叹的预言。通过强调个人主义和市场的力量，米塞斯指出在失去必要信息的情况下，全社会经济计划的不可行性和不可持续性。这一言论在一个热衷于全面计划、迷恋大政府的时代，无异于疯狂的叫嚣，也使得米塞斯和他的经济学迅速边缘化。二战开始后，米塞斯被迫移居美国，由于已经远离当时的经济学主流，米塞斯只能在一些基金会和企业家的帮助下继续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纽约大学执教期间，米塞斯也完成了其

集大成的作品《人类行为》。而遗憾的是，米塞斯没有看到在自己去世后一年，门生哈耶克就同样因其对商业周期研究的奥地利贡献、对自由市场的论证、特别是对计划经济的批判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也没有如哈耶克般幸运，在去世前一年，见证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真实世界的发展，最终证明了先知的伟大，还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清白。而这套译丛中，收录了米塞斯的两本著作。《货币、方法和市场过程》是米塞斯夫人在其去世后，收集的多篇讨论货币、方法论和交换贸易的重要论文。而《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实际上是两本小书的合集。前者讨论了与市场过程并行的官僚体制的运行特点；而后者，更多的是一本剖析人性的书籍，论证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光荣伟大却饱受批判。



学术传承步入了第四代——大名鼎鼎的哈耶克。哈耶克同样早年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初期跟随维塞尔学习经济学。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后，他逐步开始在商业周期研究所与米塞斯长期的学习与合作。在维也纳以及后来移居英国的早期学术岁月中，哈耶克主要从事经济学的纯理论研究，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有《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以及《资本的纯理论》。此后，随着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全球范围内甚嚣尘上，哈耶克的学术兴趣也开始转向。



以《通往奴役之路》为标志，哈耶克的研究开始集中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或法经济学）领域。其后期的代表作包括《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和《法、立法与自由》等。特别令人称道的是，哈耶克的学术生涯遍布不同时期的四大自由主义学术中心，它们是 20 世纪初的维也纳大学、1930 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二战后的芝加哥大学以及此后西德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弗莱堡大学。正如薛兆丰在其经济散文集《经济学的争议》中说的：“任何一个不懈地探求自由和繁荣原理的人，或早或迟，或多或少，都要读到哈耶克的著作。”而收入本译丛中的《货币的非国家化》，是哈耶克早期货币与商业周期研究的一个小序曲。他在书中反思了“政府垄断铸币权”的成见，认为私人发行货币从而实现货币竞争、让币值在金本位取消后挂钩多种商品的思考令人耳目一新。我自己的读后感呢？哈耶克总是能在老生常谈的话题中，给你一个叹为观止的惊艳视角，让你羡慕甚至嫉妒他，为什么总是能有使问题焕然一新

的奇思妙想。

最后一本书，来自罗斯巴德——《权力与市场》。罗斯巴德是美国人，或者可以说是第一代美国奥地利学派学

者。虽然哈耶克也在二战之后迁入美国，赴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工作；著名的哈佛教授熊彼特也自称是奥派传人。但是奥派经济学传统迁入美国之后，其最鲜明的旗帜仍然是米塞斯，人们也将其称作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在纽约大学开坛讲经，也继续着他的私人讨论班。罗斯巴德就是这一时期他的重要弟子之一。罗斯巴德对奥派经济学深深着迷，此后的一生都致力于奥地利学派思想的研究和传播。他参与创办的两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米塞斯研究所（Mises Institute），成为全世界奥派经济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家园。此外，作为第五代奥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也著作等身。其讨论经济危机的著作《美国大萧条》，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论述了大萧条的成因，指出正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扰乱了市场正常的信息传播功能，使得企业家群体集体性失误，铸就了大萧条的祸因。此书在 1960 年代初版之后多次印行，每一次全球经历经济危机，《美国大萧条》就被人想起。而一旦危机过后，便再也没有人再回忆起当初疼痛的伤疤。这也是为什么时至今日，政府对市场的侵犯越来越深、越来越广。本套丛书中的这本《权力与市场》，是罗斯巴德论述政府与市场职能的著作。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其实就是关于“政府究竟该有多么小”的争论。而如果说米塞斯是信奉自由主义的极端，那在这本书中罗斯巴德恐怕走的更远。在探讨政府边界的论证中，罗斯巴德甚至放弃了政府作为“守夜人”的职能，认为司法和暴力同样能够由市场来提供。当然，要了解罗斯巴德的全面经济思想，可以参考他的大部头作品——《人、经济与国家》。



奥地利学派已经走过一百多个年头。它从辉煌步入低谷，也从主流走向边缘。虽然从 20 世纪初著名的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到今天仍然活跃在学术界的诺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众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声称自己深受奥派经济学影响，甚至是如假包换的衣钵传人。但是今天的奥派经济学，不可否认的面临理论主流化的困境。对于是否应当坚持文字推理论证而排斥数学模型；是否应当为逻辑阐述引入实证检验；以及是否应当以开放的态度参与到学术理论的论争之中等问题，今天的奥派经济学家们仍然莫衷一是。但是，任何理由都不足以阻挡奥派经济思想成为经典。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奥地利学派又将回归主流，成为爱智慧、爱自由的人们的信仰与指南。 T

新闻



点评：香港游行，大陆无语，特区就是特区。

标题：数万香港人游行谴责非警方行动不力

来源：[路透](#)



点评：既无下马之忧，又无切肤之痛，不笑难道哭？

标题：伊春空难后，官员微笑留影

来源：[南方都市报](#)



点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标题：谢朝平著书反映三门峡移民历史被捕

来源：[南方都市报](#)



点评：同为矿工，难道我们的命就不值钱吗？

标题：智利举国营救被埋矿工

来源：[南方周末](#)

文章

“就此而言，新的稳定逻辑应该是：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合法权利，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这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治本之道。就此意义而言，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课题组专家说。

标题：《警惕各地维稳的内卷化》

作者：冯兴元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发生在甘地和印度的非暴力历史，可以说也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历史存在，可是，事后我们假如沉醉于张扬自己的道德感，一味地神化和美化这段历史和“非暴力”的概念，可能是一种很轻率的态度。后代政治家运用非暴力手段时，其实必须非常负责任地、谨慎地对待。

标题：《重读甘地自传》

作者：林达

来源：天翼社区

看到陈志武先生《从茅于軾先生的视角谈“剥削”》一文，依稀记得自己也曾讨论过。百度“樊百华 剥削”果然找到一篇。权利平等下的自由交换是否存在例如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剥削，我还在思考。

顺便说一下陈先生文章中对学界批评茅老的一些批评意见，一概作出否定，可能有失于感情用事。我对陈先生和茅老等的很多著述都很看重，但茅老的许多观点确实需要有不同检讨，例如“教育收费不是高了而是低了”、“中国的粮食不存在安全问题”……，很多学者的批评还是值得肯定的。对学者的最好尊重莫过于对其思想言论作出足够的研究、辨析。茅老说的自愿的交换一定能使财富增长恐怕也不适用于华尔街金融界对经济危机的“贡献”。

优秀的经济学家需要首先研究这一次经济危机提出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不仅是中国的变革。不知陈先生以为然否？

标题：《我这样理解“剥削”不知当否》

作者：樊百华

来源：共识网

第四种就是开放民众参政、推进公平政治竞争，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尼。一个社会对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透明的媒体，二是司法独立。

所以，把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放在广阔的背景上看，我们就可以把本话题聚到一个基本的思路上。过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的官僚制恢复和发展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全面官僚化的二三十年。在此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大，受不到有效约束的官僚特权越来越促使腐败的精致化、深化和全面化。同时期里，中国民间以及中国体制内的那些正义的、公正的反腐败诉求，却越来越被边缘化，起不了制衡作用。于是可悲的，中国社会里文革式政治的情绪重新抬头，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上述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的四种方法，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试过两种半，即军阀的、暴民的、半开明专制的，均无效，但又拒绝第四种。

标题：《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策》

作者：丁学良

来源：共识网

财产和生命究竟哪一个重要？事实上，盗窃罪最初进入当代中国刑法的时候，并没有配备死刑。根据 1979 年《刑法》，盗窃罪最高刑即为无期徒刑。然而在 1982 年 3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规定：对情节特别严重的盗窃罪，可以判处死刑。

五年后，24 岁的刑法学博士研究生邱兴隆准备挑战数量剧增并且还在持续增加的死刑立法。作为他的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喧提醒他，当地以死刑作为博士论文选题不合时宜。

标题：[传奇见证：中国死刑变迁](#)

作者：贺信

来源：财新网

时间一直拖着，始终未见任何解决事件迹象，我们在车尾的几名团友再几次商量要不要动手制服枪手。我们留意他的武器摆放在身上的位置，他走到什么地方时最好动手，商量大家身边有什么可攻击的东西，我说我虽然是身材矮小的女子，但如果男团友可以暂时压着枪手，我可以抢枪和按着枪手的手令他不能行动，给时间车头的团友逃走及求助，梁生亦静静叮嘱子女在行动时要协助抢枪。可是，最终我们仍是犹豫，不敢乱来，皆因枪手把谈判设定的限期往后推了又推，等待政府响应他的诉求

标题：[还死伤者公道，不向弱者抽刀](#)

作者：马尼拉事件生还者

来源：新浪博客

【关于传知行】

ABOUT THE TRANSITION INSTITUTE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立于 2007 年 3 月，英文名称为 The Transition Institute（简称为 TI）。我们致力于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自由与公正的问题与现象，主要涉及税制改革、行业管制改革、公民参与、转型经验研究等等，并通过各种渠道推广给大众人群。其他出版物可从我们的网站上获取。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 83-034 信箱 / 邮编：100083 / 电话：010-62618102 /

传真：010-62618102 / 联系邮箱：chuanzhixing@gmail.com /

网址：www.zhuanxing.org /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华清嘉园 23 号楼 401-403/